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 总第十六期 (2020年5月—2020年7月)

执行主编: 杨弘博 韩 笑

编 辑: 周诗雨 编 务: 陈天传

编 审: 王 瑞 徐 军

特邀摄影: 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 杨 宇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 010-62768010 传真: 010-62768010 邮箱: ihss@pku.edu.cn

网址: 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 文|研|通|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0年第3期总第十六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 目录

### 01 文研学术

-				
	(一)特別推送	02	[02] 戴锦华、孙柏、陈涛、魏然 镜中火焰——	54
	[07] 韩茂莉   地理对于人文研究的意义	02	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	
	[08] 高峰枫   从大西岛到《出埃及记》	04	[03] 苗润博、胡鸿、仇鹿鸣等   官修正史与叙	65
	[09] 罗 新   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	06	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	
	[10] 李伯重   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全球史	11	[04] 程乐松、孙向晨、吴飞、陈少明   在身体	73
	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与自然之间——中西哲学中的自我观念	
	[11] 张 辉   莱辛如何思考文明冲突问题	14	[05] 林小英、陆一、宋萑   素质教育的迷思:	79
	——《智者纳坦》中的指环寓言再释		跨越概念之争与实践鸿沟?	
			[06] 姚达兑、周伟驰、李骛哲   西学知识形态	83
	(二)北大文研讲座	16	在中国(1)-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	
	[167] 阎步克   酒爵大小与人之尊卑——再谈早	16	西学传入与本土化	
	期爵制之物化可视形态		[07] 华喆、吴飞、陈壁生等   重审考据之学——	87
	[168]路 风   工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	21	清代学术的表与里	
	济增长		[08]陆扬、沈卫荣、侯旭东   方法、源流与传承:	92
	[169] 刘云杉   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	24	再谈中西学脉间的陈寅恪	
	到"国家精英"		[09] 狄金华、鲁西奇、熊春文等   危机中的农	98
			村与农村中的危机	
	(三)文研论坛	31	[10] 刘未、郑嘉励、李晖达等   南渡君臣: 浙	105
	[102] 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31	江南宋陵墓新观察	
	(四)云端论坛	51	(五)读书的风景	112
	[01] 叶少勇、范晶晶、王俊淇   多元视角下的	51	• 农业社会学读书会述略	112
	佛教学			

■ 徜徉于中古思想的风景——《续局僧传》读	116
书会简记	
■ 将理论带回生活——记"国家理论"读书会	119
■ 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 ——记"北京·当代	122
中国史读书会"	
■射不主皮——记《仪礼》读书会	128
■ 礼在斯须——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礼经郑	130
氏学》读书会	
(六)丝路现场	133
■ 刘迎胜   寻找东干人	133
■ 张嘉妹   白沙瓦——文明交汇地的今昔	137
■段 晴 陌生的友邻	141
■朱玉麒、姚崇新、荣新江   2008年和田考	145
察行程日志	
■ 罗 丰   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蒙古国纪行	149
(七)线上雅集	153
■ 贾 妍   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	153
■ 张 治   书斋内外的钱锺书	158
■ 李孝聪   历史上的杀虎口	163
(八)袖珍经典	167
■ 苏薇星   济慈《初读查普曼译 < 荷马史	167
诗 > 》诗歌导读	

李 溪   梦中林泉: 苏轼题郭熙的《秋山	167
平远图》	
于 溯   再读《秋兴八首》	172
l	

#### 175 静园学术

■ 数字人又视用下的中国历史研究	176
■ 张大庆   天花根除的全球史	188

#### 195 文研回望

へが日王	
• 文研院开启"云端论坛"再现学者对话与交	196
◆ 文研院携手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第	196
二季音频讲座 • 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之"数字人文视	198
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线上研讨会举行	170

#### 201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 (一)特别推送

§ 07 §

#### 韩茂莉 | 地理对于人文研究的意义





韩茂莉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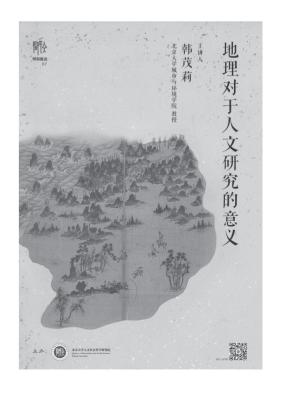
"特别推送"第七期的主讲人是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3月27 日,韩茂莉老师在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 座视频, 主题为"地理对于人文研究的意 义"。本场讲座于5月16日在文研院公众 号和官方网站同步推出。

地理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也与人文 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次视频讲 座中, 韩茂莉老师特别关注地理与人文研 究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在人文研究中运用 地理理念给出了独到的阐释。她认为,要 理性地看待地理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并 善干诱讨地理视角解读社会生活中的寻常 现象, 使地理学成为人文研究的一把钥匙。

无论是自然山川, 还是道路和聚落, 都和人们的活动之间存在着涉及经济、政 治、军事等的种种联系,因此大多人文学 科都会关涉地理。韩茂莉老师首先指出, 地理对于人文研究是有意义的, 而要在人 文研究中落实这一意义, 将地理与研究问 题融为一体,就要科学地引入地理理念。 她以"宋朝具有面向海洋的特征"这一学 术命题为例,对干何谓"科学地引入"进 行了具体详实的介绍。首先, 从地理的角 度看,除东部沿海狭窄地带以外的北宋版 图都与海洋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其次, 从人们的理念、生活方式与交往形式看, 也能发现北宋并不是一个走向海洋、面向 海洋、向海洋开放的时代。即使进入南宋, 虽然王朝版图与海洋的地理距离缩小了, 但民生、理念等等一切依然与海洋相去甚 远。因此,在人文研究中,若不能科学地 运用地理学理念,就会与科学常识背道而 驰,造成对地理环境的误读和误解。据此, 韩茂莉老师强调,科学地引入地理的理念 是人文学科与地理关系之中需要把握的一 个尺度,这不仅是就历史学而言,也同样 适用于其他学科。

接着, 韩茂莉老师继续讨论理性体会 地理的作用的问题, 以更好地理清地理学 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所谓理性,就是 要体察到地理对当下以及历史时期的人类 社会的作用, 韩茂莉老师通过讲述中国版 图上的地理界线,对此做了具体的阐释。 她谈到,中国地形图上的四百毫米等降雨 标线对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 重要的,是它界定了中国东部与西部自然 环境的根本差异,并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 生产方式。该界线以东,降雨量充沛,适 合农业发展; 以西则是干旱地区, 以畜牧 业为主。但其意义不止于此。由于农耕民 族守土保疆真正依靠的是脚下适合耕种的 土地, 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 他们与 草原民族的武力争雄都发生在这条界线之 上。因此,四百毫米等降雨标线在事实上 决定着中国历史时期政治版图核心的位置。 围绕这条界线, 版图随着王朝实力的兴衰 进行"伸缩",直到康雍乾时代,中国的 政治疆域才真正突破了农耕民族与草原民 族的分界, 走向了大西北。在那之后, 西 部地区的高原与山地成为了中国地理版图 上另一条具有重大意义的界线, 它以高屋 建瓴的地理形势, 使中国取得了军事与政 治上的优势。韩茂莉老师进而阐明, 地理 版图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一种屏障,也 是一种资源,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其他 地区也如此。比如罗马帝国, 在一千年的 历史中, 也是遵循着南北两条地理界线, 来完成疆域扩展的。由此可见, 地理并不 是仅仅落实在书本之上的, 它与政治、民 生息息相关,在历史之中始终扮演着一个 重要的角色。

随后,针对许多学科在引入地理理念 的过程中, 地理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两 张皮"的现象,韩茂莉老师以自己的研究 为例,探讨了如何从普通的人类活动现象 发现地理问题, 进而将地理现象变成一种 理论与科学的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她 首先指出,农民生活的空间是由生活圈、 生产圈与社交圈组成的一个圈层结构,其 中社交圈包括婚姻圈、祭祀圈等等,而决 定其大小与距离的则是俗称"赶集"的购 物活动。在其著作《十里八村》中, 韩茂 莉老师以山西为样本展开深入研究,并将 这一地理现象与社会现象提升到了具有普



遍性的理论层面。通过考察设定单日市与 双日市集期的村庄位置,她发现邻近的双 日集和单日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交往 圈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婚姻圈和祭祀 圈。而这个社交圈的空间面积并不固定, 主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第二个关于水渠灌溉问题的学术案例 也来自《十里八村》。以山西通利渠为例, 渠道的上游、中游、下游在使水、用水管 理过程之中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韩茂莉 老师认为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益", 或者"利益的交换和保证"。在利益的命 题下,上游作为水资源的拥有者,因将局 部利益转让给了整个渠道,而拥有了不必 出人出力来修缮渠道的权益:中下游则通 讨付出人力劳动, 换取使用水的权利, 并 由下游派出管理者,来维护使用权的落实。 在分享了自己的两个研究个案之后, 韩茂 莉老师谈到,村庄集市与水渠灌溉中其实 都蕴含着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而研究者 需要理性、科学地将其纳入到地理的理念 之中加以解读。能够从惯常的现象中发现 问题的道理和本质,就是学术的创新。

最后, 韩茂莉老师结合中国历史上的 人口南迁, 深入分析了冬小麦南下过程中 的地理现象。在南宋朝廷租税政策的鼓励 与推动下, 南方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迎来了 积极扩展的兴盛期,但另一方面,南迁的 北方人口在几代之中经历了土著化,逐渐 接受了南方水稻的饮食习惯,导致冬小麦 的种植情况在南宋后期有所衰落,如今只 在南方的丘陵山区有所保留。在视频讲座 的结尾, 韩茂莉老师做了简要的总结。她 提示观众, 在以上的学术案例中, 地理或 是解读问题的关键因素,或是寻常社会现 象的浓缩产物,都说明了地理与人文学科 研究的关系, 彰显了地理在人文研究中的 重要意义。

(整理:徐铖)



#### 高峰枫 | 从大西岛到《出埃及记》



"特别推送"第八期的主讲人是文研 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教授高峰枫。4月27日,高峰枫老师在静 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 主题为"从

大西岛到《出埃及记》——火山与神话"。 本场讲座于5月23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 方网站同步推出。因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尚 未发表,下文仅做简要呈现。



高峰枫教授

在视频中, 高峰枫老师突破神话学、文 献学和文学等传统的人文学科视角,通过梳 理地质神话学 (Geomythology) 领域中的 研究,以一座火山为纽带,连接起古希腊神 话和《出埃及记》中的灾变与神迹, 使得古 典神话和《圣经》的阐释与自然科学领域的 研究发生碰撞,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高峰枫老师表示, 在《蒂迈欧篇》中, 埃及祭司梭伦(Solon)讲述"九千年前" 海洋帝国大西岛一夜之间覆灭; 《克里提 亚斯篇》则提到该岛的许多细节。在此之后, 西方学者就大西岛的存在是历史还是虚构 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一方认为, 这是柏拉图的政治寓言。另一方则视之为 有历史依据的故事,并着手寻找消失的大 洲和远古的文明。比如, 发现美洲大陆之 后, 便有人认为大西岛乃是美洲; 17世纪, 有学者则认为大西岛就在瑞典。进入20世 纪,大西岛的"定位"重返古希腊文明圈。 英国考古学家弗罗斯特(K.T. Frost)认为,

大西岛乃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 是埃 及人误将西北的克里特岛认作世界西极的 大两岛。而希腊考古学家皮利顿·马瑞纳 托斯 (Spyridon Marinatos) 提出, 圣托 里尼(Santorini)火山的爆发,或许是米 诺斯文明衰亡的直接原因。二者结合,便 形成20世纪60、70年代风靡一时的"锡 拉火山理论" (Thera Theory)。

"大西岛热"的副产品,是将锡拉火 山与《圣经》也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认 为,这座火山影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不 仅毁灭了米诺斯文明,而且影响到埃及。 20世纪6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出埃及 记》里的记述可能与锡拉火山相关。这种 理论与此前从科学角度解释《出埃及记》 中"十灾"的研究,采用了相同的思路, 都是从气象学或地质学出发,将圣经中的 神迹归因于自然力,而不必诉诸超自然的 力量。

从地质学角度出发解释圣经中的灾 变和神迹,一方面,延续了"去神话化" (de-mythologize)的进程,用科学来解 释神迹, 这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用理性主 义和自然主义方式来理解超自然事件的传 统。另一方面,《圣经》中无法用经验理 解的超自然事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世俗 化和科学化的解释,对于很多学者而言, 又反而证明了《圣经》中所记载的是真实 无妄的事实。

(整理:周诗雨)



**§ 09 §** 

#### 罗新 | 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



"特别推送"第九期的主讲人是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3月27日,罗新 老师在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主 题为"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本场讲 座于6月5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 同步推出。

讲座伊始,罗新老师谈及几年前他在博客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复兴门外的英国公墓》,文中描述了公墓的历史源流并附有两张抗战胜利后美国人航拍公墓的照片,而这一墓地正是丁韪良的长眠之地。1916年12月初,年近九十的丁韪良在北京因感染支气管炎转为肺炎而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派人致悼词,美国公馆派骑兵开道,将他与他已逝的妻子安葬在西城外那如今已经不存在的英国公墓中。

罗新老师开始注意丁韪良是在 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当时出现了很多讨论丁韪良在北大校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尤其是争论他算不算北大第一任校长。罗新老师倾向于接受与官方校史立场不同的沈弘的论证,即认为大学堂的草创,学科规划的基础工作应该主要是丁韪良带领一帮原同文馆教习做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常见简写为W.A.P. Martin)1827年4月10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其人在23岁生日那天(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不久前往宁波,

开始他漫长的在华宣教生涯,直到1916年12月在北京去世。清末民初国内外的评价,都认为他足以与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并列为最具影响力的在华外国人。丁韪良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成就。

罗新老师认为在他所读过的有关丁 韪良的论著中,美国人柯饶福(Ralph R. Covell, 1923-2013) 所写的传记《丁韪 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W.A.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最为系统、全 面且深刻,这位传记作者与丁韪良的经历 类似,既了解中国,也了解传教事业。不 过,柯饶福是在美国基督教海外宣教史的 框架内来写丁韪良的,正如本计划为丁韪 良写传记的陆鸿基在读到该书后, 在一封 信上写的: "这篇学位论文局限干传教史 的狭小框架,对于作为人的丁韪良及其时 代措意甚少。所以,我觉得还有一定的空 间来另写一本书。" 只可惜柯饶福留下的 空间并没有,至少陆鸿基本人后来认为没 有,大到可以容下另一本传记。罗新老师 在十几年来多次访问印第安纳大学, 当他 在2019年夏天再次到印大时,他决定用最 后的两三周调查丁韪良,了解他的家庭、 他的教育、他的生长环境。于是, 在印第 安纳追寻丁韪良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丁韪良和他哥哥孟子元 (Samuel N. D. Martin)于 1943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一般简称 IU,以下简称印大)学习,1838年毕业,算是印大的早期学生。罗新老师的调查就从印大的校档案馆(the University Archives)开始,但因为印大校园在19世纪多次遭遇火灾,旧档案损毁严重,丁韪良上学时的注册材料已荡然无存,尽管如此,档案馆还是为他建有一个卷宗,收纳和他有关系的后出文件。在卷宗中,卷宗内算得上第一手史料的,只有丁韪良两封书信的复印件,以及印大为早期校友重建档案时丁韪良自己提供的材料和校方给他写的条目,其他都是后来收集的相关资料。

卷宗中有意思的是 1970-80 年代的相 关信件,包括中村忠行捐赠他认为丁韪良 对之影响巨大的书籍给印大的信件,中国 学者王维俭及美国学者柯饶福询问丁韪良 早期资料在印大留存情况的信件。其中, 曾在印大求学的香港人陆鸿基, 查看丁韪 良档案的书最多。罗新老师推测, 陆鸿基 大约在写博士论文,研究艾儒略这位"西 来孔子"时,陆对情形近似的丁韪良产生 了兴趣,于是趁着毕业之前人还在美国, 就开始搜集资料。陆鸿基研究丁韪良的项 目可能开始于1975年8月,得到了时任 印大校长的赫尔曼・威尔斯 (Herman B. Wells, 1902-2000)的帮助,并因此, 陆鸿基与印大档案馆的负责人玛丽·克莱 格(Mary Craig)已有较多往来。柯饶福 1974年春访问布卢明顿时, 陆鸿基还没有 立志研究丁韪良, 所以他的研究计划柯饶 福应该也不大清楚。不过, 陆鸿基初起此 念并接触克莱格时,后者一定会把柯饶福 的情况告诉他。直到1975年柯饶福完成博



罗新教授

士论文答辩之后,陆鸿基才在伦敦读完了他的书,这对于他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无论资料还是主题,重合度实在太高了。所以,陆鸿基必须在柯饶福的论文里找到不足,以找到继续工作的空间。基于初读的印象,陆鸿基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一空间,但是无论如何,陆鸿基 1977 年从印大毕业返回香港之后,似乎就放弃了为丁韪良写书的计划。《中国与丁韪良王朝》这一生平介绍性的文章,竟是他有关丁韪良的唯一作品。

陆鸿基写印大求学时期的丁韪良, 提到他曾爱上威利校长的一个女儿,而他 当时已经决心到中国传教,但是因为校长 反对女儿去中国所以拒绝了这门婚事。罗 新老师发现这个故事是有所本的,但有一 个明显矛盾之处,即丁韪良的哥哥孟子元 (Samuel N. D. Martin, 1825–1903)于 1849年娶了校长的一个女儿并一起到中国

丁韪良他们所到的校长家,即威利校长 1835年自己设计建造的那幢 2层砖楼,如今保存完好,作为"威利旧居博物馆"

生一样, 常常到校长家消磨时光。

(Wylie House Museum) 由印大图书馆 管理。如今很多印大学生,特别是历史系 和图书馆系的研究生,以义工形式参与旧 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他们的研究则以短 篇博客的形式,成为印大建校200周年庆 典校史发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艾莉森・哈克 (Allison Haack) 所写颢为 《孟子元夫妇——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博客, 也提到威利校长对女儿到外国传教的反对 态度。罗新老师还找到了档案中收录的威 利校长在女儿离开半年后给女儿写的第一 封信,解释自己不送别女儿的行为,其中 有着威利校长反对女儿去中国的直接证据。 罗新老师推测, 也许丁韪良的确爱上了威利 家的女儿, 但这段浪漫没有讲一步发展, 很 可能并不是因为校长反对。而威利反对玛格 丽特随夫出国传教之事, 在小小的布卢明顿 一定广为人知。正是因此, 在后来的印大学 生中流传开来的故事就变形为校长反对女儿 嫁给传教士,而故事中的失意情郎,自然只 能是未能娶上威利家女儿的丁韪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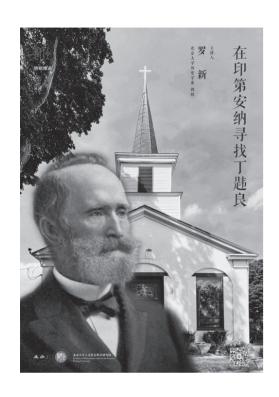


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教职员

罗新老师还在印大档案馆藏威利家庭 档案中发现了玛格丽特写给家人的信函 33 封,从1847年到1886年,其中在中国期 间(1850-1858)共6封。这些信是丁韪 良兄弟传教生活的第一手史料,非常重要。 现存玛格丽特中国来信中的第一封写干 1850年5月23日的上海,信中最重要的 是报告她生下一个男婴的喜讯。由于写干 上海的信没有及时寄出,11天后(6月3日) 玛格丽特在宁波续写了一页, 在其中描述 了宁波的传教教堂情况。玛格丽特在上海 写信两天之后, 孟子元也给岳父母写了一 封信,可能本想和玛格丽特的信一起寄出。 这封信先按时间线介绍了自香港以后的经 历, 汇报了儿子出生的经过, 除了介绍教 会与传教士的情况, 也写了他对上海的观 察,在6月3日他在宁波加写了一段,说 之后开始学习中文。

当最初的思乡念家之情稍稍平静之后, 孟子元和玛格丽特夫妇未必顾得上有规律 地给老家写信。在1850年11月的回信中, 玛格丽特首先用了很大篇幅总结她到宁波 这半年的宗教感受, 然后报告小孩子的情 况,接着介绍了自己夫妻的身体情况。威 利校长病逝于 1851 年 11 月的消息, 是姐 妹们来信告诉玛格丽特的, 1852年3月上 旬信到宁波, 玛格丽特立刻给母亲写了一 封信,说了很多宽慰妈妈的话,也报告了 小 Willie 的夭折。这封很长的信主要是回 忆父亲和想念家人,把强烈的乡思都放在 宗教性表达里。给母亲的下一封信(1854 年12月25日)提供了较多宁波生活的情 况,其中提及了太平天国运动与丁韪良对 此运动的介入情况。从玛格丽特 1855 年 6月写给她的大嫂(长兄小安德鲁之妻) Caroline(昵称Cara, 1825-1896)的信中, 我们可以知道丁韪良兄弟在宁波传教生活 的另外一面, 即不见载于丁韪良回忆的那 一面: "丁韪良这个安息日为两个中国人 施洗, 他们遭受到亲戚们的迫害, 有一位 甚至挨了打,但他们信受真理,奉主耶稣, (勇敢地)在乡亲面前皈依基督。"她还 仔细讲述了教会里的中国教徒邀请从上海 来的几个传教士到家里的晚宴。三个月后 (1855年9月20日) 玛格丽特给姐姐伊 丽莎白的信中, 因为刚刚接到她的信报告 哥哥约翰的死讯, 所以她先表达了对约翰 的哀念,之后玛格丽特谈到在宁波的生活, 尤其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普陀山休假期间的 生活,期间丁韪良还遭遇了一次海盗。孟 子元本心是要扎根中国的,不幸染病,在 宁波宣教8年后,全家于1858年返回美国。 丁韪良自己差不多同时北上上海、北京, 开启了他在华生涯的新篇章。兄弟二人从 此东西悬隔, 再无相聚之日。咽喉伤病是 对孟子元事业的致命打击, 丁韪良说他后 来再也没能独立主持过一个教堂, 但孟子 元显然并未放弃,休整了十来年,身体略 略恢复,他就计划重返中国,但最终未能 成行。

罗新老师在追踪这些材料和故事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现象——传教士的历史,或者说海外宣教的历史,也存在官私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传教士的妻子们有否被提到。只有当我们进入材料,这些妻子们的形象才生动起来、丰富起来,而且我们会发现,在海外宣教的大事业中,女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印大档案馆还收藏丁韪良 1896 年书 信五封,其中一封给当时的印大校长约 瑟夫・斯万因 (Joseph Swain, 1857-1927), 其余都是给波伊森夫人(Mrs. Boisen),后者是威利校长同曾祖父的 堂弟西奥菲勒斯・威利(Theophilus Wylie, 1810-1895)的长女。对丁韪良来 说, 威利校长的影响固然大(柯饶福在书 中重点从神学思想角度论证较多),西奥 菲勒斯·威利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特别是 在自然科学方面。丁韪良在中国办学极为 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些科目可以 追溯到西奥菲勒斯・威利。1896年丁韪良 出版《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y), 让 出版商给印大的斯万因校长寄了一本。丁 韪良这时在纽约治病一年多,在身体有了

明显好转后,想起自己从印大毕业已50年,有了返回母校参加纪念仪式的念头。于是他给斯万因校长寄书,并主动写信给波伊森夫人,后者自然立即邀请他返校,并代表自己的母亲邀请丁韪良到家里来做客。

有两封信都写于 1896 年 10 月 11 日,第一封是因收到波伊森夫人寄来的印大新手册,为了表示感谢。这封信寄出两个小时后,丁韪良收到波伊森夫人的来信,于是赶紧写了第二封信。罗新老师推测,大概这封匆匆补写的信主要是为了回答波伊森夫人的提问,她一定提到了 8 月底 9 月初李鸿章到访纽约之事。丁韪良在信里详述了自己返回中国的旅行计划,比如要先到新奥尔良,从那里坐火车到旧金山,再上船进入太平洋。他强调自己不会早于次年 3 月动身,事实上他 1897 年春就已返回北京,这说明他出发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罗新老师在调查丁韪良家世的过程中, 逐渐对 19 世纪中西部拓荒史有了一定了 解。丁韪良出生成长的小镇利沃尼亚,在 印第安纳州南部,属于华盛顿县。印第安 纳的拓殖是从南部开始的, 因为拓荒者的 一个重要来源是肯塔基州, 而那些穿过俄 亥俄前来印第安纳的,则往往顺俄亥俄河 而下,也是在南印第安纳上岸。罗新老师 在印大图书馆查到的本州教会史和本州地 方教育史的著作,都表彰了老马丁在拓荒 时期的独特贡献。老马丁不仅在传教布道 方面足以载入印第安纳的历史, 他还在该 州早期教育史上有相当贡献。他在1819年 就建立了一所学校——"老木屋学院", 是印第安纳州历史上第二早的同类学校。 从这个小木屋里启蒙的学生,有很多后来 成为了律师、牧师、商人和学者。除了中间为三个儿子上大学搬家到布卢明顿6年之外,老马丁一家一直住在利沃尼亚。

9月11日,罗新老师与朋友一起开车前往华盛顿县,在去历史学会所在的县治萨勒姆(Salem)之前,他们先访问了利沃尼亚小镇,向南到利沃尼亚墓地,进去寻访老马丁的墓碑。随后,他们前往县治所在的萨勒姆。县历史学会收集的材料包括了一切相关的地方史史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县史专家杰里米·艾略特(Jeremy Elliott)带来了《上帝之下的朝圣者》(Pilgrims under God)。据罗新老师调查,这个历史学会最重要的藏品是丁韪良晚年所写的两封写给Cousin Grace 的信(1914年和1916年)。Cousin Grace 是丁韪

良的堂侄孙女,她这时与丁韪良联系,可能是为纪念长老会在利沃尼亚建立教堂满100周年做准备,有些家族历史问题要问丁韪良。丁韪良当时年事已高,他在信中谈到: "11号回来,我看到上百封贺信和一车装的卷轴,其中最棒的来自袁总统。64年来,我操劳于把十字架种植在中国人心里,我的努力虽不能说是尽付东流,但中国官员似乎更欣赏我引介国际法的工作。"与堂侄孙女 Grace 的书信往来,是丁韪良在生命进入秋天树叶将落阶段与故乡意外的连接。告别萨勒姆,罗新老师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之旅也结束了。

(整理: 王诗瑜)

**§** 10 **§** 

### 李伯重 | 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特别推送"第十期的主讲人是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5月15日,李 伯重老师在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 主题为"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全球史 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 系"。本场讲座于6月19日在文研院公众 号和官方网站同步推出。 本次讲座的内容围绕疫情之下大家所 关心的一个问题展开——中国能否离开世 界?李伯重老师从五个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回答,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经济起起伏伏 的历史变化,第二部分着眼于中国外贸在历 史中的波动,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 中的优势和劣势,第四部分回顾中国的发展 之路中如何扬长避短,第五部分结合历史经 验教训对今天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李伯重老师在第一部分对中国经济在 历史上的大起伏进行了论述。在人们日常印 象中,中国在清代是处于衰败和没落的时 期,是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度,这 也是过去国际学界的共识。然而一些学者的 研究对此进行了质疑。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 的研究,从18世纪初到1820年的一百多 年间,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欧洲、印度等其 他经济体, 在18世纪初中国的GDP占全 球的22.3%,在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处于第三, 而到了182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 的经济体,占到全世界GDP的32.9%。冈 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也认为。 直到 1820年,中国依旧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而且这一中心地位远高于美国在今天经济体 系中所占的地位。即使从人均收入上看,在 1800年左右的时期,中国在世界上也处于 发达的地位。中国的富裕和繁华,是西方人 一直希望敲开中国大门的原因。

但是从182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长 达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衰退。至1913年、中 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一路下滑到 9.1%, 到 了 1952 年, 这一比例进一步降到 5.2%。在 1820-1925年之间,全世界六大经济体中, 其他经济体都在增长,只有中国经济在一路 下滑。1913年时,中国人均GDP已经下滑 到世界人均 GDP 的 36.7%, 1952 年更下降 到 23.7%, 成为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新中 国成立后, 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 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更快, 至 1978年,中国仅占世界 GDP 的 4.9%, 中国的人均 GDP 仅 978 美元 (1990 年的美



李伯重教授

元),依然达不到世界 1/4 的水平。然而改 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 的时期, 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 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从历 中来看,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大起伏,从 18世纪的繁荣转变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 半期的衰落,到20世纪最后的30年又开 始出现奇迹般的增长。

在第二部分中,李伯重老师对历史上外 贸情况进行了分析。李伯重老师指出,随着 中国经济的大起伏,外贸同样经历了大波动。 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一 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中国人对于外贸没有兴 趣。但最新的研究显示,实际上在1800年 以前,中国拥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技术、 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不仅没有脱 离世界市场,而且在市场竞争中无可匹敌。 凭借着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 当时世界 市场上的高端消费品如瓷器、丝绸等几乎被 中国所垄断,喜爱中国产品已经成为18世 纪欧洲的风尚。除了瓷器、丝绸等奢侈品, 棉布、茶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贸易项目,中国 所生产的"南京布"甚至深入了英国的农村、 饮茶的习惯也被英国所接受。在18世纪, 中国对欧美各国的贸易额度不断增长, 其中 增长最快的是中英两国的贸易,至18世纪 末期中英两国贸易额已经占中国对欧美各国 贸易总值的80%左右。而且中国在对各国 贸易中均处于顺差地位, 所以当时欧洲各国 在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作为贸易偿付的硬通 货流入中国, 促进了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国际贸易 的转折点。在大家的常识中, 打开国门后中 国的国际贸易数额应该迅速增加, 但是事实 上. 从此以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的份额持 续下降, 进入了一个大衰落的阶段, 1913 年时中国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额的1.7%, 1952年只占 1.6%, 1978年时仅有 1%。但 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迅速增 长,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 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李伯重老师认为,通 过中国历史上经济起伏和外贸波动的比较可 见,中国的外贸与经济一直有十分紧密的联 系,经济和外贸的衰落繁荣是同步的,这一 现象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息息相关。

在第三部分中,李伯重老师着重分析了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以此解释经 济和外贸的同步现象。李伯重老师认为,中 国的经济资源特点是自然资源不足却拥有众 多且质量高的人力资源。从自然资源方面来 看,中国的耕地面积受到严重限制,人均耕 地资源更是十分不足,而从工业生产体系所 需的各项矿产资源来看,中国不仅主要的矿 产资源分布分散,而且一些矿产资源数量和 质量较低,因此,中国的工业体系对世界其 他国家有较高的依赖。而从人力资源方面而 言,中国拥有数量众多且质量较高的劳动力, 不仅工作勤奋, 而且重视教育, 具有商业精 神和才干,这些特点是在历史上长期培养形 成的。优秀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强 的学习和生产能力,能够快速降低商品的生 产成本,这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

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上述的两方面特点, 因此在第四部分中,李伯重老师认为,中国 要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必须要弥补自然资 源上的劣势,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而唯一 的办法就是和平贸易。在19世纪初,中国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出口国,农业资源的 束缚限制了国内的棉花生产, 因此当时的中 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18、19 世纪,中国人的足迹也遍布东南亚地区,在 当地大规模开采矿产运回中国本土。繁荣的 对外贸易促使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外向 型经济,经济活动与世界各国紧密相关。

李伯重老师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国贸易经 济的影响,实际上体现在随之而来的各种不平 等条约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 位,中国的优势无从体现。诸多不平等条约剥 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大幅降低中国关税的同 时,各国对中国商品课以极高的关税,从而逆 转了中国商品对外输出的强劲势头。加之割地 赔款、中国被划为列强势力范围等原因, 使得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处境愈加艰难。这一局面 直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扭转,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找到了一 个规模空前、增长迅速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快 速增长。世界市场为弥补中国的自然资源劣势,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提供了空阔的空间。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中,李伯重老师 分析道,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需要 世界,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开放。 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面临着各方面的 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希望将产业从中国转 移出去,还与中国存在贸易争端,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体系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部分 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需,粮食饲料也 需要大量进口,而自身制造业水平尚未提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高,很多高端制造业关键零件高度依赖外国。这说明中国依然十分需要世界,而从历史得出的经验也可以看出,只有充分进入世界中国才可能繁荣。因此,李伯重老师最后总结道,当前中国进一步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整理: 包堉含)



### 张辉 | 莱辛如何思考文明冲突问题——《智者纳坦》中的指环寓言再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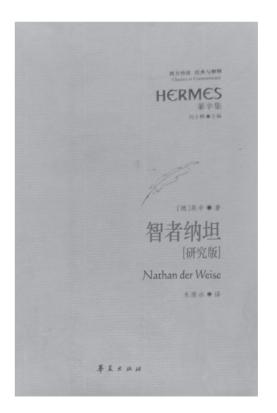
"特别推送"第十一期的主讲人是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5月19日,张辉老师在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主题为"莱辛如何思考文明冲突的问题?——《智者纳坦》中的指环寓言再释"。本场讲座于6月27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同步推出。因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尚未发表,下文仅做简要呈现。

本次讲座,张辉老师在揭示《智者 纳坦》圈层结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 全剧的中心事件"指环寓言",从而 思考莱辛是如何思考宗教冲突、文明冲突等现代社会最为敏锐、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智者纳坦》是德国戏剧家莱辛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剧。 在开篇的题记中,莱辛提到的"诸神"或"众神",即神与神之间共在而又冲突的状态,恰恰反映了文明冲突的问题,这也是整部剧作关切的核心主题。面对现代社会最为敏锐、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莱辛似乎并没有用《智者纳坦》直接给出唯一的解答,



张辉教授



菜辛《智者纳坦》 (研究版) 书影

而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思想的酵素", 启发我们进一步追问与思考。

《智者纳坦》是三层套圈结构: 外圈是由纳坦家族所代表的十字军东征 (1187-1192年)的时代氛围,交代了整 体的背景;中间圈是萨拉丁家族的故事, 体现出戏剧的脉络;内圈是处于整个戏剧 中心位置的指环寓言,反映了莱辛对于"如 何理解和看待文明冲突的事实?"、"如 何寻求解决之道?"的判断和思考。

张辉老师在视频中指出,目前知道的指环寓言的第一个版本,出自约成书于1300年代的《罗马传奇》,与其对读的另一版本的故事是1879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其中指环依然是具有宗教隐喻的特征。真正与上述两个版本形成对照的,是薄伽丘《十日谈》中的第三个故事。在莱辛的《智者纳坦》中,萨拉丁向纳坦提出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这三者之中,到底哪一种才真是正宗"的问题,这也是引发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关键问题。纳坦选择用指环寓言进行回应。莱辛在这里通过对指环寓言的改写,直面现实而更面向未来,既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的残酷,也激励我们相信爱与行动的力量。

(整理:周诗雨)



#### (二) 文研讲座

**§** 167 **§** 

### 阎步克 | 酒爵大小与人之尊卑——再谈早期爵制之物化可视形态

2020年6月9日上午,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酒爵大小与人之尊卑一再谈早期爵制之物化可视形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

阎步克老师介绍说,邓小南教授希望他 以近年对饮酒礼器与早期爵制的思考为题, 分享研究心得,于是他应命登台。爵是中国 古代区别尊卑贵贱的主要手段,具有超常的 稳定性。阎老师谈到,在整齐清晰的爵列产 生之前,"爵"曾有一个"原生态"的发展 阶段。"原生态"是相对于"行政化"而言 的。原生等级标识是物化的,具有直观可视 性的,直接诉诸视觉形象与心理感受,一望 即知、一目了然。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体现于座席次序和行礼次序上;一类体现于 物品、礼器的质量、样式与用法上,前者是 空间化的可视化权势,后者是物品化的可视 化权势。

早在周代,封爵称"爵",尊贵称"尊",而"爵"是饮酒器的通称,"尊"是盛酒器的通称。可见中国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等级用词,都和酒器有关——这就是原生可视性等级标识所留下来的一个历史胎记。

西嶋定生提出,最早的爵列,其实是饮酒礼上的坐席排列和酒爵的巡行序列,"赐爵"本身就指明了饮酒仪礼的举行。由此,西嶋就把酒爵与封爵内在地联系起来了。2018年,阎步克老师为文研院做了一个讲演,题为"制度史视角中的爵与尊——早期爵制的原生性可视化形态",其内容就是空间关系中的原生态的爵。

本次讲座以酒器为题,转而讨论第二 种原生性的可视标识,也就是物品化的身份标识。

学者有"无酒不成礼"之说,酒爵是上古典礼中一种主要礼器。根据礼书的记载,古代饮酒礼上使用的饮酒器,主要有爵、觚、觯、角、散五种,它们可以合称"五爵"。 所以"爵"既是饮酒器的总称,同时又是某一种饮酒器的专名。

那么,五种饮酒器各是什么样子呢?根据文物考古词典,爵是有流、有尾、有鋬、有柱的三足酒器;觚是侈口细颈、状若喇叭的饮酒器;觯是侈口、束颈、深腹、圈足的饮酒器;角是形状似爵、但无流无柱的酒器;散,王国维认为是"斝"字之讹,斝是形状似爵、但无流无尾的酒器。这五种不同器形的饮酒器,不妨称为"五器"。这五种酒器

之名,系宋人所定。宋人王黼《宣和博古图》就绘制了青铜爵、觚、觯、角、斝的形象。 考古实物中也可以找到"五器"真实存在的证据。如1901年宝鸡西周墓出土、后被端方收藏的"柉禁诸器",以及1930年代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一组十器,恰好都是"五器"俱全,后者还与《仪礼·特牲馈食礼》中的经文"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相吻合。

现代礼学家和经学家就用宋代金石学家命名的商周"五器",来阐释礼书中的"五爵"。但这种做法面临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时代不合。如郭宝钧与朱凤瀚等考古学家所云,殷商盛行的青铜爵、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已经消歇了,而春秋末到战国前中期成书的《仪礼》等礼书,所反映的是东周以来礼制。则礼书所说的爵,就不会是商西周时的铜爵。第二个障碍是功能不合。考古学者认为,宋人所定名的三足器爵、角、斝不是饮酒器,而是温酒器,所以一些爵、斝的底部能看到烟熏的痕迹。宋人取礼书"五爵"之名,将之安在了商周五种酒器实物上,但"五器"与"五爵"间却横亘着时代与用途两大障碍。

那么,礼书中的爵到底是什么?自东周到北宋的十七、八个世纪之中,人们对三足爵已一无所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文献中酒爵应另有所指——或为某一饮酒器的专名,或为饮酒器的通名。在宋人聂崇义《三礼图》中可以看到,此时经学家、礼学家对"爵"的看法与王黼等金石学家所认定的"五器"判然不同。郑宪仁认为,东周礼书所记载的五种饮酒器,与被金石学者称作爵、觚、觯、角、散(斝)



酒爵

的五种酒器,是两套不能相合的体系,虽然用了相同的名称,但在诠释上难有交集。 但在阎老师看来,"五器"与"五爵"虽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其间依然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随即, 阎老师向听众揭示了礼书"五爵" 的真相: "五爵"其实是一套"容量化器名"。 对《礼记·礼器》的"贵者献以爵,贱者献 以散: 尊者举觯, 卑者举角"之文, 郑玄注 引《韩诗外传》,用容量大小来阐释相关饮 酒器名: "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 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这里的一 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 阎老师认为 都是容量之辞。一升的饮酒器就叫爵,二升 的饮酒器就叫觚,三升的饮酒器就叫觯,四 升的饮酒器就叫角, 五升的饮酒器就叫散。 阎老师强调:礼书"五爵"中的爵、觚、觯、 角、散(斝)概念,所指并非商西周之"五 器"、"五爵"仅仅是容量概念、而非器形 概念, "五爵"的区别仅仅是容量之别,而 不是器形之别。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除了《韩诗外传》,还有若干文献,显 示"五爵"之名实为容量概念。《周礼·考 工记》: "梓人为饮器, 勺一升, 爵一升, 觚(觯)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这也表 明,一升之饮酒器即称为爵,三升之饮酒器 即称为觯。而且这爵、觯都是由"梓人"即 木丁制造的, 说明"五爵"都是漆木饮酒器, 不但不等于"五器",而且不是青铜器。在 先秦鲁地礼乐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叔孙 通,其《汉礼器制度》也有"觚大二升,觯 大三升"之文,同《韩诗外传》、《考丁记》 的酒爵容量的陈述完全一致。

许慎《说文解字》,另有觯四升、觚三升、 斝六升之说。阎老师推测说,这当是另一套 容量等差。不同文献中的不同容量记载,可 能来自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没有疑问的 是,它们都采用"容量化器名"来解释相关 饮酒器。

此外, 做为酌酒器的勺容量一升, 用作 罚爵的觥容量五升或七升。把勺、觥也考虑 在内, 便形成"1+1・2・3・4・5+5 或7" 这样一套完整的容量组合了。

然后, 阎老师借用"业务需要"与"政 治需要"两个现代语词, 阐述容量化器名产 牛的原因与发挥的作用。

首先阎老师推测, 西周中期"五器" 消歇以后,礼乐人员借用昔日爵、觚、觯、角、 斝之名,用以转指五种不同容量的饮酒器。 借用旧名, 比另创新名简便; 以器名转指 容量,可以使表达简便。在礼乐人员赞司 礼乐时, 比起"请您使用一升之饮酒器"、 "请您使用二升之饮酒器"这样的表述,"请 您用爵"、"请您用觚"之语显然简洁得 多,一听便知。这就体现了人类语言的经 济原则——用最简的语言形式传达最多的 信息(可参马丁内《普通语言学概要》)。 显然,商周"五器"与东周"五爵"的称 谓原理判然不同, "五器"是一套器形概 念,指的是五种不同形状的饮酒器;"五 爵"则是一套容量概念,指的是五等不同 容量的饮酒器。从"五器"到"五爵", 发生了一个命名策略的转变,转变的动力, 就是礼乐人员的业务便利。

采用容量化器名,是服务于政治需要, 用物化可视的方式区分贵贱亲疏。古人说 得非常明白, "礼"的功能就是区分贵贱 亲疏。具体到利用物品、物体来区分贵贱 亲疏上,礼书阐述"以多为贵"、"以少 为贵"、"以大为贵"、"以小为贵"、"以 高为贵"、"以下为贵"、"以文为贵"、

"以素为贵"等原则。其中"以小为贵" 的原则,就适用于酒器使用。地位越尊贵, 使用的饮酒器与盛酒器越小。

阎老师提供了三个例子, 以展示"容 量化器名"是如何服务干"以小为贵"原 则的。第一个例子是《礼记·礼器》的"宗 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这 里所说的是, 宗庙祭祖献尸。在先秦祭祖 礼上,会选定一位孙辈的小孩担任"尸", 代表祖先接受家族成员的献酒。参考孔颖 达疏, 在向尸献酒时, 献酒者依身份高低, 使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 天子、诸侯和大 夫地位高,使用一升之爵献尸;士等而下之, 使用四升之角献尸, 协助行礼的群吏之佐 食者地位最低,用五升之散献尸。可见地 位高则其酒爵容量较小, 地位低则酒爵容 量较大, 这就把"以小为贵"落到了实处。

第二个例子是《礼记・礼器》又云宗庙 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参照孔颖达 疏引崔灵恩的解释,这涉及的是士等级的贵 族举行的祭祖礼上, 尸与主人的相对关系。 尸是代表祖先的,相对于主人他是尊者,所 以使用三升之觯: 主人相对干尸是卑者, 所 以使用容量大一号、等级低一等的四升之角。

除了根据献酒者本人的身份高低而使 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之外,有时也会依照献 酒的对象来决定酒爵大小。第三个例子就是 这种情况。根据《仪礼》对大射礼和燕礼叙 述,向公(国君)献酒要使用象牙装饰的象 觚;向卿大夫献酒,使用普通的二升之觚; 向士献酒,要用三升之觯。郑玄云:"献士 用觯, 士贱也。"士等级最低, 所以向士献 酒用较大的酒爵。这就是根据献酒对象之尊 卑, 而换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的情况。

除了区分尊卑, 这套容量化的饮酒器还 用以区分亲疏。在传统中国, 忠于君和孝于 亲,是两项核心价值观。与之相应,传统礼 制除了区分尊卑贵贱, 还要区分亲疏远近。 《仪礼·特牲馈食礼》有"实二爵、二觚、 四觯、一角、一散"之文,据郑玄的注解, 其中爵、觚、觯,就用以区分主妇、长兄弟、 众宾长等的不同身份。

由礼书中的饮酒器具体用法, 阎老师得 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爵必为五。必须备齐 了五种不同酒爵,相关典礼才能正常进行, 否则若干仪节就不成立了。第二,以小为贵。 贵者用大爵、卑者用小爵, 疏者用大爵、亲 者用小爵, 在礼书中也斑斑可考。第三, 五 等之差。"以小为贵"必然体现在容量上, 那么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的容量 等差,就势在必行。这三者都干史有据,并 不是后人凿空悬拟、向壁虚构的。通过在饮 酒典礼上随时换用大小酒杯,来体现贵贱亲 疏,这样一种饮酒器礼制,在世界史的范围 之内,是独一无二的,反映先秦等级礼制的 无与伦比的精致程度。

除了饮酒器, 先秦礼书中的盛酒器的 器名, 也是"容量化器名"。《礼记·礼器》: "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 此以小为贵也。"盛酒器分为三等: 君主 使用瓦大(或名瓦甒)最小,容量五斗; 卿大夫使用方壶,容量一石;堂下的士庶 子使用缶,容量更大。

阎老师并没有回避这样一个问题: 仅仅 证明了"五爵"容量有异,那还不足以证明 它们器形无异。假如"五爵"器形也有差 异, 甚至是类似"五器"那么大的差异, 那"容量化器名"的论点就将缩水打折了。

对此阎老师指出,从先秦到宋初的礼学家, 一直传承着一个"凡诸觞皆形同"的说法。 盛了酒的酒爵叫做"觞","凡诸觞皆形同" 就说明"五爵"的外形无异。聂崇义的《三 礼图》为觚、觯、角、散提供的图像、都 是筒形杯。《三礼图》所引用的"旧图", 也明言觚、角、散三器外形相同。所谓"旧 图",就是汉唐间绘制的六种不同礼图, 它们构成了聂崇义《三礼图》的基本依据。 阎老师相信, "凡诸觞皆形同"之说不可 能凭空产生,它在各种礼图中一以贯之、 一脉相承,还可以通过叔孙通的《汉礼器 制度》,一直追溯到先秦礼家那里去。"凡 诸觞皆形同"这个传述,对理解"五爵" 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说"凡诸觞皆形同",那也得有 个具体样子。对这个问题, 文献提供的信息 很不充分, 而春秋末到战国初年若干青铜器 上的刻纹,可以提供帮助。公元前5世纪中 叶,描绘射礼、采桑、打猎、宴乐等生活景 象的刻纹,开始在青铜器上流行起来。它们 的出现时间,同《仪礼》十七篇的写作时间 大体相同,而且栩栩如生,相当写实,学者 认为其中很多场面,都可以与礼书中所记载 的射礼、乡饮酒礼、飨宴之礼等比照印证。 看来春秋战国之际古风未泯,贵族们不忘初 心, 仍以射礼、乡饮酒礼、飨宴之礼作为娱 乐之方。细审战国宴乐图中所见的饮酒器, 其中绝无三足器的影子,基本都是筒形杯, 具体说来,都是侈口、细腰、喇叭形的酒杯, 形状和觚相去不远。

若从考古实物看,三足爵、三足角、三 足斝均非饮酒器,而被认为是温酒器。则商 周常用饮酒器觚、觯、杯、尊等,都是筒形。

就"筒形"而言,礼家"凡诸觞皆形同"之 说符合实情,足以取信;礼书"五爵"既非 三足爵,亦非青铜器,而最可能是漆木器、 筒形杯。

最后, 阎老师向大家说明, 本次讲座 的主要内容,来自他的《礼书"五爵"的称 谓原理:容量化器名》一文(《史学月刊》 2019年第7期)。此后他又发表《由<三 礼图 > 中的雀杯爵推论"爵名三迁,爵有 四形"》一文(《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 第6期),文中推测爵名曾有过三次转移, 由此留下了三足爵、斗形爵、筒形爵、雀杯 爵四种称爵的器形。又, 在刊于《中华文史 论丛》2020年第1期的《<仪礼·士虞礼 > 所见废爵、足爵、繶爵辨》一文,考察了 废爵、足爵、繶爵三爵,认为它们都是斗形 爵, 但废爵无足。

讲座接近尾声时, 阎步克老师对几个问 题做出了解答。韩巍老师提出,觚形酒器不 一定是漆木觚。阎老师回应说,春秋以来日 益崇尚漆木礼器。礼书中若干礼器以往在被 释为青铜器,现在看改释漆木器可能较好。 考古学者未能提供足够的春秋饮酒器实物, 但宴乐图中的饮酒器显系觚形。当然,"觚" 是借用了宋人命名,我文章的提法是"筒形 杯",基本论点表述为"五爵都是筒形杯"。

(撰稿:徐铖)



#### 168

#### 路风 | 工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国际主流学术 的进程中, 我们该如何通过对中国自身田野 与历史经验的深入理解, 重塑中国社会科学 的想象力? 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一问题, 文研 院组织发起"质性研究"系列讲座。该系列 首场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八 期在线上平台以视频形式推出, 主题为"工 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主讲, 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评议。

路风老师从经验研究的意义谈起,指 出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经验的, 因为 理论需要经验证据,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 本身不能相互独立,一切理论研究必须有 经验证据。当我们出发去研究一个问题时, 首先面对的是事件的结果,即因变量。而 质性研究就是需要透过结果,深入到事件 过程去理解因果关系本身, 而不是以想当 然的逻辑"去解释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 而做质性研究的意义就是要去理解这个讨 程,从现实中、过程中、历史中去理解所 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通过考察事件的初始 条件如何转化为事件的结果,在各种事件 的联系中发现解释变量,找到因果关系的 可观察证据。而当今社会科学理论由西方 学界所主导的条件下,经验研究对回答中 国所关心的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特 别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许多常规思维 的解释范围, 质性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概括



路风教授

出重大主题,识别新的变量,产生新的概念。

路风老师在重新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 原因时, 先回溯了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 原因的流行性解释。第一是发展战略的改 变。从以前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遵循比较 优势, 即发展劳动密集型优势; 第二是市 场化改革。通过产权改革, 使得20世纪末 涌现了3000多万户民间企业,成为了中国 出人意料发展的基础推动力。此外, 市场 化还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让中国融入 世界经济的同时利用发达国家的机会扩大 出口, 引进国外技术, 以此来缩小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差距。路风老师把这些流行性 解释所代表的"世界观"称为"主流范式", 它的理论逻辑和表达深受主流经济学的影

响。因此,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在 很大程度上是从理论中推演而来,并不是 被经验证据所证明的,它们并没有给出属 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奇迹般发展的原因。

199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在 紧缩。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通货膨胀经 济过热的现象,采取了宏观紧缩政策。到 90年代末,自然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以 及中国采用宏观紧缩政策带来的通货紧缩 等等,这些成为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转 为扩张的重要条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 产生了很多有利条件, 触发了中国经济在 2000~2014年连续15年史诗般的高增长。 这场高增长使得中国连续超过法国、英国、 德国和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路风老师从工业研究的角度出发,将 工业变量引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 现高增长。首先,他从钢铁工业谈起,发 现中国钢铁工业增长的现实与"比较优势" 和"市场化"等流行的理论解释是矛盾的。 以 2000 年为界, 所有的中国工业都经历了 一次迅速增长, 而对钢铁的需求主要源于 体系因素, 而不是钢铁工业本身。所有的 部门都在高增长, 所有的部门都需要钢铁, 强劲的需求为中国的钢铁工业高增长提供 了条件;另外,钢铁工业内生于中国经济体, 其高增长也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带动的: 此外,中国冶金设备工业的增长,以及技 术进步的力量也成为了推动钢铁工业增长 的主要原因。路风老师以无缝钢管、水泥 工业设备以及电气设备工业、石油和化学 工业、石油钻采设备工业等为例,详细地 描绘了中国工业的高增长现状。陆风老师 还提出,中国发展工业本身也经历了技术



引进的几个阶段。他将中国在1980年代之 后形成的技术政策称之为"三段式"的政策, 即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到实现国产化, 再进行自主开发,但政策的逻辑并未经受 住实践的考验, 这条路并没有走通。他以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半导体工业和飞机 制造业等为例,说明了"三段式"的技术 政策存在的缺陷。

路风老师也论述道,技术引进是工业 发展的一个常量, 而工业能否发展良好且 有效益,则取决于是否有自主开发的基础。 在拥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基础上,引进技术 就能起到正面作用, 若完全依赖引进, 很 容易出现技术依赖的状态,导致结局的截 然不同。他以中国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为例, 说明了中国高铁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因 干"走向自主创新"和以高铁替代传统铁 路的"激进方针"。此外, 他还以中国核 电的发展为例,详细论述了世界不存在不 进行自主开发就可以消化吸收技术的可能, 更谈不上"再创新"。如果引进方没有技 术能力的基础,那么"引进"本身不会带 来任何技术,只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 技术的使用权。路风老师还谈到, 国有企 业可以转变为竞争性企业。他以济南二机 床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为例指出,虽然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但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工业上不断推进发展. 实现了涅槃。路风老师同时提及中国的民营 企业的发展也以已经存在的工业体系为基 础, 所以才能广泛地出现在资本密集型工业 中。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和重组, 国有和民 营企业形成共生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结合以上论述, 路风老师指出, 应把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变量看成是中国工 业体系的演讲。中国从1950年开始工业化、 工业体系建立的年代是在人均收入极低的 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系列类似于发达国家 工业结构, 但计划经济的缺陷使得其效率 不高, 潜力发挥不出。70年代末到90年 代末,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改革 获得的非常大的成就就是在基本没有破坏 中国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工业体系 的市场化,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同样付出 了牺牲,经历了失误和试错。另外,具备 了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较高的技能水平的"组 合",中国在加入世界经济之后也具有相 对较强的竞争力。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 主体可以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响应的条件 下,中国工业体系受到一系列有利因素的 触发, 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以上所陈述 的因果关系构成了主流范式无法解释的"非 常规事件",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主流范 式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因解释并不充分。更 重要的是,对"非常规事件"的合理解释 有助于形成新的"范式",帮助理解中国 经济高增长的原因。

随后,路风老师结合当下的贸易战, 以半导体工业发展为例,提出了保护中国 高技术工业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解 释了近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下行的原因。陆 风老师提出,2012-2013年以来,中国工 业被看作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的、产 能过剩和需要改造的经济部门,这一定程 度上带来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的 结果, 所以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出现了下滑 现象。在这种思维之下,人为地将工业划 分为高和低、新与旧,把它们看作是对立 的和互相替代的关系,例如现在所提的新 旧动能转换, 这对于研究工业来说是不正 确的。因为工业技术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已 有的产业基础之上, 若是将其看成新旧对 立的关系,就完全违反了工业发展的规律, 依此而制定的政策其效果也有待考量。

讲座最后,路风老师对中国的工业发展 提出自己的展望。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中 国收缩的经济战略应当转向进取战略。通过 重振经济增长,推动基础产业升级,依靠自 主研发突破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瓶颈。

评议环节, 刘世定老师发表了五点感 想。首先,路风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 解释涉及了历史过程视角、作用机制视角, 此二者对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都很重要。第二,从历史过程视角出发时, 若想找到现实历史过程中各环节的衔接方 式,不仅需要拥有时间序列层面的认识,还 应考察各要素之间的现实作用机制,这便要 求研究者选择彼此匹配的研究目标、视角与 方法。第三, 处理历史衔接性问题时, 研究 者需要具体考察历史过程所历经时段的长短 差异与影响,及其所体现的历史关联复杂性。 第四,在进行机制研究时,研究者需要谨慎 地澄清概念,尤其对于流行、常用的概念,

更需要考察其涵义源流, 选择与研究内容相 匹配的所指。第五,虽然微观层面的田野调 查不能直接导出宏观层面的结论, 但可以提 供理解宏观数据所需的必要信息, 进一步支 撑宏观研究, 并帮助研究者在使用宏观数据 时保持谦虚与节制。

(整理:单良)

#### 169

#### 刘云杉 | 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

"质性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 讲座"第一百六十九期在线上平台以视频 形式推出, 主题为"直面成长: 从'别人 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文研院工 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 讲, 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 授李猛评议。

刘云杉老师首先从"别人家的孩子" 这一习语切入,以讨论教育平等的限度问 题。这是一个本土概念,也是一个日常用语, 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都会有"别人家的孩 子"作为参照, 其背后的心理往往是非常 复杂的: 既可能是正向鼓励, 也可能是羞辱。 作为一个隐喻, "别人家的孩子"的出现, 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成为了过去时。这 个提法及其背后的共同体都感受到了危机。

《我们的孩子》是美国社会学家帕特 南的一本书。20世纪50年代,在作者的 故乡克林顿港,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 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 所以无论是否血 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为"我 们的孩子"。然而半个世纪过去, 克林顿 港的生活已经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 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 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美国梦 已经渐行渐远。教育被期待为向上流动的 "社会阶梯",在阶梯背后,社会是分层 的; 阶层跃升的意象之后, 社会是分层的, 甚至是可分裂的;教育与学校原本是"我 们的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园,现在已经成 为竞争的战场。这涉及教育平等以及平等 的限度。

美国第一本全国通行的中小学教科书 《麦格菲读本》(1843年出版)中有这样 一段话:"诵向财富、荣誉和幸福的道路. 向所有人都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只要愿意为之努力,每个人 都可以踏上成功之路,成功可以说是唾手 可得。"这背后既体现了教育平等、也指 向了一种机会的均等, 机会均等的原则既 培植又限制着美国梦中的自我奋斗和个人 主义。19世纪的美国社会充满了这样的热 情,每个人为了释放自己的能量,实现自 己的意志,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林肯也 曾说过: "我碰巧暂时占据了这座白宫。 你们的孩子中任何人都会像我父亲的这个 孩子这样向往来此,我就是活着的见证人。" 而林肯本人就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典范,他 的成功神话既激励了美国人的雄心, 也启 动了个人奋斗、社会竞争的引擎。然而, 这也涉及到平等和卓越之间的张力。教育 是否真的能铲除一切人为的不平等和先天 的不平等? 如果是铲除人为的不平等, 实 际上坚持的是机会均等的原则, 主张因材 施教和教育的筛选:如果不止步干此,还 要铲除先天的不平等,则信奉的是结果平 等和教育的万能。

刘云杉老师介绍说,这就涉及到美 国教育思想史和实践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 对争论: 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 (the Jeffersonian and the Jacksonian) . 前者强调"有才干者的发展",培育卓 越;后者强调普通人的机会,坚持平等。 前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批评杰克逊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 的平等主义,也是一种过度的平等主义。

他的修正方案是自由竞争的金刚砂轮必须 高速旋转起来, 主张一代人都从一个全新 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生活,用努力的工作 和能力获得自己的回报,要实现这一点, 唯一办法就是确保机会均等,并主张一种 学术上的达尔文主义。机会均等必然带来 高度的竞争,竞争能够激发活力,能够加 速流动。至于高度竞争所激发的贪婪, 竞 争带来的侵扎和分裂, 科南特策略性地回 避了, 他更愿意强调竞争所带来的建设性 的力量。"自由"的价值需要激烈的竞争、 严格的客观考试来保障; "无阶级"的阶 层模糊却需要教育制度中严格的分等、细 密的分层来实现,这不是制度的悖谬,而 是制度的理性——这是朝向民主的"精英 教育"的内在悖论,机会均等与自由竞争 下的自我奋斗之梦实质是个人主义。这是 问题背后的理论悖论。

反观中国,科南特所期待的"每一代 结束的时候权利和特权应该被自动重新分 配"实际上已经通过中国的科举制部分地 实现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论及科举制的影响时说道: "中国社会 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 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 官吏不能 世袭, 政权普遍公开, 考试合条件的谁也 可以入仕途。""贫寒出身,平地拔起, 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 起先一个勤耕苦 读的人出来问事,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 下一代,很快又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 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 头来。"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 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

流转相通"。"在中国社 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 都无一定,为十、为农、为 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 限制"。刘云杉老师进一步 提问, 既然中国社会有这样 平等的基因,到底什么是人 民满意的教育呢?

改革开放40年来,庞 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兴起, 几代人仿佛搭上了上行的自 动扶梯,习惯性地向上流动,

而教育也成了维持家族地位与财产的防御 性机制。今天,教育作为一个传统的依赖 路径, 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出现 这样的悖论:中国的家庭教育不仅不能输 在起跑线, 更要为竞争——出类拔萃、出 人头地而学, 独生子女的家庭不仅不允许 失败, 甚至不接受平庸的; 另一方面, 中 国公立教育致力于"让所有人一样好"—— 这个悖论正是学业负担重的症结之一。教 育减负的初衷本来是淡化考试、减少压力, 但它却捆绑住了公立学校的手脚, 干是"便 宜的公立教育与昂贵的私立教育"这一教 育双轨制逐渐发育成熟,与之俱来的是大 量的教育培训机构、膨胀的校外教育市场、 天价教育消费项目以及焦虑的家长、疯狂 的教育。同时还存在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 育之间的巨大矛盾: 前者旨在创新, 且院 校分层有财政支持;后者旨在公平、均衡。 如果说过去的教育筛选由"英才主义"或 者绩优主义 (meritocracy) 主导, 相信个 人的成就取决于智商加努力, 在新的教育 消费主义、教育市场化浪潮下,这一波筛



刘云杉教授

选原则转变为"家长主义",教育选择取决 于家庭的资源与孩子的兴趣。

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 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旗帜下, 人 民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 而是冲突的 群体, 甚至是分裂的个体。激烈的竞争逻 辑将教育公平的政治理想主义逆转为既精 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 主义。走入大学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成就, 更是家庭长年持久的努力。在这素有平等 基因的社会, 高等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 公平的安全阀,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 一切家庭开放,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 庭都不得不"卷入"其中。怀抱改变命运 的寒门子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 大的困难, 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 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 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 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 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 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 家庭、学校与培

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 共 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 名、冼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 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 是一笔生意, 甚至一条产业链。

在教育改革背后,存在"精约"和"博 放"两种"理念型"教育。在精约教育中、 学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择与训练, "吃得 苦中苦"背后是习惯的养成、意志的磨砺, 这是平民精英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 而在 博放教育里, 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 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 起学、以什么方式学,这种教育模式主张 在集体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变得伟大。在 这对理念型,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某种断裂:大城市尤其是中上层已经开始 体验和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 社会中下阶层所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 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 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 告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精约教育嵌 入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 导致的 是这样一种"无根病":人在不断地向高 处走,亲情和故乡成为急于挣脱逃离的地 方: 而博放教育则嵌入中国当下的观念与 民情结构之中造就一批虚妄的、被宠坏的 "无限的"儿童,他可以任意而为,甚至 不知义务为何物,这是现代"无限病"的 出口,其后是极度的个人主义。

刘云杉老师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 总结。在教育变革第一季, 出现了教育的 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离奇分裂, 过去在 学校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在学校愉快的教 学、多元的评价中, 筛选的要害被外包出 去了, 这就催生了各种教育培训项目: 在 教育变革的第二季则出现了教书和育人的 断裂,既有无教育价值的教学,也有无教 学根基的育人。教育学的奠基人夸美纽斯 曾写道:"懂得科学,纯干德性,习干虔 敬"——习知识、修德行、致信仰,这是 教育的内在秩序,假如抽离了德性与信仰 两根支柱,教育的大厦就塌陷了,裸奔的 知识教育或者左倾,知识的权威与教育的 专制窒息了心灵的活力,是为精约教育: 或者右倾,易变的兴趣与碎片化的知识以 及平等的权利诱惑着欲望以及意志的肆意 生长, 是为博放教育。

刘云杉老师进而聚焦北京大学的本科 学生——激烈竞争中的"赢家", 在他们 的成功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又面临何 种成长的困难。首先是"害怕失败": 我 不是一个"loser": "泯然众人"出典于《伤 仲永》, 受之于天的"通悟", 因其"受 之于人"的教育的不当,小时了了,大未 必佳。这既是他们对自己天命的窥探,也 构成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安排。中国家 长、学校教育、学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看到家长不仅需要劳动服侍,还要进 行学业监督、成长规划。布迪厄抽象的文 化资本在中国是日常的、具体的甚至细碎 的家庭教育,直接关系到父母是否用心投 入、仔细陪伴,教育方法是否适切。学校 教育则致力于分层教学、动态进出、彼此 PK、追求极致。

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 降低难度, 高考区分度不断下降, 备考训 练的关键在降低失误率。低挑战的学习、 重复的、低效的考试训练究竟培养了学生

什么素质? 有学生认为, 高考不只是一场 考试,它是进入高中就开始的一整套围绕 高考而来的教育训练,包括在截止时间前 精准规划时间的能力、抗压的能力、强悍 的学习能力: 自学能力、自己去查漏补缺 的能力。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学科竞赛与 自主招生项目,本意为大学自主找寻一些 天赋好、有学科浓厚兴趣的学生。但同样 有学生反映: 竞赛知识很有限, 甚至没有 高中课本多,需要的是不断训练技巧与熟 悉方法。在有限的知识里, 熟悉解题技巧, 讲究的是一种奇技淫巧。

刘云杉老师进而提出: 我们的教育到 底是"竟优"还是"竟次"? 前者鼓励谁 更有创造性, 谁更敢于将自己置身于不确 定中勇敢探索;后者则要求不能犯错误, 不能有任何风险,不能有任何瑕疵。实践 中涌现了一批以 A 中为典范的超级中学, 成立考试研究中心与教研中心, 教研的本 质就是把知识型的工作转换成操作型的工 作, 在教研的分解与转化为一套标准化的 训练后, 学生再用"刷题"来熟悉"套路": 高分背后未必有可靠的学习能力以及相应 的学习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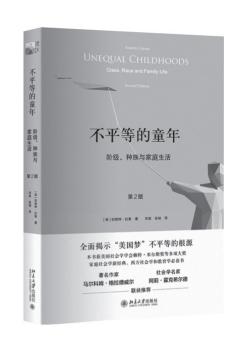
刘云杉老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引用了 学生的话"北大是我想象力的终点"—— 来到大学, 这想象力之外的现实世界, 首 先面对的挑战是自由——在大学中如何在 自由中学会学习。同学们从高监督、高竞争、 高压力的环境来到大学, 最重要、最清晰 的体验是"自由",自由很美好,自由也 很具体,自由既是大学时光的特权,也构 成巨大的挑战。在中学与大学之间,就学 习的形式、方法、学习内容而言, 存在巨

大的鸿沟,要填平它是不容易的。大学学 习中最为重要的动力来自对知识的渴望与 热情,而不是外在的纪律,成长的魅力、 学术生活的无穷魅力表现为巨大的自由, 这是一种探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其次, 还面临着拔尖的压力,面对着"成功"与"成 长"的张力,那些具有拔尖人格的"高考 状元"们,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和保持荣誉 的责任感, 他们也在不断地向最优秀的人 靠拢。在高持续的高竞争中,也常处于高 焦虑之中: 远离大学教育特别需要的闲暇, 而处在不断的忙碌、碎片的时间、肤浅的 学习之中。

刘云杉老师用"赛道上的骑手"来比 喻教育竞争中的"获胜者"及其学习策略: 他们熟知比赛的规则, 和知识的关系是短 时的占有,和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栖 居,和同学之间却形成持续的竞争关系。 刘云杉老师进一步指出学生中两种"失序 的"状态。第一种是聪明文化、表现为精 明。他们以评价体系的结果为最终目标, 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取得荣誉, 赢得认可, 可以对专业不抱有热情, 甚至缺乏人生的 总体目标,对失败的焦虑构成了内驱力的 源泉。他们虽然在智力的竞赛中获胜,伴 随着个体的成功, 焦虑感却更为加剧, 无 法停止。第二种"失序"是"浪",表现 为通常所谓的"斜杠青年"。尽管他们无 法找到所沉浸、投入的对象, 但可以在学 生工作、体育、艺术、社工、国际项目、 创业等身份间不断切换,不断叠加外在标 签,来确认自身的独特性,同样无法停止, 这是他们突显自身不同干他人的"个性" 的方式,但却难以形成"有所不为"的内 在坚定性——也就是性格。理想的教育实 际上要培养虔敬的学生而非精明的学生,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可以献身投入、专注 和沉浸, 朝向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内在的 坚定性,而非仅靠强大的成功欲来驱动。

刘云杉老师举了几位北大同学的例子 来说明何为"直面成长"。有的同学来自 农村, 四年学费来自助学贷款, 寒暑假在 老家做家教。他逐渐认识自己,接受自己, 在北大这个最优秀的地方向最优秀的人不 断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讲: "我从来不觉 得我'宁为鸡头', 当凤尾我也当得挺开 心的"。还有的同学说大学四年实现了四 个目标: 学习二外、锻炼身体、规律作息、 养活自己,大学的四年更多时候是与自己 相处,这是发现自己、接受自己的过程。 还有的同学在科研中发现了一种优美感, 这实际上也是怀特海所说的教育目的—— 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这是一种对风格 的鉴赏,一种审美感。有了风格,可以避 开细枝末节的东西, 直达目标: 有了风格, 力量便得到提升,思想不会被一些不相干 的事务所打扰,人就能更专心于自己的目 标。风格是专业化学习的礼物。

刘云杉老师最后用"全球拍卖"中的"意 优"与"竟次"来分析中国"国家精英"。 全球拍卖出现了由赢家和败者所结成的复 杂的网, 西方政府面临被迫分为头脑的国 家与肢体的国家之间进行重新思考,全球 人才面临新的分配:第一类是开拓者,被 给予允许思考的权力,比例不超过10%-15%: 第二类是演示型, 实施或执行现有 的知识、步骤或管理技巧; 第三类是依附型, 他们的工作单调乏味,且不被期待动脑筋。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书影

在这样一场全球人才竞争中, 我们精 挑细选、严格培养的"国家精英"究竟是 在"竟优"还是"竟次"?更有创造性、 敢于探索、敢于把自己置身于不确定性当 中的人,可能从事开拓型的工作。不能犯 错误,不能有任何的风险和瑕疵,则是追 随型的学习者,可长成为高效、可靠的中 层执行者。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

刘云杉老师最后谈到了自己的研究心 得。4年时间、200多个案例、一对一的访谈、 她做研究最直接的方式是听,就是听学生 们的故事。她听到完整的、有逻辑、有筹 划的故事, 听到具备主题和视角的叙事, 也听到叙事中的破绽、意外: 既听流畅的、 慷慨的陈词, 也听到欲言又止, 句子中的 停顿、字词之外的意思。

倾听之外, 也要看。不仅看学生们漂 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 更看指标后普诵的、

朴素的人性, 还看到他们如何在各种诱惑 中坚持日复一日的练习,看他们如何与无 聊做斗争,看他们如何在无所不知又浅尝 辄止中慢慢安静下来,看他们如何在忙碌、 凌乱中坚持内在的秩序,看他们的机敏, 也看到他们的怅然若失,还看到他们的坚 持、沉默、麻木、顺从与反抗:教育是实 践的技艺, 在应然与实然之间, 不断地努 力。这一群体,在被期待的智力的天赋、 意志的成熟以及对规则的熟悉之间,自然 或生硬地进行"自我的教育"。教育研究、 最为重要的不是把学生对象化为"客观化 的对象"乃至各种数据、指标,而是真正 走到他们中间,用人的情感、意志与理性 去理解他们, 识别他们, 去见人性、见生命、 见成长。成长源于真正识别自己,成长意 味着敢干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刘老师最后表示,在他们身上,我们 认识制度, 也认识着中国: 教育既潜移默 化、又立竿见影地影响着一国民众的性情, 一个时代的好与坏,一个国家的兴与衰。 他们能走多远,我们的民族就能走多远。

随后, 李猛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评议。 对于刘云杉提到的高度平等化在中国教育 传统中的影响, 李猛表示认同。中国大部 分社会成员比较认可以竞优选拔的方式来 实现社会流动、社会开放的理想。就平等 与卓越的张力而言,大多数中国人遵循着 这样的逻辑:认为自己有机会超越其他人, 在平等的机会中争取卓越的可能性。

在大学教育这一方面, 李猛老师对"竞 次"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 的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追赶性的逻辑, 当别人已经取得了某种研究范式、提出了

相应的问题时,我们往往能够以更快的速 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过 去的二十年见证了追赶型教育的成效,我 们看到了中国大学排名飞速的上升, 高质 量论文的发表。但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教 育者,我们都感到在真正具有开创性,能 给出问题、规定方向的研究方面可能还存 在问题,这是整个中国社会高度竞争性的 选拔机制容易引发的结果。残酷竞争的筛 选机制塑造了学生的心理乃至性格, 学生 逐渐形成了一种防卫机制,不敢尝试新的 方向, 而是谨慎地做出人生选择, 尽快使 自己在所选择的方向中取得第一。李猛老 师认为,在当下高度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 如何在竞争中挖掘出能够让学生自由成长、 自由发展,从而产生第一流的人才,这是 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 也是高等教育与基 础教育之理念相结合的地方。最后,李猛 老师总结道, 诱讨每个孩子的命运, 对干 教育制度乃至根本教育原则的思考,应当 是整个教育研究非常有前景的领域。

(撰稿: 周观晴)



#### (三) 文研论坛

**102** 

#### 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 第一场

2020年6月20日, "从历史到现今: 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一 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 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 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 文研院 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 敬东做主题报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方震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邓小南教授对于本次论 坛进行了主题介绍。刘后滨教授以"安 禄山起兵与唐王朝的信息处理"为题进 行第一场报告。刘后滨老师提出了一个 问题, 在安史之乱以前, 河北郡县都受 到朝廷控制,但是为什么从安禄山起兵 的一个月内,没有一个地方长官向朝廷 报告,以至于等到安禄山占有洛阳之后, 朝廷才开始了全面动员?

刘后滨老师认为, 节度使兼采访采 访使对干信息多元直通造成了巨大的障 碍。安禄山以幽州节度使兼任采访处置 使. 垄断了河北道各州郡向中央的信息 传递, 使得州郡使没有渠道向朝廷汇报 地方的异常情况。有鉴于此,采访处置 使权力过重的情况在安中之乱平定的过 程中就不断得以调整,不仅地域范围有 所萎缩, 职权也在制度上有所限制, 同 时不断打通刺史信息上奏的制度通道。 地方对朝廷的信息通进需要有多元直通 的通道,是安禄山起兵带来的一个重要 启示。唐朝中后期经五代到宋朝,中央 与地方信息通进渠道的建构正是朝着这 个方向展开的。

安禄山起兵还反应出唐朝中央决策 或信息汇总处理机制出现了问题。唐前 期朝廷处理问题仍然是以集议的方式解 决的, 但是到了后期则以奉对的方式讲 行解决。刘后滨老师特别指出,安禄山 起兵的时期,恰恰是朝廷从集议到秦对 决策转型的时期,以至于出现了制度上 的空白。建中四年避难奉天的唐德宗向 翰林学士陆贽询问当今切务, 陆贽认为 其核心就是疏诵信息渠道,从而化解了 君臣阻隔的危机。这一经过这正说明经 过专权宰相李林甫、杨国忠之后奏对机 制尚未完备的脆弱性。贞元、元和以后, 以延英奏对为主要形式的君臣沟通机制 不断完善, 至宋朝则各种形式的奏对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

为完备。晚唐五代至两宋, 君主与大臣 的谈话制度不断完善, 君主对于国家政 务运行过程中各种情报信息的收集和外 理能力大幅提高。

刘后滨老师总结, 隋唐之际的制度 调整至元丰官职改革,是中古国家治理 体系因应信息收集与处理需要发生的深 层变革,是一次长时段制度变革中的"三 级跳"。第一跳发生在隋朝建立后到唐 高宗时期,第二跳发生在武则天称帝前 后到安史之乱期间,第三跳发生在安史 之乱以后至元丰改制的较长时段。相较 于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治理所 需信息的复杂与详尽程度, 唐朝总体来 说还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安禄山起兵暴 露的问题, 却是促成传统国家治理体制 向近世转型的一个内在动因。

李伯重教授以"信息收集与国家治 理——清代的粮价与雨泽奏报系统"为 题进行报告。十九世纪以前的清帝国是 世界上人口最多, 治理体系最为近代化 的国家, 也是十九世纪以世界上唯一有 全国规模气候与粮价信息系统的国家。 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保证 人民的福利,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 的充足。这对干清朝统治来说也相当重 要。入关的八旗人口不讨十六七万人, 想要统治有近亿人口的帝国, 就需要极 高的统治智慧,因而清政府对于救灾制 度用力极深。在实际操作方面,清代荒 政的重要步骤由救灾开始, 再由官方依 勘灾、审户、发赈之程序进行, 救荒措 施主要有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 安辑、抚恤等七方面,其中以蠲免与赈 济最为重要。蠲免就是减免赋税, 赈济 就是救济灾民。这就要求与相当多的粮 食的仓储系统,包括官仓和半私有的民 仓(即常平仓、义仓和社仓)。要使仓 储制度运作良好, 国家必须获得充分、 及时和可靠的信息,以便决定在何时何 地、以何种价格和何种方式收购和出售 粮食等等。为此,国家建立了粮价奏报 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由干粮食生产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 因此国家也建 立了雨泽奏报系统以收集全国的气候信 息,从而预测和核实之后从各地收集到 的粮价信息。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提前 进行准备,以应付一些地区因天灾导致 的粮食减产带来的危机。

李伯重老师指出,雨泽奏报自秦汉 依赖就已经形成,但作为一项常规事宜

则正式确立干乾降年间。粮价奏报系统 此前虽有但并不常规,直到康熙时期才 真正建立常规的粮价奉报系统。雨泽奉 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为了 保证雨雪分寸报告的可靠性, 皇帝同时 布置几个奏报的渠道,皇帝对不同来源 的信息进行核对,对干各地不及时奏报 的官吏,皇帝经常追查,有的被严加议 处。这基本保证信息来源大致可靠。雨 雪奏报与粮价陈报、收成奏报共同组成 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

李伯重老师引用魏丕信的观点,指 出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相比, 明清中国有 一个显著特点,即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 国家,以及一个成熟和稳定的官僚制度。 这一点正是中国具有比欧洲更强的抗灾 能力的关键所在。清政府虽然能够控制 的人力资源有限,但是在人力和资源的 组织与动员方面却有明显的才干。清政 府为了保证民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哪 怕它不是一个韦伯口中的"福利国家", 但也是一个"务实性"国家,而有效的 信息收集系统是达到国家治理的关键之

渠敬东教授以"信息的社会机制" 为题进行报告, 注重从理论角度对此问 题进行分析。渠敬东老师指出,社会世 界就是由信息构建的。人需要通过各种 各样的表征、符号为每一个人的行为、 意识和意义赋予可交互理解、可社会通 约的形式,信息为社会运动的各种因素 赋予形式的时候, 就为群体的行为提供 了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不只是我们可以 通过信息转化出的语义形态来理解社

会,这种表象也是一种代理机制,其内 在就具有制度的意涵。我们整个社会运 行就是建基于信息。但是信息也充满了 悖论,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 者和承载者,信息具有弥散化的特征, 另一方面制度如果形成共识形成稳定的 意义系统, 就必须将信息极大程度地集 约化, 二者在现代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张 力。卢曼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认 为现代社会完全就是致力干降低信息复 杂性并在信息提供中不断自我再造以进 行控制。但是这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 特征, 在传统社会中也充满了信息沟通 和运作的机制,只是二者构造的系统和 运行的方式不同。在古代社会, 因为天 路阻隔,就需要有特别的信息渠道讲行 社会运转和治理。

渠敬东老师借用语义学进行分析。 用信息系统的方式对社会加以规范和阐 释,需要依据不同的组织层级,从基层 社会到国家, 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普遍性、排他性。各级部门都需要收集 和论断信息,建立一套比较明确的陈述 系统和组织系统。正因为信息充满了这 个世界,单纯靠排他性来垄断信息是不 可能的。如何处理信息的剩余控制权 呢?不存在完备充分的制度,因此在制 度中实现不能规定的那部分控制权的权 力就是要害所在。这是制度运行和信息 沟通机制的中间范围, 也是理论和经验 对应的部分。信息管理的制度空间,才 是社会运行的平衡机制。如果制度以做 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为目标,恰恰说明社 会处于危险中。正因为信息不能完全控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制, 这就要求讨论剩余控制权的问题。 在制度和信息运行中,人和法都是能够 在制度空间内达成理解的渠道和机制。 每一个人都是多重化的信息体, 渠敬东 老师讲一步引用语用学来对此加以理 解。每一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信 息, 在制度看来, 人是信息的载体, 但 是在人看来,人也是制造和运行制度的 代理。人是信息的生产者,可以构成一 连串的信息源,这具有无限的传染力和 扩展力。多重且混杂的信息,可以制造 出制度的多重缝隙和矛盾, 从而释放出 各行动主体的能动性。

渠敬东老师指出,社会治理是双向 信息采集的过程。任何一个政治体或组 织体,都要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制度体系, 尤其是有价值观的体系。简单讲,我们 需要认定一个大价值和制度目标,但是 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紧密的信息支持。信 息采集是制度得以运行的最重要的步 骤。围绕制度而产生的正向信息系统才 是制度运行的落脚点。现实的制度是多 元的、不充分的、不均衡的, 所以需要 反向信息作扩充,需要多个部门、多重 空间的设置才能够把信息传递过来。社 会构成的多重面向能够以多重渠道向制 度反馈。这就要求制度留出恰当的空间 对于异质信息讲行反馈。

渠敬东老师总结了社会治理中的信 息难题。阻碍信息的各类因素包括官僚 体制中的信息瓶颈:委托代理制中的信 息不对称; 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成本; 制 度规则对信息的屏蔽:信息流通中的措 置、分叉和反转现象。因为制度有着单 向目标, 但是社会生活是多重实在的, 规则具有确定性而实践则是不确定的, 所以在信息的收放、传播和控制中会存 在多层次的博弈。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 治理者需要留存信息流通的空间,使制 度保有充分的灵活度和弹性,人在具体 实践活动中的权宜性, 以应对现实的变 化。否则,统治过死,体制中的各层级 就会形成一道道闭塞信息的闸门,只筛 选正向信息,阻滞反向信息,造成制度 的固化和人的教条和虚设,体制空转。 保证各类信息的交流和交换,才会使得 制度的实施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起到 预警、调整和更新的作用。

渠敬东老师进一步指出,信息存在前 台和后台。前台信息经常呈现出模式化和 仪式化的特征, 这是重要的动员机制。但 同时, 后台的控制和流涌也非常重要。后 台信息需要有多重的信息组合, 打破组织 边界, 讲行多层次、多渠道、非正式的信 息沟通。私人信息的沟通恰恰是信任渠道 的保证。主导制度和运行制度的人, 在相 互沟通的讨论中的弦外之音具有特别的意 义, 这存在干所有人际关系中。

最后, 渠敬东老师探讨了舆论和民情 的信息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信息流,具 有传染力和扩散力。信息风暴就是短时 间、高强度、焦点集中的信息聚集。这会 对常规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 使得后者措 手不及, 也具有极强的扩散效果, 一旦形 成, 便像病毒一样具有潜伏性, 转变成为 具有惯性的社会基因, 条件成熟后继续爆 发。我们需要建立信息传递的新形式,使 得技术与信息共进, 在机遇与危机共存的 环境下找到好的外理办法。

接下来,论坛进入了评议环节。邓 小南老师指出, 刘后滨和李伯重两位老 师侧重历史, 渠敬东老师则侧重理论。 方震华老师对于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 方式感到好奇,他进一步补充道,安史 之乱之后进奏院构成了中央和地方的重 要管道,中央和州的公文需要通过道的 进奏院沟通, 而进奏院的邸吏则具有垄 断性的角色。由此, 节度使的权力或许 在安史之乱之后有了削弱, 但可能与之 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接下来, 赵世瑜老师认为信息沟通 在国家秩序问题下可以简化为上传下 达, 而三位老师的报告或从国家出发或 从社会出发,或从经验出发或从理论出 发, 这恰恰体现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 科特点。他认为渠敬东老师的信息观念 比历史学家所说的"信息"概念要开放 很多. 从而提示. 有关"信息"的论述 在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是缺位的。

张静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近代以来, 国家和社会的连接通道,至少发生过两 次重大改变。一个是历史上十绅这个角 色集团——作为地方治理的权威中心、 同时连接官府与民间的协调者——的消 失; 第二个发生在最近这三四十年: 1949年以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重组, 一些制度化的连接通道——比如城市单 位、乡村人民公社这些和国家体制有纵 向连接的组织角色,在过去的社会经济 变迁中,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个变 化使得很多社会诉求无法上达,导致中 央了解的信息不一定真实。这些阳塞发 生的一个基本结构特点,都是社会中介 角色消失, 所以导致上下连接的渠道中 断。张静老师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结合 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 国家的角色和目标是什么? 从信 息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在信息的 选取和使用的问题上,国家的目标与角 色相当关键。国家的目标是统治还是公 共服务,决定了国家对于不同信息的重 视程度。第二个问题关于官僚系统的组 织特征。信息的上报与否或许与官僚系 统的组织特征有关,比如责任制可能助 长了官僚不愿意上报的动机。基层官员 不像中央官员关心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因此他们对于定义信息的时候就会表现 出与中央官员不同的反应。第三个问题 是信息在社会中分布的结构。一方面现 代国家在信息垄断上较社会组织有天然 的优势。另一方面信息是需要相互确证 的,越是来源多元,任何组织和个人就 越难以依赖虚假信息操控他人。因而研 究信息在社会当中的分布和历史上的信 息分布情况变得很紧要。

随后,几位主讲人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相关角色对于信息的垄断在安史之乱前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刘后滨认为,更为实质的变化可能发生在更为后期的阶段,而方老师的补充恰恰构成了一个安史之乱中呈现的信息垄断这一背景。李伯重老师表示从赵世瑜的方法论提示中获得很多启发——后期,政府的雨泽奏报系统越来越差,而民间有上万人从事信息的搜集和传播,甚至政府反而要依靠民间的信息系统。民间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领域。渠敬东老师认为,社会学家努力的方向是

找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连接点,向历史学家学习描绘具体的场景,另一方面也能够讨论内在的机制和结构的关联。我们存在的社会和体制是非常丰富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口。渠敬东老师表示,一统体制的讲法需要打开,从信息的角度切入后会发现,内在有丰富的信息流和多重的博弈。一统体制只是一个概括,需要打开内在的丰富性。任何制度在释放空间的时候都需要拿捏分寸,不存在一个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想制度。

#### 第二场

2020年6月27日,"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二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克武主持,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做主题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丰图义仓,建于1882年,中国唯一一座仍在使用的古代粮仓

应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 参与会谈。

茅海建老师以"清代的驿递、书信、 电报与《缙绅录》——'信息渠道与国 家秩序'"为题带来第一场报告。清朝 之所以能够管理广阔的地域范围与众多 人口, 正是因为有着相当畅通的"信息 渠道",其基本形态就是驿站系统。清 代相较于明代增加了许多驿站, 并将驿 站开支纳入国家的财政支出。清代的驿 站系统是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办 交通系统。驿站系统的主要设施是驿道, 最大的开支是养马,负责的主要工作是 官员的交通和公文的传递。清代驿站系 统运作情况大致良好,尤其是乾隆朝, 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在公文传 递方面仍然保持较高的效率。但是,正 因为清代的驿站系统只开放给官方免费 使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驿站系统的效 率也渐趋低下。

茅海建老师进一步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通商口岸在沿海沿江建立,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得铁质轮船取代风帆动力木质帆船,这两个变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成分与社会结构,原来的民信局很快发展起来。大清邮政建立前后,中国进入了铁路建设的高峰期,这也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十九世纪另一个重大技术革命是有线电报。在西方的压力下清政府铺设了三大电报干线,与丹麦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资本的大东电报公司接通。清朝兴建的电报系统,大多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而官办电报主要用于军事用途,但也对民

众开放。茅海建老师总结,清末已经有了两个信息渠道系统:原有的驿站系统与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而新系统必将取代旧系统,官员上任不再使用驿站系统,电奏、电旨也开始出现,官员之间信件与电报大规模增加,直到最后驿站系统消亡。原有的驿站系统只有一个信息中心,即北京,而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变成了多个信息中心,最大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这一发展使得信息更多元,传播速度也更快。

茅海建老师指出,清代人民获得政 府信息的方式是邸报。这在宋代已经形 成了相关制度, 明清两代皆继承之。邸 报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商业性, 民间的印 刷量甚大,官员和人民可以订阅,还出 现了以月汇编的邸报合集。《缙绅录》 是民间出版的全国官衙官员人名的手册, 其中包括从京官到地方官,各个部门官 员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身等。 人们可以通过邸报获得官府政策信息, 还可以通过《缙绅录》获得官员信息. 从这个角度看,清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 相当可观。茅海建老师认为,清后期的 诸多"信息渠道"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 对外信息获取上的缺乏, 这不仅仅关系 到"国家秩序"还关系"国家安全"。

接下来, 江沛老师以"近代媒体与 五四运动的空间转换"为题带来第二场 报告。江沛教授以"现代民族主义运 动, 何以由五四而起"发问, 引入报 告。清末以来, 中国有三次对外的重大 事件——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山东问 题, 其损失渐小, 但抗议却渐强, 这是 为什么? 江沛老师认为, 正是在 20 世

《清代缙绅录集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第

纪初传媒技术革命性的展开,对于信息 的传播与民族主义的奠定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使得五四运动成为可能。电报的 出现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导致 不同区域的人接受了同一信息, 感受到 个体与群体的共存感,形成近似的思维。 近代的印刷机引入中国, 报刊、书籍批 量印刷,知识的廉价复制使得信息的快 速传播成为可能。交通、邮政、新式学 堂的建设,以及辛亥革命后政治宽松的 氛围等,都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 基础和空间。所有的因素汇聚起来,构 成五四运动开展的基础。

接下来, 江沛老师以巴黎到北京的 信息传递为例进行说明。从鸦片战争到 一战结束,民族危机成为知识精英最为

敏感的考量。为了参加巴黎和会,北京 政府做了积极的准备, 当时巴黎与北京 之间的信息传说是诵讨电报讲行的。梁 启超通过电报将山东问题归罪干曹、陆、 章等人, 林长民据此撰"代论", 发表 后舆论沸腾,促成了五四运动。助推 五四学潮持续发展的有明暗两种力量, 一条是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这形成了 强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感染,另一条是 诸种政治力量在对学潮的充分利用中助 推运动向全国蔓延, 意在形成一条配合 政争的舆论力量。两种力量借助由电报、 报刊、邮政和新式交通构建的信息与人 员的快速流动,持续发酵,欲罢不能。 当运动从北京传到上海,上海的经济结 构使得运动以罢工、罢市的形式发展。 上海罢丁需要得到帮派的同意,帮派的 动力在于抵制日货以为国货开辟市场。 上海的"三罢"迅速波及内陆,其中凡 是反对皖系的地方, 学生运动都得到了 讯谏扩展。

江沛老师指出,在五四运动期间,北 京与各地进行了多方的政治博弈, 这一博 弈主要是通过电报展开的。围绕签约,亚 洲和欧洲之间也在进行信息上的反馈。政 府和代表团围绕签约的态度变化也是通 过电报进行的。因为巴黎信息在国内的传 递, 使得这一问题被摆在了全民视野之 下, 因为情感、道德、利益的纠缠, 中央 政府的选择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吴佩孚 通过持续的通电树立了"革命将军"形象, 其政治影响力也得到了扩张。

江沛老师总结到, 传媒技术奠定了 五四爆发的必要前提,民族情感推动 五四学潮的勃发,政治势力从中推动, 学潮扩散为"三罢"影响渐广,利益选 择及民众压力终致代表团拒签合约。从 洲际信息传递、运动中心的南北交替、 政治势力跨越空间的电报战直至国内政 局对于签约与否的影响,都是经历在传 媒技术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以 传媒技术为基础,融合国际因素、国内 政局纷争、民族主义高扬、工商群体登 台的历史大戏, 是新旧因素的复合体, 是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新起点。

王奇生老师以"联络技术与权力机 制一一莫斯科与中共革命"为题进行报 告。王奇生老师的报告涉及1920年到 1940年这一时间段,以"莫斯科"代称 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 二者密不可分, 很 长一段时间共产国际掌控在苏俄政府手 中。共产国际是第三国际,与第一国际与 第二国际在组织的运作方式上完全不同。 当列宁组织成立共产国际时有一个总体的 构想, 即建立一个世界的共产党以进行一 场世界革命并最后建立一个世界苏维埃共 和国。共产国际不是一个松散的各国共 产党的联盟组织, 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共 产党。共产国际成立后派人去各国帮助建 立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不是独立的,它只 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组织 方式是高度的集权与铁的纪律, 即各国共 产党的行动都需要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指 挥,包括最高人事、路线方针、行动计划, 乃至是错误的决定,,并接受共产国际特 派代表的直接监督与就地指挥。

由于电报费用过高,初期共产国际 与各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书信进行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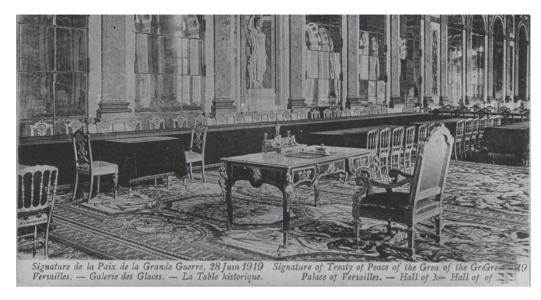
这就会导致信息沟通的不畅。各国革命 形势瞬息万变,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而 莫斯科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不折不扣地 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这就使得各国共 产党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即有时必须 执行莫斯科发来的时过境迁的命令。当 时莫斯科对中国情形所知有限,命令又 经常过时,还要求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统一行动。这使得莫斯科的命令与中 共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矛盾。直 到 1930 年初期, 莫斯科与上海中共中 央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电台和电报通信, 信息的沟通才变得通畅。不过,新的问 题又来了,通讯技术改善以后,,也导 致了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控制大大加强, 中共的自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共中 央对莫斯科更加亦步亦趋,难以施展自 己的手脚和发挥自己的独立自主性。长 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电报密 码丢失,这样在长征时期,中共一度失 去了和莫斯科的联络, 反而为毛泽东的 自主决策提供了空间,也为毛泽东的崛 起提供了机会。等到长征结束后莫斯科 与中共的通讯重新建立, 莫斯科只能够 承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已确立的重要地 位。另一方面,莫斯科也越来越认识到 高度集权、统一指挥的局限, 所以共产 国际七大后, 莫斯科也逐渐放松了对各 国共产党的控制。这也为毛泽东的独立 自主提供了较大空间。到抗战中后期, 毛泽东个人直接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报 密码,进一步掌控了与莫斯科联系过程 中的主动权。王奇生老师还补充到,毛 泽东在长征时期运兵如神, 也和当时中 国共产党能够破译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 的电报有很大关系,当时党内的报务人 才大多是从莫斯科培训回来的。到抗战 时期,在国、共、日三方的电报战中, 日本电报技术强于共产党,共产党又强 于国民党,这使得国民党有时在战场指 挥上,因害怕被破译而不敢使用电报。 从信息沟通的角度看,中共与莫斯科之 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中共既有从莫斯科 获得经济、技术支持的一面,也有受到 莫斯科掣肘的一面。

随后,论坛进入评议环节。唐启华 老师指出,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以西方 为中心的文明之下,并被西方世界纪录 下来,产生了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又影 响了中国。外部的信息始终对中国影响 很大。研究中国史,一定要用到外国的 材料。比如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受到西 方学界提供的档案影响, 如英国档案、 外国传教士的档案等。而1919年除了 五四运动、共产国际的建立之外,6月 28 日国际联盟的创生也是相当值得关注 的一点。唐启华老师主要对江沛老师的 报告进行评议,他认为除了考虑到传媒 技术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还应该纳入国 际背景的视野, 即表面上巴黎和会的争 端是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实际上是美国 和日本的竞争。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在 巴黎和会的诉求,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三 个问题其实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的。 此外, 巴黎和会召开时一战刚刚结束, 从北京到巴黎的电报并不畅通, 当时主 要是通过太平洋的水线,通过美国到巴 黎。当时电报发送的速度时快时慢,从 北京到巴黎一份电报慢时需要七八天, 快时也要一二天,而电报发送速度最慢 的时候正好是在五四运动。学界普遍会 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因为当时很多 人知道了巴黎和会把山东半岛的权利直 接交给日本, 但是北京政府5与7日才 收到相关电报,5月7日这一和会的结 果才见报, 因而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不可 能是因为知道这一事件才进行抗议的。 电报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可能还要再做 更细腻的考证。唐启华老师还补充道, 有一种说法认为6月27日北京政府发 出"不要签"的电报是"废电",因为 该电到达巴黎时早已签约,真正决定不 签的,应该是代表团自己,而非北京政 府。但就北京政府的主观意图而言,要 说这是"废电"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 北京政府需要知道28日下午3点签约, 但是相关往来电报上巴黎代表团没有提 及具体签约时间。所以这是不是废电, 还要再考虑。此外, 当时的报纸中有各 种各样的舆论来影响大家对该问题的看 法,这一部分还可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接下来,应星老师进行评议。他指出,王奇生老师进入中共研究的角度可能反映了他对现有的党史研究的批评。 王奇生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很明显,第一,他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中共早期而非成熟时期。这个视角很有见地,对于帮助我们摆脱成败的观点来探讨问题相当重要。中共经历的各种曲折和分岔对于历史研究相当重要,其中政治文化的制度渊源,对于理解后面的流变有根本性的影响。第二,以往的党史研究集中在政 治、制度、大人物,缺少对实际的运作 机制的研究,而王奇生主要落实在实际 的运行机制上。王奇生受到日本学者的 影响,研究基层的运作,这开拓了风气, 但是这种研究也可能和高层的运作存在 断裂。王奇生如今转向了高层的研究, 即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沟通机制,这 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上下运作,而且能 使我们看到中共微观和宏观的联结点。

应星老师指出,我们要看到共产国 际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共产国际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并且注重国家的地位, 这与第一国际和 第二国际是不同的,但是在阶级中心和 欧洲中心上则与之相同。然而中国共产 党天然地存在工人阶级的弱项,以民主 集中制运行的共产国际必然会对中国有 着复杂的影响。此外,应星老师认为, 上海和中央苏区有一个没有被破坏的水 上交通线, 直接沟通了上海中央和中央 苏区。这也是二者沟通很通畅的一个原 因。在北京和上海,中共崛起的方式很 不一样, 在北京的崛起和北大有关系, 在上海则和上海的通讯有关。陈独秀始 终坚持在上海,和上海作为信息通讯的 中心是分不开的。

韩策老师对茅海建老师的报告进行 了评议。他认为,电报的产生和流行在 晚清影响非常大。晚清有一个书信时代 到电报时代的过渡,如从政治大员的文 集当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时代 没有电报,李鸿章、刘坤一则电报和书 信互用,书信占很大部分,而张之洞、 袁世凯、端方等后来基本上多用电报。



凡尔赛宫镜厅准备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场景

随着技术的改进,官员之间的沟通大规 模增加了。之前是一个单线沟涌渠道, 现在各地官员和京官,还有各地区官员 的电报沟通,形成多线性的信息渠道。 于是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增加了, 而地方 对中央的了解增加得更多。因为各地官 员之间联系密切多了,这使得地方官员 更容易形成联盟,加大了中央使用密折 制度牵制地方的难度,由此改变了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

韩策老师在茅海建老师提出的晚清 信息中心从北京到多渠道信息中心这一 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一变化对于国 家秩序的影响。上海作为信息中心的崛 起,首先是五口通商的结果,后来盛宣 怀把电报总局设在上海,以及上海的中 外新闻媒体的繁荣都是重要因素。在此 背景下,上海不仅沟通着内地、北京和 海外的信息,而且信息沟通的数量和效

率比以前有了几何级的增长。这些信息 都是资源, 有些核心信息甚至意味着权 力。上海信息中心、经济中心的形成, 在庚子之后越来越对北方朝廷形成挑 战,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韩策 老师还指出,《缙绅录》的出版确实反 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但是这与 十九世纪欧美那些报刊比较发达,崇尚 言论自由,有代议制的国家比起来,还 算不上政府信息公开很高。清末立宪之 后,政府信息比以前公开了很多,并为 北洋政府继承。这一方面因为清朝政府 确实有不少人认为政务应该公开,另一 方面也是形势倒逼的结果。韩策老师补 充道,收藏《缙绅录》最多的是北京大 学古籍库和国家图书馆, 但是只有清华 大学图书馆将其所藏《缙绅录》影印出 版, 供学界方便利用。目前, 李中清教 授的团队正在做一个《缙绅录》数据库。

随后,几位主讲人对评议人提出的 问题作出回应。茅海建老师补充,除了 五口通商的影响,上海是在北京不愿意 做信息中心的时候做了信息中心, 这与 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关于信息公开 程度的评价,他认为,清政府是中央集 权制的,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很多信息 并不需要公开,而非不愿意公开。清政 府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传递上没有问 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对外部信息获取不 足。针对唐启华老师认为的学生更多抗 议的是不公而非巴黎和会外交结果的观 点, 江沛老师指出, 从5月4日北京学 生给美国外交部的陈词来看, 学生明确 要求青岛归还中国,似乎学生是清楚了 解巴黎和会的结果的。王奇生老师补充 认为,中共内部的信息沟通也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事实上,广东省委和上海中 央联络之中, 也存在着同共产国际和上 海中央联络时一样的问题, 即中央高度 集权,地方缺乏自主性。

#### 第三场

2020年7月4日, "从历史到现今: 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三 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 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 敬东主持, 文研院邀访学者、荷兰莱顿 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魏希德, 文研院工 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孟天广做 主题报告,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 究所教授平田茂树, 文研院邀访学者、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 文研院 邀访学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教授 黄宽重参与会谈。

首先, 魏希德老师以"建构国家理 论——18世纪欧洲对中国治理形态的阐 释"为题进行演讲。唐太宗生前撰述或 后人编纂《金镜》《帝范》《贞观政要》 等帝鉴,以为太子与皇帝服务。而这三 个文本构成了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法 国一一研究中国治理的重要文本。此前, 史书、耶稣会的记载等等都构成了欧洲 学者研究中国的材料,但是很少有人关 注到帝鉴这一类政治劝告文学对于欧洲 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帝鉴与欧洲的 王鉴存在相似之处,因而帝鉴构成了政 治思想与行政管理理念讲行跨文化交流 的载体。国王的自我节制、宪法对国体 永久性的重要性等被启蒙思想家视为可 以从人类历史中获得的通则,启蒙思想 家不仅仅将之介绍给读者, 还将之改造 为可以实施的政策推荐给国王。

魏希德老师认为唐太宗帝鉴的影响, 需要在全球中的视野中加以理解,需要超 过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分界。她指出西亚、 南亚、北亚与中国都存在王鉴的传统,并 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多共同点, 这些传统 一直延续到18世纪乃至今天。此外,明清 到现在最流行的《贞观政要》的版本是由 元代的吴澄支持出版的,这并非因为元代 学界对《贞观政要》评价很高, 而是因为 蒙古人十分喜欢太宗的政术, 甚至出版了 蒙文版本颁布给官僚。此后当《贞观政要》 流传到欧洲后,其全球性就更为显著。

接下来, 魏希德老师介绍了16-18 世纪上述帝鉴是如何流传到欧洲的以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

欧洲人特别是耶稣会十据此形成的对中 国君主制度的看法。1735年徐乾学《御 选古文渊鉴》的部分选文被法国传教十 赫苍璧编入中华帝国通史介绍到欧洲, 其中包括唐太宗《金镜》《帝范》的选文, 魏征的谏书,而这些文章可能都来自《贞 观政要》。赫苍璧的法语著作成为了18 世纪欧洲的畅销书。该书发表后不久, 就有了德语、英语的译本。其他法国传 教士在他们的历史性著作中也提及了帝 鉴,向欧洲读者介绍了《帝范》《金镜》 等文本。总而言之,18世纪初,已经有 了很多关于唐太宗的法语、英语、德语 资料。那么,这些作者是如何解释中国 的政治,而这些解释又如何进入18世 纪的政治治理实践呢?

耶稣会士和明清的士人一样,都认为学术和为政是密不可分的。耶稣会士

积极参与政治,在欧洲各国的朝廷担任 国王的导师、参政、顾问,国家理论依 赖于传教士进行阐发。这些耶稣会士认 为,国家是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其目标 是公共福利,公共福利可以按照生活质 量、和平等加以衡量,公民与国王之间 相关的契约应来源于自然法,如家庭关 系可以当做政治模式的一个模范。耶稣 会士认为,中国明清时期儒家国家的治 理形态非常符合上述理念。欧洲人将他 们对中国的新知识应用到当时欧洲的国 家治理中。

其中,尤斯蒂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是一个不平常的 人,他在奥地利、德国、丹麦做过官员, 游历经验丰富,发表了60多种书,其 书被翻译为至少5种语言。他被看作政 治经济学的创立人之一, 中东北欧的官 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官房学派的目 标是为增加国王国库、促进国内经济建 立一套理论与相应的政策。除此之外, 公民生活也是官房学派的关注点。尤斯 蒂将中国的信息整合到全球性的政治制 度的比较,著有《欧洲与亚洲所谓野蛮 人政府的比较》。他所讲的其他国家包 括非洲、秘鲁、泰国、波斯, 但主要是 中国。通过综合性的比较, 他认为这些国 家的治理一点都不野蛮,相较而言,欧洲 政府才比较野蛮。尤斯蒂的观点有很强的 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评。

尤斯蒂主张君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最核心的主张是,为了避免君主 无限权力的滥用,需要君主自我节制。 这一自我节制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最

好的例子就是唐太宗。他认为唐太宗应 为世界上所有君主的模范。他从中国历 史得出三个君主自我节制的来源:皇帝 的荣誉——皇帝有父亲的权威,一日皇 帝不再像父亲也就失去了他的权威:官 员谏书的节制: 历史教育的节制。尤斯 蒂针对孟德斯鸠 1746 年发表的《论法 的精神》的。《论法的精神》一般被认 为是欧洲从喜爱中国到排斥中国的转折 点, 其中认为中国皇帝的治理依靠的是 恐惧。而尤斯蒂利用公文证明中国早就 有合理的法制,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延续 性依赖于历代中国君主与参政们的教 养——他们尽管把法律放在第二位,但 是追求道德。总而言之,尤斯蒂在一个 系统性的比较中将唐太宗视为一个模 范,他也把这个模范推荐给欧洲国王与 国民。魏希德老师在此基础上总结道,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史观来理解帝 鉴的意义, 其次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 看出唐代的帝鉴在中西行政知识与技术 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周飞舟老师以"政府行为中的信息沟通问题——以脱贫攻坚战为例"为题进行演讲。周飞舟老师从政府行为的角度谈在脱贫攻坚的政府行动中形成的对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新理解。周飞舟老师引用邓小南教授的观点指出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言路。狭义的言路指奏折、上书等,广义的言路指政府之间的沟通行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和传达,既包括了看上去很明显的信息沟通制度,如公文、会议、调研等传达的信息,也包括政府官员主动感知到的行为中有

意无意传达的信息。对于下级政府来说,他们需要知道的特别重要的信息是上级政府对于某件事、某项政策、或者某项要推行制度的态度,而这些是从公文和会议系统中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的。很多会议是学习、领会上级的文件和会议的精神,各部门和各地区还有横向交流和表达,这些都是为了讨论上述信息。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下级政府是否真正领会精神,下级政府是否真抓实干。而这个最关键的信息,并非都能够从下级政府提供的工作总结中看出来。

周飞舟老师引用周黎安教授关于行 政发包制的概念切入信息问题的讨论。 所谓行政发包就是政府把一些任务打包 发包, 地方政府对此展开横向竞争。但 是这一横向竞争有一个问题,即在教育、 医疗、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安全、 区域合作、安全监督等领域, 行政发包 制指导下的横向竞争效果很差。横向竞 争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很难设立非常好的 单一明确, 可以直接比较的考核指标体 系., 缺乏严格的规则、程序和精细化 管理,无法进行有效的跨地区合作。周 飞舟老师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 称", 上级政府无法知道下级政府把事 情做成什么样。脱贫攻坚也属于这一低 效率领域, 但是"脱贫攻坚战"以非常 规的方式完成民生任务, 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那么在脱贫攻坚的问题上,政 府是如何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呢?

周飞舟老师从两个大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首先,上级政府要用非常

规的方式引起下级政府的重视, 让下级 政府了解脱贫攻坚的动机、意义。第一, 相关的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打赢…… 战"的表述很少出现在国务院级别的文 件中,到了下级,其态度就变成了立军 令状、成立总指挥部。第二,现在中国 公文文件有15种类别,最高级别就是 冠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七个字。第三、 从文件引领的文件体系——中央文件能 够引领下级发众多的文件去执行它—— 上看,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引发 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文件体系。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发了 200 多了文 件,形成了配合该决定的文件体系。第 四. 从文件引领的部门分丁来看, 一般 来说有牵头部门、配合部门, 但是脱贫 攻坚中所有的中央部门都是牵头部门, 互相配合。企事业单位,只要是在国家 体系中的单位,包括高校、央企、武警 等, 都进入了一个牵头部门引领的责任 体系。

其次,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用了 一些新的办法,如"责任到人"与"反 向激励"。"责任到人"的意思是,任 务是落实到人上,而非落实到某岗位上, 与之相配合的就是全国贫困具的县级正 职领导包括贫困乡镇的正职领导"不脱 贫,不换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流官制, 通过流动来实现晋升。而与不流动配合 的是"就地提拔",如从正处级提拔到 副厅级, 但是仍然是县委书记的岗, 提 级别不换岗。此外还有很多监督检查和 反向激励。反向激励是以检查问题、加 以惩罚为主,而非以锦标赛、项目制的 比赛为主。事后追究强调决策的后果需 要长期为施政官员承担。这些机制综合 起来看,针对的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

周飞舟老师指出,上述政策是在 四五年的时间中逐渐调整形成的。脱贫 攻坚刚刚开始的时候, 以项目制的方式 推行, 出现了层层加码的问题, 导致贫 困户的地方享有上等人待遇, 这很快被 中央制止了。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项 目制的逻辑来做脱贫的治理。最终中央 采取了以人为中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落实主体责任与约谈制度。这并非 常规治理、科层化治理的局面, 而是以 人为核心的非常规治理,通过营造一个 政治氛围,让官员在某种政治氛围中开 展工作。

孟天广老师以"信息与治理——数 字时代的国家 - 社会关系转型"为题讲 行演讲。孟天广老师指出,信息对国家 能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影响越来越 显著,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越 来越强,这或许会塑造新的国家治理样 态,乃至可能如一些国际学者所说,使 得国家治理导向数字列宁主义。当前, 围绕信息治理的理论问题, 也出现了很 多信息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政治学关心的信息问题主要有两 个: 委托代理和经典官僚制带来的信息 问题,和信息碎片化问题。前者主要指 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 问题,这广泛存在于古代现代国家中。 后者主要存在干现代国家中, 即每一个 行政部门都有垂直的管理体系, 但是不 同的行政部门的信息都是非共享的。国 家内部的信息问题的解决,是要建立一 个反馈控制的机制,即巡警式的信息督 查或信息控制机制。除此之外,还需要 觉接政治制度的包容性问题,将社会多 元化提供的讯息进行加总, 吸纳到认同 整合的过程中。近十多年世界各国的政 治系统改革的方向就是提升包容性,以 解决国家和社会之中信息流通的问题。 社会机制会自动进行信息的加总和筛 选, 但是如果国家不能够处理这些信息, 就会面对信息过载的问题。比如"吹哨 人"是社会的信息的处理,如果在一个 理想的状态下, 国家治理应该能够把"吹 哨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孟天广老师指出,在数字时代,数 字技术的渗透在改造着国家和社会,这 会改变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机制。2000 年之后,中国社会快速信息化,中国拥 有全球最大的网络社会,有9亿多网民, 有一个比较发达又普惠的网络机制—— 这保证了信息流动的平等——以及丰富 的互联网内容。到了数字时代,互联网 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机制。孟天广老 师引用彭波教授,将互联网的联通作用 归纳为四点:第一,政府理解社会的舆 论场: 第二, 社会处理与分享信息的平: 第三,信息筛选的工具——网民表达负 向情绪的下水道, 快速告诉国家哪些方 面治理失灵; 第四, 治理失灵的指示器。 随着数字技术的扩张, 政府将信息引入 政府决策, 国家掌握的信息资源变多, 国家能力也逐渐变大。中国逐渐建立起



吴兢《贞观政要》书影

了一个网络治理和监管的体系,包括中 央建立的网信办, 地方政府建立的数字 政府等等。在政府看来, 这能够最大化强 化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比 如北京从2018年开始做改革,能够让市 级政府能够直接把信息触手伸到社区层 面,及时督导职能部门解决社会问题。

孟天广老师指出,在技术赋能国家 上,中国正在形成数字列宁主义的现象。 数字列宁主义在苏联有非常长的传统, 通过信息汇总和计算进行动态规划。随 着在数字时代技术条件的成熟, 计划思 维开始复兴, 国家建立了有控制的政治 包容——社交媒体空间,政府的管理很 严格, 但是政府会设置一些听取社会问 题的平台——并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治理 问题。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维度上,

孟德斯鸠

技术在赋权社会。通过数字空间、虚拟空间,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虚拟空间给人们提供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渠道;在虚拟空间中,流动的信息是公众可见的,这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影响政府的行政。简言之就是建立舆论场,通过社会讨论形成信息加总的功能,最后让公民学会更有策略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孟天广老师介绍欧洲学者提出了国家信息能力,并在全球做跨国比较研究。学者们用三个指标衡量国家信息能力:第一次做人口普查的时间;第一次出版统计年鉴的时间;第一次建立国家信息采集部门的时间。欧洲学者用国家信息能力解释国家治理绩效,认为国家信息能力这对经济繁荣有正向效应,对于国家内部冲突与认同危机有负向影响。这凸显了国家信息能力的独立性。但是到了数字时代,国家能力还应该包括信息筛选能力,信息作为政策干预发挥作用的程度。

孟天广老师提出"数字化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以解释当前国家能力的演进形态。学界普遍承认,国家能力和技术高度相关。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开始利用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来做信息的采集、处理、政策干预能力。这一机构一直到苏联解体都在发挥作用。中国建国以来受到苏联国家治理的很大影响,但是因为技术不达标而未能实现,直到当下,中国开始有能力实践这一治理理念。如说证监会使用卫星遥感数据来检测上市公司,来衡量财务年报是不是有隐瞒的行为等等。国家内部正在形成一种信息汲取的能力,数据治理能力,数据决策能力,包容和回应的能力,柔化的能力。

目前信息处理机制依据两个阶段分成两种信息处理基础,一个是信息提取阶段,这是为了解决信息不足问题,另一个是信息处理阶段,处理信息过载问题。现代社会有两个机制,一个是专业

化行政机制,但是专业化行政部门特别依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信息处理的思路是中心化,特别强调信息加总,去个性化,去噪,另一个是社群机制,通过社会自己来处理过载信息,再把信息传递给政府,这必须是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这有助于政府进行信息筛选。通过社会的交叉验证能够帮助政府筛选出重要信息,在这个思路下,中国开始驳证研究发现了六种包容性制度模式,包括政治权威高但不专业的组织、信访部门、专业部门等。

孟天广老师总结,在数字时代,国家的信息机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了提高制度的包容性,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建立制度化的信息反馈机制,以解决委托代理的信息难题,第二种是正式的代表制度,建立国家和社会之间制度化的信息协作制度。第三种,是中国相对欠缺的,就是社会信息机制,将社会产生的信息有效转化为政府能够汲取的信号。这三种信息机制应该协作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输问题。

接下来,论坛进入评议环节。平田 茂树老师针对魏希德的报告进行评议。 平田茂树老师认为,中国理想的政治模 式是坐而论道,而这与《贞观政要》中 的叙述大体符合,而这到宋朝时就发生 了变化,直到明清群臣甚至跪受笔录。 与唐代前半期与正殿为中心进行朝政, 皇帝用个人的力量驾驭官僚相比,在唐 代的后半期,以延英殿为中心,官僚直接与皇帝面对面陈述意见的政治体系发展起来。总之,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存在变动,唐代与后来的宋明清也有很大差别。

曼跃讲老师指出,周飞舟和孟天广 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点,都跟政府或国家 有关。周飞舟主要关注政府官僚制内部 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交流; 孟天广注重国 家和社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信息沟 通。两个报告放在一起讲,形成了一个 互补的结构。景跃讲老师指出,一般以 为,官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无论 是经由文件的正式途径,还是通过各种 非正式的方式,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明 确的,否则下面的人没法做事,而且通 常也假定官僚制是充满理性精神的。那 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上下级之间相互揣 摩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是否可 以从中概括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针对 孟天广的演讲,景跃进老师指出,所谓 数字化治理是否对干传统的组织原理的 基本假定提出挑战。从组织管理上有两 个基本假定:第一,人性是不完美的; 第二,信息是不对称的。所有的管理、 组织设计都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第一 点似乎无法改变, 但是技术的发展似乎 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突破传 统的组织理论、关于制度学的思考。此 外, 景跃进老师认为, 信息赋能政府与 赋权社会的进程是高度不均衡的。中国 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强国家 弱社会"来形容,社会组织的发育和作 用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 而新技术非常 有可能加重这种不平衡状态, 使最近这 些年来基层治理的行政化趋势得以加强。

黄宽重老师问顾了三次主题论坛的 内容,对干论坛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许。 他认为信息传递或者是信息沟通渠道, 不仅从传统走向当代, 甚至迈向全球 史, 也跨出历史领域, 与社会政治学者 进行对话,来延伸与深化研究议题,是 深具学术意义的。作为宋史的研究者, 他认为宋代研究者在信息传递方面已有 基础, 值得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宋代在 研究信息传递沟通的优势,除了史料多 元丰富之外,宋朝的大环境跟往昔有别 也是重点。在宋代和战频仍、政治开放 与政局变动、十人考试、任官的移动, 以及商业贸易活动,人与信息都较以往 社会有更高的流动性,信息对国家与社 会, 乃至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性充分 体现。加上印刷的发展, 十人的意见容 易藉由交流、对话,建构系统性知识。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观察多样性发展 的宋朝,乃至近代中国政治、社会,都 会有新的斩获。

接下来, 诸位发言人对上述评议进 行回应。魏希德老师指出, 当时的欧洲 哲学更多地将《贞观政要》理解为一种 治理实践,而非完全视之为历史。欧洲 的人更多地认为其中存在政治理念的延 续性。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能 够长久地延续下去,能够保持合理的政 治制度。周飞舟老师认为,脱贫攻坚是 发生在十八大以后的事情,但是带有政 治化色彩的处理方式并非是全新的,把 政府事务政治化处理是中国的历史传 统。孟天广老师认为, 技术进步对于信 息不对称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国家内部,信息赋能的是上位政府, 中央政府,而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弱化 了,大量的治理资源上升到中央,这可 能让基层的治理单位变成信息治理的一 个用户。另一方面,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 力量的不对称会造成问题。之后的发展 趋势可能会变成越来越原子化的国家, 直接和公民进行沟通, 而不再依赖社会 组织化的体系。政府可能越来越和碎片 化的人或小群体对接。

(撰稿: 王诗瑜)

#### 

#### (四)云端论坛



#### 【编者按】

"云端论坛"栏目延续讨往线下论坛的传统、以多视角、跨学科深度对话重启思想的 交锋,将学者间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广大师生。 特殊时期,栏目以视频 为载体在线上进行,并以纪要的方式在通讯中呈现。截至目前,五十余位学者就佛教学、 中源学意义、素质教育、自我观念、农村危机等主题展开讨论。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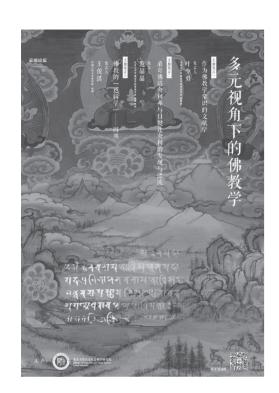
#### 叶少勇、范晶晶、王俊淇 | 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



2020年5月14日, "云端论坛"第 一期在线上平台推出,主题为"多元视角 下的佛教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 授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 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王俊湛博 十展开讨论。

三位来自佛教学领域的高校青年教师, 就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分别做三场主题 发言,并就发言内容展开云端讨论。三场 主题发言的议题从佛教文献、历史考古和 哲学义理等不同角度探讨多元视角下的佛 教学,各鸣其音而不求统一,在交流碰撞 之中,激发了多元视角下的深度思考。

在"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中,叶少 勇老师首先围绕"作为佛教学常识的文献 学"作主题发言。他指出, 英语 philology 一词, 学界并无统一的译法, 大致有"文 献学" "历史语言学"和"语文学"三种 译法,对应到中文语境中,则三种译法各 有侧重, 但可以确定, philology 所处理 的基本对象,既不是纯粹的语言本身,也 不是文本所要传达阐发的思想体系,而是 文本本身。众所周知,13世纪初,佛教在 印度衰落,包括梵语和俗语的成体系、成 建制的原语佛典在印度本土失传。所幸, 斯里兰卡保存了完整的巴利语的佛典三藏,



而其他语种的佛典保存情况则不容乐观, 这就造成了梵文佛典校勘的困难。针对这 一问题,叶老师认为,佛教学不仅是一门 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研究者在分析翻译的佛教文本时,一定要 建立起对干写本的、原本的和平行本的立 体意识, 多一份怀疑与谨慎。对于历史上 是否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接近作 者意图的佛典"原本"这一问题,叶老师 指出,早期佛教的文本意识是开放的,而 非封闭的。早期佛经中有所谓"四大广说" (或称"四大教法")的判断标准,简言之, 可称为"法义原则",即判断一段话是否 可以信从,关键并不在于这段话出自何人 之口, 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佛法的基本精神。 另外, 叶老师强调, 文献学视野下的佛教 文本,不仅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还 是一个动态的流变序列。所谓文本校勘, 并非要还原一个最初的、唯一的文本,而 是描述、呈现文本的动态发展过程。

范晶晶老师的主题发言梳理了桑奇佛

塔舍利弗与目犍连舍利的发现与漂流过程。 佛教约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13世 纪初在伊斯兰教的打击下在印度本土几近 消亡。18、19世纪,英国殖民者对文献材 料的搜集、各处遗址的发掘, 使得佛教重 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1851年康宁汉在 桑奇遗址中发现了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 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 利流转海外,在大菩提学会多年的斡旋与 交涉下,直到1947年才由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交还,并于1952年回归桑 奇、建寺供养。范老师在发言中指出,虽 然印度佛教圣地已成废墟, 典籍零落各处, 但佛教所提倡的戒杀、和平、宽容等教义 依然能够激起现代人的共鸣。同样, 在亚 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 佛教也发 挥了"界定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作用。 范老师强调, 无论是达磨波罗对锡兰佛教 的改革,还是尼赫鲁将鹿野苑发掘的阿育 王柱头上的四面狮绘上印度国徽, 都体现 了佛教元素在这一时期凝聚人心的力量。

王俊琪老师以"因明"为切入点,窥 探佛教的"逻辑学"。 他首先说明目前普 遍流行的观点认为, 东方哲学具有神秘性 和超逻辑性。不过佛教作为一种宗教, 当 然有其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一面, 但佛 教也有理性、世俗与平实的一面。王老师 此次以"佛教的'逻辑学'——因明"为 题作发言, 即是补全大众对佛教印象的一



桦树皮上以佉卢文书写的佛教文献

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在发言中, 王老师总 结了佛教因明学的特征,并分别加以阐释。 他首先强调, 因明学是一门关于"论证" 的学问, 具有强烈的辩论术色彩。此外, 因明学在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知识体系中 地位不同。简言之, 因明学在印度经历了 不断地被整合进"内名"(佛教自己的学问) 之中的过程, 而在中国, 因明学却处在边 缘化的地位。虽然因明学在中印佛教中地 位不同,但都服务于佛教内部的学问—— "内名"。之后,王老师解释道因明学具 有强烈的实在论背景,论证式中使用的"词 语"必须有现实世界中实在的指称物,否则, 类似的命题只能被视为一种"过失"而不 必讨论其真伪了。最后, 因明学采用归纳 推理方式进行论证。在休谟的哲学体系中, 归纳思考基于"自然划一原则",而这一 原则之不可能被证明,大大削弱了归纳法 的推理必然性。陈那在《集量论》中给出 的建议是, 只要没有看到反例, 就可以认 为推理具有必然性。

主题发言后,三位老师就各自报告中 呈现出的有趣学术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 论与回应。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界和宗 教界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譬如"伪经" 问题,叶少勇老师认为"伪经"应被视为 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不应掺杂价值判 断。但无论是学界还是宗教界, 无视彼此 之间的相互影响,都非客观、合理的处理 方式: 至于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的真实性 问题, 范晶晶老师进一步申述道, 考古学 家和历史学家对舍利的真实性确实关注不 够, 这同样涉及学界与宗教界之间认知的 差异。对佛教徒而言,舍利是圣物,真伪 问题并不重要。另外, 范晶晶老师还指出, 就目前技术而言,判断舍利真伪也很难困 难;王俊淇老师在报告中提及因明在中印 两国的不同遭遇,对此他进一步指出,相 对于从所谓的"民族性"出发解释因明学 在中国的衰落, 他更倾向干地理环境、制 度文化等更为具体的视角。

(整理: 王瑞)



#### ₹ 02 🍃

#### 戴锦华、孙柏、陈涛、魏然|镜中火焰 ——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



2020年5月29日,"云端论坛" 第二期在线上平台播出,主题是"镜中火焰——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孙柏、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 所副研究员魏然老师展开讨论。

2018年韩国导演李沧东拍摄的影片《燃烧》入围 2019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了场外有史以来的最高评分。尽管评审过程中惜败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但是戴锦华老师依然认为《燃烧》是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世界电影之一。她在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的同时,指出这部电影能够引发我们一系列的关于今日世界、今日现实、今日社会的思考,更进一步引发我们思考电影是什么,我们能够对电影期待什么。

《燃烧》最先打动戴锦华老师的地方,就是李沧东导演从容不迫、优雅细腻的叙述结构下,那鲜明的、尖锐的现实关注和社会表达。戴锦华老师认为,这部电影表达了阶级分化与阶级固化问题。影片表现的就是在一个极具分化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似乎在分享着同样的关于生活的想象,关于生活方式的选取,关于价值的认可。

《燃烧》是一个谋杀和复仇的故事。 谋杀者本年轻而富有,闲适而从容,简直 是韩国的盖茨比。与此同时, 他声称自己 有烧塑料大棚的癖好, 唯有这种犯罪能够 成为他感触生命,感触世界的方式。而在 他以炫耀挑衅的方式提出他选择要烧掉的 大棚是被弃的,没有用的,不被人需要的 那个时刻,另一个主人公李钟洙——文学 系毕业的, 在社会上漂泊底层年轻打工 者——近平直觉地意识到这个告知背后的 "大棚",并非大棚,而是一些被选做祭 品,被选做猎物,同时又被视为完全废弃 的,没有意义生命的年轻姑娘们。本对于 他的选择有一套哲学而优雅的表达, 他说 "我不选择我接受",他的犯罪、杀戮就 有如天降雨水,雨水进入河流,河流形成 洪水,洪水造成死亡,而这不是雨的选择, 这是自然的道德。戴锦华老师指出, 钟洙 作为一个被邀请的"目击者",几乎"目 击"了犯罪的全过程,却没有任何证据, 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法外的复仇行动,影片 以另一场可见的血腥灭杀结束。这个故事 当中尽管有清晰的因果链条, 但很多环节 缺席, 使得无法完全解锁, 无法去相信, 使得人们处于一种知道, 但却无力的状态。 如同欠着巨额卡债的惠美,仍然向往和本 一样的生活,去非洲旅行、去探索关于生 命的议题、去整容、去追逐时尚,如同当 钟洙陷入巨大的伤痛、绝望和无力的时候, 他只能通过血腥的杀戮来回应社会,回应 自己。

戴锦华老师提示观众们注意, 在剧情 没有完全展开前,导演已经设置了一个场 景, 即钟秀回到乡村的家里进入父亲的工 具房,发现了父亲收藏的刀具。戴锦华老 师将之命名为"杀心萌动的瞬间",此时 还没有敌人、罪行,而只有涌动的愤怒感, 以及相伴随的无力感。《燃烧》向我们展 现了现代韩国乃至现代世界的人们共同面 对的各种现实问题, 比如阶级分化和固化 使得人们丧失了希望和上升空间。这些从 乡村流入城市的年轻人,可以被本这样的 人轻松而优雅地指认为没有用的,不被需 要的人。在经济衰退的时代、弹性工作制 等迷离下,这些年轻人无法找到稳定的工 作, 得不到问题, 得不到位置, 得不到在 社会当中去奋斗的起跑线。即便回到乡村, 乡村也在破产。而另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 戴锦华老师称之为"债务",钟洙的父母、 惠美, 都是信用经济所带来的高负债普遍 的缩影。李沧东导演借助钟洙上厕所时电 视上特朗普讲话的背景音, 提示了新民粹 主义、新民族主义在这样的世界变局中的 涌动,处理了小人物故事背后庞大的国际 背景。似乎在今天,大背景已经离我们越 来越远, 但其实它就是这样笼罩着小人物 的生活。

戴锦华老师认为,《燃烧》可以被视 为一部心理惊悚悬念电影,一个后现代版 的希区柯克。故事中三个角色的相遇就是 一幕心理惊悚剧的展开。本"瞩目"于钟洙,



主动"邀请""引诱"钟洙成为游戏中的 一个角色,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在面对 世界之谜, 讲述生命故事, 更是因为惠美 很早就告诉本, 钟洙是她唯一信任的人, 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会在意她的人,也就 是给这个没有意义,没有人需要的生命, 这个废弃"大棚"以意义的人。而本想要 验证、摧毁这个意义。本和钟洙在某种意 义上是心理上势均力敌的对手, 但是他们 的阶级身份使得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阶 上, 直到最后出人意料地, 钟洙并没有因 为本刻意展现在他面前的线索而陷入无力 绝望, 而是接受了他的角色, 于是猎物和 猎手的角色互换了。在影片的最后,本拥 抱了钟洙。这一幕引出了对这个故事的另 一种理解可能——也许拥有财富,拥有这 个世界近平一切自有的本, 他的杀戮本身 也是一种毁灭与自我毁灭的路, 因为他没 有希望,没有价值,没有一种让他留在这 个世界上去工作、创造的动力。戴锦华老 师认为,成为了复仇者的钟洙,最终把自 己落到了本的位置上,而这构成了一个更 为惊悚和残忍的故事。

戴锦华老师进一步探讨了影片给现实 主义批判立场增加的一个自我质询的新维 度。影片从哑剧开始,对于橘子是否存在、 猫是否存在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到井是否存 在,那个曾经在井下几个小时望着那个洞 口,圆圆的天空,呼喊等待救助者的到来 惠美是否存在, 惠美对钟洙的信任是否是 真实的反复质询。这种自我质询不是怀疑 和不可知的, 而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 高的质询上去。

最后, 戴锦华老师借助《燃烧》的叙 事表达,探讨了电影制作的目的。她认为 这也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戴锦华老师 特别喜欢李沧东导演在这部电影中使用的 "浅焦"的语言形态。惠美的黄昏之舞, 以及钟洙在废弃的大棚前接到电话的两场 戏中,导演都用了浅焦的镜头,在其中后 景是清晰的, 而前景中的人物是模糊的。 戴锦华老师认为, 这是一种关于自我的不 可确认、主体的不缺确认, 以及人对环境 绝对的无力的表达。而电影中的神来之笔 是当钟洙认为他已经确证了故事的真相后, 他在惠美的床上招妓, 而后在惠美的房间 中写作,导演用的不是主观镜头来表现, 而是以客观的第三人称的方式展现。戴锦 华老师认为这个段落是非现实主义的, 这 提示了我们另一种理解这部电影的方式,

即这是一个关于作家的生活想象, 通过自 己的写作去试图解脱,解决在现实中无法 解决的痛苦、愤怒、绝望。

随后, 魏然老师尝试从文学改编和文 化政治的维度解读《燃烧》。魏然老师指 出,《燃烧》与导演李沧东此前作为小说 家时写作的小说一脉相承, 带有很形象的 自传性和"罪己"的意味, 这与韩国的近 代史和他本人亲历的民主化运动密不可分。 《燃烧》故事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烧 仓房》,并带有福克纳《烧马棚》的印记。 这提示我们故事的殴并不局限干当代韩国, 而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可以上溯全球, 因为故事所要讲的是资本的暴力和人在暴 力的经济结构中的处境。

村上春树的小说主人公也是一个作家, 他在婚礼上认识了一个20岁的女孩并与之 成为一个月见一两次面的朋友。这位朋友 去北非阿尔及利亚旅行时带回了一个新的 恋人,富有斯文,像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人物结构基本被《燃 烧》保留了下来。村上的短篇中同样出现 了核心场景, 即非洲归来的恋人拜访"我" 的家, 吃饭、吸大麻, 而这位斯文的男子 说了一句"时常烧仓房"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而这位男子认为实际上有很多仓房等着他 去烧, 15 分钟后就会一干二净, 仿佛压根 儿不存在。他已经找好了下回要烧的仓房, 就在作者家附近。自此以后,作者每天都 在观察, 却一处仓房也没有被烧, 与此同 时,那位女性朋友也开始杳无音信。很久 以后作者偶然遇见那位男子, 询问仓房一 事,对方说在拜访之后的10天左右已经烧 了,同时也声称找不到那位女性朋友,而

日两人都知道女孩没有朋友, 日不善糊口。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作家每每在夜色中考 虑被烧毁的仓房。

魏然老师指出《燃烧》与《烧仓房》 有几处差异值得思考。第一, 叙事者"我" 作家与烧仓房者新贵没有明确的阶级区隔。 第二, 主人公从村上春树的中年人, 变成 了青年人。第三、《燃烧》有更丰沛的情 感维度, 愤怒也更明显。小说对于资本的 暴力力量也是不是全无质疑, 所以小说和 电影中都有那一句,事物有无价值,谁来 判断?被认为没用的东西就应该被烧毁 吗?只不过村上的质疑没有宣泄而出。"愤 怒"在李沧东的自述中是电影的主题、全 世界都在愤怒, 连美国人都在愤怒, 甚至 选出了代表底层白人怒气的特朗普作为代 表。2016年时韩国人的愤怒已经累积到了 脖颈处,严重得令人窒息。正是对愤怒的 关注,李沧东从村上表面上优雅、平静的 文本中读出了愤怒。

以村上春树小说为底本, 李沧东导 演带回了福克纳的维度。《烧马棚》写于 1939年,主人公是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底 层白人斯诺普斯一家人。叙事的视角来自 一个孩子沙多里斯·斯诺普斯, 他是白人 工人老斯诺普斯的小儿子。老斯普诺斯因 为受不了乡村权贵的气, 脾气暴躁, 倾向 于用暴力方式解决一切与邻居或雇主之间 的矛盾, 干过点火烧别人家马棚的事, 而 到了新庄园,父亲又因为踩踏了雇主的地 毯被遭到勒索,很可能再次诉诸燃烧。于 是他从自家里逃脱出来,到新雇主家去告 发, 在大门外大喊"马棚!" 这很可能造 成了父亲的死亡, 因为小斯普诺斯远远听 到了枪响。午夜时分,他坐在小山顶上, 想起父亲的遭遇, 他在绝望中喊道"他是 个好样的! 到底打过仗, 不愧是沙多里斯 上校的骑马队!"父亲一系愤怒的血脉、 对火的力量的崇信,可能也继承在他身上 了。李沧东在干研究韩国电影的范小青老 师的访谈中说, 钟洙的气质近乎福克纳。 确实, 钟洙也是贫穷农民的儿子, 也有一 个参加过战争,对不合理遭遇充满义愤、 崇尚火的力量的父亲。

魏然老师指出,在这三重文本中,所 烧的物质不同却有意思。《烧马棚》当中, 马棚是美国南方庄园经济重要的生产空间, 佃农、雇工慷他人之慨,将雇主的家私付 之一炬, 批评所指的是庄园经济制度。《烧 仓房》,仓房是城市空间里低端人群的蜗 居谋生之所, 在权力者看来不过是当不上 大雅之堂的城市污垢,将其付之一炬,是 要抹除弃民的存在痕迹。《燃烧》里是"烧 大棚",大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物, 塑料大棚是传统农业跨入所谓"现代农业" 门槛的标志。但农业破产之后,农民走向 债务化,塑料大棚是最鲜明的遗留物,塑 料不易降解, 常年存留在乡间土地中。韩 国农民是反全球化的积极团体, 他们曾经 在加拿大、墨西哥等地自焚以批判农业全 球化。李钟洙的父亲与自焚的农民李京海 一样,原先都是养牛大户,但受到韩国从 澳大利亚进口低价牛肉的冲击而破产。焚 烧自我, 携带着韩国保卫传统生存方式时 "父亲一系愤怒的血脉"。在《燃烧》的 最后,不论是真实还是小说写作,钟洙希 望继承父亲,将本和权力者的罪恶付之一 炬的情绪是真实的。这让魏然老师想到了

惠美的黄昏之舞 (电影片段截图)

奉俊昊的《汉江怪物》结束时,人们毁灭 巨兽的武器不是演员裴斗娜射出的、富于 精英气质的弓箭,而是街头抗争的愤怒的 燃烧瓶。20世纪密西西比河畔的愤怒,21 世纪汉江边的愤怒似乎有某种隐线连缀在 一起。

魏然老师指出,李沧东作于 1987 年小说《火与灰》的结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牺牲者的灰烬: "刚才我分明看到了,逐渐被夜幕吞噬的巨大混凝土桥墩之间,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可是他没有坠落,而是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 在李沧东看来,火焰甚至灰烬都不是无意义的,有共同的愤怒就有共同的希望。最糟糕的处境是,感悟到无从改变,无助到连愤怒都无从表达、无从知道。但魏然老师并不认为,李沧东像老斯诺普斯那样,喜欢用传递愤怒与社会抗争。影片的一个提示是,餐厅当中的绘画,是韩国画家李沐相(音译)创作的一幅作品,主题是龙山的强拆事件引发的惨案。2009 年 1 月,韩国警方在首

尔龙山开发区驱赶要求赔偿的拆迁户,冲 突引发中引发大火。画中也有燃烧的火焰; 旁边还有一幅画讲述高压水枪将另一起示 威中的农民喷射而死的场景。这些画固然 提示了历史和另一个社会维度,但放在这 个位置,更多透露出即便是他人的痛苦, 也能和画廊与餐厅中的音乐一道,成了文 化消费品。这也提示我们,不管创造者初 衷如何,欣赏文学或艺术的机制,毕竟已 经从福克纳时代过渡到了村上春树时代。

魏然老师最后总结道,李沧东选择 的《燃烧》,携带了福克纳式的饱满, 也预留村上春树的距离与不易琢磨的想 象空间,我们无法断言最终是真实的复 仇之火还只是钟洙笔下的一段叙事但李 沧东终究没有选择村上春树的天马行空 和以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态度进行 创作。不过,毕竟连村上春树,在2009 年在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奖时,也谴责 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地带的 攻击,毕竟说出了在高墙和鸡蛋之间, 我"选择站在蛋一边"。

陈涛老师主要从电影产业的角度,针 对《燃烧》和《寄牛中》这两部韩国电影 近期代表性作品在不同电影节上的斩获, 谈"新韩国电影"的类型发展问题、管窥 奥斯卡、戛纳以及中国电影的发展。《寄 生虫》是2020年第92届奥斯卡最大赢家, 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 电影"(最佳外语片)和"最佳原创剧本" 四项大奖, 而且也是头一次获得最佳影片 的外语片。《燃烧》则并没有获得奥斯 卡提名。作为艺术电影奖项的最高标准, 2019年的戛纳金棕榈给了《寄生虫》。而《燃 烧》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虽然场刊得分 3.8、刷新了最高记录、但最终没有斩获金 棕榈。陈涛老师认为,这种奖项上悬殊的 对比,并不能代表两部电影的水平,但是 这一对比结果,说明了"运气"的重要性, 比如戛纳颁给《寄生虫》明确表示是对韩 国电影的褒奖,包括对于《燃烧》没有得 奖的补偿,比如《寄生虫》迎合了奥斯卡 今年主打的"国际化"关键词,体现了电 影的官发公关力量以及奉俊昊多年来在好 莱坞的打拼或者合作。而从票房来说,《寄 生虫》现在是超过了2亿五千万美元的全 球票房, 就算是在韩国, 观影人次也达到 了1010万,而《燃烧》在韩国的观影人次 只有53万。很多观众觉得李沧东的《燃烧》 "不好看",或者过于"文艺片"范儿。

《寄生虫》的"全胜"和《燃烧》的 "落寞"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对于陈涛 老师来说,这两部电影代表了"新韩国电影" 的两种不同的种类或者面貌,但又不完全 是类型片(商业电影)和文艺片(作者电影) 的对立。他引入马克·卡曾斯"趋同"与"另类"的概念来进行说明。好莱坞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对"类型片"进行革新,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挑战电影类型的"另类"作品与延续好莱坞类型片模式却装入新内容、新人物、新拍摄手法的"趋同作品",前者揭示人和社会的现实真相如同李沧东的电影,而后者的包容力和创新性正如奉俊昊一样。

陈涛老师认为,现在的新韩国电影, 很像 1970 年代的新好莱坞电影。所谓的新 韩国电影,指的是从 1995 年韩国政府颁布 《电影振兴法》以来,韩国电影开始慢慢 崛起的这二十多年的电影发展。陈涛老师 从宽松化、类型化、壁垒华、制度化总结 了新韩国电影的产业发展,指出,《寄生 虫》的获奖,其实彰显的是韩国电影产业 的崛起,尤其是代表着"类型化"的"趋同" 电影的崛起,证明了韩国电影工业的合理 与进步。从制作到宣发,韩国电影不断积累, 才爆发出了这样一个高潮。

借由《燃烧》和《寄生虫》来作为镜子,陈涛老师以此反射奥斯卡和戛纳不同的发展困境。奥斯卡将奖项颁给《寄生虫》,更多反映出好莱坞的"穷极思变"。奉俊昊的获奖,也暴露了好莱坞创作能力的下降,尤其是针对当下的现实主义力作的稀缺。好莱坞面对着各种新问题,比如以"网飞"(Netflix)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挑战,过度商业化或整合化趋势,以及特效文化霸权等等,似乎又进入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衰退期。不管是奥斯卡跳脱出惯常主流价值去回应其他声音,还是借助他国影片来为自己的世界性加码,都是一种向外寻

力的过程,即通过他者来实现自我指涉, 其本质还是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种治疗。 而我们之所以特别尊重戛纳,是因为法国 电影其实代表了和好莱坞完全不同的另一 种类别或者定义——电影是艺术。如果奥 斯卡给了《寄生虫》说明好莱坞想要突围 "类型"的国际化和批判现实主义化,那 戛纳给了《寄生虫》,除了是对于《燃烧》 的补偿,是否也显示出戛纳或者法国电影 越来越商业化或类型化的趋势呢?

反观韩国电影的获奖,中国电影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之后似乎再没有拍出好的作品,这是为什么?陈涛老师联想到了第六代导演或者新生代导演的"转型"之路,尤其是最近的一些作品,例如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或者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其实是很"趋同"的黑色电影;当然贾樟柯、王小帅等导演其实也在不断让自己的看似"另类"的影片变得更"好看"。他不仅提问,这是否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呢?这样的一种趋势,和奉俊昊或者李沧东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孙柏老师从"消失的女人"这一主题 切入对《燃烧》进行了分析。这一主题可 以追溯到希区柯克的《贵妇失踪案》(The Lady Vanishes),而较近期的一个范例 是大卫·芬奇的《消失的爱人》(Gone Girl),后者带起了新一波的"消失的女人"的 重现。齐泽克曾经把"消失的女人"解 释为无从放置的欲望的崇高客体,她的消 失标志着"失落的欲望客体成因"的曝光。 尽管女性在电影表层中消失了,却构成了 影片的根本结构。惠美从某种意义上,是 近年来银幕上重现的"消失的女人"这一 主题的最新一例。

韩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在《燃烧》 中有着叙述,这决定了三个主人公的命运。 但影片讲入推理悬疑片时,三个主角的生 存处境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惠美不 仅在物质上贫乏,她也渴求着更高层面上 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正因此, 钟洙被惠美 深深吸引。钟洙不同于惠美,是一个城市 女孩, 她仍然是一个农村孩子。孙柏老师 认为, 这部影片对于韩国农村的叙述是十 分值得注意的,这是东北亚农业社会的原 乡, 但实际上早已被摧毁, 塑料大棚是农 业现代化的初级标志。当钟洙家最后一头 牛被拉走时, 他唯一能够去捍卫的就只剩 下塑料大棚了。而被称为江南青年的富家 子弟本,不仅在物质上应有尽有,还能够 去追求生命意义。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 本说他既是献祭供品的祭祀,又是享受祭 品的神祇。

孙柏老师指出,在这样三人社会处境 以及价值取向的展现过程中,惠美作为消 失的女性的结构性意义就凸显了出来。此 处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商品化。 本是故事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携带着 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某种恐怖。"同时存 在"——关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些真 相,是由本提出的——既在这里,又在那 里,既是工作,又是游戏,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但无论慧美还是钟秀,都已 经无法通过出卖劳动力进入到商品化的社 会秩序之中了,他们已经是低于劳动力商 品的存在,他们不再有什么可以出售,因 而也不再有什么可获得。影片中慧美的转 喻式的能指更清晰地说明了她的生存处境, 就是粉红色的塑料手表和叫做锅炉的猫, 它们是废品、是残渣,是在生产的物质性 存在里连边角料都算不上的什么。

引发我们讲一步思考的是惠美消失的 原因。与其说是她作为富家子弟本的猎艳 对象死在了后者的祭坛上,不如说钟秀那 句"只有妓女才那样脱衣服"的话导致了 她的消失。因为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结构里, 她被夹在了两种相反但又相近的 男权逻辑之间, 这其中不存在女性存在的 位置, 她消失在了这同一种男权逻辑的夹 缝中。当她消失了以后,那个现实图景的 没影点就被暴露了出来。钟洙说"世界像 谜语一样,很难把它写成一本书",而这 同时也是李沧东导演的自况, 钟洙某种程 度上意味着李沧东本人,除了把电影本身 拍成一个谜语, 他也无所适从。钟洙最终 在惠美的房间里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开始 写作。很多评论者认为最后的谋杀仅仅是 处于钟洙的想象和虚构。孙柏老师指出, 导演似平只能通过承认虚构为虚构,才能 够以"燃烧"封闭这个故事,即以一种不 大可能实现的方式来表达年轻一代的愤怒。

接下来,论坛进入讨论环节。两年之间引起世界性关注的《燃烧》《寄生虫》《罗马》《小偷家族》和《饥饿站台》等电影关注的都是贫富分化或者阶级固化的问题,阶级似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议题。陈涛老师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在《燃烧》中的表达。《燃烧》谈及的"饥饿"问题,在很多作品中也有出现,但往往会多出一个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维度,而在《燃烧》中除了阶级问题,"饥饿"还是一个差异性的问题。比如钟洙好像是处于所谓的没

有钱的底层, 他首先要满足小饥饿; 惠美 追求的是诗意的人生大饥饿, 但因为阶级 属性还是底层, 所以不停地陷入小饥饿; 本作为富人阶级似乎没有小饥饿, 但却极 端空虚,有着大饥饿。而《燃烧》的重点, 会把这样的小饥饿、大饥饿放到国家隐喻 层面进行讨论, 以不断思考北朝鲜和南朝 鲜的问题。联想惠美的黄昏之舞是在朝韩 边境跳的,特朗普在电视上的演讲,以及 电视新闻背景中谈到的韩国的失业问题, 陈涛老师认为,导演的意图是在表达,朝 鲜缺乏各种物质, 韩国虽然不缺乏, 但反 而是所有人都缺乏生存意义,陷入了精神 饥荒的大饥饿, 而造成这些很重要的原因 是和美国的关系。二战过后美国也许是带 着韩国在发展,但是现在韩国已经逐渐被美 国所抛弃,就像惠美被本所抛弃一样。从这 个角度, 陈涛老师解读了结尾处钟洙脱光衣 服这一场景,一方面是因为有血战,另一方 面可能是他为了逃到北朝鲜做准备——脱光 衣服是为了显示自己没有危险性。

孙柏老师认为,将全球化在韩国、东亚 的国家和地球所造成的匮乏、贫瘠、凹陷的 状态放置在冷战所造成的历史创伤上,似乎 能够打开电影的新维度。目前诸多电影节似 乎都在调整今天的电影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 的联结点。特别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抬头,使 我们重新考虑国家、民族和急剧变动当中的 全球化版图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讨论也 是内在于李沧东的这部电影当中。

戴锦华老师指出,《寄生虫》《小偷家族》 在全球的热映其实是在一个交互的回馈之间传递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即因为 全球化、贫富分化而丧失了上升空间的绝 望的年轻人,突然成为了电影的议题,并 被电影观众以他们所谓的消费选择方式接 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魏然老师认为,《罗马》与《寄生虫》 的创作者都有非常强烈的中产阶级创作者 的视角, 他们同时关注全球化下的阶级分 化议题。对《罗马》来讲是特朗普之下的 中美洲移民在美国的处境问题、后来转向 了性别的议题——女性的几个家庭成员拥 抱在一起, 共同去克服男性, 并在这样一 个相对保守的中产者的视角下带出了墨西 哥街头的学生运动, 而后者是超出原先中 产者视野的。事实上,李沧东与他同时代 的韩国小说家比较, 他并不是一个热衷暴 力、萨满式结尾的作家, 他的结局更多是 抚慰式的, 是从否定走向肯定的表达。但 是在《燃烧》的结尾却是相当残暴的、以 暴制暴的复仇。魏然老师认为,这可能是 在新的语境下,他们重新把阶级一体表达 地这么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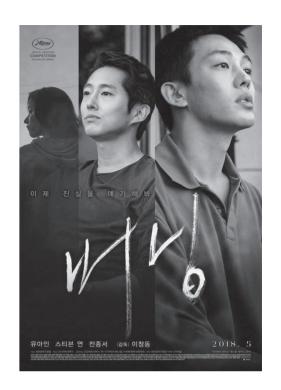
戴锦华老师针对陈涛老师提出的《燃 烧》相较干《寄生虫》在市场上和观众口 碑上失败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第一,由于《燃 烧》缺乏《寄生虫》的奖项背书,使得它 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所以我们才要去 探讨《燃烧》。第二,《燃烧》是新浪潮 开启的艺术电影脉络当中的艺术电影,他 有自己的诉求、敬畏。《燃烧》和《寄生虫》 的制作预算、制作规模、制作方式、宣发、 市场投放上没有可比较的地方,或者说《燃 烧》是在寻求某一特定观众的电影,而非 去寻找最大公约数,争取票房利益最大化 的商业电影。如果只从票房排名上讨论电 影的价值,那就太不公平了。艺术电影扮

演的角色是实验室和发动机,它首先是一 个对于电影艺术、电影语言、电影美学的 实验室,它可能失败,可能成功,而实验 就意味着还没有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成 功的试验就是成为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动机, 电影工业因此才获得动力活力, 注入新的 力量。第三、《燃烧》成为李沧东的观众 并不喜爱的电影的特例确实是一个很难外 理的问题。韩国非常特殊的地方是,它的 社会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是 一个政治畸形化,普遍左倾的状态,在东 北亚三国其他地区都没有类似的情况。韩 国始终保持着年轻人的愤怒和激进,近年 来在韩国最普遍发生的就是年轻左派对老 年左派的挑战,乃至清算,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老年左派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而《燃烧》 刚好撞在了这样的当口上,李沧东作为前 文化部部长的既得利益者身份尤其突出。 此外, 戴锦华老师根据她阅读李沧东小说 的体会,认为李沧东小说的罪己与自传性 质可能使得他的小说成为历史记忆的负载, 对于现实情境的质询, 他并不把自己搁置 在现实主题之外。他不是站在年长者的角 度去看钟洙和惠美, 因为钟洙也可以就是 他自己,就是一个要写作而又写作不出, 因为面对现实就像面对一个谜语。他不断 的试图去猜谜, 去挖掘谜底, 但同时他深 深的知道他只是一个谜中人。在这个角度, 罪己意识才真正成为一种反思的力量。

陈涛老师认为《燃烧》不受观众欢迎 仍然是他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李沧 东有固定的粉丝群,而《燃烧》与他之前 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对阳光的 渴求和对堵车的厌烦等。而井的意象,除 了是来表现记忆的不可靠, 也是一种成年 创伤的描述,很类似于《绿洲》或《薄荷糖》。 而《燃烧》中安排本去基督教堂或者天主 教堂,和《密阳》中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 批判很类似。这些都是原来李沧东的痕迹。 旧是李沧东和奉俊昊似乎都有一占占转型。 奉俊昊会越来越类型化, 而李沧东在这部 电影中加入了一些非文艺性的元素,就是 悬疑的部分,那个部分似乎让这个电影更 好看了, 但他却失去了原有的粉丝, 没有 得到更多的观众和票房的成功。

孙柏老师从李沧东导演对于结尾的处 理人手, 试图理解上述问题。如果李沧东 导演没有设置钟洙的写作——写作非常明 确的在向我们提示,最后的谋杀、复仇很 可能是一次虚构——在惠美的房间外面从 近景、中景慢慢拉开整个城市的景观当中 我们看到钟秀的写作画面,它会和奉俊昊 最后的解决会更加的趋同。恰恰是这样一 种可供选择的位置, 在《燃烧》这部电影 中给了出来。结尾非常清晰、直接、血腥 的谋杀场面由于前面写作场景的存在, 而被 自我解构了。这种结尾设置,或许对于韩国 观众、中国观众来说也许构成了某种困惑, 他们变得无从放置自己的位置。影片似乎提 供了想象性的抚慰,想象性的解决,但是又 迅速的收回,不能够让它充分展开。

魏然老师进一步将这种可能解锁的空 间扩展为,也许是钟洙幻想出了本的罪行, 将之投射到一个本身上,而本原来可能就是 一个从国外归来的富有的很好的哥哥。也许 李沧东预留了这种选择的空间。魏然老师联 想到波拉尼奥, 他在文学作品中把一个非常 通俗的非常英国化的侦探小说的写作方式变



电影《燃烧》海报

成一个解锁当代世界生命谜题很重要的形 势。李沧东也许复兴了这种题材。

戴锦华老师指出,通俗写作的类型样 式,或者好莱坞的警匪片,它最突出的特 征是一个逐渐收束的一个中心化的叙事, 所有的线索最后聚拢到一个焦点上, 而李 沧东的电影借助了这种类型片的叙事模式, 但是最后他是碎裂掉的和弥散开的。他借 助了这个类型,而他有消弭了这个类型。 这对于定位的观众来说,会带来一种巨大 的挫败感。现实中的挫败已经太多了,而 我们在一部电影中获得的不是获知, 而是 再度确认了我们的不知。

随后,戴锦华老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 即商业电影如何通过电影艺术实验室而重 新获得力量,在这种状态下如何看国际电 影节,奥斯卡和电影市场,如何思考中国 电影的未来?

陈涛老师认为,焦虑其实弥漫在很多 国家电影导演的生活中,他们面对市场、 奖项、自己的转型、艺术探索,都会有很 多焦虑,而跟多的也许是现实的问题。

孙柏老师则指出,从新好莱坞时代开 始,对于类型就不断地在进行反思。除了《燃 烧》,《白日焰火》也采取了悬疑片、惊 悚片、黑色电影的方式, 而他认为, 悬疑 片、惊悚片和其他的类型片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这关系到认知的问题。李沧东导演在 访谈中也谈到过一个问题, 我们肉眼看到 的难道就是真实的吗? 这这直接涉及到了 电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通过什 么样的电影形态去探问, 去触碰到世界的 真实? 而对于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把握, 越 来越展现为匮乏、空白的世界, 好像推理 悬疑片有自身先天的有时, 因为它完全把 这样的追问, 内化在动力结构中。在惠美 失踪后,影片似平有一个努力,就是把它 越来越集中,但反而因为这样的集中,我 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的钟洙变得越来越固执, 他明明是在行动, 追查大棚和惠美的下落, 但反而陷入越来越多的疑问, 叙事的线条 变得更加松散、碎片化, 我们反而看到了 更多的贫瘠和空白。

魏然老师联想到了《平原上的夏洛克》 这部接住了推理悬疑躯壳的中国电影。 两 个最普通的基层农民为了自己被撞的同伴 开始寻找肇事车辆。这位同伴因为申报新 农合来填补医疗费用而不能够报案,他们 两个化身侦探开始破案。而另一方面,导 演也谈论了债务华问题,包括因病致贫, 因残致贫,因学致贫等等生活压力。这两位农民摆脱种种生活困难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寻找肇事车辆。但是这部影片罪不让魏然老师满意的,就在于被撞的朋友苏醒了,债务问题也解决了,于是三个人回归田园,发现田园瓜熟林茂,一片丰美的景象。而《燃烧》则告诉我们农村不可归之,早已没有田园,这是资本下乡带来的巨大问题。新三农问题是需要广泛面对的问题。那么今天电影能够做什么呢?魏然老师联想到了韩裔韩炳哲写作的《透明社会》中讲到,当今社会不存在任何否定性,全部是非常没有深度的肯定性,而肯定性不等于真实。在现代,是不是真的能够发现有深度的否定性,可能是当代电影可以做得工作之一。

戴锦华老师从电影行业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电影作为国家形象名片,其实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区域性表达,一种自我确认,而它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共同面对我们的处境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是否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延续下去呢?戴建华教授认为,电影正在从二十世纪的大众艺术萎缩为一种特定的艺术,一种相对小众性的艺术,电影能不能够继续生存,它的小众空间能不能够继续维系,其实已经成为问题。而今天中国电影工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逆势而生的电影工业,应该思考回应这个问题。

(撰稿: 王诗瑜)



₹ 03 ₺

## 苗润博、胡鸿、仇鹿鸣等 | 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 ——史源学的意义



2020年6月2日,由文研院、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云端论坛"第三期"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十三位学者围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苗润博新著《〈辽史〉探源》展开讨论。论坛由中华书局副编审、《〈辽史〉探源》责任编辑胡珂老师主持,分为引言、对谈、圆桌讨论三个环节。

论坛伊始, 苗润博老师作了名为"史源 学的前世今生"的引言,爬梳了"史源学" 这一概念形成衍变的历史脉络。1932年陈 垣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研究"(后更名 为"中源学实习")课程,通常被看作中源 学作为方法的正式确立。然而翻检《陈垣史 源学杂文》及陈垣其他论著可以发现,陈垣 进行史源学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是清人著作, 很少将其用于更早史书的溯源工作。这其实 牵涉到陈垣当时所谓史源学与今人所称之异 同。以往认为"史源学"是陈垣总结乾嘉学 术成果而提出的新概念, 其实忽视了20世 纪 20-30 年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在陈 垣使用"史源"一词之前,当时译介欧洲史 学方法论著的一批学者早已开始使用此词, 对应的其实往往是英文中的"source(s)", 指较为原始的史料,可能包括书籍、建筑、 碑铭、语言等历史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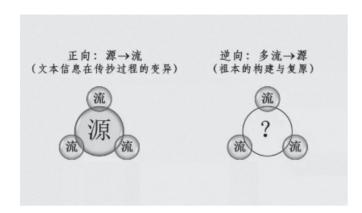
在当时为数众多的译介者中,对陈垣的 "史源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姚从吾。1929 年,留学德国的姚从吾在陈垣创办的《辅仁 学志》上发表译文《蒙古史发凡》,他在《例言》 中写道: "德文 Quellenkunde 一字,译之 为'根源学',或'根源的研究',用于历史, 则为'史源学',或'史料来源的研究'。""在 所有史料中,最早最根本之记录或遗物为一 切叙述纂辑所自出者,谓之史源。"同时还 提出了"史源"与"参考书"这一对举的概 念,前者为记事根本,不容增减,后者为专 家研究,见仁见智。在姚氏 1935 年在北大 开设的《蒙古史研究》课程大纲中,特别 提到"关于成吉思汗的旧史源与新著作"。 史源与参考书,旧史源与新著作,这种二 分法,有助于我们理解陈垣的史源学即所 谓"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 史源"。这里的"史源"其实也是相对于 "近代史学名著"而言的,即逐条追寻、 检核近人论著所用的原始史料, 判断其是 非正误。姚从吾在北大开设的另一门课程 "历史研究法",对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 《史学方法论》进行了编选、译介。对于 该书 Quellenkunde 一词,陈韬的中译本 译为"史料学",而姚从吾则采用"史源学" 的译法,后者正是陈垣史源学的来源。可 见,陈垣的"史源学"与傅斯年的"史料学" 其实同出一源,都来自伯伦汉。

在苗润博老师看来,陈 垣的"史源学"方法其实是 传统的乾嘉考据之学与新兴 西方史学概念的一种嫁接。

"史源"作为原始史料,被等于历史本身,是不可拆分的,这一脉络下的"史源学" 其实并不具备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与独立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兴起,"史源学"作为一种

方法重新得到了学界重视,研究重心也逐渐 转变为追索史书本身的来源,但主体路径仍 未跳脱陈垣史料学的框架,将史书视为供史 家采拾的材料,逐条溯源。这种"为我所用" 的心态可能带有某种工具性、功利性色彩, 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史源学可能存在着先天的 不足: 由于缺乏对文献源流的通体关照, 研 究的结果可能服务干论证目的, 缺乏规定性 和可验证性,同时对文本的结构、层次、缝 隙及叙述框架缺乏省思。基于此, 苗润博老 师希望将自陈垣以来的"史料取向的史源学" 转变为"文本取向的史源学",首先关注文 献本身的生命历程,在整体、贯通的视野下 研究来源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 过程,尤其重视文献与人的微妙互动,最终 的落脚点在于呈现历史叙述的复杂性, 开拓 出全新的问题空间。这样的史源学关照或许 不应再局限于一种基础的史料训练,而有望 成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 内化于新的史学探 索之中。

进入对谈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蔚老师首先对苗润博的新著进行了评述。余蔚老师认为,《〈辽史〉探源》较之冯家昇的《辽



文本源流研究的两种情况

中源流考》, 是一部更具系统性的、集大成 的著作。那么,在对《辽史》做了正本清源 的探源工作之后,还有哪些工作可以继续推 进? 余蔚老师举两例以说明: 一、过去包括 其本人在内的对于辽朝捺钵制度的研究,多 致力干揭示了朝捺钵之地的空间规律, 但在 《 了中 》杂凑各方中料,并且以一时之现象 作为一代之通例的状况被揭露之后, 捺钵制 度的研究应该转向其与辽朝当时主要的政治 议题、军事动向、礼仪文化的关系;二、苗 润博在离析了《辽史·营卫志》文本来源后, 揭示了不同干以往认知的阿保机家族迁徙史 和发展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事实上, 族群构成处于不断地变化、流动之中,这给 族群形成的追踪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苗润博 在研究中的新发现, 提醒研究者对文献系统 的梳理,对文本生成的认识,应该成为一种 学术自觉, 这样学者便不会轻易地错过发现 重大问题的机会。

接下来发言的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张佳老师。针对《〈辽史〉探源》一书,张 佳老师指出,由于与辽史相关的传世文献数 量很少,因此书中有些结论的得出,依靠的 是逻辑推理, 而非文献确证。比如, 对干不 见于辽金旧史和南朝文献记载的内容, 即判 定为元朝人所添加的做法是否确当, 值得怀 疑。张佳老师进而提出质疑,事实上南宋对 干了的认识并不算十分匮乏,比如尤袤在《该 初堂书录・地理类》中就著录了 15 种与契 丹相关的书目, 史学家李寿进呈《四系录》, 该书详细记载了女真、契丹兴衰起灭事迹。 这些书有没有流传到元代为纂修官所见? 在 北宋仁宗年间赵至忠进呈书籍之前, 辽、宋 对峙已近百年,面对北方这一强大的对手, 北宋是否真的缺少关于契丹的系统记载?张 佳老师指出,北宋余靖《契丹官仪》开头就 说: "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夷狄传",似 乎在此之前宋代国史中就有关于契丹的详细 记录。可见,南朝系统中关于辽的知识还有 待清理。对于正史的史观问题, 张佳老师指 出,虽然在原始资料充足的明史研究中,《明 史》并不具有"独尊"的史料地位,然而清 修《明史》的史观却仍然在左右着目前学界 对明中的整体性认识。在各种蓬勃进行的、 旨在纠偏正缪的"新史学"(新宋学、新清 史) 当中, 更有必要进行是"新明史", 其 基本前提,便是反思钦定《明史》的明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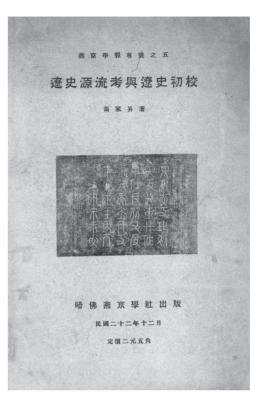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邱靖嘉老师指出,一般读者甚至有些相关的研究者对史源学的方法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解,认为史源学不过是一种查证史料原文出处的技术性手段,而《〈辽史〉探源》对史源学方法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史源学研究取向所具有的研究魅力。邱靖嘉老师认为,苗润博对《辽史》文本的全面离析为接下来的《辽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重建契丹王朝的历史论述,这是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对于本书所提出的

新问题, 邱靖嘉老师择要进一步申述了自己 的看法:一、契汉双轨修史制度的提出与发 现意义重大,可以有效地解释过去我们不太 理解的《辽史》文本现象,但这一"假说" 是否成立,以及这套制度具体的运作方式、 其发展演变过程等,还有待相关材料的验 证和进一步的研究。二、元修三史同享共 同文本资源这一事实, 提醒研究者要打破 对元修三史进行孤立研究的旧有格局,充 分关注三史资料来源与编纂过程的复杂性 与多样性,将三史作为整体进行考察。而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元修《宋史》 的研究相对薄弱,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供挖 掘。三、过去研究存在的误区是,当《宋史》 与《金史》记载出现冲突时, 研究者往往 认为《宋史》记载是不准确的。然而事实 是, 宋人对金史的记载并不全是讹传。相 似的情况,在《辽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 这提醒研究者对正史文本的经典性进行反 思。对于《〈辽史〉探源》这本书的写作, 邱靖嘉老师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首先, 《〈辽史〉探源》对《辽史》史源研究的 学术史缺乏更为详细的梳理与介绍: 其次, 就冯家昇对《辽史》的研究而言也不应局 限干《辽史源流考》一书,还应该将冯家 昇到美国后与魏特夫合著的《中国社会史: 辽》一书纳入考察的视野;再次,除了本 书已经清理过的《辽史》相关《纪》《志》 外,他如《刑法志》以及《传》的一些部分, 同样有待细致的个案研究加以厘清。

在此之后,苗润博老师对以上三位老师 的讨论做了简单回应。对于余蔚老师提出的 辽朝捺钵问题,苗润博老师认同余蔚老师关 于辽朝捺钵制度应该与辽的政治、文化议题 放在一起考量的看法,同时指出,游牧社会 本身是否遵循农业社会的节律运动也是值得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于张佳老师的疑问, 苗润博老师提到,全面爬梳宋人、元人关于 契丹的知识流变可知, 在赵至忠人宋并上呈 契丹书籍之前,宋人对契丹的认识确实相当 匮乏,同样地,元人对辽史的认识普遍比较 隔膜,至正修史之时能够利用到的资料也相 对有限,我们几乎可以一一考出。至于邱靖 嘉老师提到的契汉双轨问题, 苗润博老师表 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寄望于 俄罗斯所藏契丹大字抄本的公布情况。关于 《辽史》列传部分的情况,苗润博老师进一 步补充道,新出《韩德让墓志》的内容与本 传的巨大差异,恰恰印证了他关于辽代官、 私传记资料系统相互隔绝的观点, 辽朝很可 能并没有行状考功、史馆报送的制度。

紧接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聂溦 萌老师发言, 她在评议中强调了"探源"工 作对其他相关领域的意义。她指出,《〈辽 中〉探源》一书以诸志的探源为主,通过将 元人增饰的错误因素剔除,从而考证出辽代 制度相对真实的原貌。然而, 聂溦萌老师强 调,历史记录并不等同于事实。苗润博老师 在《〈辽史〉探源》及其他相关文章中对西 辽开国始末, 契丹建国前史的研究, 在考证 事实的基础上往前迈进了一步, 触及到历史 记忆的建构问题, 为探源工作开拓出更大的 空间。不过,对于苗润博老师对《辽史》粗 制滥造的批判, 聂溦萌老师则认为如果过分 关注于史书修撰之优劣,可能会遮蔽一些更 本质的问题。古代史家编撰史书的一般做法 与现代历史研究的目的本身就不一致, 在这 一点上,《辽史》与其他正史没有根本差 异。聂溦萌老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特点为例说明,对材料的"模糊"处理可能会有助于史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问题。同时她强调,支配古人编纂史书的并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追求,而往往是搜集、拼接文献这个程序本身所形成的一些格套化方法。唐宋以后,国家垄断正史修撰,使官修史体制嵌合进政治体制之中。聂溦萌老师相信,对史书编纂规律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到,正史不是"历史"本身的绝对代表,而有其独特的形成因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孙正军老师也充分 肯定了苗润博老师将史源学从传统的史料取 向转变为文本取向的方法,这一跨越使得史 源学从单一的文献学研究发展为兼具文献 学、历史学的复合研究,由此大大扩充了史 源学研究的范畴和价值。接着, 孙正军老师 评述了《〈辽史〉探源》在具体操作中值得 称道之处, 如强调文献的整体源流以及溯源 手法之巧妙。另外, 孙正军老师还指出, 以 往历史学领域的文本分析较多关注纪传文 字,对于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志留意较少,学 者多将书志视为某朝制度的如实记录,直接 用以研究。然而苗润博老师的研究则表明, 《辽史》诸志不仅编撰粗糙、史源不一,其 中还可能混杂有元人的辽史观,这样的文本 直接用来研究辽史非常危险。孙正军老师近 年来致力于史料批判研究, 他从方法论层面 提示包括史源学在内的文本分析在文献不足 徵的状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厚诬古人"的 可能, 书中一些判断或可更为谨慎; 又具体 到史源学,指出由于史源学侧重追寻史料来 源,故往往对历史编纂过程中史家的角色关 注不够, 书中将《辽史》中种种不合理之处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年初印本封面

简单归结于元代史家的无识、颟顸,即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点。孙正军老师强调,在 辨析史源的基础上重视史家(包括时代和个 人)在历史编纂中的积极作用,或更能呈现 文本生成复杂多歧而又生动细节的一面,且 史源学并非探求文本生成的唯一维度,有些 问题是史源学鞭长莫及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老师同样认为,相比于《纪》《传》,《志》的史源更难于推考。苗润博老师所标举的"新史源学",其特点是找到了"中间文本",使得他的研究区别于前人对文献线性传抄的认识或仅对正史材料来源做简单推测。在史源学研究中,提出判断相对容易,关键的是要找到"中间

文本",而此书的突破点即在干大多数情况 下都找到了可靠的"中间文本"。对于"史 源学"与"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的立场 差异, 仇鹿鸣老师以《〈辽史〉探源》中提 及的辽乾统七年全年无一干支系日这一奇怪 现象为例加以说明,"史源学"在没有找到 确凿的"中间文本"例证时并不轻易地作出 推断与解释,宁可阙疑待考,而"历史书写" 则倾向于从史学编撰的角度作出合理化的解 释。接着, 仇鹿鸣老师对苗润博老师所谓的 "元人的辽史观"这一说法提出了商榷意见。 仇鹿鸣老师认为"史观"具有明显的个人意 图,而通过将元人修《辽史》这一行为还原 到历史现场考察,他发现元人其实并无所谓 "史观",《元史》不过是一个急于"结项" 的国家政治工程,而元人所做的工作仅仅是 技术性的删削。就正史校勘而言, 仇鹿鸣老 师指出,《〈辽史〉探源》为二十四史校勘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过去对二十四史的校勘 工作,很大程度上沿袭着清人的老路子,对 相互矛盾的两段材料、认为必有一误。在史 源学的视野下,这种"本校"存在着很大问 题。走出以辨析文本正误为第一目的的校勘 学,转而对史书文本不同层次进行剥离,进 行同史源校勘, 进而作出对某一正史史源的 系统研究,或许是更有意义的工作。最后, 仇鹿鸣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即耶律俨的《皇 朝实录》与陈大任的《辽史》究竟是源流关 系还是平行关系?

在回应环节,苗润博老师指出,恰恰是 因为《辽史》的"粗制滥造",才为我们提 供了对其进行史源学批判的试验场,但其实 他本人并无评骘《辽史》修撰优劣的意图。 《〈辽史〉探源》只是尝试还原《辽史》修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撰的历史现场,考察元人到底利用了哪些以 及如何利用那些材料的。苗润博老师也肯定 了从创作意图、权力话语等角度切入的史料 批判的价值,但他同时强调,"史源学"和 "历史书写"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创 作意图、权力话语等的分析只有建立在对文 献源流的总体把握之上才能生效。无论哪一 种文本研究,大家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 史源, 但关键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究竟关注了 没有、如何关注的。对于仇鹿鸣老师的提问, 苗润博老师表示, 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与 陈大任的《辽史》并非线性关系。可以确定 的是,陈大任修《辽史》时,仍然可见耶律 俨《皇朝实录》之前重熙十三年所修的"遥 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另外,针对仇鹿 鸣老师提出的"史观"问题, 苗润博老师进 一步申述道, 在讨论"史观"之前, 需要对 "史观"进行概念界定。在他看来,"史观" 并非仅指主观意图, 史书所呈现出的客观的 叙述框架同样也是"史观",这种无意识的 史观往往更容易影响后人。

接下来,论坛进入"圆桌讨论"环节。 复日大学历史学系陈晓伟老师首先发言,对

史源学作用于校勘学的研究路径进行了简明 扼要的介绍。他指出, 文献校勘存在版本和 版本较、正史文本本身的讨论两个层次,前 者具有奠基性作用。对文本源流的研究,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向过程,侧重研究文 本信息在传抄过程中的变异: 一种是逆向过 程,侧重祖本的构建与复原。今天的研究, 面临更多的是逆向研究的困难。版本校的尺 度和标准主要取决于版本系统的情况,具体 而言,也有两种情况:一、版本多元非一源: 二、祖本及其衍生版本。在后一种情况下, 由于祖本与衍生版本的单线传递关系,就需 要充分尊重祖本原貌和纠正版本流传过程中 产生的讹误。因此, 陈晓伟老师强调, 处理 正史文本时,研究者要树立史源意识。以往 对"二手文献"编纂思路及史源问题认识不 到位,导致种种误校。以探索史源为前提, 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校勘的尺度和彻底揭示问 题的症结所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老师在讨论 中指出,就历史学而言,"史源学"仍当属 于史料学的范畴,是对史料进行处理的一种 方法。苗润博在本书的结语中,将"史源学"

视野下的史料批判分成了两个层次:一、对 文献本身的研究;二、对文本背后的创作意 图、权力话语、历史图景的批判。这涉及"史 源学"与"史料批判"的立场问题。在党宝 海老师看来, 在史家与史料永无休止的对话 过程中,这两个层次的研究其实是交替进行 的,并不一定具有先后次序。另外,党宝海 老师注意到元修《辽史》的不同的人员构成, 并推测因为他们各自出身、学术背景的不同, 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分工。我们现在 知道,元修《辽史》对耶律俨《皇朝实录》 和陈大任的《辽史》有所继承, 但究竟哪些 是至正史官的史观,哪些是耶律俨、陈大任 的史观, 仍有待厘清。

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康鹏老师认为, 苗润博的《〈辽史〉探源》一书开启了一个 崭新的研究局面, 辽史研究中的很多重大问 题都需要重新予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点也 由此引发。对于《〈辽史〉探源》一书, 康 鹏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辽人对耶律俨《皇朝 实录》加以增补的时间下限究竟是哪一年? 陈大任《辽史》的史源又是什么? 他又是如 何取舍的? 南朝系统的史料的价值究竟如何 判定?《辽史》中的某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并 不是元人的过失, 而是另有他因。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中间环节,值得进一步探究。另外, 对于辽朝修史的契汉双轨制度,康鹏认为 《辽史》中类似"范密"(实为"潘美") 这样的记音讹误, 很难说是辽朝史官将契 丹文文本译成汉文文本的结果。最后,对 干苗润博老师提及的俄罗斯契丹大字抄本, 康鹏简单地描述了这一文献的现状,认为 学界真正释读、认知这个抄本还需要极为 漫长的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流老师 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辽史〉探源》在学 术史上的意义,认为其对后续研究元人知识 体系中有关辽史知识的流传, 乃至元人观念 中的辽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助干推动 学界全面重新思考有关辽史的重要议题,进 而重塑和展现出一个不被以往所知的辽史。 同时,《〈辽史〉探源》也开拓了新的研究 模式,推动正史史源的研究走向精耕细作。 除此之外, 曹流老师期待着苗润博老师对元 人为何分撰《营卫志》《兵卫志》,以及《营 卫志》为何又分宫卫、行营、部族三门等问 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老师并未对《辽 史〉探源》的具体细节展开讨论,而是对正 史的经典性问题进行了反思。胡鸿老师认 为,传统历史撰述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循"。 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考证史料来 源出处,因为即便是最原始的"档案",记 录的也并非事实, 而是现代史家要充分认识 到历史图景都经过了一重重的信息过滤和扭 曲,我们今天习焉不察的宏大叙事往往都建 立在无数不可靠的细节之上。中国历史载籍 丰富、历代正史连续不断,在胡鸿老师看来, 这些引以为傲的事实有时恰恰遮蔽和掩盖了 历史记忆本该具有的多元性和矛盾性。通过 史源学的方法为"正史"去魅,重估一切史 料的价值,重估一切事件的价值,将已有知 识都当做待证的假设, 承认我们对历史所知 的局限,或许是《〈辽史〉探源》带给史学 工作者最重要的启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老师在发言中 以中古史为例,对史源学方法提出了一些看 法,他认为在处理史料的一般性原则上,中 国古代史各个断代差异其实不大。但是我们 在掌握一般性方法的基础上, 应该具体区分 对待不同断代的史料。吕博老师具体举例指 出,目前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对《资治通鉴》 史源的清理算是比较充分。然而就目前情况 来看,《资治通鉴》大约有20%的记载不 见于南北朝文献, 隋唐史部分大约有50% 的文献不见于两《唐书》,其中的很多史料 我们并不知道来源。吕博老师进而以唐长孺 先生的《唐书兵志笺证》为例进一步说明, 研究者如果想讨论欧阳修的史观, 那么对史 料进行必要的清理当然很重要。然而,如果 要讨论具体的问题, 如是唐代府兵制, 那么 欧阳修的史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因为欧阳 修关于兵制的看法常常是有很大缺陷的。这 里我们就应该利用杜佑的《诵典》、王溥《唐 会要》之类更原始的文献,去探讨唐前期的 兵制。

针对吕博老师的质疑, 苗润博老师进一 步申述道, 史源学首先讨论的不是"意图", 而是文献"源流"。他强调, 史源学绝不应 限于现存文字的简单对比, 如果没有整体的 文献关照,很难解决具体研究中的问题。比 如关于《通典》的史源问题, 目前唐史学界 的认识就还有很大的深入空间。仇鹿鸣老师 也表示, 苗润博老师的史源学关怀, 很值得 中古史学界进行反思。他试图纠正人们对中 古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错觉, 即认为很多问题 前人都已解决,而事实上不少大部头文献在 文献学、史源学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很多基本文献亟需通过"史源学"的方法进 行厘清。

在讨论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老师 也同意苗润博老师对史源学的看法,认为史 源学并不等同于史料学。史源学这一方法由 来已久,是文献校勘中常用的方法,不仅可 以运用于史学, 也可以运用于经学。李霖老 师以皮锡瑞《经学通论》为例,说明史源学 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作者会根据主观意 图扭曲对史源的理解, 甚至对史源问题含糊 其辞, 在这种情况下, 不对史源进行追究可 能会错过很多核心问题。史源学的意义不仅 在于将人为建构的因素剥离出来,从而呈现 出真实的历史图景,同样也在干通过史源学 的工作,认识到后人置于历史文献之上的"滤 镜"。而历史学界普遍关注事实,对"滤镜" 缺乏重视。同时李霖老师也强调, 史源学并 没有义务处理所有的史料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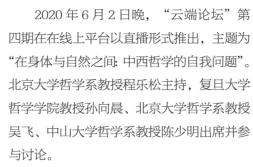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老 师对本次论坛做了简要总结, 他希望经过 本次论坛的讨论,能够达成以下两个共识: 一,对传世文献,尤其是重要的史书做史 源学的探源工作很重要, 也很有必有; 二, 辨析文献源流、考证正误可能并不是最重 要的, 重要的是去讨论为什么文献会呈现 出不同的样态。

本次论坛从《〈辽史〉探源》说开去, 聚焦于史源学的路径、威力、边界及其局限, 诸多讨论已跃出个案的范畴, 而牵涉到史学 方法的问题。相信随着具体研究实践的积累, 不同断代、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史源学方面会 有更多的对话空间, 文研院也将持续关注、 适时组织相关的讨论与争鸣。

(撰稿: 王瑞)

04

# 程乐松、孙向晨、吴飞、陈少明一在身体与自然之间 ——中西哲学中的自我观念



论坛伊始,程乐松老师首先介绍了本 次论坛的主题——自我问题。自我是叙述哲 学史乃至建构哲学体系的基点, 而身体既是 自我的载体,又是自我的界限。在自然之中 活动的自我一方面不断探索和理解自然,另 一方面也在对自然的理解中不断朝向自身。 对作为个体的自我和作为群体的"自我"的 构建,不仅建立了理解生命、他人与生活世 界的基础, 更为历史与未来之间的绵延提供 了反思的前提。程乐松老师提出,如果尝试 在身体与自然之间为自我的建构提供一个相 对明确的论域,那么中西哲学传统会如何描 述不同思想语境中的自我建构方式呢? 进而 言之,从自我的建构出发,是否可以进一步 理解中西哲学传统在思想方法及反思立场上 的异同呢? 从程乐松老师提出的这一主题出 发,三位老师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与之研究 背景相关的主体报告。

陈少明老师以"躬行与自忘——对儒道 身体观的一项比较"为题进行报告。陈少明 老师以"我的身体"、"我的电脑"两个短 语中"我的"与"我"的关系为对照,指出 身体虽然也属于"我的",然而身体对于我 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 "电脑" 对于我而言却是可有可无的,与整体的身体 不能被我放弃不一样。同样的, 我的心灵与 我也不能分开。故身、心均是我不可分割的 内容。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心灵和身体无 法分离。一旦分离,没有身体的心灵就变成 幽灵, 而没有心灵的身体则变成动物或行尸 走肉。中国的儒道共享着身体与心灵不分离 的前提, 但是有着不同的表现。

陈少明老师指出,儒家经典《论语》 中与身体有关的一个关键词是"躬"。在儒 家看来,身体本身不只是心灵的负载物,而 是一个主动的社会要素。一个人认识自己可 以依靠心灵, 但是别人理解自己, 则是从身 体开始的,从样貌、举止,乃至行为、语言 进行认识。身体不仅仅是自我在空间中的定 位,还是人的界限。人所需要的空间,不仅 仅是身体所占有的物理空间, 还包括支持身 体存在的资源的空间。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服从于空间的秩序安排。行为与别人 配合, 便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 家将这一秩序及其建构与践行称为"礼"。 于是,身就变成了实现礼的行动场域,儒家 达成生命目标的工夫论就称作修身。所谓 "躬",鞠躬尽瘁的躬,事必躬亲的躬,就 是从践礼的运作引伸而来的。与之相对,以

《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方面贬低社会意义上的身,及规范于礼的社会行为,其中所推崇的得道者多是相貌离奇甚至病态的身躯——出于自然的禀赋或者出于社会性的处罚;另一方面则展示人身具有神乎其技的表现能力——如匠石运斤与庖丁解牛,做到心、物与道合一。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忘","忘形"与"忘己"。"忘形"让身从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忘己"则让心物合一,游心于道。

概而论之,儒道两家都具"万物一体"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儒家本于自然而超越自然,从而指向社会道德理想,道家则要回归自然,把有限的自我投入无限自然中,从而导向了宗教精神。两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身体观念的基本格局。

随后, 孙向晨老师以"重思'身体'的 哲学地位"为题讲行报告。如果将"身体" 追根溯源, 在古希腊, 身体占据了极其重要 的地位,显示了美和力量。从哲学角度来看, 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与身体为敌的。在苏格拉 底-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 灵魂想要认识 真理、理念,身体是一种阻碍。因此, 灵魂 本质上是敌视身体的。亚里十多德虽然并不 那么敌视身体, 但他所认为的最高幸福, 仍 然是精神性的沉思。沿着这一进路, 在主流 的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有着某种"原罪"。 嗣后,这种对于身体的敌视为基督教所继承。 基督教传统中有着强调苦行、禁欲、独身、 忏悔的面向, 将身体与肉欲当作提升心灵和 纯净信仰的敌人和障碍, 脱离身体和欲望的 重负才能保持灵魂的自由和拯救的可能。

近代以来的哲学转向以一种新的方式 将心灵与身体对峙, 这是一种身心二元结构 为基点的哲学立场。笛卡尔的思想就呈现出 了一种十分典型"身心二元"结构。在《第 一哲学沉思》中,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方法论 就是通过无可怀疑的"我思"来作为哲学的 基石,一直要到"第六沉思",笛卡尔的哲 学体系才重新出现身体。笛卡尔的身体始终 无法和思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笛卡尔以一种 新的形式呈现出身心之间的张力,并被后来 的哲学家所继承,成为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 特征。从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不断追求 和建构"思"的纯粹形式,强化了思的主体 地位。在这一传统中, 先验主体的哲学话语 和体系得到彻底发挥。与之相对,随着近代 科学的发展与科学主义观点的滥觞。"思" 被越来越还原为"身体",从洛克、孔狄亚 克到拉美特利, "我"彻底还原为"身体", 彻底沦为一部"机器";主体与思想的差别都被归结为作为机器的身体及其物理属性的差异,这样的传统显然导向了一种生物的还原主义立场。

与此相对,海德格尔另辟蹊径,在"此

在"中呈现"在世界之中"的意涵。但在《存 在与时间》中缺乏对于"身体"的研究。孙 向晨老师指出, 列维纳斯在批判海德格尔与 西方哲学传统时,建构起一种独特的"身体" 存在论、借助"身体"恢复起"我"与世界 与他人的原初关系。孙向晨老师认为,从某 种方面来说, 列维纳斯的思想是相当中国化 的。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给出了 自己的存在论, 诵讨"身体"把自己安置在 世界之中,"身体实现我在大地上的安置"。 人通过感受力 (Sensibility) 直接和世界相 交融,"沐浴"在原初的环境中,与世界的 关系则是一种"享受" (enjoyment)。从 "身体"出发,以居住、占有、劳动等方式 与世界打交道,从而建立了以身体为起点的 存在论。在此基础上,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关 切也十分强调他人之"脸"带来的意义与责 任。在列维纳斯看来,人们是通过"面对面" (facet to face)激发起一种伦理关系。此外, 通过男女有别、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生 行"概念, 列维纳斯让哲学全方位地回到了 身体, 让身体的经验变得更为根本和原初。 此外, 孙向晨老师还指出列维纳斯在后期思 想中强调了身体的暴露,及其易受伤性和脆 弱性, 开创了另一种意义的主体概念。

即便有着列维纳斯的丰富论述,孙向晨老师认为中国文化资源中依然有十分丰厚的关于身体的理解,仍然可以提出某种新的向度,填补西方思想中的空白。他特别指出,

《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解显示身体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还是联系"世代性"的枢纽,这种世代性枢纽的关系同样显示了一种前反思的状态,在前建构的状态中人已经处于某种给定的与他人的关联之中,这种关联对于伦理性的建构和自我的理解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基于"亲亲"与世代性的架构,建立起的自我认识与社会秩序本很好地回应了西方面对的身体与自我时的哲学困境。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论是在人伦关系中,还是与自然的关系,身体都是一个枢纽点,在世代的时间上与在自然的空间上的枢纽点。

吴飞老师以"从存在到性命:中西自我 观的对比"为题进行报告。吴飞老师认为, 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存在问题, 而中国哲 学的核心问题是性命问题。在西方哲学的存 在论架构中,从古到今有三种基本的存在形 态,第一种存在是绝对存在,第二种存在是 精神性存在,第三种存在是物质性存在。这 构成了存在论的基本架构。古代哲学和中世 纪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存在,哲学反思的基 石和归依就是上帝的存在。从上帝的存在和 确证的基础上来理解精神和物质。笛卡尔的 转向是把哲学的出发点从绝对存在转移到自 我。唯物主义是从物质性存在出发去理解整 个世界。在现代西方,精神性存在作为出发 点的思想倾向是最主流的, 主要关心认识论 问题。然而,这种理解视角的最大问题是, 一旦确定了自我的主体性,就很难确定有和 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

现代主体性的问题是把自我封闭在这个架构中。近代的生命哲学,叔本华、尼采、伯格森等也是从自我出发,不过是意志的自

我而非认识的自我。自我成为意志的主体,通过意志和欲望来建构对身体的理解。在意志哲学中,尽管会有很多对身体的描述,然而其中的身体却有根本缺陷,一个充满欲望和难以控制的意志的身体不可能是自足的。因而,不妨说,无论是认识的自我还是意志的自我,西方哲学都无法解决主体论的困境。

以此为基础,吴飞老师转向对中国哲学中身体与生命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主题是性命。在性命论哲学的传统中,第一位的是性命。在笛卡尔的认识性主体中,很难有和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但是在性命体系中,我与他人的第一关联是生的关系。对于生的源头和生生关系中的内在联系的反思性确认,是性命论中的首要问题。由这个问题出发,才有可能建构与其他的人伦关系。推而广之,这种性命论的建构模式可以建构了理解我和无生命物之间的关系,进而言之,我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回到自然,吴飞老师指出,在西方,精神是敌视身体的,就像文化敌视自然。但是在中国思想中,生是极其自然的行为,而天地自然的生生是无目的、无安排的,人为的制礼作乐不如自然的完美。人为需要模仿自然,把自然的生生之意模仿得足够好,就能够做到人与天地自然相参。自然始终是一个最高的标准。

在这样的结构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身体的问题。试举一例,《大学》中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小到大不断推展。修身包括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在内,但是毕竟与正心诚意不同,修身涵盖了这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不是修身的全部。修身的展开又是

具有延展性的。修身成为一个枢纽,从向自 身的建构回归的同时又是自我的拓展。

不妨说,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身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概念。如果从文字学的角度讨论"身""体"。身的形象就是正立的人,体本意是四肢,但最后成为四肢联结成的总体。身体与心灵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对比,身体是质料的,心灵是形式的,从人的心灵形式,发展为家庭,到村庄、城邦,这是精神性的扩展。但是在中国的观念中,这一过程是身体的向外扩展,是包括了生生自然的性命的总体。

从自我的性命出发,反思到父母、兄弟、父母的兄弟、祖先,于是呈现出了家,并进一步认识到村、乡、国。考虑到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哲学所面对的问题,如何突破主体的藩篱?我们或许可以从性命论中找到灵感。

讨论环节中,程乐松老师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身体的奠基性地位是否可能造成主体的限制?第二,中国哲学中是否有把心灵从身体中抽离出来,让主体奠基于心灵的尝试?

孙向晨老师认为,列维纳斯指出身体的概念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限制,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即我们需要回到被限定的身体。吴飞老师指出,中国思想的优势就是,心始终在身里,不过这里的身并不等同于精神和物质关系中的物质。身不完全是物质性的身体,而是人的性命总体。

陈少明老师指出,身、体原意略有不同,身只有一个,是有界限的,但是体可以有四体,可以衍生与联系,没有固定的边界。 (司马黛兰对几个相关词有专门研究。)在 这个意义上说"万物一体",我们把生命理解为相关联的,只是关联的层次与程度不一样。只有从儒家、道家出发,具有前反思性和本体性的关联与责任才能被奠基,以此为基础,所谓群的命运共同体才能成立。在中国,不存在一种把人的心从身体中脱离出来的倾向。当然,人们也会对人的有限感到不满足,这种不满只有两种办法去解决。第一是通过科学发展扩展人的生命与身体能力,第二种是通过代际的传递把价值寄托在类的无限发展中。

陈少明老师指出,严格来说,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并没有自我概念。现在对于"自我"的理解,通常因为每个人都自知是独一无二的。如何认识这种独特经验,以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如何对待世界,便包含在自我问题中。其中的第二个问题在中国传统中也存在。陈少明老师以"吾丧我"这一寓言的解释展开论述。这一寓言中涉及了心和形,过去和现在,我和你,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从中可以推导出《庄子》的自我预设。其中的"我",一定是和别的比较才能够存在,

而如果只说自己,就是"吾"。吾包含着一种自主性,而我则是对待性的。丧我,就是要忘掉由于和别人的比较产生的利益纷争。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庄子的自我理论,只能说是我们在这一问题框架下展开的文本解读。

孙向晨老师进一步指出,列维纳斯处区 分了主格的 I 与宾格的 me。因此对于自我 问题的看法或许还是要回到根本性的概念中 去。吴飞老师认为,我们在讨论哲学问题是, 面临着两个困境。一方面我们总是认为中国 思想不够纯粹,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西方的框 架中。这就要追求回到原初的语境和思维方 式。而小学的训诂等或许对此有所有帮助。 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可能完全变成自 说自话,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真实问题,中 国哲学的意义又在哪里?从而,我们一方 面要回到纯粹的中国,另一方面又要接触 到现代世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肯定是西 方的问题。

程乐松老师进一步提问,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术语和术语概念的清晰性通常会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程乐松老师提出,不只是西方,现代中 国是否也在忽视身体? 孙向晨老师认为,不 同文化的聚焦点是不同的,中国文化能够提 示出身体的起源。现代社会普遍是以遗忘身 体的来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 都是以现代"个 体"为单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会遗忘身 体的来源。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扎 根于某种身体性以及基于身体的原初经验, 时时提醒着现代中国人"身体"的来源、从 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是不 易消失的。

程乐松老师提问,在性命论的意义上是 否存在身体的亏欠性? 吴飞老师指出, 他对 亏欠的理解就是原罪,即人对于上帝的欠负。 相对于绝对存在来说,人的存在,无论是物 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一定是有欠缺的。如 果从性命论的角度说,身体本身是自足的, 不是相对于别的什么的存在, 而且身体本身 就是自然的, 所以以自然为标准, 不存在身 体天生的亏欠。

最后,程乐松老师对论坛进行了总结。 他谈到了他自己从几位老师的主旨发言和讨 论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首先, 身体在有限性 与延展性之间展开反思的空间及理论论域。 其次,身体的奠基性价值是在秩序的意义上 展开的,即指向了自然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 自然的秩序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而社会秩 序则包括横向和纵向的理解性建构。再次, 身的界限感和体的联结性,构成了身体与自 然的全面联结。如果没有界限感就无法构成 身体的独立性, 如果没有连接性, 那么身体 就是把自我封闭起来的藩篱。第四,从哲学 反思的意义上说,身体不仅成为自我问题的 重要论域, 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表述视角, 保障了哲学反思的活力。最后,身体的奠基 性和反思空间,以及对于从本体论、存在论 到伦理学等各个层次的理论潜力,可以让它 成为一个互通中西的共同问题意识, 也成为 中西哲学进一步融合的切入点。

(撰稿: 王诗瑜)



**§** 05 **§** 

# 林小英、陆一、宋萑 | 素质教育的迷思: 跨越概念之 与实践鸿沟?

2020年6月11日上午, "云端论坛" 第五期在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 主题 为"素质教育的迷思——跨越概念之争与实 践鸿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 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教授宋 萑、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 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 林小英老师指出, 素质教育 理念从9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形成,1999年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正式施行,至今 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本着"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的原则,素质教育改革涉及了包 括教师职业素养、学生核心素养、课程教学、 评价机制等领域的诸多方面。然而, 公众对 教育改革的不满却并没有减少,相反,随着 改革的推进,人们的焦虑感与日俱增。

为何素质教育政策制订时的良好愿望 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很难得到实现? 这给素质 教育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带来了怎样 的争议和问题? 通过梳理素质教育本身及与 之相关联的政策, 林小英老师指出, 通过这 一文本互联性,可以发现素质教育在过去 20年间所呈现出的基本脉络。其间的关键 在于,在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政府、 学校和教师的角色位置与工作原则都发生了 变化,呈现出政府监测评估、学校规训管理、 教师竞争表现的支配框架。

首先,政府从教育的提供者变成了管 制者,以"问责"为治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 则,依照监视一评估主义的伦理进行管制。 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要求教育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这一举措导致教育管理逐渐分权化、地方化, 素质教育政策的执行责任也被推向基层。 2005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将素 质教育理念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并很快在 各地方学校的实践中呈现出相应的问责形 式, 在响应政策的驱动下, 重视指标、数据 和可见效能的"素质教育评估"如火如荼地 展开,事实上却造成了对学校和教师的"诱 明度的暴政",学校和教师则努力制造"合 规的病态"。

因此,学校从教育的组织者变成了管 理者,以"规训一管理主义"的理念对师 生进行管制。随着绩效指标成为管理工作 的主要原则, 学校内部形成了竞争性文 化,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表格化、数字化、 文本化及程序化的所谓"质量认证",形 成了一种"表演性恐怖"。竞争压力下, 学校和教师的行为按照其结果是否可见被 分为"记分项"与"减分项",减负政策 因而呈现"课内活动课外化、课外活动课 内化"的结果,而学生的压力则丝毫没有 降低。

在此背景下,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随着工作的指标化和个体化,本应整全的教育工作被拆解为可计算的指标,教师自身便从合作者变成了分工者。一方面,学校绩效管理对教师劳动的考核指标忽略了情绪劳动;另一方面,教师间原先自然的组织合作与集体关系被个体化的表演性竞争所替代。因此,教师的劳动发生了转向"表演"的异化,被迫呈现"竞争—表现主义"的职业伦理。

最终,在政府、学校与教师三者的变化 和实践推动下,素质教育改革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异化。素质教育鼓吹"每个人的成功",几乎完全无视了现代教育的角色分配功能,在面对现实时,却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幻想。需要承认的是,每个人终将被安排在特定的社会角色和职位之中,而教育的职责便是为此作出基础性准备,这要 求今天的研究者切实返回素质教育的本质传统,进行言之有物的反思。

宋萑老师围绕着素质教育改革提出三个问题。首先,素质教育改革真的落地了吗?宋萑老师指出,对身处教育一线的师生而言,素质教育改革面临着应试教育的强大惯性,被认为对提升成绩没有意义,在很多人眼中甚至"似乎从未发生过"。然而,成功的课程案例亦向观众表明,理想的素质教育并不否定基础知识,反而可以超越学科分野,提升综合能力。因此,实践中,素质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形式化、片段化、孤立化、规训化"这四方面异化并非素质教育自身的缺陷,其实质原因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弊端。

那么,素质教育改革为何难以落地?对 此,宋萑教授归结了四方面原因。第一,这 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天然地"防范教师",向 教师提出数不胜数的要求与命令,施加了巨 大压力,从而未能支持起教师的主体性。第 二.素质教育改革被实践为一种技术性改革, 缺少政治与文化向度,未能带动更深层次的 转变。第三,在改革问责的高压之下,教师 作为改革代理人,其被赋有的权力和要承担 的责任体量是不匹配的,呈现出"低增能、 低赋权、高问责"的不健康结构。因此,教 师只得采取"拒绝赋权—问责外推"的策略, 以卸去一部分问责压力。第四,各种外部因 素也可能导致素质教育难以落地的结果,其 中包括资源稀缺、独生子女、文化传统等宏 观条件, 也包括改革设计者、研究者、管理 者缺乏实践经验和现实关怀等顶层原因,且 尤以后者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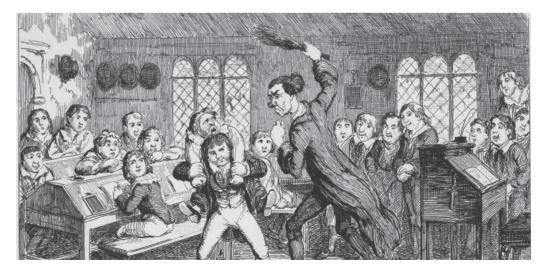
既然如此,素质教育改革未来的路在何方? 宋萑老师认为,素质教育改革既不能退

回让落榜生"陪太子读书"的应试教育,也不能重演"远离家乡"的应试教育,而要考虑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学生,警惕以"甄别"为目的的知识层累,让学校传授的知识有机会转化为实用,从而体现教育的赋权意义。对此,宋萑老师提出了"解放教育"的概念设想。不同于强调"标签化使用"、被用作象征资本、实现阶层流动的应试教育,亦不同于关注"生产性使用"、希望教育对象作为人力资本参与社会发展、成功实现价值置换的素质教育,解放教育关注的是作为本体的"人"与其可行能力,希望实现的是实质自由。

陆一老师首先讨论了素质教育理念与 考试制度的关系。根据政策文本,理想的素 质教育追求的是和谐均衡的知识体系,其中 不同种类的能力和素养能够各安其位、主次 有序,兼顾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考试 制度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仅可以作为教 育制度,实现促学、导学、质量控制,也能 发挥社会和政治功能,使社会基于公平竞争、 学业努力进行上下流动,同时满足百姓关于 选贤举能的常识信念。陆一老师指出,考试 制度的这些功能超出教育本身,考试制度的 存在并不绝对约束具体教与学行为。素质教 育更多指的是教育目标和理念,所谓应试教 育并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投机取巧、急 功近利的行为,所以提倡素质教育并不等于 反对考试,它们在逻辑上不构成对立。人们 会觉得两者有矛盾,还是在实践中的。

在所有重要的素质中,根据"考试是否可以测量",将学生能力分为"考试可测的才智素质"和"考试难测的狭义素质",再各分强与弱,便形成2\*2的交叉结构。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是"强才智+弱素质"的状态,为了实现"强素质",应该采取何种路径?许多人可能认为"强才智+强素质"难以做到,便希望通过降低才智要求来达到狭义素质的提高,问题是,"弱才智+强素质"真的能实现吗?

随后,陆一老师以日本"新学力观"教育改革为例,举出一系列实证研究来说明,



1839 年学校教育的形象

假如教育改革真的采取"弱才智"的路径。 最终并不能实现"强素质"的结果。1991 年起, 日本官方提出要彻底改变过去偏重知 识的教育, 转向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选择 自由,弱化统一标准,尊重个性,培养生存 力、创造力等教改目标。1998年更新的《学 习指导要领》只要求学生掌握圆周率大致为 3, 学科教学内容削减三成。然而, "新学 力观"推行10年后,不但学生平均成绩全 面下降, 高分群体在同期生中占比也明显减 少。得到了更多自主活动时间后,10年间, 中小学生的居家时间却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看 电视、玩电子游戏,而学习、读书的时间均 有减少。改革后,学校里存在四种教学模式: 注重传统教学、注重新学力观、两种均注重、 教学方式模糊。实证结果发现,仅注重新学 力观型教学的学校,学生平均成绩偏低,且 不参与校外补习的学生数学成绩特别低,改 革间接导致家庭教育负担加重, 社会不平等 恶化。另一方面, 注重新旧两种教学的学校, 学生的学业表现最佳,对校外补习的依赖度 也不高,补习与不补习成绩差异不太大。

陆一老师认为, 日本的例子带来了双重 启发,第一,要提升素质教育,实践路径不 应该采取"学科知识退让"的"弱才智"路 径,才智素质在各种素质中具有优先性和基 础性,放松才智要求之后不可能达成"强 素质"的愿望,只能使教与学都变得更加 柔弱和退缩。第二,既然日本同时注重新 旧教学方法的学校表现不俗, 我们应该对 "强才智 – 强素质"的方向抱有更大的信 心。强健的教与学才是我们期望的目标。

讨论环节中,对于宋萑老师先前所提 "研究者所批评的规训并非素质教育改革

下的新产物,而是自应试教育时期便一直 存在"的观点, 林小英老师作出了回应。 她认为,在追求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 更容易受到政绩、"表演"的牵制,因此 相对干逻辑较为简单的应试教育时期而 言,其自由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些异化的 结果事实上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因此, 即便改革的意图与初衷是善良的, 也需全 面考虑种种客观情况, 而不能让教育政策 "裸奔"。

宋萑老师回应了听众关于"相对应试教 育而言,素质教育是否存在门槛"的提问。 宋萑老师指出,现实案例中存在着素质教育 与应试教育结合的典范, 在实施得当的情况 下,二者的"矛盾"可以消解。对此,研究 者们需要多展开实地考察、结合真实经验、 在实践中追求"强健的教与学",通过这种 方式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经验研究, 而不应 盲目空谈, 同到应试教育的老路。

在总结中, 林小英老师指出, 在学术层 面,关于素质教育改革的实证研究十分重要, 而在实践层面、在群众对教育方式的投入与 选择中, 百姓也会展现行动者的观点、看法 与行动的逻辑。在这两个层面之中, 张力或 许会长久存在,但通过反思性的研究和讨论, 人们可以对已经走过的素质教育改革之路获 得更为全面、清醒的认知。未来如何, 展望 并不难, 但一定是在过去和今天的基础上去 筑就的。

(撰稿: 张雪洽)



₹ 06 €

# 姚达兑、周伟驰、李骛哲|西学知识形态在中国 ——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西学传入与本十化



2020年6月19日, "云端论坛"第 六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 主题为 "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两学传入与 本土化"。本次论坛由文研院邀访学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达兑主持,参与 者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周伟驰、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 方学院博士后李骛哲。三位老师分别做了 主题报告,并讲行热烈的讨论。

周伟驰老师带来第一场报告, 题为"梁 发与南洋神学"。周老师首先对南洋神学 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南洋"指的是东南 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 坡一带,"南洋神学"则是泛指近代以来, 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东南亚的 中文传教著作,特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新教 中文传教著作中所体现的神学观念。

随后,周伟驰老师阐述了在新教传教 十在东南亚进行传教的概况与原因。东南 亚有着非常丰富的华人移民的历史,广东、 福建等地的华人移民甚至在东南亚建立了 小的国家。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和欧洲殖民 者在当时是并存的关系。1807年,新教传 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广州, 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清 廷的禁教限商政策,他在中国本土的传教 和出版受到了限制。随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派米怜(William Milne)等人前往东南亚发展。由于东南亚 地区大多被西方控制,因此传教较为自由, 米怜、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等人在东南亚学习了潮州话、广东话等等, 并集中出版了许多中文读物。从1815年 起,新教传教十在马六甲、槟城、新加坡、 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当中传教, 并在马六甲 创办了英华书院,出版了众多著作。到 1842年,约有160余种书籍出版,主要是 在马六甲、槟城和巴达维亚三地出版,广 州、澳门两地仅出版了约20种著作。这些 中文著作可分为了两类, 宗教类的著作占 80%,主要内容是圣经、释经和宗教伦理等; 世俗文化类的书占 20%。

周伟驰老师指出,新教在南洋借助其 出版与传教的自由进行传播, 但南洋实际 上是向中国传教的一个跳板。传教士所创 办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其实是在做西学 东渐的工作。他们将西学中的科技著作翻 译成中文, 主要是为了破除当时中国人的 一些迷信观念,如黄道吉日、祭祖、风水等, 并破除中国人传统的华夷之辩的观念,向 中国人展示西方的科技与政治制度。除此 之外, 传教十在南洋传教还有其背后的神 学观念,主要是英美新教的"大觉醒运动"。 他们相信基督复临在即, 因此急于传播福 音,以拯救异教徒灵魂。由于新教传教十 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等新教国家, 因此, 其 传教士在南洋传教的时候, 其神学动机与 其世俗身份是交杂纠缠在一起的。

最后, 周伟驰老师结合其校注梁发著 作的工作,揭示了其思想与"南洋神学" 的密切关系。《劝世良言》受到马礼逊、 米怜、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麦都思等人在南洋出版的中文著 作的形式和内容的影响。比如,米怜重视"灵 魂"的概念,认为它是道德行为和受报的 主体, 梁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所著《劝世良言》。 插图为马六甲英华书院版本

接下来,李骜哲老师发表了题为"郭 实猎为何选择中国"的报告,主要围绕郭 实猎 (Karl F. A. G ü tzlaff ) 的日记以及相 关研究资料展开讨论。郭实猎在近代史上 是一名非常重要的传教十, 在19世纪30 和 40 年代, 他几乎参与了中西方碰撞过程 中的所有重大事件。

李骛哲老师结合了郭实猎的人生经历 讨论了其成为传教士并到华传教的原因与 经过。郭实猎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贫寒家 庭,仅上了五年小学,且个性极端。他原 本计划前往希腊参加独立战争,后迫于荷 兰传道会的压力才前往东南亚传教。来到 东南亚后, 郭实猎又因马来人过于落后, 无法抚平心理落差,加之麦都思等人的影 响,遂转向对文明程度更高的华人传教, 并最终脱离荷兰传道会, 远走暹罗(泰国)。 李骛哲老师指出,郭实猎对华人的传教并 不是出自于对东方的长久兴趣, 而是出于 他与母会的矛盾、个人的野心等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总之, 郭实猎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 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出身社会底层, 是非界限模糊, 行事极端偏执, 夸张求功。 相比后人评价更高的马礼逊、米怜等人, 郭实猎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来华新教 传教士中,似乎更具代表性。 郭实猎在荷 印群岛期间的经历, 反映出 1834 年以前, 新教来华初期筚路蓝缕的状况。由于报名 充当传教士者寥寥, 使得"贩夫走卒, 耕 田拉车者"均可入选来华,最终导致各大 差会在东南亚各地的传教活动不同程度地 遭到挫折,即所谓"人谋不臧"所致。这 一现象,与学界印象中,1840年以后,大 量教育程度较高的传教十来华并陆续取得 的业绩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以郭实猎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在 对华态度上的矛盾心态。相当一批早期来 华传教士,除希望在华传播福音、造福华 人之外, 却希望中国内乱, 甚至对鸦片贸易、 战争等行为始终保持着一种虽反对却又若 即若离的暧昧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 清政府的海禁和排外政策, 使西人无法通 过正常管道踏入中国的大门。总之,研究 1830年代之前的来华传教士群体,特别是 研究他们选择来华传教的原因,将有助于 学界厘清西人在鸦片战争以前对华态度的 变化过程及成因,并呈现出中西交往、新 教入华过程,在政治、经济之外的更多复 杂面相。

姚达兑老师发表了题为"晚清传教十 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耶稣传 "的报告,讨论为什么《耶稣传》会出现 在清初道教神仙文献中,晚清西来传教士 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文献的问题。

姚达克副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神仙 通鉴》这本书,它是清初三教合一的产物, 是以道教为本位的中国神谱, 收编各个教 派的教主或圣贤,从而构成了一个可以无 限添加的开放体系。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仙真衍派";第二部分是"佛 祖传灯",其中就收录了圣母玛利亚和耶 稣的相关内容;第三部分是"圣贤贯脉"。

随后, 他围绕着传教士对于《神仙通 鉴》中《耶稣传》的三种译介进行了讨论。 分别是 1818 年刊于《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 上一封匿名来信上的介绍文, 1839 年刊于《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的



郭实猎画像

对《神仙通鉴》一书的详细讨论,其中也 涉及《耶稣传》的翻译,以及1849年刊于 《中国丛报》上对于这篇《耶稣传》的讨论。 第一种译介,其实是一篇刊印在《印中搜闻》 上的信件,该信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马礼逊 或米怜。作者借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耶稣传》 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指出了该传应该是来 自在华天主教的汉语出版物。经过一番考 证,姚老师认为该传应该是来自清初耶稣 会传教士出版的一部《玫瑰经》,后来被 改编进了道教的故事集《神仙通鉴》当中。 此信还提及了玛利亚被当时中国人看作是 妈祖一类的人物。这显示出强烈的澳门与 东南亚的传教背景。

第三个译本为斯皮尔(W.Speer)创作的,较之前两位的文章,斯皮尔的文章是一篇学术论文。其写作的目的,便是以学术论证的方式证明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中国传播的种种痕迹,以此证明他们这些来传教士在华活动乃是延续神启之旨意,有其"正当性"。斯皮尔的论述,颇多牵强附会之处,有些说法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证据。斯皮尔认为,过去经由陆地进入东亚或中国的商贸往来,带来了基督教传教

的可能,这表明了上帝有改造东亚的宗旨,说明了现在传教的正当性。商贸往来进一步的发展,促使了英国和美国一起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福音,他们的传教事业也将会在他们帮助下取得胜利。在郭实腊和斯皮尔同时代的英文杂志上,其实还有不少选自《神仙通鉴》的单篇故事(主要涉及民间宗教、至高神、奇异的神灵等)也被翻译出版,这些译文帮助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宗教的理解,进一步地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底层社会的复杂状况。

讨论环节,三位学者围绕着麦都思的《神理总论》、梁发《劝世良言》和《言行日记》,以及梁发和郭实猎等人及其著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位学者还就在线观众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诸如关于"南洋神学"体系化定义、欧美传教士在南洋传教的目的、郭实猎研究的相关议题的延伸等方面问题,一一作出详细的解答。

(撰稿: 钱婧)



**§** 07 **§** 

# 华喆、吴飞、陈壁生等 | 重审考据之学 ——清代学术的表与里



2020年6月27日下午,"云端论坛" 第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重审考据之学——清代学术的表与里"。 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华喆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 飞、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璧生、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董婧宸、清华大学中国 经学研究院教授张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 教授陆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琦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陈鸿森先生的新书《清代学术史从考》展开。陈先生在中国经学史和清代学术史领域耕耘近四十年,发表文章愈百篇,成就斐然。去年,陈先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清代学术史从考》,选入论文十二篇、演讲稿三篇,是两岸学界期待已久的大作。在文研院的组织下,八名学者共聚一堂,分享各自对该书及陈先生治学的心得体会,并重新思考、讨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

华喆老师首先宣读了陈先生为此次论 坛撰写的引言。陈先生以本书向当年推荐 自己入史语所的几位老先生致敬,希望无 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前辈学者渐次凋零, 民国学风式微沦替,陈先生坦言自己已是 "史语所旧学传统最后一个残垒"。现在 的学风急于求成,"研究的人变多了,但 读书人变少了",自己则不惮"逆风而行", 以"抵抗流行的学风和研究,不管是精神上或方法论上"。陈先生指出,自己倾心于"阐幽扶微",会刻意关注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忽略的学者,或重要学者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这本《论丛》,对陈先生而言,如在高山攀爬时所见的一些景观意趣,"我无意攀登峰顶,我只是随性的在清代学术这座连绵的大山里,探索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原生态景观,如是而已。"最后,陈先生还预告未来会另编《清代经学研究》一书,收录有关清代经学的部分成果,并计划撰写《皮锡瑞〈经学历史〉得失论》一文,作为研究清代经学的总结。

吴飞老师率先分享了自己对陈先生治 学的三重印象:初读陈先生文章,会为其 考据功夫之精细详密惊叹;再读后,则会 叹服于他从蛛丝马迹中得到重大发现的能 力;而等读了更多、了解更深后,便逐渐 领略到陈先生惊人的历史洞察力。他的考 证、辨伪如侦探破案,令人拍案叫绝。他 仿佛就生活在清代学者当中,可以洞悉他 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充满同情与爱 护。陈先生的这本《清代学术史从考》, 着实嘉惠学林,其中对很多经学家的生卒 年代、事迹作出新的考证,可以作为我们 重新理解清代学术人物的新起点;对清代 学术史上长期被遮蔽、但实际上很重要的 人物的发掘,可以订正我们以往对清代学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术整体图景的认知;对重要学者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新发现,则颠覆了我们对清代学术流派、关系的某些定论与成见;对一些学说的重新驳正,则为我们提供重新理解清代学术史的宝贵契机。

清代学术史、经学史研究,因为时代相近,保存下来的材料非常之多,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还有待考察。理解清代学术史,有多重路径:或以清代考据学为中心开展研究,或从政治文化入手理解学术,或从经义之变视角做出分析。陈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学术史研究,关注的不是书、学说或流派,而是人。他从经学家的历史入手,又兼擅上述三重路径的优长之处。通过并超越以往学术史研究重视的文献、学派、学术,看到活生生的人,这是陈先生给予我们的莫大启发。

陈璧生老师直言,对《清代学术史从 考》的一个强烈感受,在于陈鸿森先生的 研究是对以梁启超、钱穆为代表的清代学 术史研究典范的极大突破。近百年来,虽 然材料层出不穷,知识日益积累,但清代 学术研究的大框架依然未变,一直笼罩在 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阴影"下。 陈璧生老师认为, 若要在梁、钱二先生的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可以有两个方向: 其一, 经疏之学, 即将经疏理解为经学史, 而非学术中, 来检讨清代经疏的得失, 以 及经疏中的思想理论问题; 其二, 人物考察, 即在认定学术人物的思想派别属性之前, 对清代人物生平、文献、思想进行系统细 致的考察。陈鸿森先生以自己深厚的汉唐 学术理论背景和考据功力,身体力行,为 后学示范了如何突破旧的研究典范。他的 清代学术研究有两个特点: 首先, 侧重人 物,比较典型的是一系列年谱著作;其次, 侧重文献,或以文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

《清代学术史从考》一书集中于对清 代学术人物的考察。对清代学术研究而言, 启发之处至少有两点:把清代学术人物还 原成活生生的人;重新表彰清代学术史上 的"失踪者"。陈先生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把人看成活人,则其说也为活事,所 以可以更好的进行考辨,这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弥补以书为中心的研究的不足。陈先 生的著作,呈现了对清代学术研究如何达 到细致入微。而陈先生本人,则承载着一 种老派学术研究者的"樵夫"精神。而如 果清代学术研究要实现对近百年前的超越, 则需要涌向出更多如陈先生一般沉浸在清 代学术大山中的"樵夫"。 董婧宸老师则结合自己对传统小学的研究,讨论陈先生著作带来的启发。她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从江藩、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前贤的著作进入清代学术世界,但往往得到的仅是抽象的、概括的学术史脉络,以及"录鬼簿"、"书帐录"式的人名和书名的集合,这种扁平化的学术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深入地理解清代学术史呢?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意识又在哪里?《清代学术史从考》的"入山问樵",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期待。

陈先生通过对清代学术著作、学者生 平及相关的专题研究,为我们揭开一张立 体而生动的学术网络的神秘面纱。他主要 从事三项工作:编订遗文,让一些清代学 者(有的声名显赫,有的身后寂寥)散落 各地的遗文佚稿重见天日;新撰或订补年 谱, 考订史实, 知人论世, 在时间和空间 的框架中, 定格清代学者的学术探索之路; 清理学术中公案, 准确还原相关学术事件 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并评价相关学者 的学术特色。无论我们是否认同陈先生的 学术观点,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干货 满满"。董婧宸老师认为,我们需要有更 多研究,如陈先生一般,能深入到第一手 材料中,把握整体框架,同时深入细节, 敏锐地捕捉学术思潮,生动地把握学术生 态,并准确理解和评价每一位学人的学术 性情、学术兴趣乃至学术成就。

张涛老师从研究进路、方法和关怀三 个角度谈及对陈鸿森先生新书的感受。在 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学者既可以走历史 的路数,从时代氛围、个人遭遇等历史背 景入手,也可以循学术的脉络,从经学、小学等具体学问入手。陈先生的论文集,则兼具学术进路的深度与历史进路的广度。有人不解,陈先生的考察对象多非公认的一流学者,对一流学者的关注又多非其主要面向,这样的研究能有多大价值呢?张 涛老师提醒到,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则会通过陈先生的文章,看到清代学者一般的著书习惯,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而这却是以往只关注一流学者的主要面向的研究所难以呈现的。

陈先生的方法是考据,但考据有不同 层次。考据并非全由史料说话,如何将史 料运用到研究中,则体现着研究者的知识 底蕴、研究框架和学术功力,在不同史料 的缝隙中作出有说服力的猜想,正是陈先 生本领高超之处。陈先生对小人物的关怀, 对人作为本体的关注,让他既看到光,又 看到影,让冰冷的考据背后,蕴涵着深厚 的温情。

陆胤老师说,在陈先生的著作中有一股"气",有时是浩然正气,有时是内转潜气,有时则是不平之气。陈先生的清代学术史,与我们以往认为的学术史不同。清代学术史的传统路线,是由章、梁、钱等先生建立的,他们都把大量篇幅放在思想升降这样的大线条上。陆胤老师认为,理想的"学术史",应当深入一代学术的内部而贯通之,以人物境遇为中心,且有当代学人基于前修经验的精神反思和自我表达,既要避免"没有学术的学术史",也要警惕"没有人的学术史"。陈先生的书便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既有学术自身的深度和广度,又有体会人性普遍处境的温度。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陈先生以汉唐经学为基础,贯通音韵、 文字、训诂、版本、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 这令他在看问题时,不限于某个学科的视域, 而能综合各方面知识,站在与乾嘉学者同样 的高度和广度上做出判断,得出更厚实的结 论。此外,陈先生还非常善于安排文章结构, 他会是先呈现论证或辨伪的过程,而将最重 要的证据放在最后,图穷匕见,可见陈先生 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在考据过程中带出 学术史的丰富与歧趋,为此不惜散步"烟雾 弹",读来宛如侦探小说。

学术史的考据,从客观开始,将问题本身的是非搞清楚,最后则通向主观,即知人论世,把握人物的心态,正如陈鸿森先生所言,自己希望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生员层次)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长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现象,以及清代社会某种上下略食而又相互依存的学术生态链。"学术中是当代学人基于前辈经验所作出的。

针对当下的精神反思和自我表达,而在陈鸿森先生的书中,虽然研究的是两百年前的问题,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活人的温度,这是一种"有我"的考据。

李霖老师首先分享了十年前与陈鸿森 先生的一段回忆: "十年前,有机会与陈 鸿森先生一起吃饭,陈先生问我正在读什 么书,我说我最近在看陈乔枞和王先谦的 三家《诗》研究,陈先生忽然就说: '王 先谦的书改陈乔枞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 是错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印 象很深。后来我才知道陈先生早年在一篇 有关臧庸《韩诗遗说》的文章中,研究过 相关问题。陈先生的观点其实很特殊,今 天学界也没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看法。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在做一个研究时, 背后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李霖老师认为,陈先生绝对有能力做任何断代的经学史研究,但他选择清代作

为默默耕耘三四十年的大山,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留下足够多的资料供后人驰骋,对研究者来说,清代是一个可以"下定论"的断代。在研究对象上,相比那些"光芒万丈"的学者、史事,陈先生似乎更关注所谓暗部、影子。李霖老师指出,陈先生所做的绝非"填补空白"的研究,他关注的也是乾嘉时代众人服膺的一流学者,只不过他们的重要性由于某些原因被历史遮蔽罢了。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之所以能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做出"新"突破,并非由于用了什么新方法,相反,他本持的恰恰是旧方法——所谓"旧学之残垒",即古之考据学,今之文献学、历史学。

梁启超的学术史框架影响深远, 但他 显然不是站在纯粹的学术立场上著书立说, 他本人也并非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研究清 代学术史的动机,深受当下时局的影响, 仿佛是在向清人要东西,看乾嘉学者能否 为二十世纪初的救亡图存提供答案。出于 这样的动机,自然会遮蔽很多问题。相反, 陈先生对于清代学术,是无所求的。正因 如此,他的考察才是立得住的。他反复强 调自己是一个"樵夫",所描述的清代学 术史是原生态的,胜过之前那些粗线条的 学术史。李霖老师坦言, 自己并不如其他 老师一般期待陈先生再撰成一部新的清代 学术史, 因为从陈先生的立意来看, 他似 平一直拒绝某种单调的风景, 而是更喜欢 从不同的路径, 常玩清代学术这座五光十 色的大山。

张琦老师通过回顾陈鸿森先生有关高 邮王氏四种的实际作者问题的讨论,提出 陈先生治学的三个特点:注重清人著作的 内证;善于还原清代学术的现场;善于书信系年和利用。正是这些特点,使陈先生的学术史研究"充实而有光辉"。

最后, 张琦老师接续陈先生的观点和 方法,进一步就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的 作者问题展开讨论, 特别聚焦干成书讨程 和相关时间节点。张琦老师认为,通过对《昭 代经书手简》的相关书信系年,可知乾嘉 诸儒多于嘉庆十年或稍晚获寄不分券本《经 义述闻》, 再结合焦循得书的特殊情况, 可以论定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直到嘉庆 十年秋才刊刻完成, 自叙所署的嘉庆二年 并非刊刻时间;通过对不分卷本稿本的稿 纸及按语称谓讲行分类和分析,可以推测, 在已经完成110条稿本的基础上,王氏父 子决定正式撰著《经义述闻》,由王引之 撰写自叙(时为嘉庆二年),案语称谓定 型为"引之谨案"和"家大人曰",并将《大 戴礼》和《国语》二种视为"经"收入。《通 说》则很可能是最晚撰写的;不分卷本稿 本有六例"引之案"被改为"家大人曰" 的条目, 却没有出现"念孙案""家大人曰" 改为"引之谨案"的情况。三十二卷本《大 戴礼》"贵其能以让也"条同样存在"引 之谨案"被改为"家大人曰"的情况,但 其草稿却为王念孙所撰,显示出王氏父子 之间互相推让的心态。而有关作者的问题, 可以结合稿本展开进一步研究。

(撰稿:任新亚)



§ 08 §

# 陆扬、沈卫荣、侯旭东 | 方法、源流与传承: 再谈中西学脉间的陈寅恪

2020年7月3日上午, "云端论坛" 第八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方法、源流与传承:再谈中西学脉间的陈寅恪"。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清华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 陆扬老师简要介绍了本次 论坛的论坛主题和与会者之间的渊源和关 系。陈寅恪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卓越 的历史学家之一。今年是其诞辰一百三十 周年,与会的三位学者历来对陈寅恪先 生的学术思想有所研究, 因此发言人将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再提出一些新的观察 与思考。首先, 陆扬老师以唐史为立足 点发表了题为"视域之融合: 陈寅恪唐 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学术报告。他认 为陈寅恪先生在唐史研究中始终是一个标 志性的人物。尽管当下关于唐史方面的论 断,诸多史学遗产的研究都已有较大的推 进,但是陈先生针对唐史提出的史学框架 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遗产。陆扬老师为 此从三个方面来回应他所强调的这一点: 第一,从陈寅恪作为史学家的成长与心路 历程, 陆扬老师认为陈寅恪的治史一方面 处在历史的对话中, 具有高度的历史敏感 度(historical sensitivity);一方面又 保持高度的冷静,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距



陈寅恪先生画像

离。陆扬老师引用余英时的话说,"陈寅恪治学不相信任何史料直接的表面的意义,而要看它深层的下面的意义。"陆扬老师认为这种冷静和克制是陈寅恪深受西方史学影响的结果。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中提出的"反讽",其根源也是历史学家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持有批判性的考察。另外,陈寅恪曾引用的带有佛教色彩的"熏习"一词亦是例证。"熏习"指的是历史对象采取某种行动是受到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在它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新东西来。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条件。陆扬老师在此特别提到了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vsky)的直观(intuitus)及其与布迪厄"惯习"之间的联系。

第二,从陈寅恪的唐史转向来看,陆 扬老师认为要同时看内因与外因。外因 是:随着清华大学的建立,陈寅恪成为中 文、历史系的合聘教师。历史学的负责人 蒋廷黻受美式学术训练,对陈寅恪的隋唐 史治史风格有一定的影响。而长期跨系教 学使他除了运用史学的方法,而且能够用 诗歌文学来切近历史现场。内因上主要指 的是陈寅恪对晚清政治文化的感受在唐史 研究中找到共鸣。在他看来,晚清与晚唐 一样都是突然灭亡的。清朝社会的迅疾崩 溃使他的治史目光聚焦在了隋唐史上面。 同时,陈寅恪受突飞猛进的日本史学的刺 激,也想要与日本史学家一争高低。

最后,陆扬老师谈了陈寅恪先生最重要的两本唐史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并认为这两部著作的视角和取径并不完全相同。前一本著作是从南北朝绵延不绝的汉魏传统的展开来揭示隋唐国家支配体制的构成。陆扬老师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礼制"在该书中的份量。他认为,前人的研究大多未注意到"礼制"实际上在陈寅恪看来对于认识和理解隋唐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而且,陈寅恪较早注意到了北齐文化对隋唐的重要性。陈寅恪在战争岁月中写就此书,以礼制为核心,是因为他内心里认为中华文明的礼仪是基础,只要这个核心不

灭亡,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而在后一本专著中,虽然《渊源稿》中的视角仍延续,却在讨论唐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变化时,切换成了受宋代史观影响的视角,且将其自身经验中的晚清政治投身到唐后期政治的分析中。陆扬老师提醒注意陈寅恪论述中"藩镇"的性质和特点,并将其藩镇研究放在20世纪唐史学的脉络,尤其是日本学界的脉络中加以比较。他特别提到了日野开三郎的《支那中世的军阀》一书,并认为对藩镇及晚唐政治结构分析的研究中存在以陈寅恪和日野开三郎为代表的两条学术路径和传承脉络。

侯旭东教授紧接陆扬老师的发言,作 了题为"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 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的报 告。侯旭东老师意欲由陈寅恪给沈兼士的 《"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的回函 说起,不过侯老师首先为听众介绍了沈兼 士的学术背景和影响。他指出沈氏是20 年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鬼"字》 一文超越了其师章太炎,引用了金文、甲 骨文来证其学说。从文内的引文可看出当 时受到了董作宾的帮助,亦参考了日本学 者出石诚彦和英国学者韦力(A.Walev) 的研究。沈的一文后继者少有,直至今日, "鬼"字仍是待解之谜。沈文并不是清代 戴震以来训诂通经明道的训诂学传统, 陈 寅恪的回函反映出当时中西汇通背景下的 一代学者的立基传统、融汇新知、开辟新 途的构想。也就是说,不仅是研究文字本 身,考察字形音义的演变,也不仅仅是解 决思想史的问题,而且是研究文化史乃至 一般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书影

侯旭东老师引用陈寅恪 1929 年《元 代汉人译名考》中所言"一时代之名词, 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 随政治 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 谬, 即因兹细故而起, 此尤为治史者所官 审慎也。"沈兼士在《希、杀、祭古语同 原考》一文的结尾写道: "考证文字之作, 多流于破碎支离。即能以精义古音贯串证 发之, 犹嫌未足。必也于当字形音义演变 之原委, 语文表里交流分化之形势, 及其 与古代文化史之关系, 三者具有综合一贯 之见解, 方为合作。"可见陈寅恪的影响。 侯旭东老师还提及了傅斯年(见其《性命 古训辩证》)和杨联陞(见其《中国文化 中"报"、"保"、"包"之意义》)两 位学者以字观史——尤其是思想史的治学

方法。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和《钱穆与中国文化》中对杨联陞的"训诂治史"进行了说明。即"只有通过对史料的严格鉴定和精确理解,比较可靠的客观史实才能建立得起来。这一层次的工作相当于中国清代以来的所谓考证,但也和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史学主流的取径相近。"也就是说,"他(杨联陞)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因此,他在晚年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特别引陈寅恪的话'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是相当彻底的现代史学精神,超出传统考证学的范围了。"

随后, 侯旭东老师继续举我们较为熟 悉的季羡林先生为例。季先生所著的《浮 屠与佛》即是根据两个译词的西十来源进 而揭示佛经翻译的先后, 甚至开启了对佛 教传来路线的新思考。还有季羡林晚年出 版的《糖史》,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 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 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延续考察"语言 与文化关系"这一脉络的还有著有《语 言与文化》的罗常培,他回忆自己写《唐 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时受到了陈寅恪先生 的诸多提携与帮助。另外, 侯旭东老师还 提到了1996年出版《中国传统价值观论 释学》的刘翔,以及著有《古代文化词义 集类辨考》的黄金贵。侯老师认为, 最近 二三十年,汉语词汇史研究异军突起,尤 其是常用词演变研究,成果卓著。但是陈 寅恪的"字词观史"路径却少有追随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

侯旭东老师认为随着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语言学的传入,传统文字训诂音韵学逐渐受到冲击而边缘化,欧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现代语言学成为主流,"字"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和抑制。傅斯年、李方桂便是欧洲比较语言学的追随者,与陈寅恪相异。陈氏在给沈兼士的信中写道:

寅恪相异。陈氏在给沈兼士的信中写道: "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为 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 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 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 也。"第二,由于文史的学科划分带来的 限制,"字"的研究被划入文字学、训诂 学与先秦史,而"词"的研究缩入词汇史, 在史学则只是属于近代,仿佛与其他时代 或领域无关。到21世纪,文字学、训诂学、 历史学之间断裂的传统依旧占据主流。侯 旭东老师认为,继承陈寅恪"凡解释一字 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说,到最一般的字 词使用事实中去归纳、提炼与构建对过去 的认识将有可能发展为认识中国历史思想 与文化的基本概念,逐步构建起中国历 史、思想与文化的理论解释。

在侯旭东老师发言结束后,第三位学 者沈卫荣老师发表了题为"陈寅恪与佛教 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报告。与陆扬老师 所关注的陈寅恪唐史转向不同,沈老师关 注的是其早期所受的东方学影响。不古 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乃亦古亦今,亦中亦 西的学问,是傅斯年所谓汉学与"虏"学 的结合。而陈寅恪正是主张以历史学和语 文学的实践来实现和成就中国人文学术 的现代化: "即将汉学放在亚洲诸高等文 明交融发展的视野中,将汉学置于西域 (欧亚),乃至世界学术的语境、体系和 规范之中,形成中国的'民族语文学' (National Philology),并使它成为 世界现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沈 卫荣老师首先回顾了陈寅恪在美、德两国 的求学史, 而后介绍了其时中亚语文学的



陈寅恪先生故居

指导老师和教学内容,包括古代回鹘文佛 教文献,突厥学,满学,藏学,宗教学, 印藏佛学, 西夏文法华经等。受到中亚语 文学训练的陈寅恪一直试图把西方的那套 做法引用到中国的研究里边。为此他开设 了"佛经翻译文学"、"佛教翻译"、"梵 文文法"等课程,并在20-30年代撰写 发表了佛教语文学方面的论文如《大乘义 章书后》(1930)、《有相夫人生天因 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 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 传跋》(1298)等。同时他还校订《高僧传》、 《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佛教文献。 沈卫荣老师提到傅斯年对佛教的义理没有 兴趣。但陈寅恪认为佛教对历史,思想文 化具有深远影响, 而且研究一个词汇的变 迁,如敦煌的佛经到汉文里有多少种翻 译,这里面可以看出佛教意义的变化。校 勘的意义亦十分重大, 甚至他认为从唐玄 宗以后的汉译者都不懂梵文,译文都是错 误的。因此陈先生花费十年的时间,做汉 藏梵文的对刊, 纠正汉译的错误。

其次, 沈卫荣老师认为陈寅恪开创了 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诸分支学科研究 的先河,留下了《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 经夏梵藏 汉合璧校释序》(1932)、《斯 坦因 Khara-Khoto 所 获西夏文大般若 经残券考》(1932)等作诸多品。但是陈寅 恪并不是专业的印度学家、藏学家或是西 夏学家, 他没有直接做藏、蒙文文本的文 本语文学研究, 而是从事语文学中的"文 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或者 是"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 也就是说,在沈卫荣老师看来,陈寅恪 致力干做的是"对这些文本的作者、来 历、成书和传播过程进行细致的考据,并



陈寅恪先生在家中为学生授课

通过多语种文本的比较来弄清文本中出 现的各种名物制度的语言和历史涵义, 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最后,沈老师将陈寅恪放 在世界学术的格局中加以比较, 尤其是将 其与伯希和 (Paul Pelliot) 放在一起。 伯希和所受的是专业精致的历史语言学训 练,而陈寅恪的学术偶像地位和影响力却 没有走出中国, 他在佛学和西域语文学领 域的学术成就很快被林藜光、韩儒林、王 静如等中国的学术后辈们超越。然而,毫 无疑问, 陈寅恪依旧是成功地把世界汉学 和中亚语文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和前沿成果 引进中国的关键学术人物。

随着沈卫荣老师发言的结束, 论坛讲 入了提问环节。首先, 陆扬老师赞同沈卫 荣老师的判断,并对沈老师的发言提出了 补充。陈寅恪先生的确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历史语义学家。他是想用自己在国外学到 的语言来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他关注 的点更像是沈老师所提到的文本批评。另 外, 陈先生要找的是一个历史场景和历史 脉络,在这一点他比伯希和要敏锐。接着, 由侯老师回应同学们在线上留言所提出的 问题: 即字词观史是否是概念史? 侯老师 回应说, 字词史的研究不限于思想史。比 如杨联陞和季羡林研究都超过于思想史。 因此他更想要强调是字词不能局限在思想 史领域内。字词, 也是我们生活中要使用 的。所以这一史学观察路径应该进入更一 般的意义。那些关键性字词不见得只是在 思想史、哲学史上有意义的词,还有很多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使用的字词,它们应该 同样重要。侯老师认为从日常语言的字 词研究中还能探索出更为普遍的历史学意 义。紧接着他又回应了另一个关于陈寅恪 和戴震训诂学的差异问题, 侯老师提醒 我们更要关注他们的关联性和继承性, 而不是过分强调他们的差异。沈卫荣老 师随后回应了学科划分和命名相关的问 题,认为少数学者如伯希和、陈寅恪涉 及多门语言学,而当代大部分学者都是 在专门语言学领域内从事研究,如藏学, 蒙学, 西夏学等。

接着, 陆扬老师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陈 寅恪未写赵宋作出回应。他认为,司马光、 欧阳修、朱熹等宋代的中官和学者对陈寅 恪的唐史研究都有很重大的影响。但他未 必熟悉所有的历史文献材料, 因此我们也 不应过度神话陈寅恪。沈卫荣老师针对陈 寅恪与钢和泰等人的交往问题回应说,整 整十年每个星期六,陈寅恪跟钢和泰这一 帮人读书, 他特别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因为 他痛心于前人汉译佛教文本的错漏百出。 然而很遗憾, 陈寅恪回国前, 钢和泰已经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个版本的汉梵 藏的对刊本,陈寅恪自己却没有做。钢和 泰在好几个场合都说陈寅恪的梵文和藏文 水平都是足够的,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学术 语境里都把陈寅恪当成一个作家。沈卫荣 接着回应第二个问题,他说,当时傅斯年 建立的历史语言学民族学,不是局限于理 解历史, 也不是光从语言学角度, 而是将 汉学扩展出去,加入中国的四夷、边疆、 民族文化传统,目的是为了发展现代人文 科学。这也与中国当时面临的边疆危机政 治危机有关:第一,不能只有汉学,要纳 入其他语言; 第二, 要打破经学与神学的 最后,陆扬老师还补充说,今天我们 纪念陈寅恪先生还因为他有个著名的断 句,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陆 扬老师强调说,这完全是西方的看法,中 国传统里没有这个看法。中国传统的思 想都是跟道德有关的。沈老师对此表示赞 同。陆扬老师接着说,这一思想跟德国关 系密切。陈寅恪的海外求学生涯中最重 要的就是受他自己所用的词——"熏习" 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强调学术的绝 对独立。这是以德国为核心的大学精神, 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德 国的大学。比如写《国王的两个身体》 的著名学者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他是德国人文学术的典型代表。他曾在纳粹时期拒绝教职,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因董事会要求所有大学教授宣誓反对共产主义时,拒绝合作从而再次丢了教职。康托洛维茨当时就写了宣言,与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出一辙。因此,陈寅恪表面上看有文化保守的立场,但实际上他在精神上或表达上却完全是个西化的。

陆扬老师总结道,我们对陈寅恪先生 的纪念不因为论坛的结束而终止,会不断 持续下去。我们要更多从学术上去理清、 理解和继承陈寅恪的精神。这次论坛的三 篇主要报告也将在北大学报正式刊出。

(撰稿: 孙静)

₹ 09 🤰

# 狄金华、鲁西奇、熊春文等 | 危机中的农村与农村中的 危机

2020年7月9日, "云端论坛"第 九期在线上平台推出,主题为"危机中 的农村与农村中的危机"。中山大学哲 学系教授吴重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鲁西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 学系教授熊春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 教授狄金华参与讨论。 首先,吴重庆老师以"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为题展开报告。吴重庆老师将他在《孙村的路》中所记录的90年代孙村修路的历程与今年春节和疫情期间他所观察到的村庄修路的历程展开了对比。在90年代,农村的收费工作是通过层层包干的机制来推行。比如

镇里下达指令,要求一个行政村今年必 须完成多少万元的税费上缴,一个行政 村之下又有很多自然村, 行政村里又划 设了不同片区,行政村对片区也进行包 干,负责某片区的村干部如果完成不了 包干任务,就需要自己出钱填补;如果 超额完成任务,剩余则归其自己所有。 而包片区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 就必须依靠各个自然村的一些民间社会 里比较有名望的人来了解各家各户的情 况,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权威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可见,虽然国家力量、 基层政权,在这一时期不断向自然村、 向各个家庭扩张,但由于基层政权需要 依赖民间权威,民间权威人士可以出于 村庄自身的利益来主张公益事业,并要 求基层给予配合支持。不同于以往的国 家社会分析框架,民间社会在层层渗透 和压力之下依然保有其活力。

2000 年费改税和 2006 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的税费完全被削减。这看上去是对农民生计对乡村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的,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在此之前,因为征收税费和包干制,基层干部非常有动力去走基层、深入乡村。可是在税费都被取消之后,他们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再加上"零上访"的行政考核指标要求,乡村干部逐渐不敢、也不愿再深入基层去解决那些实际的、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以财富为唯一成功取向的标准之下,乡村社会的民间权威也逐渐缩减。基层干部下不去、乡村权威出不来,这就是中国农村后税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吴重庆《孙村的路》书影

而二十年后,在2020年的春节期间, 由于疫情, 所有的中青年人又全部聚集 在了村中。疫情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刻, 使作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乡村一度 又呈现出了熟人社会的特点。在这期间, 乡村的公益事业发展蓬勃。通过微信群 募捐,完成了大量的公路、桥梁修筑工作。 不同于以往,基层行政与民间权威在这 场公益活动中是缺席的, 而无中心、有 场域的微信群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 过线上讨论、线下互动,推动了修路工 作的进行。因此,吴重庆老师认为,这 次疫情期间孙村所体现出的公益热情的 爆发是危机中的一种生机, 是乡村社会 正在重新形成一种新的格局。虽然仍然 存在着中青年与长辈之间因技术鸿沟而 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的客观问题, 但更应 鲁西奇老师以"危机中的身份与平等"为题展开报告。鲁西奇老师提出,身份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或群体、阶层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标识与状态,个体或群体在这种状态中的位置或被贴在某种标签,并非出于他或他们的意志(或意愿),他或他们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否弃这种位置,除非打破给予或确定其身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但是,身份体系并非全然不可变动,危机就提供了变动的机会:或强化身份体系,或迫使其做出调整,而具体到个体或某个群体、阶层,危机则给其身份的改变提供了某种契机。

鲁西奇老师首先探讨了汉景帝初年 官府向郑里二十五户发放贷种、食的一 则记录。根据《汉书》的记载,如果遭 遇灾害,贫民没有粮种可供播种,官府 会干春三月向贫民发放必须的粮种,和 少量救济粮。这份文书显示, 郑里的全 部人户几乎都接受了赈济。而接受官府 贷给的种食,则意味着受贷种人成为国 家的编户齐民,要履行作为编户齐民的 义务和责任,要缴纳算赋钱(人头税)。 鲁西奇老师的分析指出,春荒强化了郑 里编户的身份秩序,户人们作为"齐民", 平等地接受了官府的赈济,而官府也平 等地施予了这种赈济, 并藉此强化了对 全部编户齐民的控制。国家在履行职责, 编户在使用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切的 前提,在干这些人是国家的编户齐民, 拥有合法的身份。

鲁西奇老师又举一例: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时任凤阁舍人李峤曾上表说当时天下有很多的流亡人口,脱离了原来的户籍地,不在国家掌握的户口籍簿上,"堪为祸患",而促使这些流浪者返回本乡的做法却都收效甚微。对此,李峤建议,应当就地安置,将他们的户籍落在现居地,"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鲁西奇老师指出,李峤的建议实际上泯灭了逃户与主户(土著户)的分别,也淡化了军府府兵户与普通编户之间的差别,对于逃户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就地安置,按居地编籍管理。他的建议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居地原则。

鲁西奇老师总结道,无论怎样性质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对于全部的个体和群体,都存在着威胁、危险和损害。危机不应当成为强化不平等的契机,也不应成为建基于身份差别之上的人群隔离的借口。危机应当成为争取并实现社会平等的机会,并应当在危机中努力打破诸种建基于身份制之上的、程度不同的、各种形式的人群或社会隔离。

随后,熊春文老师以"农户生计与乡村危机:疫情所见及其他"为题进行报告。熊春文老师首先回顾了费孝通先生对于"非典"的思考。在《"非典"的社会学反思》中,费先生非常明确地把"非典"的社会原因与都市化、全球化关联起来。都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和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使得疫情的影响瞬间

放大。这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以及急 剧爆发的态势,是由人类交往模式的变 化造成的。设若人类处在一种知根知底、 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当中,疫情就可以 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乡土社会是这种 交往模式的原型。农业社会应对疫情相 对于城市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 广大的乡村腹地, 有利干稀释人口, 减 少人与人接触的频率, 天然地阻断病毒 的传播; 其次, 乡村相对的自给自足(至 少在粮食生产方面),隔离状态下可以 不求干外,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有助于防范心理恐慌,给疫情防控争取 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是一个熟 人社会、守望相助的天然社区, 人与人 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可以在应对 疫情阶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 熊春文老师也指出, 本 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乡村的危机所在。在 农户生计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生产在农户收入结构中的比例日益 下降,农户生计越来越依赖干城市的非 农就业,二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的倾向愈 加明显,农户生计在疫情影响下暴露出 极强的脆弱性;在农业生产方面,疫情 期间,各地粮食生产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以规模化养殖产业为代表的高投入、高 风险、高度市场化产业受创最为严重; 从国家角度, 涉及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农户自身生计安全之间的平衡; 从结 构上说,大国小农和小农户长期存在的 基本国情农情则仍将长期持续。因此, 熊春文老师提出要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 基础,不能以发展产业为名,轻易地破坏农户已有的生计体系,更不能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由,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小农户生计体系是在与自然长期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图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文化传统,其坚韧性、生态性、负责任性和相对自主性有助于形成守望相助的基层社区。这种坚韧与脆弱的并存是认识中国国情与乡村发展的一点前提。

狄金华老师以"海绵机制:危机中 的乡村功能"为题进行报告。狄金华老 师首先回顾了百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 演变。城以商业贸易为主,而乡以农业 生产为主,商业作为农业的一种派生物, 使得城与乡在经济的业态上形成了一种 互补关系,这是一种同向位运行的状态。 但晚清民国开始,城乡关系逐渐转为反 向位运行。其主要原因在干晚清民国时 期开启了追赶型现代化,以城市工业为 主要特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需要从农 村来获取。因此1930年代是中国的民 族资产阶级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恰 恰是农村持续凋敝的十年。新中国成立之 后,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 道路, 这意味着对干农业和农村的加倍汲 取。从1949年到1980年代,城与乡都 以反向位的状态运行, 但这30年之间, 城乡的反向位运行是双向的, 即一旦农业 和农村面临困境, 政府就会放松对于农村 和农业的汲取: 而一日放松了对干农村和 农业的汲取,就意味着城市工业的发展成 本随之增加,城市工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冲 击。到新世纪以来,这种城乡之间的反向 位运行的状态才发生改变。

以此为背景, 狄金华 老师指出,乡村作为中国 整体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间的内部消解危机和风 险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经济与乡村的社会生 活具有某种反市场性的特 征,它使得当城市社会的 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开始增 加的时候, 乡村就具有了 化解这种风险和危机的能 力。在土地改革、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的社会变革中,农村以及以家户为单位 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生产,都构成 了极为重要的危机化解机制,就像一块 "海绵"。同时、狄金华老师也指出随 着改革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乡村作为"海绵"吸纳和消解外部 风险的能力有所削弱。这构成了在整体 的结构背景之下去理解乡村位置的一个 视角。

进入集体讨论环节, 狄金华老师首 先就危难时期国家与民众的伦理性纽带 与所谓"多难兴邦"的说法向鲁西奇老 师进行请教。鲁西奇老师认为, "多难 兴邦"的说法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学术认 证。在危难面前,民众强化了对于国家 和政府的认同和一致性, 但由此是否构 成了"兴邦"的条件或前提,是值得怀 疑的。对此, 熊春文老师也进一步补充 道,按照社会学传统的讲法,中国老百 姓最在意的可能是"家","国"或"邦" 对于"初级群体"而言还有着较为遥远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

的距离。一般公民要产生对国家共同体 的感情,是需要嵌套在他的职业或家庭 中,从而产生对国和邦的爱。

鲁西奇老师也就"接收地负责原则" 作出了补充与回应。从历史上来讲,王 朝国家在建立之初往往都着眼干户口控 制,从身份的角度来控制个体与家庭。 在王朝建立之初, 民众的身份户籍与他 居住地往往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但是 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出现,居住地与 户籍所在地逐渐分离。王朝国家的管理 也逐渐由身份控制过渡到地域控制。在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循环,秦汉开始时先 是按照户口身份控制,到了魏晋南北朝, 一个循环走过去,变成了村落控制。等 到隋唐时期又重新确立了身份控制,但 到中唐以后又变了。到明初的时候又重 新确立了身份控制的方式, 而明中期身 份控制又被打散。总的来看,身份控制 是国家强有力地控制每一个人时可以采 取的措施, 但这种措施是无法长期维系 的。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我们在很大程度 上试图恢复到身份控制的旧路上来,但比 如农民工的医疗问题, 最终落实下来的依 然是居住地控制,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 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居住地控制或地 域控制的原则, 应当是一种大势所趋, 需 要立足干居住地, 认可其的身份, 从而实 现身份与居住地的整合和统一。

狄金华老师针对孙村的故事向吴重 庆老师请教: 以往认为如果合作得以发 生, 其背后需要有权威的支持。而孙村 在这次疫情期间则是通过一个无中心、 有场域的结构形成了合作。微信平台在 很多地方都会被应用, 却并不是所有的 地方都能产生孙村的效果, 在这背后的 社会机制、乡村公益得以发生的基础是 什么?

吴重庆老师指出,莆田乡村往往同 乡同业特别发达, 因此特别看重乡土社 会的团结问题。而如果将孙村的案例放 到更抽象的意义上来讨论,它所体现的 则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韧性, 哪怕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段都会碰到各种 各样的社会团结、社会治理的危机,可 是乡土社会的力量还是会表现出来。而 为什么中国的乡土社会会比较有韧性? 吴重庆老师认为这与小农户有一定关系。 土地的存在具有溢出经济价值之外的更 广的社会效益和价值,它不仅是一个非 常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家乡, 同时还是 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吴重庆老师进 一步总结了四位老师的观点,提出乡村 社会的稳定是国家提供给社会的一种公 共产品: 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 是小农 户的生计的维系,和小农户的生计空间 的拓展。只有看到小农户的重要性,看 到土地对今天小农户生计维系的重要性, 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稳定的保障。

鲁西奇老师讲一步向吴重庆老师请 教。鲁西奇老师认为, 在无中心场域的 背后或许还是存在着固有社会秩序和社 会关系网络的影子。此外,针对、危机 作为场域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契机, 鲁 西奇老师请教: 无中心场域是否有可能 发展成一个有效的稳定机制?如果有. 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对此,吴重庆老师回应,场域的背 后肯定还是会有社会结构的作用,只是 这个结构不一定还是以前围绕中心而形 成的一个秩序。而在莆田这样的地方能 够利用微信群形成一个无中心的场域, 仍然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孙村的微信 群是完全自发的,因为有事件带动。而 在乡村里还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在外 经商较为成功的、有愿望来参与来推动 乡村社会公益的人群存在,只是这些人 可能还并不具备成为一个自然村的权威 人物的那种名望, 而是要通过做事情来 累积他的社会资本。未来他们可能成长 出来,只是在目前阶段这个场域还是无 中心的。针对微信群的作用, 吴重庆老 师指出原本乡村的舆论传播需要有一个 过程, 而因为微信群的存在, 舆论的产 生这一过程在瞬间内就基本完成了。这 种无中心、靠事件带动而形成的场域, 对乡村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进行了一 次时空压缩, 能够快速地让大多数人了 解到公共意见的产生,并将舆论收集和 放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乡村社会的机 制。另外,吴重庆老师也注意到了乡村 中的微信群与城市的微信群也有一定不 同: 乡村微信群所形成的场域一定是既 有线上,又有线下,同时配合,同时推动。

针对能春文老师在研究中对于小农 家庭的脆弱性的关注, 狄金华老师补充 道, 小农家庭的脆弱性除了来自自然的 维度之外, 也来自国家的维度, 而今天, 它同样还来自市场的维度。在逐渐从自 身市场和地方市场向外部市场转向的过 程中,小农的脆弱性程度进一步加大。 以往对农业的讨论强调农业的产值要下 降, 却往往忽视了强调农民从农业中间 所获得的收益要随之而增长。农业与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收益极低,因而 在这种格局之下,农民和农村都有足够 动力去追求高收益。而高收益随之带来 的, 其实是小农户与乡村都必须面临一 个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格局之下,小

农户的定性要如何来获得保障?

能春文老师指出,恰恰是现代农业 的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主导方向 正在不断破坏小农的生计体系。土地是 小农的生计保障,各种土地流转、社会 化服务体系、技术托管等,一旦以资本 形式介入, 其逐利性质就很有可能会导 致小农的权益受损。农民介入市场越深, 产业化规模化越深,风险就越大,其自 主性就越可能减弱, 这是危机的所在。 而从应对角度来看,有两个主要的方向。 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家对农户直接实施托 底性社会保障,比如给农民提供各种各 样的政策补贴,保护好农民既有的生计 体系, 尊重农民的生存智慧: 而另外一 个途径则需要我们要重新认识农业。农 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第一产业,它可能 是第二产业, 也可能是第三产业甚至是 第四第五产业。比如蔬菜产业、生态农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还有涉农加工业、服务业、乡村旅游业 等等, 乡村产业兴旺了, 其从业人员自 然会从中受益。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城市化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城市化到一 定程度会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这时候 乡村会成为人们想往的新的生活方式, 会生长出很多新的产业类型,很多资金 人才都会重新回到乡村, 这也将为乡村 发展创造全新的升级机会。因此,一方 面强调保障,一方面面向未来,是思考 这一问题的途径。

吴重庆老师最后补充道, 支持小农 户并不只是在支持小农户本身,不是将 其作为一个救济的对象, 而是诵讨支持 小农户来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小农 户的生计模式一定是多元的。只有让 千千万万的小农户都能够维持这种多元 的生计模式,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有稳 定。而支持小农户应当体现为从国家政 策上关注小农户的存在。因此十八大以 来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农户问题, 其实 是一种政策导向的调整: 计小农户健康、 可持续的生存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持 续和正面的影响, 是一项我们所追求社 会目标。

(撰稿:朱睿晗)

**10** 

# 刘未、郑嘉励、李晖达等 | 南渡君臣: 浙江南宋陵墓新 观察

2020年7月10日下午, "云端论坛" 第十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 主题为 "南渡君臣:浙江南宋陵墓新观察"。文研 院邀访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未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 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晖 达做主题报告,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 峰、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魏峰出席并参与讨论。

刘未老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题。由于 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的不同, 中国南北方地 区葬制葬俗在墓地环境、墓地排列和墓葬形 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宋元考古的 学科框架里,中原北方地区宋墓和南方地区 宋墓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议题,一般分别予以 讨论, 而较少谈其联系。今天论坛围绕浙江 南宋陵墓所进行的新观察则试图打破以往的 这种局限,在浙江宋墓考古发现与中原北方 宋墓葬制葬俗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南渡君臣 为切入点,考察随着宋室南渡,皇室、士大 夫等各阶层人士徙居南方, 其丧葬理念如何 适应徙居地的新环境,人员南北流动带来了 哪些丧葬实践方面的变化。

郑嘉励老师做主题发言,他介绍了本 次议题的由来,即 2005 年对于湖州风车口 南宋墓地的考察与发现。这片墓地的选址为 常见的江南山地环境,墓地系人工堆筑,填 平山坳, 华北朝南, 合平南方选址的习惯。 其最高一级台地上有三座墓, 其中一号墓和 二号墓的规格非常高,两座墓共用一个排水 沟,表明是有意识地一次性规划的。但三座 墓呈东西横向排列,两座大墓都不位于中轴 线上, 而是偏居墓园中轴线的两侧。在正中 心的位置发现了一座非常小的墓,长度仅有 一米左右。这种排列方式在南方的丧葬传统 中是无法解释的。郑嘉励老师提到了刘未老 师的《鸡冠壶历史札记:风车口》一文对自 己的启示。刘未老师在最高一级台地上布下 了一个四十九格的墓域, 并推测墓地的主人 应该是商姓的。按照"壬穴为尊,丙穴为次, 庚穴为卑"、墓域正中的位置为"明堂"的 做法来比对, M1位于壬穴, M2位于庚穴, 但丙穴空置,而"火葬墓"出土石函、铁券, 则正是"斩草埋券"的明堂位。由此推断, 南渡的权贵移民利用了江南与中原不同的特 殊地形, 但在局部的目的规划上, 则完全照 搬了中原"五音墓地"的制度。

郑嘉励老师对此次议题的基本概念与 背景作出了厘清:"中原"指河南、关中地区, 是北宋的中心;而"江南"指浙江地区,是 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与江南的墓室、 墓园、风水均异, 而更根本的差异则是选址。



中原流行"五音墓地",按照《地理新书》 的说法,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 五音, 再将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 水)四方联系,推断与其姓氏对应的阳宅、 阴宅方位吉凶,即所谓"大利向"。在"五 音墓地"中,"墓域"是一个基本单位:一 块方正的墓地,分成七七49个方格,即49 穴位,以八干四维十二辰共24个汉字。按 不同姓氏所利的方位排列不同墓穴的"尊、 次、卑"的位次,而先、后墓域,又按照各 姓所利方位进行斜向排列——以"角音"为 例, 自先而后, 墓域由东南至西北方向, 斜 行排列。皇帝则埋葬在最中间的明堂位,即 所谓"天子葬明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江 南的"形法墓地",主要依据形势派、理气 派风水, 即龙、砂、水、穴。对比来看, "五

音墓地"与多代人的族葬兼容,而南方的"形 法墓地"则与之相冲突;江南一、二代人合 葬, 而"无族葬"。一代人合葬的最普遍形 式是夫妻合葬, 夫妻之间存在位次差异, 这 是一种以墓葬位次规范尊卑的做法,而这种 做法又与传统的昭穆葬观念直接相关。

理解昭穆葬大概有四个层次: 首先是 《周礼·公墓》中的阐述: "冢人掌公墓之 地,辨其兆域为之图,先王居中,以昭穆为 左右。"然而在宋代以前、昭穆更多存在干 观念层面。到了北宋时期,程颐、蓝田吕氏 主张"复古",如《葬说》: "葬之穴, 尊者居中, 左昭右穆, 而次后则或东或西, 亦左右相对而启穴也。"此外, 地理家也 讲"昭穆",讲"五音墓地"以位次规范 尊卑。最后,昭穆是儒生的笼统说法,是 一种长幼尊卑的抽象伦理观念。南宋时期, 昭穆葬在江南地区的实践较少。而明代以 后, 昭穆葬的形式则相对多见。

以上是对第一种人, 即南渡权贵的墓葬 方式的介绍。第二种人是南渡的士大夫家族, 比如东南吕氏、吕祖谦家族, 其墓地位于浙 江金华附近武义明招山。北宋时期吕氏家族 十分显赫, 在北宋意外灭亡之前, 吕氏已经 在河南新郑神崧里规划了家族墓地, 且规模 庞大。鄞县《木阜吕氏宗谱》收录了《吕氏 墳域圖後集序》和《吕氏坟域图记》,清晰 地记载北宋吕夷简家族墓地的形成经过、墓 葬数量、位次。经过分析,认为神崧里属于 典型的中原"五音墓地"。如果说是没有 北宋的意外灭亡,毫无疑问吕祖谦的曾祖父 会埋葬在神崧里。但北宋灭亡后, 吕祖谦的 曾祖父吕好问就带着四个儿子仓皇南逃。绍 兴元年, 吕好问卒于桂林。到绍兴5年, 宋 金局势渐渐缓和, 吕好问的四子陆续内迁, 吕本中居信州, 吕弸中居婺州, 吕用中居绍 兴,吕忱中居衢州。由于家族成员散居各地, 到绍兴23年,吕用中建议,仿祖宗坟茔故 事, 迁葬吕好问干"驾部坟山之东", 重建 家族墓地。其后,祖字行、年字行,五代人 悉数聚葬:由《吕官之圹志》看,也有少量 的第六代成员。明昭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从 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元代中期,至少有150 年之久。据"明招山坟图"说,一共有96 所坟墓。根据实地调查, 吕好问墓就采取了 石椁石顶的墓式。作为南渡的第一代移民, 其地下墓室已经完全"在地化": 地表墓园 由于考古资料缺,形态尚不可知,但完全可 以推测其与中原的高级品官墓园存在着较大 差异。

更重要的是明昭山96座墓的墓地形态。 从鸟瞰图来看, 明昭山可以划分为大坑、明 招岭头、明招寺东山三大区域。为了适应江 南气候、地形、葬俗,墓室均是"江南化" 的。同时为了适应地形,在位次规划上也与 中原有别。与神崧里相对比,两地的位次记 述方法不同: 在五音墓地中, 不同身份的人 所对应的墓葬位置是唯一的、确定的, 比如 "西茔之甲穴、东茔之丁穴,第一穴、第二 穴……",表述位置的方式非常清晰;而明 昭山出土的墓志对于方位的表述则是完全江 南化的,例如"之左、之右",表述非常笼 统。总体来看,明昭山的吕氏墓只是相对集 中的"松散型墓地"。与神崧里祖墓的"五 音墓地"不同,吕氏家族墓只是在"聚葬" 的观念与核心价值上继承传统, 而在实践层 面已完全地"在地化";与蓝田吕氏家族的 "昭穆墓地"相比则更为不同,蓝田吕氏是

仅见的理想化的十大夫家族墓地, 张载曾对 程颐说: "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连程 颐也认同道"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然而, 对汀南的儒生来说, 五代人、四大房派聚葬, 已经是前所未见的事物了, 所以江南人认为 这就是"昭穆墓地"。

最后,郑嘉励老师指出,吕祖谦家族的 做法对于当时南方的十大夫产生了影响。例 如方大琮也想在莆田规划这样的一个家族墓 地。《铁庵集》记:"山以方名旧矣,仪曹 公来宅九跳之正脉, 面势宏阔, 从而祔者五 代,此某之宗派也。每代之中,昭穆相从凡 四十余。《周官》族坟墓之说,吕氏深有取 焉,此山官与婺之明招等。"而与此同时, 方大琮也在《与林提幹进礼书》中阐述了他 的顾虑: "吕氏自南渡来,子孙虽分散四出, 多归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为人墓志,遇附 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谓吕之子孙不甚寿, 亦祖山掘凿太过也。惟朱文公最喜风水, 韦 斋、祝氏皆别葬, 文公又自葬唐石, 门人执 绋者数日乃至,水心笑之,谓其多占风水。 前辈之不同盖如此"。这反映了当时南方士 大夫,一方面看到了建造家族墓地在家族凝 聚方面的巨大好处, 而另一方面又十分关注 本土的风水。此外,郑嘉励老师也提出吕祖 谦与朱熹对丧葬明显不同的主张和选择,反 映了二人观念的不同, 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学 者们深入研究的方向。

李晖达老师以《西北望长安:南宋帝陵 制度的继承与变革》为题展开汇报,关注皇 室成员在南渡之后采取了怎样与前两种群体 不同的策略。李晖达老师指出,"西北望长 安"不仅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故国情怀, 实际上涵盖了整个中央王朝从皇室到大小官 员的共同心愿。宋高宗南渡后,要继续团结 南方居民共同抵御金人的推进, 维持正常秩 序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则必然在制度层面和 具体的施政层面不断强调原有的皇家体制, 帝陵制度则是其中非常顶层的一部分。五音 姓利的准则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也无法轻易 变更的祖制。与此同时, 角音利向又是一个 根本性的大利向,以东南高、西北低为基本 原则, 由此形成了坐于东南、西北望长安的 墓地格局。

南宋将皇陵设定在绍兴宝山, 即会稽县 以东约三十里的地方。绍兴元年四月, 孟皇 后去世于绍兴。在当年兵荒马乱的态势之下 被迫选择的墓葬地点, 却在无形中开启了南 宋主陵的先河。到绍兴12年,南北和议, 高宗杀岳飞后,宋金疆界划定,东以淮河为 界,从此以后宋室再无北渡的希望,徽宗在 绍兴5年前后预先选定的主陵地被彻底放 弃。绍兴和议实现后,徽宗灵柩仓促南返, 此时迫不得已再洗陵地。当时有两大洗择, 一在临安(杭州), 二在绍兴。选址过程中 存在诸多争议: 会稽山龙瑞宫与国音姓利相 违, 因此被排除。泰宁寺位于昭慈孟皇后攒 宫旁边, 但其地系天柱寿山, 低怯, 亦不可 用。最后择定在昭慈皇后攒宫西北向的地方 埋葬了宋徽宗,认为此地"形势高大,林木 郁茂, 土色黄润, 一带王气秀聚……庶几山 冈顺于国音,风水便于地理。"

据李晖达老师介绍, 角音姓利有三大原 则: 角音所官, 角姓官东山之西, 为东来山 之地,以北为前,南为后,西为左,东为右, 明堂中水出破乾为大利向。角音大利向, 千 向坐丙穴, 亥子为案, 水出戌亥中间, 令玄 武山遮转西南,流入大水,吉。角音小利向,



2018年一号陵园享殿与龟头屋基址

角音丙向, 水流坤出, 安坟在壬。李晖达老 师回顾了近六年对于宋六陵的考古发现。整 个陵区的占地面积约为2.3平方公里,考察 工作从2012年开始进行,集中对南片区进 行了地毯式勘探, 主要目的是寻找最能体现 当年皇陵体系的陵园建筑。在原"孟后陵" 保护范围通过勘探发现了另一处攒宫的大致 轮廓: 整体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 石藏以 条石砌成,东西宽8米,南北长10米,所 用石材形制不一。2018年对高宗陵的上宫 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发掘, 发现了完整的中 轴线结构,建筑外墙整体较为方正,验证其

主体建筑格局完全是坐北朝南的, 总体倾向 也与北宋陵的结构极为相近。2019年发掘 出了一处规模更为宏大的宫殿建筑遗址,可 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一定更高。总结来 看,最初的这一批陵墓非常严格地遵守了五 音姓利的祖制, 是恪守中原传统政治准则的

但是, 恪守祖制的做法经过了几代的实 践后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南方的地势低洼, 地下水位高,皇帝去世后必须一路往西北埋 的国音法则在孝宗时就面临挑战。朱熹在《山 陵议状》中就对国音姓利讲行了毫不客气的 抨击: "盖自永安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 而九世之间, 国统再绝。靖康之变, 宗社为 墟。高宗中兴, 匹马南渡, 寿皇复自旁支, 入继大统。至于思陵亦用此法,而寿皇俙勤 之后,旋即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逊位。 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魏邸相继薨谢。" 朱熹是南方人,见惯的高山大川和形式派风 水的格局, 他无法理解赵宋王朝为何对于五 音姓利这样的一个跟南方地理形貌格格不入 的制度如此痴迷并孜孜以求。朱熹提出建议, 变革皇陵制度, 择壮厚高平可葬之处, 如严 州富阳县"江山之胜、雄伟非常……严州乃 高宗受命之邦也", 再如临安县"钱氏故乡, 山川形胜,宽平邃密"。官僚集团也逐渐认 识到,改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 孝宗陵并没有按照朱熹的建议建在山上,而 是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将其埋葬在了两山之间 的平地处。后来,光宗被埋葬在了最初为孝 宗选定而后又被否决的地点。但到了宁宗时, 继续往西北葬的国音法则实在无法再延续下 去。因此,永茂陵选择了角音"小利向", 坐西北、朝东南。至此, 国音姓利的法则被

彻底抛弃,只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而实践中 则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法则,后来的理宗陵、 度宗陵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建在山上。最后, 李晖达老师指出, 在将南部阜陵的地势摸清 后,接下来的目标是到北部山地找到一座完 整的陵园进行更详细的发掘, 以期更好地展 现南宋帝陵整体演变的历史性过程。

随后,论坛进入评议阶段。方诚峰老 师基于对历史文献的认识主要进行了两点补 充。第一点是十大夫的江南化问题。方诚峰 老师曾经关注过周必大家族从郑州南迁到江 西的历程, 文献显示周必大家族也是实行了 族葬。因为靖康之乱是在非常突然的状况下 爆发的, 很多士大夫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都处 于一种宦游的状态, 散居四方。因此, 族葬 行为是南迁士大夫家族在南方重新建立家族 地位、凝聚家族的重要手段。第二点是攒宫 的选址问题。负责陵地选址工作的一般有四 类人:按行使,太史局的官员,太常寺的礼 官,以及负责测绘的官员。其中士大夫官僚 所担任的职责是最不重要的, 宦官内侍发挥 了较为强势的作用,而在专业方面起决定作 用的则是太史局官员, 由于天文历法知识是 由皇权独占的,这些阴阳官直接对皇帝负责, 并深得皇帝信任,对此朱熹曾表达不满和批 判。太史局官员的人员组成存在从北方人到 南方人的变化,或许与皇陵攒宫本身的变化 存在一定关联。此外, 方诚峰老师还补充道, 临安西湖南山和北山以寺院为依托的攒宫, 也进一步反映了宋廷南迁后再地化的文化选 择问题。

魏峰老师提出,对家族墓地的讨论所 连接的问题必然是家族的组织。南宋家族墓 地的营建和组织化过程,必然与南宋家族组

织的逐步形成有着密切联系。靖康之变后, 很多士大夫都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南渡到 江浙地区, 很多家族在进入南方时是先沿着 南迁路线就近安置, 等绍兴和议完成后再向 临安等地区集中,例如韩琦家族。韩琦家族 的能够留在绍兴地区,很大程度上与韩氏家 族成员在绍兴地区任官有关,家族成员在当 地的经营,保证了其后世成员得以不断在此 聚集。而韩氏家族在这一区域的发展又在很 大程度上和与他们的家族组织有着密切联 系,通过家族墓地的经营来明确血缘关系的 远近、尊卑亲疏的问题。两位老师的汇报启 发我们要去关注物质材料出土的位置关系, 通过家族组织和族葬的问题去展开思考,重 视墓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在 文献和材料的基础上拓宽思考范围。对此, 郑嘉励老师也作出了回应, 关注到了韩氏墓 地的形态与明昭山吕氏墓地的区别: 韩氏家 族往往是住在绍兴的人就葬在绍兴, 住在湖 州的就葬在湖州的,而吕氏则是不同房派的 五六代人都葬在了明昭山,这体现了吕氏墓 地的特殊性。郑嘉励老师也对蓝田吕氏昭穆 葬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 蓝田吕氏墓 地是一种自己复原出来的昭穆葬形态,严格 地践行了儒家的理想, 而基本上看不到受到 风水先生影响的元素。在此,郑嘉励老师也 进一步明确了对昭穆的定义,是以墓葬位次 安排来规范不同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区别;儒 生和风水先生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其本质都 是规范不同人之间的身份秩序。

最后, 刘未老师对本次论坛作出总结。 他谈到,方诚峰启发我们关注不同身份背景、 职责地位的人物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了 怎样的影响, 在这方面晚期考古或许可以提 供一些反思的线索。魏峰则提示我们对干家 族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深入和全面的 认识。此外,今天以南宋陵墓新观察为题而 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得益于南方地区新的考 古工作和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使原先基于文 献而产生的很多认识都得到了突破, 甚至对 干一些旧的考古材料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最后, 刘未老师提出, 本次论坛想要达到的 目的是促进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交流,这也对 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突破对历史 背景的片段式理解, 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对历 史问题的设计和讨论中去,这样学科交流才 能真正走到实处。



文研学术 111

# (五)读书的风景



#### 【编者按】

文研院支持过许多自发的小型读书会,师生共读文献,热烈讨论,深化对先行研究理论的理解。文研院开辟"读书的风景"栏目,回顾过往线下读书会成果。第二至七期读书会以《续高僧传》、《仪礼》、《礼经郑氏学》、农业社会学、国家理论、当代中国史为主题、校内外师生共同参加。



#### 农业社会学读书会述略



#### 一、缘起

农业社会学,顾名思义,是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处理农业问题的一门学问。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它在西方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在中国还是一门新生学科。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一路狂奔。20年间,农业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农业一意地朝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大量农场兼并、农民失业、农村消失,传统以农业推广和社区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农村社会学失去研究对象,陷入学科危机。一班以农村社会学为业的学者转而扛起农业社会学的大旗,抓住粮食安全与食品体制、农业道路与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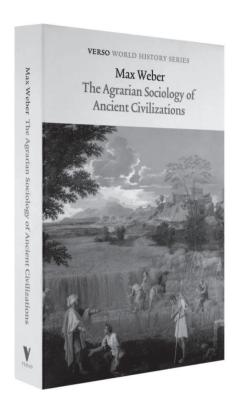
农命运、生态环境与动物福利等议题,在理论、方法、学会、刊物等方面不断 开垦,竟然开出一番新天地。当前中国 正处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产能过剩与粮食安全问题并存;资 本农场与小农经营兼续;新型职业农民 与传统农民同在;以及现实中出现的休 闲农业、都市农业、替代农业、社区支持农业、转基因伦理等新现象新问题层 出不穷,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更让农业问题走到全球政治经济道义秩序的最前沿,这些议题都超出了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的既定范围,更超出了农业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地。在此背景下,农业社会学应运而生,可谓恰逢其时。

相较而言,中国的农业社会学无论在理论储备还是经验研究方面都还很稚嫩。自然,一门学科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进行一砖一瓦的建设。在理论建设方面,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老老实实地研读经典,通过理解和阐释经典大家的著作,以寻求学科发展的最大共识和经验研究的灵感之源。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契机,整理了一个农业社会学的基本书目,从2018年春季始,组织了两个读书会。

#### 二、组织与方法

其中一个是就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学派和主题,每个学期安排8部著作的阅读,以此试图勾勒农业社会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面貌;另一个是从基本书目中选取韦伯的《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进行精读,以期体悟农业社会学应有的深度与厚度。两个读书会同在每周三晚上同一时间,轮流进行。第一个读书会,先在课题组成员内部进行,并面向研究生开放;因课题组有京外成员,采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结果参与人数瞬间扩大,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同时在线。对于这种纯学术的阅读,居然这么多人感兴趣,我们备受鼓舞;至少对于普及农业社会学知识是个好事儿。

第二个读书会成员比较固定集中,一直采取线下模式,人数也较少,有助于面对面互动、研讨。这个读书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弄通《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这本书,每次也安排一位成员领读,他/她提前对相关段落的关键概念、历史事件、核心人



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书影

物以及疑难句子进行注释,然后大家一字一句地精读。每次读上三五段,以弄明白为旨,这样坚持了两年,快完成导论部分(约70页)的时候遇到了新冠疫情。

第一年,读书会成员以中国农大几位 年轻老师和 17 级博士生为主,因学科背景 集中于社会学,阅读中遇到的困难较多, 进展也不甚顺利。第二年(2019年)春季, 我有幸到北大文研院访学,得到邓小南教 授和渠敬东教授的关怀与支持,将读书会 搬到静园二院。文研院同期学者刘志伟教 授、狄金华教授、鲁家亮教授、黄群研究 员以及七期学者李放春教授参与了读书会。 此外,还有北大历史系的张新刚博士,北师大社会学院的王海侠博士等。读书会立刻有了新局面,大家读得兴趣盎然,收获颇丰。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文研院的读书会,最妙的地方在于不 同知识背景之间的激发碰撞、交响共鸣。 比如刘志伟教授对于该著中 oikos 的论述 特别有兴趣,他比照明清史实多有精彩阐 发,给我们诸多启发;鲁家亮专治秦史, 关于奴隶阶层、农业制度、政治制度等多 有比对,大开读书会成员的视野;狄金华 对于乡村治理颇有研究,他的参与有助于 大家理解韦伯对于古代社会治理的论述; 黄群专治西方古典学,对荷马史诗尤熟, 她给我们带来一种结合神话、文学、政治、 经济来理解韦伯的视角。还有放春对韦伯 社会学的驾驭,新刚对希腊罗马的熟稔, 农大师生对农业问题的敏感, 总是能让每 一次读书体验发生神奇有趣的化学反应, 每次三个小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

#### 三、启示与趣事

韦伯被称"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 《古代文明》一如他的其它著作,视野开阔、 气势恢宏, 非有跨学科的背景不足以窥其 美奥。总体而言,该著讨论了环地中海几 个主要文明的农业发展中, 包括美索不达 米亚、埃及、以色列、希腊和罗马, 时不 时与中世纪、现代及东方文明进行比较。 简单来说, 韦伯在该著中第一次尝试在比 较历史分析的框架中,通过其特有的社会 学理想类型方法,在史学的原始派与现代 派之间游刃有余, 处理极为复杂的古代社 会历史问题, 最终获得对西方古代文明个 性及其命运的清晰认识。可以说, 韦伯该 书确乎是一部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 学以及农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百科全 书式著作。

跨学科的读书会,最明显的一个好处, 每有助于对书中论到的历史概念和事件有 及时准确的了解,帮助打通其中关节,而



读书会现场

不致游移于全书主旨。读书会中常遇到这 种情况,有些很小的细节,一帮外行读得 云里雾里、莫名其妙, 但经专家一点拨, 立刻释然会意、豁然开朗。比如遇到埃及 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问题,清华的温静、 北大的贾妍总能在群里及时答疑解惑;遇 到中世纪的问题, 黄春高老师总在线救 急; 再遇到古典及难懂的理论概念, 现场 成员解决不了的,就请教李猛。为了更好 地理解该著,读书会中间还组织了两次讲 座。一次是请到七期特邀访问学者法兰克 福大学的谢孚德(Bertram Schefold)教 授。教授是德国著名韦伯专家,《韦伯全 集》的主编之一,他为读书会做了"Max Weber as a Development Economist" 的讲座, 让我们更加切近地领会到韦伯研 究的经济学维度。教授回国后, 因为姜宏 博士的联络,我们还可以持续地受教于他, 帮忙解答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问题。第二 次是请新刚为读书会做了一次"城邦与帝 国: 古希腊罗马历史漫谈"的通识性报告, 对于理解韦伯原著有很大帮助。

此外,我们特别地体会到比对德文原著的重要性。该著的英译者Richard I.Frank本身也是韦伯专家,还译过韦伯《罗马农业史》,译文流畅、清晰明白,但有时候过于文采飞扬,以至于失真。比如有一次读到韦伯对古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他认为如果不过于严苛地遵循现代资本主义概念,古代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弗兰克来了一句"……it becomes perfectly clear that capitalism shaped whole periods of Antiquity, and indeed precisely those

periods we call 'golden ages'."这个 'golden ages'让黄群想到了古希腊和罗 马的"黄金时代",刘志伟老师认为是韦 伯的一个比喻,没有实指,类似中国古代 的"三代之治"想象。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线上的张巍卓博士对照德文后,告诉大家, 这个'golden ages'完全是弗兰克一时兴 起加上的,德文原著中根本没有!此类趣事 常有发生,如若没有多学科成员的及时襄助, 不知道要在原著理解上无畏摸索多久。

#### 四、特别鸣谢

除了邓老师和渠老师,读书会还得到 文研院杨弘博、韩笑、陈天传、关雪、周 诗雨、崔璨、王瑞等老师事无巨细的帮助, 一并表示感谢。没有文研院提供的平台, 读书会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精彩收获。因 为文研院和这个读书会,我有幸结识了很 多新朋友,在我的学人生涯无疑是一次美 妙的机缘和契机,想来甚为感念感激。尽 管因为疫情肆虐,今春读书会不得不暂停, 但伙伴们一直保持着"云"交流。私下阅读, 遇到困难,在线求助,总能得到及时回应。 唯愿疫情早日结束,再聚静园,相谈与欢, 尽兴方休!

本文由熊春文撰写。熊春文为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 徜徉于中古思想的风景——《续高僧传》读书会简记



#### 一、为什么是《续高僧传》?

书是我们的纽带, 先说说道宣和《续 高僧传》的意义吧。首先, 我觉得道宣 处在一个关键的时代,在佛教的外部, 从南北朝到唐,政治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国家对僧团的干预显著增强。在佛教的 内部, 宗派孕育成长, 中、印文化的位 势也在发生微妙的逆转, 边地情结逐渐 克服。同时, 道宣也极生动地记录了那 个时代, 在朝堂他深度参与了最高层的 佛道论争,又和玄奘隐隐相抗;在地方 他千里跋涉, 步履所及涵盖北齐故地岖 城和南方的荆襄、巴蜀地区。作为律学 僧人, 他对富干异端性格的各种实践特 别敏感, 因而道宣的笔下呈现出的信仰 图景真是异彩纷呈。道宣作品的这种魅 力,连同它的复杂艰涩,使我们几位不 同学科的朋友把目光投向他。

#### 二、有朋自远

读书会最初是我和当时在人大做博 士后的李猛发起的,我俩都研究过南朝 佛教,李猛的博士论文是初唐佛教政策。 2017年夏天,在日本从事研究的池丽梅 老师到五台山开会,池老师是《续传》 研究的专家,对日本古写经和版刻的源 流,以及道宣所处的时代皆有极精深的 见解。我兴奋地坐了长途车, 跑上五台 山找池老师,和李猛我们三人谈到夜深。

池老师睡下,我们两人再谈至东方既白, **篁下来时针整整走了一圈……** 

在共同的兴趣推动下,我们学术视 野有所扩展,了解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肥 田路美老师主持《集神州三宝感诵录》 的校读、台湾"中研院"仓本尚德老师 也开始带读《续高僧传・感通篇》。我 直接、间接地与两个读书班的参与者建 立了联系,以之为借鉴,决定也把《续传》 读书会做起来。

起初忐忑地向韩笑老师提出申请, 只希望借一个教室, 没想到文研院给我 们提供了二楼明亮的会议室,每次诗雨 老师都提前帮忙准备好投影设备。这样 就可以展示藏经版本和地图, 远远比预 想的效果要好。也特别幸运,读书会有 哲学系赵悠老师、张宇驰博士, 在美读 书的赵晋超,研究西夏密教和藏传佛教 的刘晨、柴建华两位,还有魏晋南北朝 史专业的师弟厉承祥、林一翀两位,都 先后参与过。微信群里还拉了在哈佛研 究日本中世佛教的王星逸博士,和王磊、 吕博、洪绵绵等几位中古佛教史领域的 年轻学者, 我很期待未来有机会他们能 来做专题的讲座。

读书会的关注点包括政教关系、教 理与戒律、感通与造像艺术、三教交涉, 这既是《续高僧传》固有的内容, 也照 顾了大家各自的学术兴趣。记得读《菩 提留支传》, 涉及到永宁寺塔的描述, 恰好晋超博士论文写北朝的佛塔,我们 把建筑史学者的几种复原方案做了梳理, 分析了《续传》与《洛阳伽蓝记》的微 妙差别。读《那连提黎耶舍传》, 耶舍 从柔然领地跑到关东北齐境内,有一段 奇怪的行进路线。小林对北朝史特别熟, 反复排定相关的史料。读《阇那崛多传》, 在北外任教的李灿来介绍了他对崛多译 经的新发现。《译经篇》隋代诸传的一 个关键问题是经典从中亚的传来路线, 我学习了桑山正进的《迦毕试·犍陀罗 史研究》,把相关的研究进展介绍给大 家。我们的讨论不敢说有多少创见,至 少文本细节上的困难被展现出来了,并 且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学习解 决问题。

《集神州三宝感诵录》读书班整理成果

#### 三、读书・校书

"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 数则须咀嚼消化",这是培根的名言。 文本的性质不同,自然有不同的读法。 聚在一起读一本书,一则相互砥砺, 坚持读完:二则相互启发,开掘意蕴。 不过对于《续高僧传》这类文本,读 书会还有另外的任务——生产校订本 (critical edition).

目前,汉语佛教文献的整理处在一 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的历史学一向 重视政治、制度中, 宗教议题长期被划 归哲学系的研究范围, 文献却不是哲学 专业的兴趣所在。国际主流的佛教学界 虽然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 受到重视的 却多是梵、藏、中亚语的作品,或者敦煌、 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藏外文献。大藏经中 收录的重要传世文本,许多从未被仔细 地阅读过,甚至日文、英文都有了译注本, 而国内独无。我和几位青年同行益发意 识到这个问题,希望对这种状况做一些 改变。

事实上,解读这些作品并不容易。 以《续高僧传》为例,从写本到刻本的 形态变化就是第一道关,行文中繁复的 内外典实、名物制度,人名、地名、经 名的比定, 史源的核查, 都很考验读者 的学养和耐心。把文本彻底读通,不同 学科专长的学者通力协作尤有必要。更 重要的是,我认为细读文本的习惯,会 塑造一种研究的气质。记得章太炎说国



读书会现场

谓深中其弊。革除积弊,坚实地推进研究, 大概只能从细读文本做起。

#### 四、未来的计划

我们读书两周一次,一次三小时, 从 18 年底开始,进行了半年左右,去年 五月就停下了。责任主要在我,为了准 备我的两种书稿,后来又去浙大高研院 访学,人不在北京。李猛也到复旦大学 就职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整理文本和 研究不同,研究以问题为中心,查阅许 多书的片断,整理文本是要解决所有遇 到的问题,问题是发散的,相关的先行 研究也都要看,以笺注的形式吸收进来。 准备起来负担非常重,即使两周一次也 感到疲于奔命。

有一次遇到陈明老师, 很意外陈老 师也关注了我们的读书会, 他建议把进

人之学术,病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可 度放慢。我想疫情解除以后,如果还有 同好聚集起来,可以做两个改变:一是 在寒暑假集中校勘,平时重点放在读解; 二是阅读的进度再放慢, 由参与者分别 负责报告一些重要的先行研究。此外也 在谋求以集体名义发表整理成果, 这当 然需要完善校勘和署名的规范, 也希望 有刊物能持续地支持我们。三十多卷的 书,按照较高的标准整理,非一时之功。 阶段性的成果能给参加的人一点鼓励. 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 本文由陈志远撰写。陈志远为文研院邀 访学者、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 将理论带回生活——记"国家理论"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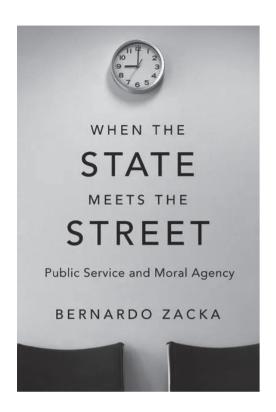
#### 一、缘由

读书会的发起源于一年前。在我开 设的"质性研究方法"课上、大家一起讨 论了一本叫《当国家遇到马路》(when the state meets the street)的书。这本书延续了 美国街头官僚研究的传统, 但是呈现了基 层官僚在面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国家任 务时候,内心的艰难、情感与选择。这本 作品带给我了我很多思考。研究政治学、 公共管理和历史的学者,似乎已经习惯了 将国家运行视为为了实现权力、信仰或者 利益的目标。那些代表国家的官僚被看做 权力的追求者,信仰的追随者或者利益的 攫取者。这背后,体现了对生活中的人的 世界的人的认识:人的世界似乎被信仰、 权力和利益占据着。但是我们不禁问:那 些生活中的人的精神世界难道真的那么简 单? 国家并不是抽象的概念, 他是植根于 每个人的世界中的。如果失去了对人的生 活精神世界的理解, 而只是基于抽象人性 认识而构造所谓的利维坦,那么也许我们 对国家理论的理解,看似宏大,但实际是 脆弱的。因为这样的理解,脱离了真正那 些具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如果学者失去了 这种对人的关心与关怀, 那么他们孜孜以 求的那些关于国家的认识, 也许只是成为 谈资、丁具或者象冷漠。

正是这样的阅读和思考, 启发了我和 一些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我们希望重新 找回"国家"究竟是如何植根干人丰富的 精神生活世界中的。

在一次和学生的聚会中,有学生说: "老师,不如我们组织一个关于国家和人 的读书会吧。"干是、我和来自北大、清 华、人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一 起, 重新回到关于人的社会行动的阅读和 讨论中。这样的阅读的目标也是为了提高 学生的"文本"能力。我们相信,理论和 思想需要以文本作为坚实的基础。只有依 靠对文本的精细和准确把握,中文理论的 语言才可以逐步达到精确,而不只是令人 费解的辞藻堆砌。因此,我们通过对一些 关于社会行动和国家文献的细读(close reading),来理解文本中重要的逻辑环节, 具有理论内涵的表达,以及文本和整个学 术共同体的关联。我们更通过各自的田野 生活经历,来将那些抽象的理论带回精神 生活世界中。 我们通过对重要的英文理论 文本的逐字逐句的详细翻译和讨论,来帮 助同学精细的理解文本,从文本中挖掘思 想,帮助学生理解如何精确的表达理论, 如何将理论变得活生生。我曾经在2016 年作为第一期邀访学者在文研院工作,期 间也曾组织北大历史学系的同学进行小型 读书会,于是"国家理论"读书会也选择 继续在文研院举办。

读书会对我们来说,并不只是获得知 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周六的傍晚,



伯纳多·扎卡《当国家遇上马路:公共服务与道德 自主》书影

聚会在文研院安静的讨论室中, 我们相互 交流各自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我们交流在 田野工作中的心得,我们也交流在为学路 上的感想。在这种交流中, 我们更加深入 的体会到,任何学术研究,无论是关于多 高深的理论,都需要根植于对丰富的生活 世界的理解之中。对理论的理解, 是伴随 着研究者的成长而深入的。我希望在这样 的交流中,能够和大家一起看到一个郁郁 葱葱的充满生命和绿色的理论世界, 而滋 润它的正是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而我们 的读书会, 也正是这样的生活世界的一部 分。就如同二院春日的紫藤,夏日的青草, 秋日的山楂, 和冬日的雪花, 在时光的流 转中,一些美好的东西留在了时光中我们 的心里。我希望这种美好可以留在每个参 加读书会的成员的心里,并慢慢生长起来。 因为, 也许希望就在这里。

### 二、年度主题: 反思国家理论的 社会行动基础

总体思路: 通过阅读反思政治科学中 的"国家理论"各流派所依据的社会行动 假设。重新探讨国家理论中的"人"的社 会行动特点,超越由工具理性一道德价值 二分视角主导的国家理论。思考这样的问 题: 当国家理论的社会行动根基被重新塑 造,将可以对国家理论产生何种修正?对 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将可以如何和这样 的努力契合? 中国国家理论如何找到其社 会行动基础?

#### 三、阅读篇目介绍

"What Is Agency?"一文详细的梳理了 自帕森斯时代开始的美国社会学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s) 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 综合现象学社会学、实用主义社会学、知 识社会学等领域对能动问题的探讨, 重新 构造了对"能动"问题的"三和旋"分析 框架。国内对社会行动的"意义"结构的 研究偏重于结构特点, 而此文则在能动问 题上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思路。我们 将此文作为一个知识索引来读,详细追溯 和学习文中提到的各流派理论。并且结合 学生和老师的田野工作经历,理解文中关 于能动的分析如何和田野观察, 访谈映照 起来。探讨以具有社会性和时间性的个体 为中心的田野观察视角,可以如何与对过 程机制与文化结构的观察分析结合,可以 如何推动对国家治理的研究。

《人类科学中理论运用的诠释与社会 认识》一书以反思性的分析方式,揭示了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对 实在论(realist)、规范性(normative) 研究与解析 (interpretive) 研究三大认 识论流派进行分析。结合经典的社会科学 著作,说明不同认识论模式如何体现了对 世界中因果性的理解。"理论"在不同模 式中运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并提出如何 结合三种模式建立更加合理的因果解释范 式。 通过阅读此书, 希望引导学生思考国 家理论背后的认识论模式问题。政治学现 有国家理论基本是沿着实在论的认识论路 径建立起来。而文化国家理论则演着解析 方式展开。那么, 当我们重新回到社会行 动研究之中,将解析与实在论路径结合起 来,进入多互动过程的理论化,我们有可 以如何建立对国家治理的经验研究呢? 这 些问题将在阅读中给与问答。

《社会行动的创造性》是德语与英语世 界关于社会行动创造性的经典作品。作者详 细梳理了欧洲和美国社会理论各流派对社会 行动的认识。从 "situation-corporealitysociality"三个维度对过往理论进行了批评, 并重新基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社 会行动创造性的理论思路。这本书的阅读我 们满足两个目标:一是按照书中介绍社会理 论流派,重新梳理从韦伯、涂尔干、到帕森 斯、米德等对社会行动创造性的认识,特别 是反思帕森斯对欧洲社会理论的改造,如何 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社会理论的认识。第二 个目标是结合三个维度, 重新考虑如何在对

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研究中,引入可以运用 的"分析"基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长期被 一些习以为常的所谓分析本体笼罩着。如何 寻找到新的分析基础, 从而对国家治理展开 可分析性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叙事、统计变 量或者纯理论演绎),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国家遇上马路:公共服务与道德 自主》一书延续了美国街头官僚研究的学术 脉络, 但以新的社会行动理论基础对这个问 题重新给予分析。进而重新反思以往政治哲 学中国家理论的局限。作者提出将田野民族 志与政治理论结合的研究思路,别具一格。 本书虽然讨论的是美国基层的治理问题,但 是本书研究所打开的基层官僚的新的理解空 间, 却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基层体制 的运行方式问题。中国基层官僚研究一直被 各种所谓常识笼罩着,而相关的制度设计也 是从这些常识中来的。克服官僚自利性,克 服非正式政治,鼓励官员创新等等,已经成 为耳熟能详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背后隐 含的却是对官僚社会行动基础的狭窄的认 识。本书则试图重新理解这种基础。而这样 的理解, 使我们打破常识, 重新思考如何建 立植根于生活的国家理论问题。本书是将理 论与经验研究很好结合的作品。通过阅读过 论,希望体会这种结合可以如何运用于中国 研究之中。

本文由罗祎楠撰写。罗祎楠为文研院邀 访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 授。



# 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 ——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于 2011 年 1 月 发起成立,是一个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 师生为主的不拘泥干学科的历史研习团体。 从 2018 年读书会主要推动者之一贺照田老 师在北大文研院任访问教授开始,读书会 获得文研院大力支持, 先后在北大二院举 办多次读书会。文研院诸位老师和工作人 员的耐心、温和,以及二院幽雅的环境, 让读书会的同仁印象非常深刻。

读书会的基本关切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 史, 尤其关注 1949 年后新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实践探索的历史与思想意涵。 读书会发起人为文学研究出身学者的这一 起点, 使其进入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是特 别基于人文知识思想回应当代状况和当代 问题所应具备的历史认知不足而进行的反 思,并进而意识到正面地投入处理当代史 经验的必要性。相对于一些通过文学文本 处理历史问题的当代文学研究,读书会更 希望在对历史中"人"的状态加以充分体 察和剖析的基础上,探索、把捉、呈现当 代文学、思想、精神、政治、社会、生活 的感觉构成逻辑与经验构成方式, 由此辨 识、捕捉、显形那些尚未获得理解或足够 理解的在当代史演进逻辑中一些需要理解 节点的历史内蕴,探求文学研究、历史研究、 思想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相互借鉴 和促进的通道。

自成立以来,读书会的日常活动便以 细致研读 1949 年再创刊的《中国青年》杂 志为主,目前已读完1959年。大致每两周 一次, 同时配合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扩展阅 读。之所以冼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成长同步的《中国青年》杂志作为主要的 阅读和学习材料,读书会有着自己的学术 老量.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希望将以 往在革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培养"新人" 的诸多积累, 转化为形塑全社会青年的实 践。《中国青年》直接展现党和国家关于"新 人"的理解, 在不同层次对"青年"问题 的整理与同应, 更集中呈现着中共如何在 具体的情境中落实"新人"的形塑,即在 鼓励和召唤各个社会领域有进步意愿的青 年群体参与新的建国实践时,通过对这些 青年的各种调动与塑造,进而对全社会青 年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道德、精 神加以引导和塑造。显然,这种意识有助 于长期受"文学是人学"理念熏陶的读书 会成员, 立体而非概念地体会和理解在中 国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新 人"塑造是如何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被赋形 和落实的。

其次、《中国青年》在1949年创刊 到 1966 年停刊这段时间中,对变化快速的 时代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反应能力。目前读 书会已经阅读完毕的近十年《中国青年》,

可分为新中国初期(1949-1953)、新中 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3-1956).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1958)三 段。在这三段的《中国青年》阅读过程中, 读书会成员又保持着相对不同的阅读意识。 中共的政治构想落实到从新中国成立前延 续下来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形态的不同方 面引发了各种反应,特别是青年群体响应 革命和建设号召,积极参与到时代的历史 进程, 其与时代课题发生的种种关联所表 现出的对现实的各种复杂理解与同应方式, 非常有助于体会要在"旧中国"诞生出"新 中国",以及在时代变动中具体的"中国 人""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中国青 年》一方面发表大量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 的文章、报道、评论、群众来信等,积极 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方面积 极把捉时代脉络中的各类青年问题,推动 对这些问题的积极面对与解决。前者,让 读书会对时代顺利行进的一面有及时了解; 后者,《中国青年》在时代建设、时代期 待侧重变化快速的历史中对青年问题的敏 锐捕捉、赋形与回应,则为读书会观察国 家建设进程中青年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往 复型构关系提供着丰富且很有认知指示意 义的视角。

读书会之所以以差不多两周读一期杂 志、每次大约五六个小时的慢速度开展研 读,和读书会的如下选择有关,就是并不 以社会史、文化史一类的学科化视角或先 入为主设定问题的眼光来挑选研读文章, 而是试图认真对待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 逐一分析在杂志中被归类为时事、思想工 作、政策文件、农村经济、工业计划、哲学、 文化、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文章, 甚至看似 无关紧要的插图、广告、编者按、推荐书目、 笑话等, 也会因担心漏掉理解历史的信息 而努力打量。读书会希望通过这种充分尊 重材料对象的方式,来打造研究者对历史 构造中变化多端的各种动态机制的理解和 把握能力。当然,读书会如此进行自己的 日常研读并不是试图无所不包地叙述和理 解历史, 而是力图以"人"为中心, 不带 预设地在可见和不可见的历史运作机制中 寻找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时间节点与事件节 点,以不受未经过认真、必要的历史认知 程序便讨快定型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认知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觉意识,读书会极 力避免那种在常规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从理 论范畴和价值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经验的工 作方式,希望通过长期、细致、耐心的阅读、 整理、体贴,尽量体会与把握历史中的丰 富性与微妙性,并谨慎尝试在对历史的细 腻把捉与认真的分析和检讨中发现可供当 下思想和实践运用或经转化后可运用的资 源。在这一意义上说,以新的工作方式重 新认识、定位、面对和深入中国"经验", 既是读书会研习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读书 会研习努力的目标。

从这样的历史理解和自我期许出发, 读书会极为重视历史事件发生场域的田野调 查,有计划地开展了地方社会考察,寻访中 国的大地山川所发生的多样化历史、社会与 文化经验, 尤其关注发生干这些历史、社会 与文化经验中的"人"的精神感受与心情, 并用其充实读书会成员通过历史文献所无法 充分展开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认知。近年来,

读书会组织或参与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到与读书会研习直接相关的重要历史之地的考察;一是参与一些地方经验本身特别有意义、相关学科有长期积累的地方的考察,借此近身学习不同学科学者的工作方法和"问题意识"。

读书会近年考察包括: 2013年6月考 察山西长治、张庄、橦头村、武乡和沁水: 2013年8月考察河北武安十里店: 2014 年8月考察山西晋城: 2014年10月考察 湖南益阳; 2015年9月考察土默特平原; 2015年11月考察山西太原赤桥村: 2015 年12月考察广东中山市崖口村;2016年 2月考察福建莆田平原: 2016年8月考察 山西五台山; 2016年10月考察陕西西安 市长安区皇甫村: 2017年6月考察陕西榆 林; 2017年8月考察山西平顺; 2018年8 月考察东北国营农场: 2018年9月考察浙 江温州各郊县; 2019年7月考察贵州黔东 南; 2019年8月考察河南灵宝、驻马店, 山西介休 - 太谷等。这些考察活动进一步 拉开了读书会理解当代史赖以发生的历史

社会视野。这些考察活动进一步拉开了读书会理解当代史赖以发生的历史社会视野。

培养必要并有深度的学术视野对于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考察,读书会还特别针对自己的不足,邀请学者做系列专题讲座。2018年5月,我们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薜毅教授为读书会作了五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系列讲座。薜毅教授是鲁迅研究、文化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又多年沉潜于苏俄文学,对苏俄文学用功极深,而且形成的理解、把握和中国问题有很深的对话性,他的讲座对读书会把苏俄文学经验有效发展为理解中国革命、中国现当代文学经验的资源有重要帮助。

与此同时,读书会在与东亚不同区域、不同学科学者长期互动的基础上,以两个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研习诉求:其一是以历史研究为聚焦主题的当代史系列会议,其二是以文学为聚焦主题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会议。经由这些自我磨练和对话研讨,



读书会讨论中国当代史, 渠敬东教授摄于2018年12月

读书会希望将每一步的艰难摸索过程, 落实为接下来思考、研究的坚实积累。自 2013年4月至今,读书会已筹办七届当代 史研究系列会议,

会议主题依次为"1949: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意涵"、 "1950—1953: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 社会、文化和生活意涵"、"新人·十地·国 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 文化、思想意涵"、"新与旧·公与私·理 与时·情与势——再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 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活意涵"、"1953— 1956: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社会、 文化、生活意涵"、"1957年历史实践的 社会、思想、文化、生活意涵"、"作为 思想资源的五十年代"。每次研讨会结束后, 会议的讨论记录都会由研究生逐字逐句地 整理出来,不仅及时保存了学术讨论中的 精彩发言和思想火花,而且为今后梳理和 整合读书会的治学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来源。"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系列会议已经举办4届,分别以赵树理、 丁玲、柳青、李凖为中心,这四次会议的 论文集在编辑出版中,接下来还会以周立 波、浩然、周克芹、沙汀为中心展开讨论。

读书会力争将每一次会议都打造为"规模不大,但主题紧凑、讨论充分"的深度学术研讨会。围绕各次会议主题,读书会邀请大陆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东亚地区的诸多学者参与。会议论文经过随后长达近一年时间的反复修改,大部分结集发表在由贺照田和高士明主编的《人间思想》学术辑刊(《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第一辑)、《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第

三辑)、《新人土地国家》(第五辑)、《新与旧理与时情与势》(第七辑)、《作为人间事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九辑)、《作为方法的五十年代》(第十一辑),文研院收藏有全套共十一辑《人间思想》)。另外,我们规划中的系列论文集《革命·历史·文学》的第一辑也即将面世。

读书会不仅是一个以较为密集的日常 讨论为基础的老师们的学术共同体,还有 众多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同学参与读书讨论。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都师范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 术研究院等高校为主的硕士博士同学, 自 2011年始陆续加入到读书会讨论之中。他 们不仅在读书会日常讨论、学术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针对自己学习、成 长中碰到的人生困扰、学术疑难和社会关 切,组织了多次专题讨论会。这些跨高校 跨学科跨年纪的讨论交流, 所收获的除学 术能力的成长外,还包括彼此理解的增进 和因对他人的深入理解而带来的对社会的 新认知,以及基于这些理解、认知基础上 的自我打开,与因对他人的深入理解、自 我的诚恳打开而重塑的个人生命状态、读 书会群体状态。而读书会年轻人的这些学 习、成长状态,更加推动读书会不仅是学术 共同体, 也同时是以学术、思考为契机的友 爱共同体, 而友爱共同体形成经验又反过来 启发、滋养我们的人文研究、人文思考。

此外,读书会还积极参与国内学界组织的各种相关学术研讨会,如相继参加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和读书会合办的"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青年"研讨会(2014年



2019年7月, 重庆大学高研院李放春教授带队考察黔东南侗族村落

6月);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主办的"资料・视野・方法:中国当代史 研究中的多学科对话与思考"学术研讨会 (2015年11月): 由《中共党史研究》 编辑部主办的"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 与展望"(2017年5月)、"中共制度史 研究的现状与未来"(2017年12月)、"当 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2018 年5月);由中山大学主办的"新中国视 域中的文学经验、文化实践与社会构造" 研讨会(2017年11月);由重庆大学主 办的"重返 1950 年代:历史经验与文明意 涵"研讨会(2018年11月);由上海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上海大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的"当代文学七十年" (2019年6月)等专题学术座谈会,以及 由《开放时代》编辑部组织的"集体化时

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人民共和国的文 明内涵"等专题工作坊,由兰州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革命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读书会联合举办的"中共革命的行动 机制"研讨会(2019年8月)等。读书会 成员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带有显著 的跨学科特性,观察视角独特,既注意历 史化的内在整理, 又重视思想内涵的深度 阐释,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 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带来了崭新的学 术感受和观察视阈。如有研究者就认为, 读书会充分借鉴人类学研究的"细描"研 究意识,试图重新把握结构性的历史认知, 重新联通当代中国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显 然对干修正目前地域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 题具有某种战略性的启示和意义"[]。

经过九年的扎实研读和耐心积累,读 书会以开放的学术心态和崭新的研究理念, 获得了不同学科中很多研究者的支持与认 可。在朋友们的关爱、鼓励中, 我们深知 自己仍有诸多不足,并诚心向更多朋友学 习,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帮助。"夫道, 天下之公道也; 学, 天下之公学也。故言 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通过 不断向他人学习来自我磨炼、校正、拓展, 也是读书会所期待的问学方式和状态。读 书会每一年都针对自身问题不断做出调整, 努力尝试新的交流和探索方式。今后读书 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将努力把自己的每一步 知识工作奠基在坚实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之 上,相信只有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能为中 国人文学术未来的创造性讲展作出更多实 实在在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本文由何浩撰写。何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 射不主皮——记《仪礼》读书会

我们的《仪礼注疏》读书班从2015年 正式开始, 进行到今年已经5年了。中间读 书班不断更换地点,直至2017年,才在邓 小南、渠敬东两位师长和文研院全体工作人 员的支持下,得以长居二院。所以当文研院 准备开办读书会的专题栏目, 让我撰写介绍 文章时,我深感义不容辞。尽管我们这个读 书班规模不大,所读之书也难称预流,仍然 有必要在此为大家稍作介绍。

我从 2004 年开始, 就陪着李鸣飞参加 陈高华先生在社科院主持的《元典章・户部》 读书班,对这种文献会读形式的读书组织,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大家集体阅读未经整理 的文献,深入挖掘其内容,不仅每位参加者 在此过程中都能得到受益,就算是旁听的学 生,也会在观摩讨论中提升阅读文献的能力。 博士毕业之后,由于必须去适应自己生活的 若干变化, 我连续数年中都处于无法稳定读 书的状态。直至2015年,实在感到不能再 放任自己,必须给自己找点压力,于是这才 开始筹划这一读书班的开设。中间屡次更换 读书地点,至2017年9月,我受邀成为文 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借着驻访的机会,《仪 礼》读书会终于能够静园二院二层的201 教室稳定下来。隔周的周五下午, 我与来自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 众多师友共同切磋探索, 到现在已经进行到 了《仪礼・乡射礼》的尾声。

读书班的基础文本是清代张敦仁本《仪 礼注疏》。起初,我发起会读的初衷,就是



师顾堂影印张敦仁本《仪礼注疏》



读书会现场

揣摩郑玄、贾公彦对经文的诠释。但为了更 加充分的比较,我们就不能仅局限于唐以前 的经说, 也需要进一步参考朱熹《仪礼经传 通解》、敖继公《仪礼集说》、胡培翚《仪 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 经校释》等礼学著作、关注不同时代下、不 同学术立场之下的学者解经思路。

作为《三礼》中最为核心的一部,《仪 礼》有着极为古老的学术渊源。《仪礼·丧服》 的传文,相传为孔门弟子中精通文献之学 的子夏所作。传内又引"传曰", 更被认 为是子夏之前的旧传。《仪礼》的学术史 跨越了两千年。每个时代的经学著作,语 言习惯、思考习惯都不一样,往往也会有 不同的结论,有些甚至匪夷所思。惟有以"了 解之同情",探索经学家们不得不然的理 由,才能悠游其间,左右逢原。比较学者 们对干经书的解释, 也如同跨越千年, 与 这些古人们同晤一室, 既让他们互相了解, 也让他们彼此争吵, 真是异常有趣的感受。

和其他儒家经典相比,《仪礼》最大的 特点在于实践性。经文描述了在特定空间内, 礼仪施行的具体节次。一个转身、一次拜揖 都关系到宾主关系的表达, 更别提祭品和祭 器的摆放、参赞者冕服的穿戴这些显著的可 视化要素了。这就决定了研读礼经是一项繁 琐细致的工作。大家读着纸面上的文字, 脑 中还要构想仪节进展的平面图,有时还要自 己尝试在台前模拟。虽然这些也有张惠言《仪 礼图》的辅助, 但很多细节仍然要反复推敲 才能恍然大悟,读书班中的成员们为此都投 入极大耐心,相应也有巨大收获。

作为读书班的主持者, 我对会读的态度 是比较佛系的。套用礼学的说法, 我们这一 读书班秉持的宗旨就是"射不主皮",也就 是礼射不以射中为胜。我们既不预先设定研 究计划, 也不追求发现多少问题, 产出多少 论文。对读书班上的诸位成员而言,我们共 同的目的就在于充分理解《仪礼》文本。《仪 礼》固然是会让一部分人充满阅读激情的文 本, 但激情褪去也不妨暂时搁置。基于此, 读书会的形式相对轻松,人员流动也比较自 由,并没有什么准入门槛。先后参加的老师 和同学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副研究员林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 研究员冯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李晓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 系讲师安文研: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方浩铭、褚叶儿、刘东奇、张照, 历史学系 谢继帅、王景创、余璐、厉承祥,中国语言 文学系王雨桐: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 化研究院张雪、崔璨、张垚, 历史学院柯祺 瀚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会读中的汲取经 验,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上取得进展。

前人曾说《仪礼》难读, 但读书会自由 而真挚的讨论, 使这场冒险不再孤单。愿读 书人快乐。

本文由华喆撰写。华喆为文研院第三期 邀访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华喆 副教授。



#### 礼在斯须

# ——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礼经郑氏学》读书会



# 一、缘起: 张锡恭《丧礼郑氏学》 的成书与重见

2017年秋,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由上 海书店出版社付梓面世,有赖北京大学哲学 系吴飞教授八年点校,海内同仁终于能够更 方便地一阅这部清末丧服学的集大成之作。

张锡恭(1858-1924)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礼学家,松江府娄县人,24岁就读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镇海黄以周,26岁拔贡进人国子监,29岁中举。张锡恭曾先后受聘武昌两湖书院和松江府学,潜研礼经,48岁被召入清廷为预备立宪所设礼学馆,参与修礼。《丧服郑氏学》完稿于民国五年,张锡恭在病中托付友人曹元忠、刘承幹刊刻成书。

《丧服郑氏学》以《仪礼·丧服》一篇的经、传、注、疏基本结构,对历代有关《丧服》篇各条目的论述精加拣选,每一条经文下所摘录的疏解和服议都要言不烦地展现出经学史上致疑之处和决疑之论,追溯对经、传和郑注的误解,辨析《丧服》一篇内含的服制、义理、服议、文字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实际上,《丧服郑氏学》只是张锡恭所 撰巨著《丧礼郑氏学》之一部分。《丧服郑氏学》 十六卷付梓后,张锡恭避世蛰居小昆山数年, 完成了《丧礼郑氏学》剩下的四十四卷。两 年后,妻儿早亡的张锡恭不堪病痛和战火的 惊吓,在困窘中离世(关于张锡恭的生平, 见吴飞教授《〈喪服鄭氏學〉序》)。 《丧礼郑氏学》分为先行撰成的《礼经郑氏学》和后成的《礼记郑氏学》两部分, 共四十五卷(含《宫室图考》一卷),于 1922年秋完稿,外甥封文权受嘱刊印。然而 书稿先后经过刘承幹、汪柏年、王欣夫等人 之手,两次筹划刊印未成。

1937年,淞沪会战正当激烈,王欣夫 犹在上海参校《丧礼郑氏学》书稿,《士虞礼》 篇末有王欣夫手记,曰:

"丁丑八月九日,据士禮居重刻嚴州本校經注一過。時人心惶惶,多有遷避海上租界及四鄉者。余仍閉户校書,未嘗一日輟也。 補安記。

上海大戰已起,人方倉黃逃避,余猶校 勘不輟。書癡生涯,可笑抑又可憐。十三日 記時,聞炮聲。"

读之每令人喟叹校书之艰与前人之贤。 此前该书已有十卷雕成试印,剩余部分的校 勘因日军人侵难以继续,校勘稿由王欣夫携 带离开上海,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2011年,吴飞教授在着手点校《丧服郑氏学》的同时,也开始南下寻访张锡恭遗著和旧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王欣夫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图书中找到了该书的勘校稿,当即组织人力誊抄,并逐步点校(关于该书成书和校

勘的详细情况,林振岳撰有《張錫恭〈喪禮鄭氏學〉成書與刊刻》一文)。这部汇集了清代丧礼学之精粹的巨著几经沉浮,终于没有被这一百年的汹涌波涛埋没。略读王欣夫对书稿所历辗转的记述,就使人感到这其中似是有冥冥天意,让张锡恭等一辈学人的努力没有唐捐。

作为共同关心、研讨丧 礼学的学友,也作为协助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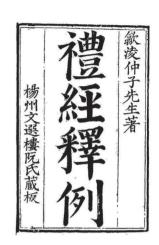
校书稿的同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老师和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老师共同主持的《礼经郑氏学》读书会的读本即得于吴飞教授惠赐。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共同研读《丧礼郑氏学》,在《丧服郑氏学》所树立的纲领基础之上,进一步理解丧礼学,从中汲取社会理论的养分。

# 二、初衷:《丧礼郑氏学》要旨与礼学对社会学的意义

清儒的思路自革命而中绝,"三礼" 文本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意义也变得渺不可知,只能循"四书"和《乐记》的表述,赋 予其模糊的地位。然而如果不能在礼的具体 内容上细致分析,那么礼和性、心、亲亲、 尊尊等核心概念的关系就不能根本上有别于 荀子义外的理解方式,也不能在社会学理论 既有的"规训"视角之外开辟新的视角。

近几年,借助《丧服郑氏学》提供的指引,《仪礼·丧服》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思想中价值秩序的意义已经被部分研究点明,将丧服制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帮助我们理解今天





淩廷堪与《礼经释例》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努力也呼之欲出。《仪礼·丧服》是清代礼学在其可能范围内找到的最终纲领文本,曹元弼为《丧服郑氏学》作序云: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著在六經。六經同歸,其旨在禮。禮有五經,本在喪服。"

《丧礼郑氏学》以相似的体例梳理《仪礼》和《礼记》中与丧礼和宗法相关的其他篇章和条目,在辨明郑注乃经传不易之解的同时,建立起从丧亡到祭祀的时间序列和宫室的空间结构。借助丧礼多环节、多主体和情感复杂的特性,《丧礼郑氏学》提供了一个比丧服制度这一符号化人伦关系更为丰富生动的礼的世界。

北大社会学系的《礼经郑氏学》读书会 正是要抓住这部著作的上述特点及其对于我 们认识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内核的启发,因 此阅读研讨的关注点与经学的视角有一定差 别。对于社会学而言,礼学的重要性仍然有 待阐发和向更深处探究。"经礼三百,曲礼 三千",静态的礼制随时都要向繁杂的现实 渗透;反过来说,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互动场 景无不是礼精神的外化,也即人伦关系中的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丧礼郑氏学》稿本

不同主体在情境中相互致意的过程,致意的过程充满了礼的意味。公西华说"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犹谓之"唯赤则非邦也与";孟子教公都子以"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辨明义之由内兴发,可见大到为政,小到饮酌,无不贯彻着礼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日常行动中仍然会觉得"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十分自然,但是未必能够清楚地讲出其中的道理,也无需明白其道理,而这正是需要社会学致力之处。清儒凌廷堪《复礼》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此之谓也。

今天的社会科学话语中,礼经或许不过 是一种类似社会规范或仪式准则的"博物馆 文本",似乎已经与现实社会完全脱离了关 系,平常人们的坐卧起居、应酬来往也意识 不到自己的很多行为实际上仍然扎根在"曲礼三千"之中,但是只要对礼经稍作了解和探究,就会发现礼乐并没有斯须去身。按照传统思想的理论,这是情感发乎自然的结果。自郑玄等东汉经师、宋明诸儒以至于凌廷堪、曹元弼、张锡恭等人,无不坚信礼具备化育情感、经世治民的作用,近两千年间虽有显晦之别,但无始终之变,其流风余绪,仍清晰可览,这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有不可变革的内心,吸引读书人反复挖掘求索。

#### 三、活动:每周读书会与礼学论坛

读书会以"礼经郑氏学"为名,其实阅读范围包括了《丧礼郑氏学》中"礼经郑氏学"和"礼记郑氏学"两部分。在各自分别阅读的基础上,读书会每周在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集中讨论一次,由一人作报告,梳理每条经文的大意和经学史上发生过的争论,总结代表意见及其理由;诸生讨论疑难之处,发掘经注和后代讨论中有启发性的内容;主持读书会的周飞舟老师和林鹄老师对报告和讨论中的疏漏、误解和疑问做出尝试性的回应,推动延伸讨论。

读书会自 2018 年春季始,两年来始终参与的有二十余人,其间产生了若干篇基于丧礼经文和注疏材料的论文,正在国内陆续发表。2018 年和 2019 年末分别依托读书会举办过小型研讨会,以资诸生相互砥砺,在读书的道路上共同进步。

本文由余朋翰撰写。余朋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六)丝路现场



#### 【编者按】

近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配合的方法,前往丝路沿线实地考察调研,取得显著成就。疫情期间,文研院设立"丝路现场"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察时所作的纪要、随感、实录。特此摘录学者在丝路沿线考察所作的纪实性文字,以飨读者。



#### 刘迎胜 | 寻找东干人



6月4日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这是我们考察中令人激动的一天。苏方人员把我们带去踏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诞生地碎叶(Suyab)和裴罗将军城(Balasaghun)等碎叶川古遗址。早晨考察队一行乘车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别什(Beshkek)东行60公里至白彦虎的部下定居下来的托克马克,再行18公里至布拉纳(Бурана),这里就是唐代的裴罗将军城。

裴罗将军城是从碎叶通向中国内地的 驿路的第一站。宋、元时代称为虎思斡耳朵 (Quz Ordu)、骨则讹鲁朵或谷则斡儿朵。 12世纪30年代,辽为金所灭。辽太祖耶律 阿机八世孙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此定都, 建立西辽王朝。《金史·粘割韩奴传》称西 辽"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 我们看到的城墙较汉文史料所记虎思斡耳朵 的规模小了很多。按《皇华四达记》的记载, 从裴罗将军城到碎叶共20里。据现代测量, 从布拉纳遗址到碎叶遗址的城墙距离为6公 里。天气好时,从布拉纳遗址的哈剌汗朝时 代宣礼塔顶部,可以遥遥望见碎叶城遗址。 据此我判断,《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 是包括了碎叶城在内的。中午由布拉纳遗址 西行数公里,来到故碎叶城。

午饭安排在附近的一家小镇,当地接待 考察队的人中有几位东干族干部。其中一位 姓马,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其兄在吉尔吉斯斯 坦任文化部长,他们觉得整个民族都有荣耀。 我忽然忆起,他哥哥就是尼赫鲁总理的孙子 曾经告诉我的那位马德贤。我问这位干部, 来接待我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告诉我,有 他们"掌柜的",即集体农庄主席,而他本 人则在农庄中担任"帮办",大约是秘书,

助手或副主席一类的职务。 当我听到东干人用"掌柜 的"、"帮办"一类词汇来 称呼他们的干部时,禁不住 要笑出声来。这位干部告诉 我,下午的活动结束后,晚 饭将安排在附近的一个东干 人村子里。

下午考察队去"新城" 遗址。按唐代丞相贾耽的记 载,新城西距碎叶40里。 这里曾出土唐代"大历通宝"

一枚及一些突骑施钱币。陪同我们的是一位 在当地新闻部门任职的东干记者。他刚开始 还与我们说几句俄语,后来就干脆用东干语 与我们海阔开空地聊了起来。他最近去过新 疆和陕西老家, 共待了两个多月。他不认识 汉字, 我很奇怪他怎么能独自在中国旅行。 他很不服气地反问我:"眼认不得,嘴还不 会说么?"我问他还想不想去中国,他说想, 但中国物价太贵。他说中国东西多、什么都 可以买得到,而这边什么都没有。但中国钱 难挣,找个工作不容易。的确,像他这样一 个不识汉字的小伙子,就是想打工,活也难 找。

他这一趟去中国来回花了5千卢布。当 时 27 卢布兑 1 美元,这笔钱相当于近 200 美元, 按边境地区人民与美元的比价折算, 大约5卢布兑人民币1元。5千卢布相当于 人民币 1000 元左右。这笔钱对当时平均月 工资只有200卢布的苏联公民来说,的确 是一个大数目。他花了大笔的钱, 总算看到 了自己的老家,见到了自己的远亲,了却了 自己祖先不曾了却的寻亲梦。东干人的祖先



碎叶城遗址

当年被清政府追剿,死伤惨重,但他们的后 裔却不远千里, 追寻自己五世祖先所出自的 陕西故十。这个普通故事, 反映出一个民族 思念故土之情,不是世代的更替可以磨灭的。

东干人至今记得白彦虎,把他当作英雄。 可是因为没有史籍, 他们白彦虎的事迹已经 不十分清楚了。我曾经几次遇到东干人要我 讲讲白彦虎的事。东干人对自己是甘肃人还 是陕西人分得很清楚。但多数东干 百姓已 经记不得自己老家的村名、乡名, 甚至县名。 我曾问过一位东干乡亲是哪里人, 他说: "我 嘛,伊犁陕西人。"他连伊犁、陕西的关系 都分不清。许多东干人得知我来自中国以后, 不断问我的家乡离陕西(甘肃)有多远。他 们自豪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舅家,说自己是 中国的外甥,中国人是东干的舅舅。这句话 我在中亚从东干人嘴里听到过好几次。

傍晚至比什凯克20公里的东干村子"米 粮川"。村子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 接考察队的到来。村中心的广场上搭了个大 舞台,身着民族盛装的东干姑娘在台上表演 带有东干风情的民族歌舞,会场周围挤满了 东干老乡。村子里有一个小展览馆,里面陈 列着这个村子十月革命以来发生的变化,与 为苏联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的事 访和肖像,相当于村中室的村荣誉榜。

应考察队科学领队巴基斯坦达尼 (Ahmad Dani) 教授的激请、我走上舞台、 在麦克风前对聚集在广场上的东干人和其他 民族的苏联公民发表了讲话,为了让东干老 乡能直接听懂我的话,我用汉语说。吉尔吉 斯斯坦科学院同族研究所苏三洛教授汉语不 错,为了让在场的其他苏联人也能听懂,主 动来当翻译, 把我的话译为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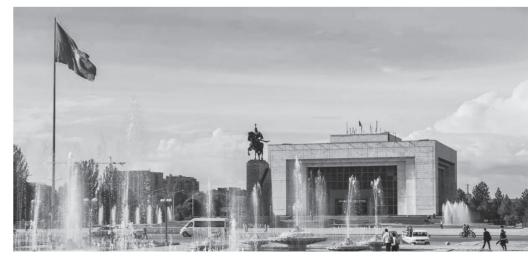
因为东干人自称为"老回", 我干是在 讲话中用"回族"这个词称呼他们。我说, 在这里能看到回族乡亲感到很高兴, 希望这 里的回族人能够成为他们过去的祖国中国 和他们的新祖国苏联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 梁,祝米粮川的回族人民幸福。广场上的人 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东干 人已不认识汉字。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老

回话"。妇女们把她们刺绣的工艺品拿出来 展示。我看见一个绣花枕套上绣着歪歪倒倒 的汉字"欢迎",便问:"这是啥?"一位 东干人告诉我: "汉字。" 我问他这汉字说 的是啥,他很干脆地回答:"知不道(不知 道)。"看来是一位妇女请人描好后、依样 画葫芦绣出来的。

我注意到舞台上方挂着欢迎的横幅, 有 四行字, 前三行分别是俄文、英文和用俄文 字母拼写的吉尔吉斯文。我虽然未学过吉尔 吉斯文, 但在德国学过突厥语, 所以能理解 大致意思, 其内容都是欢迎"丝绸之路"考 察团。最后一行也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我 下意识地念了一下, 发现这就是所谓"东干 文"。十月革命后,苏联当局为东干人创制 了新文字,这种新文字完全用开汉语官话, 使用俄文字母按东干人的土话拼写。东干族 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念的都是这种"东干文"。 苏联还用这种"东干文"出版了不少著作。

我把眼前这幅东干文标语抄了下来,并 逐字注上汉语对应字, 其内容是这样:



"Ба ченджа «вида чуцы лудо» экспедиция ди жынмуна жэщин вындон! "

把参加伟大绸子路道考察的人们哪热心问当!

整条标语注上汉字之后,一般中国人都能看懂。东干人不知道"丝绸"这个汉语书面语词,只好用土话"绸子"。他们也没有文言虚词"之"字结构,所以"丝绸之路"这个词在他们口中成了"绸子路道"。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母体,不读汉籍,而他们土话中词汇又不够,当遇到俄语экспедиция(相当于英语 expedition)这个词时,不知道相对的词应当是"考察"、"探险"、"远征",只好照抄俄语。我对最后一个词,即 вын("问")后面的那个的 дон 的意思拿不准,遂当场请教苏三洛教授,问他这个"дон"怎么讲。他不假思索地说:"дон 嘛,就是把你 дон 人看的 дон。"翻成普通话就是"'当'嘛,就是把你当人看的'当'字。"

米粮川这个集体农庄种的主要是蔬菜,他 们种黄瓜、茄子、大白菜、元白菜、芜荽、胡萝、 萝卜、葱、洋葱、茴香等。果树有杏、还有核桃。 现在这里生产的蔬菜能满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城大部分需要,所以当地的东干人比 其他民族要富。苏联汽车工业相当发达,价格 也不贵,一些村民家里甚至有两辆轿车。

村中有一所中国式样的大屋项的茶馆, 我们应邀在里面用晚餐。饭菜与在哈萨克斯 坦的那顿东干饭很相似,凉粉、炒粉条、拉面、 牛肉等。吃饭用筷子。在前苏联的 100 多个 民族中,大概只有东干人和朝鲜人保持传统 习惯用筷子吃饭。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有一 个东干研究所,所里的工作人员也来陪我们 吃饭。他们听汉语普通话的能力比一般东干 老百姓强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作什么解释。 但他们中有些人只会说,不认识汉字。当时 新疆的维吾尔族老乡越过边境来做生意的已 经很多,回族人自古善贾贩,于是我问他们 有无东干人去中国做生意。他们告诉我,这 里是集体制度,这样干还不允许。

1962年伊犁、塔城事件时,有不少新疆的回族人跑到这里,被吸收到东干社会群体中去。这些人会似懂非懂地用一些汉语的新词汇,与家乡尚有联系。我在米粮川这个村里遇到一位男子,就是"伊塔事件"后在这里定居的,现在算是东干人。我问他过来以后的生活如何,他说过去还好,但现在不行了,"大跃进哩,东西都贵了哩!"我乍一听尚不懂他为什么提到"大跃进"这个词。想了一下才明白。1958年"大跃进"这个词。想了一下才明白。1958年"大跃进"以后,物价飞涨,他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并不懂得"大跃进"中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的实际含义,只看到"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所以才会在这种场合下用"大跃进"这个词。

1962 后"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的中苏边境曾一度失去控制。这位回族边民越境出逃时,因为舍不得那些破烂家当,家人没有带来,还留在伊宁。他曾经往返国境两边好多次,把在苏联境内搞到的面包、粮食带回伊宁喂养家人。可突然间边界被关闭,他只好一个人在苏联,一家老小都留在中国。他从家信中听说中国变好了,很想回去,把我当大人物,求我给中国政府捎话,希望重新开放伊犁边境。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寻根》 1994年第1期,河南教育出版社。)

# 张嘉妹 | 白沙瓦——文明交汇地的今昔



位于巴基斯坦开伯尔 - 普赫图赫瓦省 的白沙瓦, 既是该省的省会, 也是联邦部落 直辖区的行政中心所在地。白沙瓦位于广阔 的白沙瓦山谷中,城市建立在地势平坦的犍 陀罗平原上, 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 南 面(东南)朝向开阔的旁遮普平原。白沙瓦 恰处开伯尔山口(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 脉的"错口")的东端,从西面和北面进入 次大陆的入侵者必经此地。自贵霜时期起, 南来北往的商队在这里络绎不绝。自此,她 成为中亚与南亚往来通道上的要塞城市,是 连接中亚、南亚、西亚的枢纽,次大陆由此 通往中东。如今, 地缘让这里难得太平, 加 之媒体报道中涉及的恐怖事件, 世人已惯于 用危险、极端、保守这类"不友好"的词语 来描述这里的境况;可当人们在对丝绸之路 的回溯中,在高僧法显、玄奘传于后世的文 字中, 在历史学家的记录中, 读到"布路沙 布逻"、"丈夫宫"、"百花之都"这些名 称时,那个热闹繁华、四通八达的商贸中心, 那个让人心驰神往的佛教圣地,那个融入不 同族群的历史古城,会如同连绵画卷,栩栩 如牛地在脑海中缓缓展开。那么,究竟哪一 个,才是她的真实面貌?

具文献记载,白沙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9年,是南亚次大陆可以考证的最古老城市之一。据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白沙瓦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970,042人,是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第一大城市,巴

基斯坦第六大城市, 而整个白沙瓦大区人口 也已经达到 4,269,079 人。悠久的历史 沉淀了丰厚的底蕴,如今,这里依然保有多 样的语言。目前,书面语以乌尔都语、英语 为主, 普什图语和波斯语为辅。日常交流用 语中,包括了古今、各地多种语言:印德固 语 ( وكدن ) , 郭锡斯坦语 ( وكدن ) , 科瓦尔语( (しゅ ) ) , 达利语( ) , 赫扎 拉语(。),波斯语(。),塔吉 克语(シス); 古杰尔语(シス), 克 什米尔语( عریش ), 俾路支语( عریش ), 信德语 ( عومارب ) , 布拉灰语 ( عومارب ) 希 纳语( ننىش ), 布尔锡斯基语( كنىش ), 瓦西语(シヴェ),伯勒蒂语(シヴェ)等等。 语言的多样说明人流往来的频繁,而这意味 着对便利交通的需求, 反过来, 也是便利交 通的早期建设——公路和铁路,增强了这里 人群流动的速度和数量。其中比较重要的道 路之一,是修建于16世纪的"主干线(Grand Trunk Road, 简称 GT Road)", 至今仍 承载着日益繁重的交通。而这条绵长线路的 历史,已有近2000年之久,是亚洲最古老 最长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东端起始于今天 的孟加拉国,横穿印度,经巴基斯坦境内旁 遮普省、开伯尔 - 普赫图赫瓦省, 最终到 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重要的地理位置赋予白沙瓦突出的政治地位。公元2世纪,迦尼色伽王登基后, 将都城从布色羯逻伐底城(シン・・)。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与白沙瓦地理位置

今加尔色达)迁到了布路沙布逻(白沙瓦)。16世纪,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为其定名白沙瓦,沿用至今。"白沙瓦(Peshawar)"一名来自梵语,译音布路沙布逻(Purushapura, Purusapura),意为"男人之城"(古译为"丈夫土"、"丈夫城",《续高僧传》卷二作"丈夫宫"。)。具历史学家马苏迪[3]和贝鲁尼[4]记载,10世纪中期及伽兹尼王朝时期,该城以波罗沙瓦尔(Parashawar,这说文)之名为人所知。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时期,赐名"白沙瓦(Peshawar,(又说说文)",据说取自波斯语"前线城市(又说说文)"之意。阿克巴大帝的宫廷史官阿布勒·法兹尔在波斯语史书

中同时采用前后两个名字(Parashawar 和Peshawar)来指代这一地区。根据巴基斯坦当代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的记载,白沙瓦的曾用名有:巴尔斯布尔(روب روب رائر レリカー),在殇布尔(روب رائر レリカー),在你沙布尔(روب رائر レリカー)),

古城重镇白沙瓦在地理上处于连通四方的枢纽地带,拥有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语言文化。当今,被裹挟在纷杂的地缘格局中,该如何主动寻求出路?在"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又会引发哪些对时代机遇的认识与思考,推动该地区走出困境?本文通过梳理当地的历史脉络,尝试分析该地区当今社会政治文化面貌背后的历史影响因素,以期在地区间合作的良好愿望与当前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深入了解彼此,协同提升。

2018年,"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入第三年。在政府换届、换执政党的重大国内变动中,巴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进行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否会受影响,是中巴两国积极关注的重点问题。新总理伊姆兰·汗在胜选演讲中表明了立场态度,丝毫没有动摇中巴传统友谊及当前的首位合作关系。

自古是商道,今日尤繁忙。"一带一路"中目前包括六个经济走廊项目,其中"中巴经济走廊"为旗舰项目。在其路线规划中,东北起中国新疆喀什,西南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瓜达尔港出海口的"走廊",将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贯通南北丝路的关键枢纽。其中,正在建设中的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将成为巴基斯坦首条拥有智能交通系统的高

速公路,更是巴国内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和国防要道。"走廊"将通过公路、铁路等交通基建连通巴基斯坦境内的主要城市,并以东、中、西三条主线路的形式辐射周围地区,形成便利的交通网络;同时计划配以油气管道和光缆,最终建设成为"四位一体"的通道。基础建设完成后,白沙瓦将通过公路、高速路、铁路等与国内主要城市连接畅通,并通过陆路交通网即可实现与中国更加高效的通行。

伴随着工程的推进与中方投资额的不 断增加,通过促进贸易往来和能源流通等各 方面的合作,以期达到"互利共赢"的长远 目标。其间暴露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解 决不了的,而且更可能是伴随经济状况改变 并发出来的。从本文对白沙瓦地区扼要的历 史脉络梳理可知, 白沙瓦的历史, 在某种程 度上浓缩了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即如今开 伯尔 - 普赫图赫瓦省的历史, 甚至可以被 视为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这个 年轻国家的历史缩影。这里有着与中国汉文 化完全不同的社会面貌, 对生活也有着不同 的看法和要求,具体到行事及目的,相去其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看待合作, 而是带着耐 心与真诚去尝试理解彼此。在中国从事科研 工作多年,并著有《中巴关系研究》一书的 巴基斯坦学者古拉姆・阿里 (Ghulam Ali) 先生说, 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中独树一帜, 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她不同于当今世界上 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 更不同于阿拉伯世界 的"主流"伊斯兰教国家。笔者几乎问过每 一位巴基斯坦朋友同一个问题"中国人和巴 基斯坦人最大的区别有哪些?"回答中排在 第一位的,几乎无一例外是"中国人勤奋"。 简单意味着"巴基斯坦人不勤奋或懒惰"。 因为,这些正在、或曾经生活在中国的巴基 斯坦朋友还表示,与巴基斯坦人相比,中国 人在日常生活中更有目标感和计划性。在这 个95%以上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清真之国, 人们对生活在"现世"的态度, 去除宗教因 素外, 当然有对和睦、友爱、良好物质生活 等方面的人类共通的追求与渴望, 但如何将 这种渴求与向往,在日常生活中有效转化为 "勤奋的行为",是巴年轻人积极观察、思 考、学习的一个潜在隐性内容, 也是中国文 化影响力的侧面体现。借助他者的评论反观 自身, 当我们每日谈论国内社会中的各类问 题,感叹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优点时, 从友邻一侧, 也接收到了自身习以为常不曾 关注的"闪光点"。而来华学习工作的巴基 斯坦朋友也纷纷表示, 他们以前眼睛总望向 欧美发达国家,希望可以学习到先进的东西 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帮助祖国的发展,现在 当他们开始了解中国,特别是来到这里有了 切身感受后, 更相信与中国的合作是多么难 得的历史契机。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地开始选择学习汉语作为一门外语,并在近 年来显现出自费来中国留学的趋势, 毕竟以 前的留学生基本都是依靠申请政府奖学金。 在巴国内,包括白沙瓦大学在内,多所高校 及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 在智 识上支持两国的深入合作。由此可见,在彼 此长远的合作规划中, 主动了解彼此, 在互 信的良好基础上积极调整方式,才有望共同 解决问题,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在此过程 中,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表现在从官方、 政治层面的传统友好关系,逐渐连接深化到

个人以为, 这"勤奋"的对面, 并不



释迦诞生的故事,于白沙瓦博物馆藏浮雕版上

民间交流合作中。于是, 伴随着"经济走廊" 的建设, "文化走廊"等也已悄然展开。

进一步来看,在当今交通日益便利、 信息通讯日益发达、商贸往来日益密切的人 文流动中, "走廊"的建设与努力, 为其他 国家地区提供了地区协作发展的又一典范: 地区间合作发展是学习他者——深化自我认 知——提升自我——被他者学习的深度关联 连接, 而后两个环节, 便是我国在经济发展 迅速、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境遇中, 尤其 重视的"在国际社会中塑造国家形象"等相 关课题。由此,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为 样板、为旗舰,不仅是经济发展上的互利共 嬴, 更是通过认知彼此, 各自更好地提升自 我的契机,是在事务合作中,在方式与理念 上互相学习的契机。作为中国唯一的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 巴基斯坦在历史文化、日常 生活轨迹上,与中国大相径庭。在"走廊"

建设的合作中,双方由过去"心连心、背靠 背"的姿势,逐渐调整为携手同行,将目光 投向彼此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转变, 便是与 经济合作并行的文化互动中的旗舰项目、样 板工程, 这为世界如何理解中国, 和中国如 何理解世界,奏响了新的乐章。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区域国别 研究学刊第1辑》, 商务印书馆, 2019。)



# 段晴|陌生的友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巴基斯坦塔克西拉 古城的西尔卡普遗址。上次是2013年的6 月,天气炎热,远远便看见一棵大树,郁 郁葱葱,浓荫遍布,我们曾在那树下乘凉 歇脚,着实惬意。不想,在这清凉的4月, 它却已干枯,枝丫虬结,仿佛苍老的故友 向我打着招呼。不禁难过,为巴基斯坦缺 水而担忧。但这担忧很快就在前往白沙瓦 的行程中一扫而尽, 车外所见河网纵横, 水流丰沛,印度河、喀布尔河的支流流过, 滋养着大地,小麦金黄,瓜果翠绿。同行 者中最年轻的学者——来自北京大学禁巴 语言文化专业的范晶晶博士大发思古之忧 情,口叶玄奘的莲花句,念叨着果然是"谷 稼殷盛, 花果繁茂"啊。或许正因其富庶, 又是河谷之地, 历来兵家争夺, 战祸不断, 玄奘于7世纪来到此地时,已是"邑里空荒, 居人稀少"。

贞观元年(627年),这位唐代高僧 自长安出发, 西行求法, 一路穿沙漠, 跨 戈壁,翻雪山,历经艰险,最终于次年夏 末初秋,进入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他 在印度各地游历,巡礼佛教圣所,在那烂 陀寺潜心修学……直至贞观十九年返回长 安。这场"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 二十八国"的求法苦旅堪称中古史上最伟 大的行程。一部涵盖了山川地理、风土人 情、经济文化、历史故事等诸多内容的《大 唐西域记》不仅为唐人提供了翔实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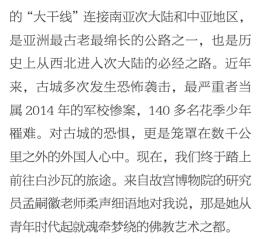
对后世亦影响深远, 无论对后代求法的僧 人,或是20世纪初期的探险考古学家斯坦 因, 甚至今日生活干此的人, 一路上都是 关于"玄奘曾经路过此地"的传说,或真 或假, 众说纷纭。

可以确定的是, 书中提到的健驮逻国、 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乌刺尸国等都位 干今巴基斯坦境内。这里是印度次大陆文 明的故乡,古老的哈拉帕文明就诞生于此, 这里也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梨俱吠陀》 的诞生地。公元前 1200 前后, 印欧语系的 东支之一支跨越了兴都库什山脉, 经由开 伯尔山口在旁遮普一带定居下来, 创造了 后来遍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之始。我 说的印度,不是政治的概念,而是语言文 化的概念——从古代的吠陀语,到曾经流 行于犍陀罗地区的犍陀罗语, 以及现在的 乌尔都语、印地语,都在印度文化的概念 之中——尽管在历史上,在漫长的岁月中, 根本没有"印度"作为统一的政治概念的 存在。

我们此行的初衷, 自是出于研究的考 虑,实地考察闻名遐迩的犍陀罗文化遗址, 亲眼得见犍陀罗艺术的渊源与传播,并期 望与当地学者加深学术方面的交流。巴基 斯坦方面为此精心安排,接待周到,从首 都伊斯兰堡到著名古城塔克西拉, 抑或犍 陀罗之乡白沙瓦,每一处献花迎宾,卫兵 守卫,仆从贴心侍奉,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令人着实感受到"巴铁兄弟"对待朋友的真情实意。 考察之后,感动之余,这次 旅程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 思考。

白沙瓦是名副其实的 历史名城,犍陀罗文化的核 心地带。它位于开伯尔山口 东端,是由此山口进入次大 陆后的第一座城市,自古便 引得各方神圣纷至沓来,四 方文明交汇碰撞。经过此地



几天来,一支由五六名年轻帅气的特 警队员组成的护卫队乘坐敞篷拖车,始终 与我们同出入。但我发现,每到一处遗址, 总有新的队伍加入保卫行列。来自北京大 学外国语南亚学系、为此行担任翻译的张 嘉妹副教授解释说,为了保护外宾的人身 安全,巴基斯坦每个省每个地区都会从特警 和军队两个系统派出安保人员随行守护。从 伊斯兰堡到白沙瓦,要先出首都直辖区入旁 遮普省,特警人员换防一次,然后出旁遮普 省入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需要再换防 一次。东道主的待客之道还真是降重。



塔赫特巴希遗址

白沙瓦周边遗址纵横, 仅马尔丹地区 就有11处遗址,是巴基斯坦最丰富的旅游 资源。其中最著名而壮观的要数塔赫特巴 希佛寺遗址。军人已提前封闭了全部景区, 在各制高点安置岗哨,与其说是为了保证 我们一行的安全,不如说是礼仪的展示。 遗址坐落在山脊上, 高处攀爬困难, 有几 处极为危险, 悬崖峭壁就在一尺开外。来 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李肖教授早已不 顾安危,开始了漫山遍野的奔波。他在新 疆工作多年,实地丈量过新疆的许多佛寺 遗址。历史上,以犍陀罗为中心,这一带 曾经对中国影响深远。佛教及其艺术正是 自此地传入中国, 而在其传播过程中, 新 疆地区首当其冲。一直到公元5世纪,南 疆诸多古代王国还在使用贵霜的官方文字 和语言。

借由摄影师的航拍图片,遗址的巍峨 迅速展现在众人面前,即使已是断壁残垣, 昔日辉煌犹然可见。佛塔塔基位于山顶, 寺院的各种功能建筑、密布其间的还愿塔 沿着山势展开。李教授则通过实地踏勘和 丰富的经验,很快确定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院和僧院,哪里是中庭,哪里是讲经堂,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如院、仓、库、廊等等,"堪称犍陀罗寺院的典范,"他如此评价。寺院的入口,门径狭小而隐蔽,完全不同于新疆地区和中原寺院的建筑理念。"将犍陀罗地区、中亚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布局进行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出佛教传播的路径和时代,有些布局元素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化极少,有些则入乡随俗地加入了本地的建筑文化元素。"李

相对于佛寺形制,塑像则能给人带来更直观的印象。尽管岁月变迁,昔日神圣的殿堂早已倾圮颓败,所幸那些来自公元2-3世纪、原本立于庙宇的佛像最终在白沙瓦博物馆得到了庇护——这座建造于1907年的红砂岩建筑据说融合了英式、传统印度式以及伊斯兰的建筑风格,房前浓

教授说。

郁的热带绿植点缀,更加衬托出洁净的意味。犍陀罗地区是自陆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入口,也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来自欧洲、西亚、中亚、南亚的不同文化在此激荡。最终,中亚贵族的面孔和希腊化的雕塑技艺完美地融合在一尊尊佛教造像中,并传播开去,影响至深至远。我们伫立在博物馆橱窗前,尽管陈设简陋,灯光昏暗,但那些出自不同工匠之手、神采各异的雕像,一手一足都令人感动,有些面孔居然雕刻出浅浅的微笑,仿佛在工匠手下,石头竟然也有了慈悲的色彩。

在犍陀罗地区,到处可见多元文明交织的印记。例如西尔卡普遗址,考古探方发掘显示出地面下三米处希腊人修建的下水道,而遗址中希腊人的太阳神庙、贵霜王朝时期残存的佛塔,还有至今仍不明其文明源头的双鹰寺……人类的古老文明在这里交融延续了数世纪之久。



考察团一行与真纳大学师生交流后合影

14

沉醉于巴基斯坦灿烂辉煌的古代艺术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令人感叹。多次来访巴基斯坦的张嘉妹副教授说,因夹杂在东西南北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巴基斯坦命运多好。当我们近看这个国家的现在,不妨越过表层的"保守"感受其历史的包容与多彩;而远观历史,也勿忘现在的苦难与无奈。

这段话发人深省。无论近看还是远观, 首先就要加深彼此的了解, 而此行的震撼 之一, 便是这个因与中国结下深厚情谊的 "铁哥们"于我们似乎就是"灯下黑", 虽然是近邻,但彼此的了解可能还不如远 在天边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喀 喇昆仑山脉的岩画整理项目, 巴方最早是 准备与中方合作的,但最终却由真纳大学 亚洲文明研究所与海德堡大学共同完成。 白沙瓦大学是巴基斯坦建国后最早建立的 大学之一,有近70年的历史。接见我们的 副校长穆罕默徳・阿徳比・汉教授是人工 智能方面的专家,在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一口流利的英语,绅士范 儿十足。令我惊讶的是,中巴友谊已经在 民间流行多年, 但在这友好近邻的第一所 大学竟然没有设立中文系。

当然,最近白沙瓦大学成立了中国中心,是由中国驻巴大使馆援建的。目前仍然是空架子,仅仅拥有一些桌椅板凳和房间,尚未开始正式招生,中心主任希望明年能够开始招收学习中文的本科生。仅此一项,已可以映照出中巴之间,其实十分缺乏文化交流。与在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交谈中,我们意识到,中国与巴基斯坦往来,更多注重经济投入,而严重忽略文化交流方面的投入。作为学者,我们感觉学术界

尤其是北大,对于南亚、对于巴基斯坦的 了解还十分欠缺。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一日,我们参观了首都伊斯兰堡的费萨尔清真寺,这是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20多万人同时礼拜。需要指出的是,这所清真寺是由沙特国王出资建设的,这是最深层面的文化输出、精神输出。巴基斯坦的现有人口据说已经超过2亿,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影响深远,即使当下,仍然是现代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大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科目的大学,仍在吸纳来自中国西部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是否能在友邦的百姓心目中留下更多呢?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华夏地理》 2018年8月刊。)



# 朱玉麒、姚崇新、荣新江 | 2008 年和田考察 行程日志



###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

早晨7:30起床,为赶时间,我们没等饭堂开饭,在房间吃方便面为早餐。8:30出发,经沙漠公路前往民丰。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连通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之314、315国道,修建过程中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其中沙漠段长466公里。

从轮南镇出发,沿沙漠公路南行,先 有胡杨林,灌木稍多。车队不久即到塔里木 河大桥,大桥连接塔里木河南北两岸,气势 恢宏。塔里木河已为冰雪覆盖,远远望去, 犹如一条银色的巨龙自西向东逶迤而去。车 队在此稍停片刻,队员们在桥头合影留念。 过塔里木河以后,即进入巴州尉犁县境内。 塔里木河南岸地带为塔里木胡杨林自然保护 区,丛丛胡杨银装素裹,车队在晨雾中穿行 其间,宛若漫游仙境。继续向南,渐入纯沙 地带,积雪渐厚,胡杨渐少,但公路两侧一 直伴有人工培植的用于防风固沙的红柳带, 披上银装后也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13:00,车行到达沙漠公路335公里 处,有塔中休息站,该站点位于巴州且末县 境内,自此东南向行,经塔中1号油田,



考察队在民丰县博物馆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交流, 左起: 张化杰、史燕、丁兰兰、李肖、广中智之、荣新江、卡斯木

有一条沙漠公路支线与东西横穿且末的 315 国道连接,称为且塔沙漠公路,全长约 140 公里。我们在塔中休息站的沙漠餐厅吃午饭。 没想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还有城 镇,还能吃到热乎乎的拉条子、炒面片。

13:45,车队沿沙漠公路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行,不久进入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境内。雪较大,遍地皆白,沙山起伏已经看不真切,只能依稀于白茫茫一片中辨其轮廓。在离开沙漠地带前,我们又在一处高大沙丘前停下,望一望塔克拉玛干,触一触白雪覆盖的沙丘。从塔中行驶236公里,到达沙漠公路与315国道的连接处——沙漠公路在民丰县城东北与315国道连接,沙漠公路至此结束。和田地区文物局张化杰局长、和田博物馆/地区文物局卡斯木先生和策勒县文管所所长史燕女士一行已先期在沙漠公路出口处迎候,一起驱车经过尼雅河,进入民丰县城,民丰街头亦有雪,而天色湛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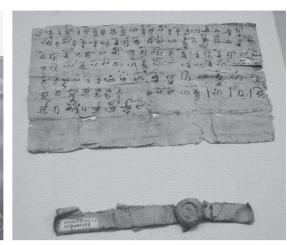
16:50-17:15,考察队在和田地区 文物局一行的陪同下,在民丰县博物馆参观。 博物馆陈设简陋,陈列也不太丰富,但陈列 品中有尼雅出土佉卢文木牍一,有字7行, 有木片三,文字各3、3、4行,值得注意。 另有戒指二枚、汉镜残片、耳环、茶叶(?)、 陶罐(上有刻划符号)等。又有很粗大的雕刻木柱,上有火烧痕迹,据说是安迪尔廷木 (方城)东一公里道孜勒克所出土(同时出土两件,另一件在和田地区博物馆)。陈列中还有夏央达克圆形城的照片。这一方、一圆两城,就是1986年荣新江随张广达先生 考察时去过的遗址。而方城(廷木)旁佛塔的前面,1998年 C. Baumer等人见到的佉 卢文碑铭,据当时在场的卡斯木讲,现在已 入藏和田地区文管所,与邵瑞琪(Richard Salomon)文章所说正符[5]。

参观结束后,车队继续沿315国道西行,横穿于田、策勒二县,于晚20:30抵达和田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和田市,下榻和田市广场西侧之玉都大酒店。21:45,和田地区文物局在酒店二楼宴请考察团。和田地区自18日以来一直有雪,今日气温下降至-18℃,平常则最冷亦仅-14℃。

和田地区是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和田 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现辖一市七县: 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 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全区总人口约 170余万,以维吾尔族为主。地势南高北低: 南倚雄伟的昆仑山脉, 危峰耸立; 北接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沙海茫茫。境内水资源丰富, 有和田河(其上游一分为二,分别称为玉龙 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 吐兰胡加河、安迪尔河等大小河流 36条。 所有河流皆源于昆仑山脉, 向北流向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河流滋养 了和田绿洲, 同时也造就了和田地区辉煌的 古代文明。和田地区是丝路南道古代文化遗 存最为丰富的地区, 蜚声中外的著名遗址有 多处,如安迪尔古城遗址、尼雅遗址、热瓦 克佛寺遗址、牛头山佛寺遗址、约特干古城 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达玛沟佛寺遗址、 麻札塔格戍堡遗址、阿萨城堡遗址、圆沙古 城遗址以及山普拉古墓群等。而且由于该地 区为古代佛国于阗所在地, 丝路南道的古代 佛教文化艺术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因此, 该地区成为上世纪初期国外西域探险队考察 的重点区域之一。先后来到和田地区考古探 险的国外探险家有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干阗语契约文书(和田博物馆藏)

Hedin),英国的斯坦因(Aurel Stein), 日本的堀贤雄、渡边哲信、橘瑞超,德国的 弗兰克(A. H. Francke)、特灵克勒(E. Trinkler)等。其中尤以斯坦因收获最大, 他先后四次到和田从事考古探险活动,前三 次均满载而归。他所编著的考古报告《古代 和田》[6]、《西域考古图记》[7] 和《亚洲 腹地》[8],已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和田 的必读文献。解放以后,和田地区的考古工 作陆续有一些收获。由于时间有限,未来几 天中我们只能有选择地考察部分遗址。

今日车行在700公里以上。

###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

晨起,在酒店二楼用早餐。10:30, 车队出发,前往和田地区博物馆参观。

和田博物馆于 2000 年以后新建,外形颇具伊斯兰建筑风格,内部干净整洁。藏品中多为和田地区各县市民丰、于田、策勒、洛浦、和田市、墨玉、皮山等地零散出土文物,以和田地区古代佛寺遗址出土的佛教壁

画残片、泥塑佛像居多。其中有喀孜那克出土泥塑佛头两件,墨玉库木拉巴特(Kum Rabat)出土莲花坐佛、石膏像、飞天、供养天人塑像、化佛像等。又有墨玉喀尔赛(Kara Say)出立佛像。贾应逸撰文之小册子《于阗》发表其中精品。又达玛沟发现有梵文题记之铜佛像,最近金申又有文章讨论。我们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文字资料,目前博物馆没有收藏唐代汉文或汉文于阗文之双语文献,但陆续入藏的于阗文材料有4件,1件完整,3件残片。承蒙馆方好意,馆藏文物均允许拍照(库房中的资料,请丁和、朱玉麒拍摄)。其中的一件较为完整的于阗语契约,我们后来转交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加以解读,现已完稿,即将发表。

询问馆方邵瑞琪(R. Salomon)《新疆安迪尔发现的一件中亚犍陀罗语石碑铭文》所刊安迪尔出佉卢文碑铭,馆方即从库房取出,并非石碑,实系两块泥板,为河床上长期沉积形成的泥板,其上书写佉卢文数行,与邵瑞琪所刊 Baumer 所摄照片基本相

同,但要清楚许多。据卡斯木说,1998年他陪 Baumer 一行到安迪尔道孜勒克故城旁佛塔前,发现此二泥板,Baumer 偷拍,所以没有照清楚。据邵瑞琪的翻译,内容是鄯善王 An(m?)goka 王时代之行政诏令,所存文字主要是王的一长串称号。荣新江把带在身边的邵瑞琪论文和施杰我(P.O. Skjærvø)关于于阗语木板文书的论文复印件送给和田博物馆。

还有一件出土于和田县布盖依乌里克 的陶片上有文字,似是佉卢文,标签上写"汉 代"。此外,博物馆还藏有佉卢文、藏文文 献若干件。

离开博物馆时,张局长为吐鲁番新博物馆落成赠送和田石一块。

12:10 离开博物馆,前往和田市西 南 26 公里处的阔库玛日木石窟遗址考察。 贵址在拉依喀乡南部之阔库玛日木山(库玛 尔山)上、喀拉喀什河东岸,河东岸为悬崖 峭壁, 崖面有石龛残迹, 据考证为古干阗 佛教圣地牛角山寺所在。所谓石窟,其实 只是一个石室。据斯坦因的记录,此地名 Kohmari, 当时据称法国人杜特雷伊·德·兰 斯(Dutreuil de Rhins)、费·格瑞纳尔(F. Grenard) 在和田地区购买的写在桦树皮上 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就出自该石室, 但斯 坦因的考察结果对此没有给予肯定。荣新江 记得 1983 年来访时, 石室前只有一间房子, 石室的木梯和斯坦因的照片没有区别, 但现 在已经大变样了,房屋增加许多,梯子也变 成石砌的了,石室内的洞穴只有三五米长。 石室分上下两层,下层可容五六人,下层顶 部有一暗洞与上层相连, 暗洞大小仅可容一 人爬入, 有人工垒砌的阶梯替代以前的木梯

连接暗洞口与下层地面。上层石室更显局促, 仅可容二三人。石室壁面及暗洞口均不见明 显的人工开凿痕迹,而且石室的形状也不规 则,因疑此石室实系天然洞穴,后被佛教徒 加以利用,但并没怎么改变形状。因而此石 室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佛教石窟。

13:30返城途中,路经布扎克村伊玛木·木沙·卡孜木麻扎,此地曾出土彩棺,出土有汉文、于阗文(背)题记之绢布,布上一面用汉文写"夫人信附 男宰相李枉儿",另一面用草体婆罗迷文字写dītsaisyāmhīye"李宰相的东西",据此或许即李枉儿墓,又出土有棕地摩尼宝珠纹锦等。关于此彩棺,李吟屏、小山满、米泽雅美都有文章,但角度不同。带于阗文题记的织物不在这里,原在吐鲁番苏公塔展览,但目前陈列品已经全部装箱,不知是否可以拍到。

14:00-14:50,在城中楼兰餐厅吃抓饭。这是一间很有风味的维吾尔族餐馆,可惜没有人拍下那位收款的伊朗风的姑娘。

下午 16 : 40,前往玉石巴扎考察,其 地在城东之加买路上,有加满清真寺。巴扎 上人山人海,主要都是交易玉石,据说更多 的是当地人自己交易,价格不比其他地方便 宜。绝大多数为成年男子和年轻的巴郎,他 们相互簇拥在一起,手中拿着几块玉石,彼 此不停地讨价还价,人声鼎沸。此情此景, 不难想见古代丝路集市的贸易场景。

18:00,前往城西11公里处的约特干(Yotkan)遗址考察。遗址在巴格其乡艾格拉曼村境内,自1892年法国杜特雷伊·德·兰斯与格瑞纳尔考察以来,就一直为各国学者所关注,普遍认为这里是汉至宋代的干阗国都,也有人认为是佛寺遗址,或

者坟院。因历年的破坏与积雪掩埋,已经难以看到当年的盛况。遗址现在都是农田,还种了许多树木,使得景观已经改变很多。因为有雪,连那条冲文物的掏宝河渠也已经不够清晰了。文物几乎已经被掏净,所以挖宝人已经不来这里,都去和田河挖玉去了。

考察队在阿不利木翻译下,和当地人交谈,了解到此地名约特干(Yotkan),约特是"故乡"的意思,"干"即可汗,意谓"皇帝住过的地方";最早叫"布尔藏",或作"博拉庄",后叫约特干,再阿尔顿雅尔,现在叫艾尔纳曼。

20:00,回到城郊之玫瑰花烤肉店吃晚饭。下午以后的活动,因为张化杰局

长前往洛阳出差,主要由和田地区文物局的卡斯木先生陪同考察(司机白克力)。 21:30,即回到酒店休息。

晚,荣新江和朱玉麒、姚崇新等一起拜访和田地区文物局已经退休的于阗 史专家李吟屏先生。他很健谈,说到许 多和田文博掌故,但不久即将前往山东 定居。

今天上午,接李军短信,告知自治区博 物馆资深研究馆员、著名的新疆考古学家吴 震先生于昨晚去世。回信敬悼。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西域文史》 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 罗丰 | 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蒙古国纪行



### 阙特勤墓地

车开了十多分钟,来到距离仓库不到1公里的阙特勤墓地,这时时钟指向11点40分。墓地被一圈绿色的铁栅栏围起。入口处竖立着一块不锈钢的牌子,牌子上端印有蒙古与土耳其国旗,用蒙、土、英三种文字介绍墓地的情况。具体地点,北纬47°33′836″,东经102°49′914″,海拔189米,与仓库的高程差不多。

《 阙特勤碑》竖立在一块不大的方形 碑座上,碑座长 159 厘米,宽 112 厘米,高度不详,凸出地面约十几厘米。石碑青石质,高 327 厘米,宽 132 厘米,左侧厚 46 厘米,右侧厚 45 厘米。碑的边角切削过,形成倒角,倒角处也刻满鲁尼文。

碑的正面朝东,碑额与碑身一体雕凿 而成,碑额为两螭龙相对,不过左侧缺一角, 为雷击所致。阙特勤碑原本矗立于原野, 宣统三年(1911)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 虑其无保护设施, 便仿照中原习惯, 建一 碑亭保护, 谁知旷野上的建筑便成了雷击 的目标。石碑的西北角曹雷击损坏, 从被 击的部位判断, 雷电来自西北方向。如果 毗伽可汗碑也是这样面东而立, 背面汉文 所遭受的侵蚀就可以理解了,蒙古通常的 主导风向是西北风,风蚀、雨淋、

雷电击损, 断为三截的毗伽可汗碑, 在这 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

阙特勤碑保存情况要好得多, 碑额中 央两行六个楷书大字"故阙特勤之碑", 碑文用隶书, 共有12行, 满行36字。 碑文并没有满布碑石, 甚至给后来者留 下很大空间, 碑文末有一行隶书小字"宣 统三年(1911)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 护之"。文末年号楷书"大唐开元廿年 岁次千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其 中"七"字或已模糊不清。碑边线刻蔓 枝花纹。

阙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去世后, 应毗伽可汗的请求, 唐玄宗派出唐朝丁匠 建造墓地、祠堂、雕刻了阙特勤像、并亲 自撰写碑文。《新唐书・突厥传》记载了 这件事:

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 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 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 其国以为未尝有。

《阙特勤碑》的鲁尼文部分也有记录: 中国可汗给我派来自己的宫廷画师。我嘱 咐他们迅速地建好专祠。我命令他们在里 外墙上饰以雕琢,竖立石碑。

阙特勒死后, 毗伽可汗亲自为他的弟 弟撰写了鲁尼文的碑文。所以在碑文中才 有"我嘱咐他们""我命令他们"的词句。 鲁尼文的碑文写满了碑的左右及后面,在 侧面倒角处也写有碑文。

突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像阙特勤 这样的英雄, 突厥人注意他所经历的每次战 斗,带有文学色彩地详尽描述一些细节:

他用箭射死一人, 并追杀两人。当他 进击时, 折断了拔野古儿白马的大腿。 阙 特勤在那次战役时三十岁。他骑英雄ŠlcÏ 的白马冲击。他连续刺杀二人、我们杀死、 征服了葛逻禄。

碑文不厌其烦地描述突厥英雄在战斗中的 英勇、甚至多次提到他所骑骏马的颜色、名字。 当然,英雄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并引以为豪。

唐玄宗御撰碑文并派大臣、丁匠, 在 碑文中深情地写道:

可汗, 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 既在 敦崇, 兄弟之亲, 得无边类, 俱为子爱, 再感深情, 是用故制作丰碑, 发挥遐微, 使之千古之下, 休光日新。

认为他们会"以亲我有唐也"。可是, 毗伽可汗的碑文对唐人友谊却警惕地说:

虽然我们与唐朝建立了关系,他们慷 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 唐人的话语甜蜜, 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 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 民靠近他们。

他们心怀恶意, 不让真正英明的人、 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

鲁尼文也是阙特勤的侄子药利特勤写 的,据他说,书写碑文及墙上的全部文字 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唐朝工匠镌刻了汉文、 鲁尼文的碑文, 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明白突 厥人对唐人憎恶,虽然突厥人是明白表露, 并由唐人亲自镌刻干碑上。

《阙特勤碑》深受晚清民国文人重视、 日前,在读一本书法书时,看到乌里雅苏台 参赞大臣志锐曾经给清宗室盛昱写过一封 信,信中提及《阙特勤碑》拓制拓本的艰辛:

《阙特勤碑》距古和林尚五六百里, 地名哲里梦。碑已倾覆于地,集蒙人扶起之, 大费厥事, 喜碑文尚少损坏。距乌里雅苏 台二千余里、派人足三阅月始归来。惟天 寒风劲,纸墨俱不合式,拓得数本,尚有 不真者, 检较真者一本奉寄清斋, 以供珍赏, 可谓不负委任矣。

我们并不知道唐朝工匠在营建阙特勤墓 时的参与程度,但从来人身份分析,主要是 突厥稀缺的精干绘画、雕刻的工匠。墓葬的 整个布局可能是按照突厥人的传统来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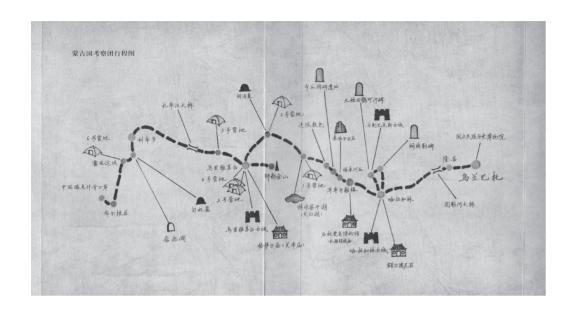
阙特勤卒于731年2月27日、阙特 勤碑于732年8月1日竖立,祠堂在733 年底才竣工。1957年、捷克考古学家主持 了蒙古一捷克联合考古队对阙特勤墓的考 古调查与发掘,虽然这项工作未能圆满完 成,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入口处到 祠堂有一条道路, 道路两旁有石像。至发 掘时,保存下来的石像共有四个,三男一



阙特勤碑

女。往后是一座庭院建筑,墙壁上有壁画, 台基上共有十六根立柱, 支撑着大殿。大 殿内发现阙特勤和夫人坐像残断, 显然是 唐人工匠的作品。祠堂的西侧有一块巨型 花岗岩。现在这块花岗岩石呈长方形,长 220、217 厘米、宽 177、173 厘米、中间 凸起,有一空洞,直径约有68厘米。这块 巨型石块,可能是祭坛,原来应该是方形, 后被破坏, 残块垒放在旁边。

整个墓地由建筑群组成, 阙特勤碑占 据墓地中央。墓地坐西向东, 东边入口处, 最前面竖立着两个雕刻粗糙的石人, 接着 向东有两个石羊, 再向东有两排列石, 每 排有十余块。向后中央有一排列石,或许 就是文献中所谓的"杀人石",据统计有 169 块。过去日本学者林俊雄说原本有上 千个以上,现在仅存这些。每个石块之间 约有3米,很明显有出入,原有上千块的 推测可能有问题,是否被人搬动过,现在 也无从查证。



突厥人嗜杀并以此为荣,最后的结果, 是要在死后统计平生所杀敌人的数量,将 杀敌人数用一种形式固定在墓葬前面。《周 书,突厥传》记录突厥人风俗时专门提到 这一点, "葬讫, 于墓所立石建标, 其石 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北史·突厥传》 也说, 杀一人, 则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 这种以杀人数量在墓前标志的做法, 使人 们很容易地与突厥墓前纵列的石块联系起 来,石块多少则依平生杀人数量。

突厥人杀戮的对象似乎有特定目标, 地位愈高,产生的荣耀愈大,他们会津津 乐道。突厥语中杀人石被称作"Balbal", 敌营中的勇士被杀,才能被立作杀人石, 杀死普通人并不能作杀人石。《毗伽可汗碑》 称: 毗伽可汗"我斩其勇士当作杀人石"。 并说"为纪念我父可汗,首先把边兹( baz)可汗立作杀人石(balbal)"。黠戛 可汗, 唐朝的郭(Qugh)将军, 都被毗

伽可汗立为杀人石。杀人石并不只是自己 的杀敌纪录, 也可将自己所杀之敌制造成 杀人石, 贡献给特定对象。

(本文节选自罗丰《蒙古国纪行: 从乌兰 巴托到阿尔泰山》,三联书店2019年10月。)



# (七)线上雅集



### 【编者按】

作为"静园雅集"的延伸、"线上雅集"栏目邀约海内外学者讨论中西多文明传统中 的艺术、人文修养和技艺问题。本期收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系列文章《塔缪 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的第二篇《驯养与信仰——从在"林间"到"在人间"》。 同时收录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的《书斋内外的钱钟书》及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历史上的杀虎口》的文章节选。



# 贾妍 | 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二)



# 驯养与信仰——从在"林间"到"在 人间"

在第二篇文章中, 贾妍老师发问"古 埃及人为何如此爱猫",指出对于生活在 五千年前的埃及人而言,这一问题构成了 一个必须直面自然与内心的严肃而实际的 选择,一个需要在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两 个层面付诸实践的承诺:一方面,需要将 四野逡巡的野猫召到家宅之内, 调教为可 以"缱绻依人"的"狸奴",来做它们的 主人:另一方面,则要在世间千万只或在 野、或在堂的猫咪之上抽象出一个精神领 袖,将其捧上神坛,并以之为"主人", 前者谓之"驯养",后者奉之为"信仰"。

谈及"驯养",古埃及人是最早尝试 驯养猫的民族之一, 而现有考古发现表明, 公元前2500年以前的埃及遗存中,极少 能找到猫的影子,彼时的埃及猫还没能达 到可以与人和谐共居的程度。猫最早出现 在埃及艺术中,是在古王国中后期。从第 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前2345年) 起,视觉材料中零星可见猫的形象,而可 能原属于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年-前 2181 年)的浮雕"三猫图",是猫在 埃及文物中留下的最早的印迹之一。根据



"猫斩蛇", Inherkhau 墓 (TT359) 中的彩绘壁画

牛津大学埃及学家马莱克教授(Jaromír Málek)的解释,猫的形象在此为象形文 字铭文的一部分,三猫叠写表示复数,与 其他符号连起来,一并读作"猫城之主" ("Lord of Cats' Town"), 标注着猫 下方可能为男性神祗的人物身份。由此 推论,这三只猫不仅是埃及猫最早的图 像证据之一, 也是它们在象形文字中最 早的出处所在。而顺着"驯养"的话题、 贾妍老师关注到三只猫颈间隐约可见的 "项圈"痕迹,认为这种人为添加的饰 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对猫的所有 权与控制力,或可作为"驯养"的旁证, 但从整体看来, 古王国时期与猫相关的 材料仍太稀少零散,很难以个别例子对 这一时期埃及人驯养猫的范围与程度做 出准确推断。

进入到中王国以后, 猫在埃及的文献 文物中出现的频率增加,但"野性"难掩。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除了前一篇章提及 的"分"型石罐猫外, 贾妍老师细致分析 了本尼哈桑 (Beni Hasan) 洪努霍太普 二世 (Khnumhotep II) 墓壁画中"沼从 间的猫"和巴凯特三世(Baket III)墓壁 画中的"猫鼠对峙图"两幅图像,梳理该 时期猫与人之间的关系。"沼从间的猫" 中,人与猫共处于同一场景却又各行其是, 二者之间没有可见的互动与可察的情感系 联;猫被归于"自然"世界一边,与墓主 个别的"人生"关系尚远,但猫的出现也 足够表明其已成为埃及人对自然认知的重 要部分。而在"猫鼠对峙图"中、猫已脱 离其野外生存的大环境,处在图带中最贴 近人的位置,顺循人的视线,专门与鼠相 对而立,画面中"人→猫→←鼠"三者的站位、方向与姿态传达出猫"为人御鼠"的作用,符合现代人对于"家猫"基本职能的期待。

新王国(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 以后, 猫的形象形貌愈发丰富多样, 它们 也开始频繁出现于居室之内, 以人亲密接 触,呈现出"宠物"特质,而同时,已成 寻常的"家猫"们未被局限干家宅之内, 仍不时现身干户外场景之中, 展现野性灵 动的天性。以内巴蒙墓室壁画"家猫捕禽 图"为例, 贾妍老师分析指出, 其描绘的 主题可视为自古王国晚期以降埃及墓葬装 饰中"渔猎"主题的延续,而其表现的猫 的形象,相比中王国时期而言,有三点不 同之处,显示了新王国时期埃及人与猫在 "驯养"关系上的推进。其一, 在形象塑 造上, 内巴蒙壁画中的猫放弃刻板的" & "型范式,姿态自然舒展、轻盈跳脱,而 猫身上不见"野猫"的凶悍, 却也全无"家 猫"的依人之举,神态温和灵动、恣意狡黠。 其二,在空间站位上,相比于中王国时期 偏栖沼丛一隅、与人全无互动的"冷脸", 新王国时期内巴蒙壁画中的猫已完全跃入 画面中心, 从小舟之外的"林间"移步于 小舟之内的"人间",与主人及其妻女形 成环绕呼应式的布局, 而舟内典型完满的 "家庭空间"又与舟外和谐的"自然空间" 两相交融,构成埃及人理想中秩序井然的 世界, 也成为他们来世期许中的图景。其 三,在角色功能上,内巴蒙捕禽图中的猫, 在进入"人的世界"的同时,也被埃及人 纳入其图像象征体系中,是人嬉戏的伴侣, 也是破乱的助力,在生活与信仰两端扮演 着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秩序守护者"的象征性职能,带有斩妖除恶、与日神相关联的神圣属性。

同顾古王国到新王国艺术中的猫,从 存在性的符号到后来与人为伴的爱宠, 埃 及猫一步步走近、直至走进人的生活,并 最终登堂入室,与人类开始"同居时代"。 这一漫长的"驯养"过程,在生物学上, 一般以物种的最终"驯化"为结果,且须 以基因线索为证据,而埃及猫是干何时完 成"驯化"的,仍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空间 的问题。贾妍老师认为,埃及猫"驯化" 的时间点之所以难以推定,根本原因在于 埃及人从未将猫的"驯化"作为"驯养" 它们的终极, 埃及人养猫并非以"驯化" 为目标,而猫之所以可以被人养,也不是 以"驯化"为前提。具体而言,有关基因 与 DNA 比较研究表明, "家猫"进化的 过程更像是"自主选择、自我驯化"的结 果. 人与猫的关系, 也更像是一种契约关 系,涉及人与猫在互惠互爱的前提下,各 自生活习性的自主磨合与改变。同时,从 人的角度来讲, 猫本身的野性与灵性一直 是埃及人最为喜爱与欣赏的特质, 因而在 驯养猫的过程中,埃及人非但不着意改变, 甚至有意保护这些野性的特质, 尊重猫的 "野性": 在称呼与日常养育中, 表现为 不对家猫与野猫特意区分、统一称作"缪" (mjw,读音miu,象形文字写作 题》); 投射干神话中, 猫被持续塑造为可以驱邪 祟、战恶魔的保护性形象;而反映在艺术 中,则是始终未放弃将猫"郊野捕手"的 面向呈现出来。在篇章的结尾, 贾妍老师 总结认为, 古代埃及的猫在形象、性格、

基因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些"野性未驯"的因素,而这种游走于宅野之间、不倚于人的做派与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埃及猫的独特品貌,一直绵续至后期埃及的艺术中。

### 从"助生灵"到"护亡灵"

延续前文对于"驯养"的讨论,贾妍老师指出,"驯养"是一种彼此之间的需要,埃及人养猫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为猫所"养"的过程:从生活中对猫的依赖,到情感上的依恋,再到精神上的诉求,埃及人将人与猫之间"双向的驯养"上升到无可企及的高度,甚至形成一种全民信仰。而在这一篇章中,贾妍老师着重讨论埃及人对于猫的"驯养"与"信仰",梳理埃及人将"猫"纳入世俗生活与信仰体系的进程与脉络。

贾妍老师认为,埃及人对于猫的"驯养"的契机,最初是从实际生活层面做出的人猫互惠的选择,与古代埃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系统紧密相关。在"新石器时代革命"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型"社会模式中,面对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蛇、鼠、雀等侵扰古代埃及人安稳生活的敌人,人们有意地吸引猫来到人聚居的城市与村庄探访,使猫获得食物、避免其他动物侵扰,而于人而言,养猫可以护仓廪、安家宅、宜出行。猫与人的"同居",建立在这种各得其所的共生关系基础上,而在彼此感情的培养上,埃及人也走得更远,一路走到"信仰"的一端。

进一步分析埃及猫进入古埃及人宗教生活中的"形"与"像",贾妍老师指出,

在现今所存的古埃及神话中, 猫主要以作 为神的"本身"(即神本来的样子)与"变 身"(即神变化之后的样子)两种方式与 神产生关联,而两种方式都与日神拉(Ra) 直接相关。以猫为"本身"的神主要是作 为拉神女儿的"猫女神"贝斯特,而以猫 为"变身"的神中流传最广、给予埃及"猫 信仰"最大权重的是拉神变幻为"赫里奥 波利斯大猫"的故事。在太阳崇拜根深蒂 固的埃及, 日神拉在每天地下夜航中, 都 会面临来自蛇的考验,黎明来临之前须与 巨蛇阿普菲斯 (Apophis) 一较高下, 而 深谙万物"相生相克"的埃及人, 让拉神 变身为一只神勇的猫,利用猫夜间可以辨 物、作为蛇的天敌的属性,与巨蛇战斗, 使得变身为"赫里奥波利斯大猫"的拉神 总能如愿赢得胜利, 重获新生。在助死者 顺利通过冥府审判的《亡灵书》中曾记载 拉神变身"大猫"战胜巨蛇的故事,这一 变身不仅入其形,还发其"声"、留其"名", 生动而有"灵性"。而《亡灵书》是埃及 人关于死亡与来世的宗教文献集成,在人 度过"生死之阈"的过程中,《广灵书》 构成一种知识汇编,助力死者实现重生之 愿。在埃及人的想象中, 广灵在墓葬中通 向冥神奥西里斯 (Osiris) 审判法庭的路 途,与拉神夜航之旅类似,均需面对巨蛇 之患。而变身为猫的太阳神, 在战胜巨蛇 的过程中, 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又保全 了亡灵的安稳。

《亡灵书》中"猫斩蛇"的故事,作为墓葬装饰中常用的母题与题材,其视觉表达具有三个标志性"图像志"特征:其一,猫的形象常被刻画为一只棕皮花斑的

长耳公猫,作为"猫-驴"合体,带有图 像与文字语义双关的意义; 其二, 猫"斩" 蛇的动作,常运用"≤"来传达,带有 "保护"与"惩戒"双重含义, 血溅刀锋、 巨蛇死而日(人)复生,图文一体;其三,"蛇 "的身体常盘成地平线(" ⊙ ", Aht) 上"双子峰"的形态,有太阳顺利从东方 升起的寓意, 而画面中常与蛇相伴出现的 象征太阳的"艾谢德树"(埃及语 išd, 也 叫"太阳树"), 也强化了这种图像意涵。 尽管日神拉所变身的"大猫"与巨蛇相对 的题材,有时会以更加晦涩难懂的形式反 映在图像中, 但猫与蛇相对的存在, 仍有 "猫蛇大战"的影子, 而贾妍老师在此猜测, 猫在此处出现,也是作为日神拉的化身, 起到驱邪镇恶、护佑重生的作用。

除了以"全动物"形态呈现、以突出 "猫"面对暗夜强敌时的"捕手"特长外, 日神半人半猫的形象在古埃及墓葬中也偶 有出现,如图坦卡蒙木椁上的猫首人身的 "木乃伊化"形象,可能影射了古埃及丧葬文学《笃阿特书》(Amduat)中日神在冥府穿行时依次变幻的形象,而猫是其第七种变身。而日神变身为"猫"的情节,还出现在另一丧葬文书《拉神祷文》(Litany of Ra)拉神诸多变换中的两处以"缪"(mjw)为"名"、以"猫"为"形"。日神拉在夜间/冥府的七十五般变化,或与太阳本身瞬息万变的"法力"相关,也是日光之下造化神工"现形"的诸面。贾妍老师认为,这些"变身"对于日神"本身"来讲",既可谓之"因",亦可为之"果"。

日神变身为"猫",是拉神步人凡尘的一小步,却是猫飞升为"神"的一大步。而谈及埃及猫的"飞升"缘何开始的问题,贾妍老师认为,"拉变猫"这一关键性神话事件投影于现实的时间点确定既重要却又难以考证,属于古埃及宗教生活中"秘而不宣"的部分,那些置于墓中、护佑死者的咒语祷文,皆是以自身的"不见天日"



丛间觅食的猫浮雕细部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张薇博士摄)

求取亡灵的"重见天日"的。具体分析而 言,现有文献材料已表明自中王国发端(公 元前 2055 年) 拉神已经完成了"猫"的 变身, 而视觉材料中现存最早有着明显宗 教指向性的"猫"图像, 也大致出现在中 王国开始以后。贾妍老师通过分析神话中 "拉变猫"这一关键事件, 梳理了埃及猫 从自然世界走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契机与方 式,认为尽管本篇引用进行图像学分析的 材料主要来自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 纪-11世纪),但零散的文本与视觉证据 可将猫"飞升为神"的时间点向前推至公 元前 2000 年前后的中王国开端, 进而指 出在"信仰"层面,这是猫从"人间"开 始进入"人心"的时期,在"驯养"层面, 这也是猫从"林间"慢慢步入"人间"的 起点。埃及人将"猫"纳入世俗生活与信 仰体系几乎是同步的进程, "圣"与"俗" 于埃及人而言,是一体两面。贾妍老师分 析认为, 古埃及人能够在猫眼中看到日光, 在猫捕蛇的天性中找到破乱重生的希望, 与中国十人能在微盆小景中看到宇宙万象 或为同样的道理。这是一种充满"宗教感" 的自然体验, 在所谓的"科学(去圣化) 时代"到来之前,构成人类面对自然的一种 普遍情绪,而这种情绪对于被希罗多德称之 为"宗教感过剩"的埃及人来说,几乎就等 同于生活本身。回应篇章开头所提及的"猫 信仰", 贾妍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埃 及人并非奉猫为神,而是信奉神在猫身的"显 现",埃及猫的"圣"与"俗",仅在神的 "一现之间", 亦在人的"一念之间"。

(整理:章涵青)

# 张治 | 书斋内外的钱锺书



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治应邀为 "线上雅集"专栏特别撰稿,推出主题为"书 斋内外的钱锺书"的系列文章。张治老师 从多重角度切入剖析, 分享其近年研究钱 锺书先生著作和丰稿集的收获, 关照钱锺 书的阅读世界与身处时代的联系, 思考动 荡艰难岁月中读书的作为,并在对于文本

的梳理解读中,洞见钱锺书先生的治学精 神与批判态度,体味读书人的美德与操守。

以钱锺书最有名的文学作品、长篇小 说《围城》起谈、张治老师在"《围城》 题下的阅读史"中追问题目"围城"所包 含的意象何以成为钱锺书先生写小说的一 个主题, 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他认为, 需 要了解他所外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读 书与思考的书斋世界里的内容。讨论到"围 城"何为,回顾钱锺书先生的阅读史,张 治老师指出,一方面,"围城"之象反映 着现实的世界,长久地在钱锺书的战时生 活中深入其心灵脑海:另一方面,"围城" 之题也包涵着丰富深邃的诗文典故, 其笔 下的战争语境与伟大的文学传统发生奇妙 的连接。例如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多 处采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与思想,荷马笔 下的"围城"在其构思小说前后阶段起到 积极的提示作用; 他吸收运用欧美作家将 荷马史诗与现代世界接通的手法, 并从比 喻的层次上进行深化,将"围在城里的人 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的状态适 用于爱情婚姻与事业人生。钱锺书先生回 国后十年在"城中人"与"城外人"之间 游离,逐渐形塑出其游走干内外的批判态 度, 而他笔下的"围城", 也映射出人生 中处处可现的两难选择。

在第二篇"《谈艺录》的'补注'体" 中, 张冶副教授注重分析钱先生在书斋中 的"补注"与治学精神,指出"补注"体 为给前人已成规模的注本进行补充修订的 工作,而其著作《谈艺录》的重要目标就 是要给几种古代大诗人的权威注本进行补 充和修订。钱锺书先生大学时读到任渊所 注的黄庭坚与陈师道, 开始逐渐体会到宗 派与形式上的差别, 乃至语言与文化的疆 域都不能阻隔文学构思里的互通之处,这 番体悟也是《谈艺录》一书的核心主题。 而谈及补注与补笺的差异,钱先生认为"注" 忠实于对原诗构思源泉的解释,是往上追 述的, 而"笺"则更加重视诗歌的本事, 是往下书写的。执着于"往上追述",他



写著《黄山谷诗补注》并不断增补, 其支 撑力远不仅是彼时的"年轻气盛", 更来 源于知难而上的态度。而钱先生对于"补 注"的执着,还体现在他对于陆游、王安石、 元好问等人诗集的补注中。他不断"攻坚", 修订、纠错、补正历来作为荆公诗权威注 本的南宋李壁《笺注》,并批评施国祁《元 遗山诗笺注》轻视诗学为注诗的大忌,认 为诗歌词章的因袭,如果进行考订,必是 会作诗且深谙其三昧的人才做得来。在篇 章的结尾,张治老师引用钱锺书父亲钱基 博的庭训之言"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 功",认为"窥隙攻难"要义在于重点难 点问题上下功夫、解决"谈何容易"的问题, 而钱锺书先生心目中的补注体著作, 应为 窥隙攻难、知难而上,克服前人未竟的事业,

这不仅是学术精神, 亦是人格道德。

在"钱锺书对干胡适文章'八事'的 批评"中、张治老师关注钱锺书先生对于 五四白话文学革命宣言、胡适的《文学改 良刍议》(简称为"文章八事")的批评, 认为其与过去学者对胡适的批评不同之处 在于,并未站在白话文学合法地位的基础 上加以论述, 而是借用他所擅长的中西汇 通的方式, 深入理解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固 有传统,继而提出不拘语体新旧的文学发 展思路。具体分析而言,面对胡适提出的"不 摹仿古人",钱锺书认为形成现代的因子, 早潜伏在过去的时代中, 而过去也时时刻 刻在变换,揭示随着当下境遇的变化,人 们的认识与过去的关系也会不断变化,现 代社会的发展并非脱离了传统的自由发展, 进而认为应在时间上、地域上与问题上"打 通",一代又一代之文学,并不妨碍不同 形式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学习。在用典方面,

钱锺书认为胡适所提的"不用典"预设了 作者是才力不济、眼前之事道不出而用典, 但用典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 以类比推 理之法道出,最考验作家才力,而用典用 得好,并非胡适所说的"工切",而在干 材料与作品间的"不隔",想要准确将感 受与思考传达给读者,不可能做到完全不 用典。谈及胡适的"不讲对仗",钱锺书 先生怀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认为刻意追求 文辞骈俪对仗, 难免出现强拼硬凑、不成 义理的问题, 但如果运用得当, 骈偶文辞 可以发挥出更精妙的效果。在批评胡适"不 避俗语俗字"时,钱锺书不认同"活文学""死 文学"的对立方式,另外提出"弹性"的 概念, 启示雅俗语体之间有相互启发的能 力,并将之实践于自己论述中西文学比较 的著作中,旨在让汉语更积极生动地容纳 外来的新内容。而对于"滥调套语",钱 先生则承认套语格式在创作中不可避免,

Afred Allers The F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If I know the goal of a person I know in a general way what will heaven. I are not an a position to bring into their proper order and of the successive novements made... As long as we a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objective which covered and the state of the successive novements made... As long as we a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objective which covered to the state of the successive not not not covered to the state of the successive novements and the value accounts the whole accounts of the state of the successive novements and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uccessive novements and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

是文学形式里坚固的习得之物,很难轻易突破。此外,钱锺书先生认为"须言之有物"与"不作无病之呻吟"不能作为文学建设的原则与保证文学进步的方向,而论诗词曲赋不同文体中的语法要求不同,本就戴着镣铐跳舞的文艺形式,不能用通常的语法或者散文的语法来进行要求。进一步回眸总结,张治老师将钱锺书的思想学问与五四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其平生治学许多思考的出发点都在不断与五四新文化进行对话,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启示读者学人"以迈出五四的工作来光大五四的精神",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是有样学样照着说,而是得其精神接着说。

聚焦钱锺书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 张治老师在"杨绛(钱锺书)编译的研究 资料集"中,探讨杨绛的翻译与钱锺书阅 读史的关联。以《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打字本为例, 张治老师发 现杨绛所编的部分编选眼光权威, 选取了 近二十位古代西方作家对干这一有"时代 感"的文艺话题的论述与讨论。而翻阅《钱 锺书丰稿集》中涉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内 容,尤其是标为"第六十六本"的外文笔记, 则几乎能找得到资料集中所有杨绛译文相 关的摘录段落,可用以查核资料集的编译 来源。张治老师详细列举了笔记中诸处在 打字本中有所体现的内容,并认为钱锺书 先生并非为了帮助杨绛编选这部资料集才 去涉猎相关西方古典文献, 而是早在初步 《谈艺录》中便梳理过西方文艺理论家关 于文艺创作的两个传统, 其中古典诸家标 出的文献出处就是资料集选目的脉络主线, 但钱锺书又认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 异而心则同",并不认为两个传统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由此,张治老师判断,打字本的资料集署名杨绛编译的内容,是在钱锺书指导下确定选目的,而杨绛的译著背后都有钱锺书的支持与帮助,究其原因,杨绛的翻译是钱锺书最擅长但无法施展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延续与替身,而杨绛在文学所外文组工作,又有做这些工作的需要。以这本研究资料集为眼,可见钱锺书先生为他人的翻译工作提供的帮助,包括选题、翻译风格乃至疑难之处的解决,往往对于提高译本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张治老师认为,这是钱锺书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谈及钱锺书晚年著作《管锥编》, 张治老师认为钱锺书在这部书中有意扩大 "文学"的范围,将一切人类精神思想活 动均视为文学研究理应关照的对象, 但其 切入问题的角度,仍然反映了切实而独特 的见解。张治老师以书中论《周易正义》 "《观》"卦一篇为例论及"神道设教"。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锺 书先生开篇引用总结性彖辞, 认为源于清 庙之守、本就接近鬼神的墨家最喜谈论鬼, 而所谓政教相须,最后得到后世论者认可, 提倡以宗教来补助政法, 用鬼神来辅助官 吏。他而后援引爱德华・吉本的名言"众 人(the people)视各教皆真(equally true), 哲人(the philosopher)视各 教皆妄(equally false),官人(the magistrate ) 视各教皆有用(equally useful)",并指出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 恩披里克的相似态度"谓于国教以至俗信, 不妨二心两舌,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所



第一版《围城》书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以免祸远害",而蒙田、笛卡尔则将其作 为自我约束的重要法则。十六、十七世纪 是欧洲思想界上的分水岭,钱锺书先生指 出,十六世纪基督教神甫制定"内心保留" (mental reservation)之法,作用大同, 作为宗教内部的一种观念, 在作用上却和 反对或鄙视宗教的方法完全一致, 而意大 利作家康帕内拉诗句"心光自照"与"随 俗委蛇"、《老子》中的"和其光、同其 尘",以及佛经中所言的"权实双行法", 均可归纳到"依二谛",即"俗谛"与"真 谛"的双行。哲学家们通过思辨精神将"自 发"上升到"自觉",而在哲人与官人在 宗教观上的关系上,钱锺书先生同样论述 出三层关系,认为神道设教有本初合理的 目的,但最后变成"杀人以当天变",和 现代政治法则里的"我负责,人任过", 都是文明发展的问题。理想为执政者根据 民间原有信仰进行改造, 合平老百姓基本 的信忌意愿, 然后使之合理化有效化, 而 钱先生引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的话时同样贯通句意,译作"宗教乃人 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 总结而言, 张治老师认为《管锥编》这篇 论述从多角度体现出钱锺书看待历史与现 实世界的清醒态度,内含其处事哲学,内 在索居独思、对外和光同尘。论及"神道 设教"背后有秉政者对干民人的利用,其 中"损益依傍,约定俗成",终致迷信僵化, "末派失开宗之本真"。而能够察觉民人 迷信之"皆真"中果然也有"本真"可存, 而非一味斥责其妄,而张治老师认为,这 在论说上是颇为周全的。

而通过阅读钱锺书先生的读书收集以 观钱锺书先生的阅读世界, 张治老师看到 了钱先生对于心理学书籍的浓厚兴趣,提 倡在"钻研故纸之馀,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 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 心理学家的著作,是钱锺书先生学术研究 倚仗的宝库。钱锺书晚年曾打算以"感觉、 观念、思想"三者为题著作一书,认为感 觉是策动观念乃至思想倾向何处的前驱因 素, 其观点有"现象学"的影子, 源于早 年对于休谟的认识, 重视现象与感觉, 由 此着重于"游历者的眼睛",勤于搜罗诗 文小说里有关中西文化接触的感觉描写。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多处谈及从情感、 感觉上认知观念与思想的问题, 并提升到 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议论,认为"其于心 性之体会,致曲钩幽,谈言微中,经、史、子、 集、小说、戏曲中历历可征",并以曹操 与《水浒》两个史传小说的心理现象案 例,说明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 理学专家之先,认为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 谓"反作用形成" (reaction formation) 的佳例。而钱锺书关注心理学书籍的另一 重要用处在于阐发文艺创造的心理过程, 例如创作者对着墙壁斑痕杂色错综形态来 激发创作灵感的造艺构思,原理在于瑞士 精神病学医生赫尔曼·罗沙赫(Hermann Rorschach) 发明的心理诊断方法, 而中 西古今常用的"看云""望气"之法, 与心理学"投射" (projection) 概念紧 密相连,"鸟鸣山更幽"则可用心理学 中"同时反衬现象"(the phenomenon of simultaneous contrast)进行解释。 类似的心理学概念运用, 在《管锥编》中 也有多处体现,如阿德勒的"补偿反应" (hypercompensation, compensatory reaction)用以解说古人的"笔胜干舌""比

邻联想" (association by contiguity) 用以说明连续经历的两个事件干意识里 发生关联,而"遏制""防御""占 守" (Verdrängung, Verschanzung, Gegenbesetzung)的精神分析学概念则通行 天下、广泛运用,而这些讨论,并非局限 在"文艺心理学"的范围内讨论文学艺术, 而是借助于文献证据, 跳出专业局限, 从 人的全部心理活动进行研究。张治老师认 为, 通过讨论钱锺书对心理学书籍的心得, 可以洞察其观察与解释文艺思维时的学理 依据, 而尽管回顾钱先生的阅读史, 许多 专业领域的书今日已并不先进,但张治老 师引用钱先生早年文章中的话以作回应, 认为"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 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 更何况从整体上看,钱先生中西汇通的学 术成就至今依然无人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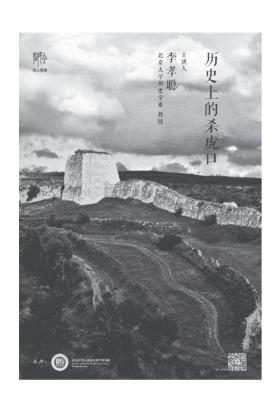
(整理: 章涵青)

# 李孝聪丨历史上的杀虎口



历史上同处于雁北的云(大同)朔(朔 州)二州经常连指,实际上这个看似整体 的地区, 却包含着两个自然地貌差别颇大 的区域:一个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由大大 小小的冲、洪积平原组成的云(大同)、朔(朔

州)盆地;另一个是处于吕梁山北部下伏 地带、晋北波状黄土高原的平鲁、左云和 右玉。两个地区西高东低,如唇齿相依, 历史上许多事情都发生在这两个相邻的区 域,彼此之间从不分离。



位于晋北波状黄土高原的右玉,因为 控扼着北通蒙古草原、河套的关口(历史 曾经称作参合陉、杀胡口、杀虎口、西口)<sup>①</sup>, 绾毂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交通, 从而令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一度很高。

# 参合陉——草原部族出入的首选 之途

右玉县所在的雁北山地高原区与大同、朔州所在的平川区,历史上始终是整合的一块地域,而有别于东部的代郡(今河北蔚县、阳原、怀安,山西天镇、阳高、广灵一带),而且历来是草原势力入境的首选之途。

匈奴,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匈奴"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塞为武州山之隘口,即今大同市西武州

川的上源分水岭。过去人们以为匈奴系从大同北境今丰镇一带人寇,实际并非如此。而经常性的往来是从杀虎口人,然后沿武州川河谷东出武州塞,或南逾岭而下马邑(今朔州),直扑雁门关。元朔年间,匈奴屡次入塞,汉"大将军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sup>②</sup>。从汉代这三个郡南北相连的空间位置关系,从西汉设置"典武职甲戍"的都尉多分布在阴山以南至今右玉杀虎口以北一带,阻挡匈奴入侵通道之目的十分明显,我们可以推断匈奴与西汉经常冲突往来的地区就是从今天的右玉县向西、向北至内蒙古大青山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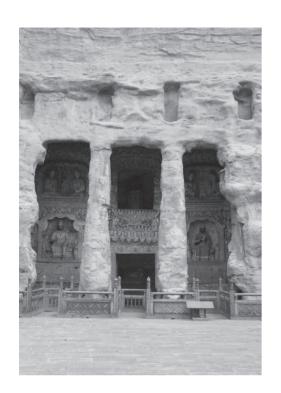
鲜卑,从公元2世纪开始,生活在东 北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人先后分数批陆续 向西南迁移, 在中国历史上, 鲜卑人的迁 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 引起鲜卑人南下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姑且不论, 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鲜卑人南下 的路线和分布。历史上鲜卑人的南下曾经 分作几条途径:第一,经过西辽河流域和 辽西走廊, 进入中原: 其次, 由大兴安岭 南下至内蒙、山西交界地, 穿过山西高原 进入中原:第三,自大兴安岭南下后,西 趋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再继续南下陕甘。 鲜卑人迁徙的特点是到达某个适合生聚的 地点后, 盘亙一段时间, 然后再向新的更 适合发展的地区移动。因此,每一处鲜卑 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鲜卑遗迹, 而鲜卑人在南迁的过程中, 也是鲜卑人逐 步摆脱本民族生活习俗, 吸收当地生产生 活方式,以适应新迁居地环境的文化融合 过程。学术界对鲜卑民族迁徙和鲜卑遗迹 给予了较多重视,其中包括早期鲜卑人的 城址。鲜卑人选择的第二条南迁路线,正 是经过今杀虎口、右玉而进入雁北地区的 通道。先后来到这里的有慕容鲜卑、吐谷 浑、乞伏鲜卑和拓跋鲜卑部,鲜卑诸部一 步步南下的路线几乎完全一致,都是沿着 大兴安岭东侧南下,到达燕山以北;再从 内蒙古大青山、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南下, 然后分途进入晋、陕、甘、宁交界地带。 这条鲜卑诸部族南迁的线路显示黄河中游 的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与雁北右玉、大 同、朔州,是南联晋中、晋南盆地,北上 蒙古草原,西走陕北、宁南、河陇和青海, 东去燕蓟的一条重要的十字走廊。

历史上有两件事实可以证明上述推论: 一件事情是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10 公 里的土城子,曾是西汉定襄郡的成乐县址, 做过鲜卑拓跋氏率众南迁后的早期活动中 心——北都盛乐<sup>3</sup>。该城址北连大青山,南通清水河,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盛乐"是一处较长时期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地点",由此向东南,经参合口(倉鹤陉、参合陉、杀虎口)有"道出其中",可进入雁北。当拓跋鲜卑部势力逐渐走强后,遂入参合陉,出武州川,移都平城(今大同)。俟后,拓跋魏灭赫连夏,平北凉,每次军事行动都是兵发平城,西出参合陉,自云中郡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与清水河县之间的黄河渡口)渡黄河<sup>3</sup>。先取统万城(今靖边北),再下高平(今宁夏固原),继而西取凉州(今甘肃武威)。

另一件事情是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535),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世居怀朔, 与东魏丞相(高)欢善,又母兄皆在邺, 由是常与欢通"。遭宇文泰攻之,"帅所 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灵州刺史

①参合陉,见《水经注》卷三河水三:"沃水又東,逕参合縣南,魏因参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参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杀虎口,明人称杀胡口,清初始改为"杀虎口";所谓西口,即指晋蒙交界处之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因其与东边的张家口相对,故俗称其为"西口"。

- ②《史记·匈奴列传》
- ③《魏书·帝纪·序纪》: 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 力微子猗卢"城盛乐, 以为北都"; 力微重孙什翼犍"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
- ④《水经注》卷三河水: "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赉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 '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津。" 今黄河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与清水河县之间的榆树湾以南进入山陕之间的山地峡谷,河道变窄,水流转急。黄河君子津古渡口大致在榆树湾以上,因黄河河道变迁,已难确指。
- ⑤《资治通鉴》卷一五七



云冈石窟第10窟

曹泥资送至云州"⑤。渭州治今甘肃省陇西 东南,时宇文泰已控据陇山南北的秦州(今 天水市)、原州(今固原)、断了可朱浑 道元东归之路。故可朱浑道元只能由渭州 向西北行,从乌兰津(今甘肃靖远西北古 丝绸之路的重要黄河渡口)渡黄河,沿黄 河北岸东去灵州(今宁夏灵武)。可朱浑道 元到达灵州后继续东去云州(今山西大同), 再南逾雁门至晋阳会高欢。东段经过鄂尔多 斯沙漠南缘的行程只有在君子津(内蒙古和 林格尔南面的黄河渡口)过黄河,然后穿越 参合陉(杀虎口),经今天右玉、左云武州 川至云州。这是当时最安全、便捷的途径。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宁夏固原、陕北 静边、榆林、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 等地都发现来自中亚粟特人的墓葬、波斯 萨珊朝银币和带有古罗马文化特征的器物, 大同云岗石窟更建有希腊化风格的廊柱建 筑。表明沿着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农牧交 错带, 存在着一条未被关注的交通路线。 这条交通道路与经过长安、洛阳, 传统的 东西向"丝绸之路"近乎平行,而且使用 的时间几乎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相一致。 同时也证明雁北地区早在1500多年前,已 经和遥远的西亚、欧洲存在着交通、贸易 关系和文化影响。

为什么那些来自中亚的人们不去长安、 洛阳,这条通道的两端究竟受哪里吸引? 从地理位置与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政治中心 变换来分析,这条通道的西段应与河西走 廊的凉州或河湟地区的"叶谷浑路"相衔接。 向西连接着西域、中亚的两河流域或更遥 远的地方。其东方在不同时期可能有若干 个吸引点,一个是平城/云州(今山西大同), 另一个可能是晋阳 / 并州 (今山西太原)。 北魏前期平城的吸引力最大, 北齐与北周 分立时, 晋阳更具吸引力; 隋唐时期, 具 有吸引力的可能还有幽州(今北京)和营 州(今辽宁朝阳)。特别是当北方遭遇东 西政权分立时, 关中受阻, 绕行河套以南 的陕北、雁北, 由君子津渡过黄河, 穿越 参合口(杀虎口)会减少许多麻烦。

(本文为文章节选,于2020年5月26日 修改、全文原载于《山西大学学报》第30 卷第2期。)

(撰稿: 李孝聪)



# (八)袖珍经典



### 【编者按】

文研院开设"袖珍经典"栏目,邀请校内外学者围绕古今中外的某部经典作品进行解读。 截至目前,来自历史学、文学、美学领域的学者以创新的方式、视角,重新阐释中西经典 诗歌的背景、结构与文化蕴含。



## 苏薇星 | 济慈《初读查普曼译 < 荷马史诗 > 》诗歌导读



苏老师导读音频等内容请参见文研院微信公众号6月17日"袖珍经典"栏目推送。

# 李溪 | 梦中林泉----苏轼题郭熙的《秋山平远图》



苏轼的一生曾给许多人题过画,许多 人的画作也因他的题跋而名声大噪。在他 所有的题画诗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一首《郭 熙画 < 秋山平远 > 》。这首诗在苏轼的作 品中如今当然并不算出名,但自北宋至清, 此诗却是苏轼得到唱和最多的作品之一, 并且可以说也是他的题画诗中对画家之历

史地位贡献最巨的一首。题画诗,似乎只 是文学家根据一幅画作出的有限的解释, 即便我们在谈论苏轼所提出的"士夫画" 的观念时, 主要言说的还是"画家"的身份、 笔墨和思想,而这首诗的影响之远却暗示 了, 艺术的历史有时候是被一些足具慧眼 的人选择和书写的。

### 其诗云:

玉堂昼掩春日闲, 中有郭熙画春山。 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 离离短幅开平远, 漠漠疏林寄秋晚。 恰似江南送客时, 中流回头望云巘。 伊川佚老鬓如霜, 卧看秋山思洛阳。 为君纸尾作行草, 炯如嵩洛浮秋光。 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 为画龙门八节滩, 待向伊川买泉石。

诗后苏轼自题"潞公为跋尾",潞公 即北宋四朝宰相文彦博。这幅《秋山平远》 图乃郭熙于元祐初年应文彦博所请而作, 画 成后, 潞公先以草书为其跋尾, 后在学士院 内引苏轼等人一同欣赏了此画。苏轼题诗的 开头四句并没有直表眼前的画作, 而是言及 了当时在学士院内更为有名的另一幅郭熙作 品——玉堂正中的《春江晓景图》屏风。此 画是在元丰初年郭熙受神宗之命而作的。在 此之前, 学十院玉堂中本已经充满了当时的 名家之作,有巨然的山、董羽的水,易元吉 的猿狟,还有曾立在玉堂中央的燕肃的《潇 湘图》屏风。这些颇有"归隐"之意的作品 皆是仁宗时期进入玉堂的, 且题材大都是宫 廷的"禁忌",此时出现在学士院,是君主 对士大夫之体认的一个明证。曾在此任翰林 学士的欧阳修说, 自己离开学士院后曾对这 些"院中名画""梦寐思之",后再入此地, "每至徘徊画下,不忍去也"。这些画由于 是直接画于壁上或者裱在屏风上, 在元丰五 年恢复三省的改制中随着对学士院建筑体的 拆改也难免丢失或损毁了。郭熙此时受命为 玉堂作画,当然是特别地精心,《蔡宽夫诗话》

说这幅新作"独深妙, 意若欲追配前人者"。 元祐初年,由于神宗去世,高太后听政,罢 黜了新党, 因乌台诗案在外颠沛数年的苏轼 重任翰林学士。自此,他便与这幅《春江晓 景屏》朝夕相对, 画面上的山光氤氲, 春情 融冶, 鸟鸣初起, 物态欣豫, 令他每日在繁 冗的政务缧绁中换取片刻的安闲和惬适。

在此四句之后, 苏轼又回到了眼前的画 作之中。这是江南一带云烟漫漫的平远秋色, 暮霭中显出若隐若现的疏落林木。同那幅玉 堂正中巨大的屏风画不同, 这幅画的形制是 "离离短幅"也即连续的短画幅的形制,在 黄庭坚的和诗中,也说这幅画是"短纸曲折 开秋晚"。这一画幅乃专为北宋时安置在床 榻边的曲屏风亦称为"枕屏"而作。无疑, 比起一定要"远观"的巨障画幅,这种枕屏 同人的身体是更为亲近的。苏轼之弟子由有 一首《画枕屏》诗说: "绳床竹簟曲屏风, 野水遥山雾雨蒙。长有滩头钓鱼叟, 伴人间 卧寂寥中。"在半睡半醒之中置于枕边,这 山水便不再是"画",它就是梦境本身,人 不是"看"画,而是在此境之中自在地徜徉。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制看, 立于玉堂之上的宏 壮巨制《春江晓景图》屏风,很容易令人联 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早春图》,而这 幅《秋山平远》则可以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 藏《窠石平远图》和大都会博物馆的《树色 平远图》联系起来。有学者根据郭熙《林泉 高致·山水训》中的说法,将前者称为"宏图", 后者称为"小景"。《窠石平远图》的画幅 尺寸这也同北宋枕屏的尺寸高度一致。画面 中, 近景是郭熙典型的卷云皴山石, 其上耸 立几枝枯木虬屈,旁逸斜出的蟹爪般的桠槎 则显得更有笔力。远景不是雄奇的翠障, 而 是大面积地虚空,只一处起伏的山峦,由淡 墨渲染, 冲淡明灭, 浮现于平阔的烟波之上。 此"烟林平远之妙"本始自李成,郭熙在这 幅画中继承了李成的风格。寒林、枯木、瘦 水, 古寺, 以及弥漫在画面之上的烟霭渺渺, 这些景物同《春江晓景图》屏风中的生意融 融相比,似乎是疏离而难以"生活"的。但 是在苏轼眼中,这却是更为"人间"的。人间, 并不意味着温度和"生生", 而意味着一种 在"存在"的忘却中对本能之挣扎的摆脱。 这一"人间", 庄子称之为"无何有之乡"、 "广漠之野"。《逍遥游》中,庄子将惠子 口中的无用之木安置于此, 他说人唯有在此 才得"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摆脱物与人"相刃相靡"的困苦。对于熟悉 《庄子》的苏轼而言,眼前的《秋山平远图》 正令他想起了这个情景。

在诗的后几句, 苏轼也提到了一个如此 的"栖居"之所。"卧看秋山思洛阳"、"洛阳" 在北宋士大夫心中正是一个卸下官宦负累后 理想的归栖之地。文潞公在元丰六年因党争 致什洛阳后, 曾在当地的林园中举办过耆英 会,引为一时佳话。东坡觉得自己有幸随公 观赏此图, 日后定要买石造园, 同他一样归 隐洛阳的林泉之中,以成就自己如白居易一 样卧游龙门八节滩的夙愿。大概是摹拟苏轼 写潞公的笔法,在黄庭坚次韵诗中,道出的 是苏轼在元丰年间的流放生活: "黄州逐客 未赐环, 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 发兴已在青林间"。苏轼在黄州数年、日子当 然潦倒, 但黄庭坚提到的东坡黄州记忆, 不但 未有苦涩,反而还相当快意。在一种不知其"还" 的心境中, 诗人往来于山水之中, 竟有种饱餐 的满足感。短短几句话道出了这位胸襟奇伟的



南宋·赵孟頫绘《苏轼像》

诗人, 在最困顿的生涯中, 可与江山胜景共在, 与清风明月相伴, 而在最得意的时光里, 在忙 碌的学士院中,亦可借屏上的郭熙之笔,回到 那个林间的自由世界之中。

在现实的生命里, 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 实现"归栖"的理想、晚年在海南长达数年 的流放生涯后,他的生命终结在了返回的途 中。在他死后不久, 他就同文彦博等一起名 列"元祐党人",诗集也造禁毁,而郭熙的 画作在同一时期也难逃被当做"桌布"的命运。 在如此的残酷的政治现实中, 他的诗不但没 有被忘记,反而连同郭熙的平远画作成为了 后世士大夫心中真正的经典, 其诗不断被唱 和,其画不断被摹仿。在今天,郭熙的平远 "小景"似乎不若"宏图"更为有名,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春图》的存在,这是





北宋·郭熙绘《早春图》

北宋·郭熙绘 《窠石平远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0 世纪最被认可的郭熙的传世之作。但是从 历史上看,不止是《早春图》,就连当时更 为煊赫的《春江晓景》屏风,并没有得到后 世更多的评论和效仿,相较而下,"秋山平 远"却在很长的时间中是郭熙风格的代表和 文人山水的主题。如在晚明王世贞的笔记中, 就曾说当时流传干世的郭熙之作多为平远, 他因疑惑为何与郭熙同时代的郭若虚的《图 画见闻志》中说他有很多"巨障高壁"之作。

这一对诗画"经典"的建立,并非只是由 干文采之卓越,或技法之精湛,而是由于他们 笔下的物象之旨趣,可令后人在同样残酷的现 实中为自我的心灵寻找到一点可以安栖的"人 间"感。王之道是徽宗朝宣和年间的进士,靖 康之变后曾追和东坡此诗, 其中有云"东坡山 谷妙言语,珠玉倍增山水光",又有"伤心北 猗归何时,园苑荒凉万年石"。对东坡、山谷 之诗的追忆, 已经令郭熙这幅画在文人心底充 满了辉光,然而在现实中它同那艮岳中的苑石 一样, 早已流落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住在北方 的刘迎在靖康后改换装束、车马、成为了一位 金朝的文人。有一次他看到友人的一幅平远山 水时,回忆昔年在被废弃的汴京宫苑游览的情 形, 那时天色已晚, 玉堂大门已闭, "壁间曾 见郭熙画, 江南秋山小平远"。玉堂屏风本是 《春江晓景图》,为何刘迎很肯定地说是"秋 山小平远"这很令人费解。说此图乃是旧党被 罢黜的哲宗或是徽宗时所换上,并不合理。或 说文人是误看,也不应当。郭熙之画见长于"四 时之色"的表达,不会出现分不清春秋、早晚 的情况。或许这幅画是在元祐时期因《春江晓 景图》屏风变旧而换上的,或许,说此画是《秋 山平远》正是文人心底的一个愿望。刘迎诗中 说"当时画史安定梁,想见泉石成膏肓",在 这离乱之世中, 唯有苏轼笔下这幅郭熙的《秋 山平远》是那念念不忘、终成膏肓的泉石之所。

此后不久(1169), 当楼钥以书状官随舅 父汪大猷使金路过汴梁时, 在破败的玉堂中他 再次将堂中之屏指认作郭熙《秋山平远图》。 他的《郭熙 < 秋山平远 > 用东坡韵》诗云:

> 槐花忙过举子闲, 旧游忆在夷门山。 玉堂会见郭熙画,拂拭缣素尘埃间。 楚天极目江天远, 枫林渡头秋思晚。

烟中一叶认扁舟、雨外数峰横翠巘。 谁安客宦踰三霜,雪梦泽连襄汉阳。 平生独不见写本, 惯饮山绿餐湖光。 老来思归真日月, 梦想林泉对华发。 丹青安得此一流, 画我横筇水中石。

此时, 画屏已经在尘埃间黯淡了颜色, 他 忙去拂拭那缣素上的厚厚的尘垢, 但见江水连 天, 仍可引人极目远眺, 枫林渡头, 仍可生出 秋思晚情。烟波之中的一叶扁舟, 仿佛载着他 厄到了茫茫的云梦之泽。几十年前, 东坡曾在 这里寄予了自己的泉石之梦, 此刻, 这里的一 切已属异国, 曾经繁华的汴梁城垣颓败, 满目 疮痍, 让人不忍多看。但就在这异乡之内, 楼 钥的心中日日所念的"归处",正是此时眼中 这残旧蒙尘的《秋川平远图》屏风。当楼钥离 开的时候, 他心里清楚, 屏风上无人照看的郭 熙名笔很快就会彻底毁损, 他的诗也将成为亲 见此屏之人的绝唱, 但他梦中所追寻的林泉之 地, 永远留在了这幅回忆里的郭熙画中, 在那 东坡曾"发兴"的玉堂中。

颇令人玩味的是,在楼钥使金归来后的 两年后(1171), 孝宗皇帝亲自赐给了宰相 虞允文自己手书《郭熙画 < 秋山平远 > 》诗。 此时经历了高宗朝对北方流散的骨董珍品的 着意收集,内府已经相对充裕,但孝宗自己 宫内的装饰却极为简朴, 竟无一书画装饰, 这令偶尔来访的太上皇高宗惊讶不已。据《皇 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记载,孝宗之辅臣 对太上皇解释说:"陛下不以万乘为乐,而 以中原为忧, 早朝晏罢焦劳如此, 诚古帝王 所不及也。"此言不止有对孝宗勤勉德行的 称美,似平也隐晦地藏着对徽宗沉迷书画玩 好以致丧国的一种反省。孝宗自己则谦逊地 说:"朕无他嗜好,或得暇,惟书字为娱尔。" 回避绘画而以书字为娱, 其"娱"当然不止 是在"艺术"本身。在有着前车之鉴、并且 受到当时儒学对君主谨严的要求之下, 孝宗 心底亦有一种对北宋时期君王同臣子关系的 怀念。在浩瀚的古代经典中选择了此诗,说 明其对林泉之心的会意,已成为当时士人的 共识,在他心里这正是赐给臣子的佳物。当然, 还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帝王,他比任何人都 更不会忘记遗落在异国他乡玉堂之中的那个 旧时梦境。

(撰稿: 李溪)



# 干湖 | 再读《秋兴八首》



《秋兴八首》是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作 品之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重要的作 品之一。因为重要, 古今论说不可谓不多, 但经典作品开放性都很强,后人只要再读, 每会更有新得。在今年线上教学的特殊情况 下, PPT 成了古典诗歌阅读的重要手段, 用 PPT 读诗, 也许可以算诞生于 2020 年的新 诗学。作为一种工具, PPT 的优长在其可视 性, 因此对结构感和设计感强的作品, 这种 "诗学"颇有用武之地。像《秋兴八首》这

样的组诗, 若读者手持书本盯着一首诗看, 看罢一首换一首,那肯定和PPT一屏八首、 直观其关联布置,感觉非常不同。这里就以 PPT 录屏动图为主,辅以"看图说话",用 年度新方法再次打开《秋兴八首》。

《秋兴八首》有极其精致的结构安排, 可以满足任何一种强迫症式的分析。它题为 秋兴,第一首开头便是"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第八首结尾是"彩笔昔 曾干气象, 白头吟望苦低垂。"以秋始而以

玉露凋傷楓樹林, 夔府孤城落日斜, 千家山郭靜朝暉, 聞道長安似弈棋, 巫山巫峽氣蕭森。 每依北斗望京華。 日日江塿坐翠微。 百年世事不勝悲。 江間波浪兼天涌, 聽猿實下三聲泪, 信宿漁人還泛泛, 王侯第宅皆新主, 塞上風雲接地陰。 奉使虚隨八月槎。 清秋燕子故飛飛。 文武衣冠异昔時。 叢菊兩開他日泪, 畫省香爐違伏枕, 匡衡抗疏功名薄, 直北關山金鼓震, 山塿粉堞隱悲笳。 征西車鳥羽書馳。 孤舟一髫故園心。 劉向傳經心事違。 魚龍寂寞秋江冷, 寒衣處處催刀尺. 請看石上藤蘿月, 同學少年多不賤, 已映洲前蘆荻花。 五陵衣馬自輕肥。 故國平居有所思。 白帝城高急暮砧。 昆吾御宿自逶迤, 昆明池水漢時功. 瞿唐峽口曲江頭. 蓬萊宮闕對南山, 紫閣峰陰入渼陂。 萬里風烟接素秋。 承露金莖霄漢間。 武帝旌旗在眼中。 香稻啄餘鸚鵡粒, 織女機絲虚夜月, 花萼夾城通御氣, 西望瑶池降王母, 碧梧栖老鳳凰枝。 石鯨鱗甲動秋風。 芙蓉小苑入邊愁。 東來紫氣滿函關。 佳人拾翠春相問, 珠簾穒柱圖黄鵠, 雲移雉尾閉宮扇, 波漂菰米沉雲黑, 仙侶同舟晚更移。 日繞龍鱗識聖顏。 露冷蓮房墜粉紅。 錦纜牙檣起白鷗。 綵筆昔曾干氣象, 關塞極天唯鳥道. 回首可憐歌舞地, 一卧滄江驚歲晚。 白頭吟望苦低垂。 江湖滿地一漁翁。 秦中自古帝王州。 幾回青瑣點朝班。

所兴结,这是首尾咬合点题。除了组诗首尾 咬合外,八首诗头尾也依次咬合:第一首以 暮色结,第二首以落日起。第二首以月色结, 第三首以朝晖起。第三首以长安之成功人士 结, 第四首以长安如棋局起。第四首以思故 国结,第五首以所思之故国起。第五首以身 在夔州、心思长安结, 第六首以夔州遥接长 安起。第六首以帝王州结,第七首以帝王起。 第七首以鸟道南端的杜甫结, 第八首以鸟道 北端的长安起。这种前后咬合把八首诗固定 在自己的位置上, 次序再不得移易。

因此在大框架上,《秋兴八首》呈现出 一种头尾咬合、次序固定的超稳定结构。如 果我们把秋兴八首的每一首视为一句, 而将 这组诗视为八句组成的一首七律的话,则这 种结构的稳定平衡正满足了律诗的一般美学 追求。但是, 律诗既从规矩中获得美感, 也 会因规矩失去美感, 所以在经典作品中. 大 规矩一般会有小自由来调剂, 这就是程千帆 先生说的"有才能的诗人在经过长期的实践 使之达到对称、平衡之后,又企图突破它们 而达到新的对立统一。"而杜律常见的一种 调剂办法,就是抛出一个和全文逻辑断裂的 结尾,从而使律诗的视听结构(二联对仗、 通篇平仄匀称)被逻辑结构(六对二,甚至 七对一)打破。前引《九日》《小寒食舟中作》 是这样,《秋兴八首》的第五、七、八首也 是这样。如果将《秋兴八首》视为一诗,将 第八首视为结句,则它同属于这类结尾—— 在连续七首秋景之后,尤其是在第七首着力 描绘了长安之秋的凄冷之后, 跟着的第八首 突然发生在春天。所以分别抽出第一首、第 八首的头尾合观,《秋兴八首》是秋起、以 所兴结; 如果将第一首、第八首视为一首诗



蒋兆和绘《杜甫》 (中国美术馆藏)

的头尾,则这首《秋兴》又是以夔州之秋、 诗人之秋起,以长安之春、诗人之春结,这 同样也是一种首尾呼应。后一种方式, 其实 在《九日》中已见端倪,那首诗结尾虽然突 然宕到骊山,但首联恰是以地名开头,骊山 就和郪县、涪江形成了强呼应, 仿佛一个逃 兵又被抓回了队伍里。总之,杜甫在布下一 个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也留意着整体的稳定 度,因此杜律能给读者一种收放自如的感觉。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请见文研院微 信公众号"袖珍经典"栏目7月2日推送。

(撰稿:于溯)





# 静园学术

#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

2020年6月6日, 由文研院、北京大 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论坛联合主办的"数字人文视角下的 中国历史研究"研讨会在线上进行。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军教授担任召集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梁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心研究员史睿共同主持。文研院院 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哈佛 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包弼德 (Peter K. Bol)、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 所教授薛凤(Dagmar Schäfer)、荷兰莱 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魏希德 (Hilde De Weerdt)、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研究员陈熙远参与。本次研讨会是"北 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首场活动、据 统计, 近万人在线参加。

### 主题发言

首先,邓小南老师以"数字人文视角 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点滴想法"为题做主 题报告。邓老师带领北大历史系的一批研 究生长期参与与哈佛大学合作的 CBDB 项 目,在她主持的文研院的日常工作中,也 有诸多涉及数字人文研究的内容。

邓小南老师谈到,进入20世纪以后, 学术界一直面临着学术创新的压力,数字 人文是重要的尝试路径。"面向历史,也 面向未来"的历史学研究者不断在寻求新

的历史学发展路径。数字人文是一种新的 学术导向, 其产生和推进都源于"数字" 和"人文"的双向需求和动力。数字人文 是一种理论开放、成就最显著的跨学科研 究,提供了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提供了新 的研究工具,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研 究范式和研究活力。人文学科一直是需要 积累和传承的,特别需要拓宽学术空间和 激活学术潜力,这样的内在需求,其实是 发展数字人文的根本性动力。北京大学近 十年来一直在推进数字人文的建设, 各学 院、图书馆等,都在积极进行相关尝试。 历史学成就的基础、来自"材料"和"议 题"的结合,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尝试 突破的首先是历史学的材料占有问题。在 实践的过程中, 透过不断的追问, 即使是 字面上的"检索",也支持并且引导学者 的深度研究。现在,数字人文已有长足的 发展,从过去的检索,到现在超越检索的 各类复杂功能,数字人文对历史学科的介 入方式也是在不断推进的。现在,不仅有 Markus 这样个性化、定制化的数据平台, 也出现了一些经过深层开发的关系挖掘型、 语义分析型的数据库, 这使学者们有机会 开始处理材料背后的一些结构化的内容。

除此之外,邓小南老师还谈到了一些 新的互联尝试。互联网的关键在于"互联"。 现在对于"互联",已经有许多新的努力 和实践。数字和人文是不同的学科,也具 有不同的学科特点, 但不管怎样, 二者都 有拓宽天地的要求。这二者的连结,延展 了观察历史的平台,深化了学术内涵,也 使学术境界有可能获得根本性的提升。如 CBDB、CHGIS 这样的互联尝试,就用可 视的、能看得到的方式呈现历史时空,呈 现时空里活动的相互关联的人。这样就可 能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形成一些新 的研究契机。同样, 也是因为议题的互联 和学者的互联,使研究交流的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不仅是收藏在世界各地的 不同资料能够让世界各地的学者广泛利用, 而且针对一些全球性的问题, 交换意见和 合力研究的渠道也变得非常迅捷、丰富。 在历史上, 笔和纸的出现以及印刷术的出 现,都曾为知识和学术思想的生成和传布 创造了新的条件。如今数字人文技术的出 现,也促成了新的记载、阅读和研究的方式。

最后, 邓小南老师还谈及一些关于数 字人文的新期待,特别是对于"融通"的 期待。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于文明的研究, 其实都是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的。今 天的数字人文领域, 也正是这样一种跨越 和互通的典范。数字人文出现以后, 历史 学者开始有了新的工作方式、面对新的议 题,也开始进行学术机制的重组和重构, 有了大跨度的文理交叉实践过程。对未来 的新期待,一方面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 究的对话,另一方面也包括数字人文和传 统考证方式的融通。人文学科有一些特有 的属性,这些属性对于数字人文的功能实 际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历史学 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历史学 者不能仅靠对材料的熟悉夺得研究中的先



机, 所以辨析和追问的能力高低就会特别 凸显出来,就这些问题,学界已经有许多 聚焦式的集中讨论。

最后,邓小南老师也谈到数字人文研 究方式的广泛应用, 应该是人文学科得以 深化的路径。作为历史学者, 要特别警惕 急功近利导致的"表浅化"可能。系统可 以协助学者抓取文本、观察文本间的关联, 但有一些非字面的体悟,只能靠学者对各 类史籍、对田野、对历史遗迹的"触摸", 靠内心的感触、靠阅读实践与思考来摸索 形成。数字人文的深度发展,是和历史学 科的深度发展相伴相随的,加强问题的提 炼、材料的阅读和辨析的训练,仍然是我 们不能忽视的基础和责任。

荷兰莱顿大学魏希德教授是 Markus 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的主持开发者, 曾在 2016年的世界数字大会上赢得"最佳数字 人文工具"奖。魏希德老师以"数字历史 需要什么? 想象力、评测、合作"为题, 介绍了她心目中数字历史、特别是东亚和 中国的数字历史研究最需要重视的原则。

魏希德老师首先介绍了她所主持的 Markus中文文本标记、分析、可视化平 台项目的最新进展。2019年, Markus 项 目新开发了文本对比服务和韩文版本。同 时,团队已与中文在线公司进行合作,预 计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大陆深度开 发 Markus,这将为大陆用户的使用提供 便利。

接下来, 魏希德老师探讨了她对"数 字历史最需要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在 她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想象力"。 想象力不仅是数字历史, 也是历史学本身 的一种发展动力。著名的欧洲中世纪历史 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著作《历 史学家的技艺》中曾说: "历史研究的特 殊对象,是人类的所动所作。比起其他学 科,历史学是为了引诱想象力而设计的。" 有趣的是, 布洛赫先生虽然如此强调想象 力,他对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的实证主义 (positivism) 也表示了尊重,认为实证主 义教我们深入地分析问题、固定地把握问 题, 甚至使我们的思想没有那么粗劣。现 在许多学者都认为数字人文就是以前的实 证主义, 若以布洛赫的视角来看, 数字人 文的研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要成为数学家, 而意味着历史学家要对数字人文的技艺有 所把握,将来数字人文也会成为历史学家

"本行"的一部分。魏希德老师自己、也 坚信这样的观点。

在魏希德老师看来,数字化给历史学 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她着重就"问题的开发"这一问题展开了 探讨。她认为, 比较成功的研究项目通常 有三个特点: 第一要从有想象力的问题出 发; 第二要确定好合适的研究范围;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设计好研究程序以 及研究方法。她过去召开过许多 Markus 工作坊, 发现有一些学生和同行只是在没 有达到这三点的情况下盲目地尝试工具, 这样一来就无法产生有价值的研究。

最后,魏希德老师以 Markus 平台的 实际开发过程为例,来说明想象力在设计 研究方法与学术发表方面的意义。Markus 平台开发的每一步,都反映了她本人或是 同学、同行们的研究兴趣, 以求灵活地设 计人文学者需要的平台。

Markus 平台的开发是从自动标记开 始的,这与她当时正在从事社会网络,特 别是宋代笔记反映的社会网络研究有关。 后来,平台加上了各种功能,比如手动标 记、关键词标记、段落筛选等。团队不断 在功能和参考材料方面对平台进行改进, 如由于对标签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添加了 关系标注的功能; 为了适应清史研究者的 需要,添加了满文材料;因为有一位学生 要从事中韩关系的研究,又添加了韩文实 体标记功能等。为了实现可视化功能,平 台链接到 Palladio, 后来又添加了链接到 Docusky 平台的功能。因为历史学研究常 常需要回到原文,平台特别设计了能从每 个标记点回到原文中的功能。最近,因为 对《贞观政要》里引用的书籍感兴趣,平 台新开发了文本对比的功能;除此之外, 还开发了版本对比的功能。这些功能,都 是通过跨领域长期深入的协作开发完成, 许多学者都曾在其中发挥贡献。

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是哈佛大学中国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中国 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的负 责人。在本次的研讨会中,他以"从轶事 到数据: 传记数据的网络和空间分布"这 一主题展开介绍。

包弼德老师首先介绍了一批数字人 文领域的中国历史研究文献, 其中, 他特 别提到了两位年轻学者——伯克利大学的 谭凯和巴克内尔大学的陈松, 他认为, 这 两位学者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对中国历 史有新的发现。包弼德教授提到, 正如魏 希德老师所言,数字人文领域的许多研究 是合作研究,需要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尤 其是技术人员参与。除此之外,他还介绍 了一批对中国历史数字人文研究最有价值 的数据库、工具和平台,包括中国哲学书 电子化计划(Ctext)、明清数据著作数 据库(MOWW)、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 料库(CBDB)、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Markus、《史记》研究数据库、 10,000 Rooms, LoGaRT, Philologic, Docusky 等。

接下来,包弼德老师对中国历史地理 系系统(C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 料库(CBDB)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中国 历史地理系系统(CHGIS)项目始于2001 年,由哈佛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旨在建 立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历史 GIS 通用标准。

CHGIS 目前已经更新至第六版,包含由 秦代到辛亥革命的行政区划数据。中国历 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则始于 2005年,由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台湾"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开发,在即将 更新的最新版本中已经包含了47万人的数 据,旨在让学者能够通过个人与群体的角 度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目前,使用 CHGIS 和 CBDB 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的研究者分布 在世界各地。CHGIS 和 CBDB 的数据特点 是"三言"的——同时有汉字、拼音和英 文翻译三种形式。建设数据库的过程中所 用的各类文本,是为了供给学者做不同的 研究和分析, 如统计分析、群体传记学、 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等。

包弼德老师介绍到, 所谓"从轶事到 数据",可以通过南宋史学家、经济学家 吕祖谦的传记案例进行说明。学者们在这 一传记中,标出了不同的人名、字号、官 名、地名、社会关系。接下来对这些标记 出的片段讲行编码并放入关系型数据库中, 即可成为可供计算机检索的资料。

据包弼德老师介绍,目前,CBDB最 新版本中的大部分数据来自唐、宋、元、 明、清代,而五代、辽、金的材料则较少, 目前已有一些来自民国的材料但数量也较 少。在未来,会进一步将材料的时间范围 向前推广到秦汉,且希望能尽力向后推广 到现在为止。CBDB 的数据库支持在线检 索,并提供了可下载的 access 数据库版 本。包弼德老师以明代进士数据的查询统 计为例,向大家讲解了 CBDB 的使用过程。 随后,他也向大家展示了如何使用明中叶 七十二位学者的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和



GIS 分析,研究学者间学术关系、学者籍 贯和明朝驿站地点关系、学者聚集地点特 征等的案例。目前,若想要在中国大陆使 用 CBDB 数据库,可以从"中文在线引得 数字人文资源平台"进入,十分便利。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薛凤教授于2020年荣获德国学术届最高荣誉——"莱布尼茨奖"。她主持有关中国地方志的数据库项目,并推出了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工具LoGa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

在本次研讨会中,薛凤老师基于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普科学研究所)在构建地方志研究工具LoGarRT方面的相关经验,以"看待史料的新视角——利用数字人文进行历史研究"为题进行了探讨。

薛凤老师指出,尽管"对问题的回答"一直是许多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和发展的前沿,但她建议未来可以将"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作为下一代的数字人文学术前沿。

这项研究的研究问题是使用地方志了解地方灾害的出现和政治因素,从而分析地方性知识的性质、发展、变化、政治因素等。和传统"利用地方志了解灾害何时出现"的材料使用方式比起来,这项研究需要了解地方志本身的发展过程。使用LoGaRT系统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很多问题,例如各地方对自然灾害的记录情况和朝代有关。薛凤老师指出,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数字人文的研究,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给出更多的答案。

薛凤老师认为,数据本身不足以提供增加新认知的结构性信息,当我们从数据

中提取出某种新的结构,例如做成一个数据库的时候,数据本身便具有了新的意义,我们也会对数据产生新的了解。同时,如果我们仍然对数据原始表征的信息感兴趣,就需要保留原来的结构,这样的做法会对材料的价值产生新的了解。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创新很重要。通过分析数据,分析结构,和同时分析数据与结构,就能够更深入理解原始材料。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史料资源本身的问题上来,材料是如何被解释的?它是关于什么,又是为什么被采用?或者原始语境中是怎么利用这条材料的?薛凤老师认为,数字人文是探讨这些问题的完美工具。它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我们对原本认为理解的东西产生新的认识。

陈熙远博士是台湾"中研院"数位文 化中心召集人。该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跨 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就开始了数位典藏与数位文化的建设。 陈熙远博士以"探索人文研究的数位转向: 挑战与前景的若干思考"为题进行了报告。

陈熙远博士首先引述了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成立时,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名言:"我 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 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国古来新学 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学 界的五大发现中,包括殷墟甲骨、汉晋简 牍等,都成为史语所在后来发展中很重要 的助力。

陈博士认为,如果说史学资料库的建 置可以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开端的话, 数字人文研究其实可以说对史学研究者 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例如说, 史语所从 1984年就开始做"汉籍自动化"的工作, 九十年代开始"内阁大库"的整理、这些 资料库提供了材料检索和使用的便利。这 些资料库还仅仅停留在"Big Data(大数 据)"而不是结构化的"Smart Data(智 慧数据)"层面,但对它们的使用,使得 史学界从研究选题、到史料援引、再到成 果展现,都已经和过去的历史学研究有所 不同。在使用材料时,从私人藏书楼,到 公共图书馆, 再到现在的云端资料库, 寻 找材料时,我们已经基本已经不必再从故 纸堆里"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弹指之间, 现在研究中的"海底捞针"已经全凭"翻 云覆雨手"。学者已经不再"上穷碧落下 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可能是在"东西" 上动手脚,将这些"东西"转化成数据库, 让"东西"自己长出"手脚"。数字人文 方法的出现, 在大势方面重新覆案历史发 展的宏观全局, 在细节方面则挖掘藏在历 史夹缝的微观细节。

作为历史研究者,陈博士提出了若干在一个美丽新"数"界出现之后,历史学将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数字人文终极的乌托邦里,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吗?还需要历史学家吗?苏轼所说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会变为"约观而博取,薄积而厚发"吗?在数位纪元里,历史学家需要有什么新的专长?这些都是值得学者们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陈博士引出了自己和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以下简称数位文化中心)对"人文研究的数位转向"的看法对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规划。

数位文化中心希望能够通过四个核心 课题来规划数字人文发展。在数字人文知 识库建立上,延续过去的资料库建置,并 和其它资料库讲行关联: 在数位研究研究 工具的开发方面,通过核心技术与系统的 研发, 萃取并分析文本: 鼓励数字人文创 新计划的发展;在出版与推广环节,通过 数位展示和虚拟出版来完成。数位文化中 心已经与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台湾中研究所、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 心、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合作, 开展了多 项课题研究。陈博士特别强调,这些项目 的成果都是"linked data (关联数据)". 而不仅仅是数据库。这些结构性的数据, 能够更有意义地协助研究者们今后的探寻 工作。他指出,对于人文研究者来说,文 本分析和图像分析是两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目前数位文化中心也针对这两个问题开发 了文本分析研究平台和图像分析研究平台, 可实现文本标引、语义标记、词频统计、 文本对比、图像比对研究、影像文字辨识 等功能。平台同样注重数据的开放互联, 也建立了自己的自己的研究材料检索系统。 在人文学者对数据资料库的使用方面, 史 语所每年都会通过"申请 - 审查"的方式 鼓励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参与到项目中 来。在出版环节,数位文化中心正在考虑 成立一个院级的出版社, 实现实体出版, 并在未来将其和所有的数位展示连结起来。 同时,正所谓"致广大而而尽精微,极高 明而道中庸",数位文化中心也希望能够 通过这些平台, 让一般人也可以参与到项 目中来。目前已经在进行"开放博物馆" 的展示平台规划,旨在实现研究者学术成

果的数位展示、研究历程的记录、研究素 材和数据的保留、分享甚至进一步修订等。 除此之外, 也希望从美术馆、图书馆、档 案馆、博物馆乃至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公 众授权的模式, 进行藏品的收集、展示、 转译与再创作。陈博十认为、这是"从学 者一个人的武林到全天下人共享的江湖", 目前已经设计的展示模组、展览模式和分 析工具,都服务于这个构想。

在五位学者的精彩介绍讨后, 由北京 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史睿研究员和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梁晨教授两位主持人收 集了一些来自听众们的问题,并向学者们

### 问答环节

"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比较依赖干数 据的搜集,那么这样的一种新方法是否意 味着它在某一类史料上比较有效,而在某 些领域内不太能展现其功能? 这种方法的 局限性在哪里,未来的前景怎样?"

包弼德: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 不是从材料来讲, 而是从问题来讲, 从研 究的题目、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举一个 例子,我个人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 宋、元、明、清思想史的。如果我需要了 解朱熹的哲学思想,那么我一定要读朱熹 的几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和注解。举例而言, 他在《中庸童句集注》中引用著名的十六 字——"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对"人心"、"私欲"、"道 心"和"天理"进行了新的定义。除了我 现在所看的文本都是数字化的文本之外, 这个问题原本和数字人文不太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现在有另一个问题: 我想 看到朱熹提出这个讲法以后, 谁开始接受 "人心"就是"私欲",而"道心"就是"天 理"这个新的定义?要同答这个问题。我 可以阅读每一篇朱熹所在时代之后写成的 文章,或者《四书》经解等等,看这些文 章是怎样讲的。可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一 个数字人文的挖掘文本方法。看从哪些文 章中, 开始同时提到"人心"和"道心", 同时, 也提到"天理"和"私欲"。例如, 从朱熹去世之后, 到元朝开科举制度以前 的约115年之间, 谁接受了这个新的讲法, 谁又持另外的讲法? 这是一项数字人文的 研究, 但这和我自己想问的问题有关。如 果我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兴趣, 就没必要进 行这样的研究。所以说,不是资料在限制我, 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最重要。

刚才魏希德老师也提到,我们要先看 到自己的兴趣、想法和问题, 然后选择最 适用的方法去研究。有时候可能是详细地 阅读一篇文章,有时候则可能采用挖掘文 本的方法。所以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专门 要做数字人文的研究, 而是要研究中国历 史的一些关于思想史、思想价值变迁的问 题,这需要利用最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必 须用数字人文的方法。或者说,如果我是 要研究社会史的一些问题, 研究社会史是 和社会科学非常相关的,可能要用群体传 记学的方法。通过群体传记学的方法,我 们可以找到非常多关于人的生活资料,如 从墓志铭、《宋书》、诗等等,都可以搜 集资料。比如说 CBDB 就是一个关系型的 数据库,我们对非常多的各类的资料进行 标记,从标记得到数据,把数据放在一个 关系型数据库中,才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 法进行研究。可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并 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 而要根据兴趣。 所以说, 我认为回答这个提问不应该从资 料来讲,而应该从问题意识来讲。

"现在这些新的方法和丁县,为学者 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使得学者能够提 出新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因为具有很大 的开放性, 甚至很多个人自我的材料也能 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材料, 这是否能使得 普通人也能够有机会从新的视角看待自己 的历史, 甚至自己去做一些分析?"

薛凤: 正如刚才包弼德教授所说, 应 该从问题和兴趣开始, 由兴趣决定要用什 么方法。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 因为材料 很多很丰富,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试试很多 的研究方向, 但也有一个坏处, 因为全部 这些材料已经被从各种各样的方向和观点 研究过,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分固执,觉得"只 能这样看",不能用新的方法分析,因为 我们已经特别了解所用的原始材料。不过, 很多材料其实也是很大、很丰富的, 所以 还是应该从一个新的问题开始,从自己的 兴趣开始,发挥想象力,一方面非常的了 解材料,一方面拥有新的兴趣,将二者联 合起来, 肯定会有新的方法出现。

另外还有一个点可以补充, 我们的研 究所中, 目前也有研究者和数学家一起合 作,来研究欧洲方面的材料。我认为历史 学家和数学家合作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 是一个有挑战性但很有希望的方向。我们 需要研究这方面的算法(algorithms), 但这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需要他们逼 着我们来做。为了发展历史学研究,和他 们合作发展算法(algorithms),是一个新的领域。

"数字人文这样的研究方法需要人文 学者和工程师的合作,像这样跨越领域的 合作以前是很少的,请问有哪些经验可以 借鉴?据我总结,在数字人文方面,应该 说人文学者对于新的技术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但他们同时又是一批数量最少的用户, 然而他们的研究内容又有最高的文化、文 明价值。数字人文研究中数据的建设也非 常难,建成的数据库和研究结果在学术界 取得学术信任的过程也比较长。在这样一 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下,人文学者应该如何 寻求合作?合作中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 大家?"

魏希德: 其实合作是一个挺复杂的问 题,我先来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我 自己在读研究生和刚开始教书时, 总是自 己一个人做研究,自己一个人读书、写文 章。开始开发 Markus 的时候, 我开始和 计算机科学家一起工作。后来, 在机器学 模型开发和文本对比系统开发的过程中, 也分别和不同的计算机科学家合作过。研 究方面,刚才演讲中提到的有关党争、社 会网络比较分析这篇文章, 也是和数学家、 历史学家以及计算机学家一起合作的,可 以说这真的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这种合 作当然充满了挑战,有的时候开展起来很 困难,特别是作为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 学家以及数学家一起工作,常常不太顺利, 因为大家可能互相都不了解彼此要解释的 问题。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其它一些项 目的观察,我觉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大 家要非常频繁地相处,学者之间的合作应 该是非常深入的。一般来讲,项目都是几 年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应该频繁相 处,一起讨论问题。作为历史学家,不仅 要讲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也要讲到 自己在所用资料的特征在哪里。因为和你 一起做研究的计算机科学家可能也对这个 问题感兴趣, 甚至不仅仅是感兴趣, 还可 能会提出一些新问题、新批评或新建议。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到一些学者 开始做数字人文的研究时, 是自己做自己 的,然后雇用一个技术员来工作,这种做 法有时候也是成功的, 但诵常不是最成功 的。因为在合作中大家会互相学习,这种 互相学习非常重要。当然这存在挑战,正 如提问中提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历史学家 要自己培养自己,或是自己学习一些新的 技术、理论。这需要时间, 但我认为这样 做非常值得。

这样的做法可能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计算机学家可能会认为某些问题提供模版化的解决方式,但这常常不适合我们想做的研究。计算机学家常常会用到其他人已经做出来的案例和程序,这本身不算是问题,但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种"数字人文"是不是真的反映了自己的研究和自己想要解释的问题?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一起写作,主要还是我来写,但是例如说做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时,需要请到数学家来为历史学家解释为什么会用到这样的概率统计方法(probabilistic method)。这样,历史学家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并且对计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对"未尽性"(uncertainty)也有非常深的了解。我觉得和他们合作可能会让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学术界可能并不一定那么割裂,他们的兴趣也可能和我们非常相似。最后一点是,合作时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找到愿意和你长期合作的人。对人文科学感兴趣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不容易找到,但还是要努力寻找。除此之外再补充一点,我觉得看我自己或者其他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其实总觉得不满意,还有进步的余地。做这样的工作确实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慢慢来做,慢慢来进步,这样才会慢慢做出我们将来可能见到的那些数字历史研究项目。

"目前,史语所的典藏数据库,对于中国史研究而言,在材料和内容上有什么样的特点?目前的开发情况是什么?"

陈熙远:其实我也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报告。其实最近由于COVID-19的关系,很多全国、全世界各地的高校都暂时在授课和研究方面受到较大冲击。所以史语所在上个月其实已经正式向全世界开放关于"汉籍资料库"以及"内阁大库"

资料库的使用, 预计开放到九月底。非常 欢迎在线上的朋友们试试看我们的资料库, 也希望能获得大家的一些反馈。刚才我们 也谈到了关于资料库的建置,从研究者的 立场补充我们过去"上穷碧落下黄泉"所 收集的各种材料,也包括我们图书馆的典 藏。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事实上的确需要人 文学者和专业的科技人员通过算法、通过 电脑程序等提供更好的字形解决、错别字 辨正、字体标注等功能。现在大家如果使 用史语所的汉籍资料库,可以看到在某种 程度之下,我们也希望能够实现由大数据 到智慧数据的建置。我们重要的标识—— 人名、地名, 甚至可以和"人名权威档"、 GIS 联系起来,还可以从其中的关联字进 行搜寻。我们每年都希望能够开放数据库, 并获得使用学者的回馈,这种回馈机制是 非常重要的。

刚才几位前辈都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一个资料库如何能够真正为人所用,研究者和技术开发人员能够怎样搭配起来?这就像过去所讲"体用"还有"道器"的问题。有一些比较单纯的资料库,像我

所负责的"内阁大库",现在还没有到达 全文辨识的阶段, 但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 诱视资料库,通过做元数据的建置,让大 家能够讲一步检索, 做图像的阅读、浏览, 这将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开发可能。在这个 过程中, 技术人员能否了解使用研究者的 需求,或者反过来讲研究者的需求是不是 能够很精准地把想象中的需求纳入到程序 开发者考虑的项目中来, 是非常重要的。 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一些开发厂商和研究人 员的商讨,以求进一步优化数据库。这是 一个漫长的道路,需要前仆后继的努力。

"'中研院'数位化的项目非常多, 而且涉及了'中研院'下属的多个机构, 包括史语所、近史所等等, 而且在新技术 的应用方面,也非常前沿。陈先生展示的 内容,包括通过关联数据将'中研院'各 方面的数据、哈佛的数据和艺术图库方面 的数据都关联在一起。因为我自己是资讯 科学的背景, 所以我特别感兴趣这些技术、 项目开发、工程建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是否每一个所内都有资讯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合作? 还是有一些商业的同辈和"中研 院"方方面面的研究人员在一起工作?

陈熙远: 其实严格来讲, 虽然我们 由中心通过审核制度资助各个人文单位 来进行相关成品、典藏、档案或文献的 数位化工作,希望能够建立最基本的资 料库, 但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够开放关联, 因为这对研究者来讲是很方便的。这牵 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我们中心 的团队也有专业的图书资讯人才和相关 科技工程师, 但个中也包括了和相关的 信息专业的教授合作。其实在早期推动

数位典藏的计划时,就有很多重要的资 讯方面的学者参与这个计划, 从图像、 文字、到影音, 这三方面都有相关学者 能够予以投入。因为很显然, 这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数位"加"人文"的架构 问题, 而事实上有很多内在的、嵌合的 考量。现在, 当然不可能资助的所有人 文社会科学项目在建资料库时都能有相 关技术资源支持,但我们希望通过每年 的成果展示以及相关的课题研讨, 包括 数字人文会议等媒介,和中心更密切地 合作, 这其实也还在摸索当中。

我们想要以此产生学术的成果和成绩, 不只是人文学者, 包括参与项目的科技人 才,这个问题严格来讲在"中研院"还没 有完全解决。但至少很重要的一点是,"中 研院"对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视的, 也希望 能够通过数位中心这样一个平台, 使这些 人文研究获得更好的发展。各所面临的问 题,接下来可能会想办法在经费上来处理。 我们所知的大部分资料库,其实是商业的, 但"中研院"的这些资料库,原则上实际 上是由"中研院"来进一步维建、管理、 甚至可以说经营的,每一年可能从海外和 国内申请经费,但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商业 公司来做统筹工作。这和其他数据库,像 我们熟悉的方志库、古籍库相比有很大不 同。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如何用一个更 好的方式来进行数据库开放, 在本次数据 库开放的过程中, 也是纳入到我们的议程 来探讨的。

"在今天的技术环境之下,诸位专家 都是做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 的。大家觉得现在中国历史研究在数字人

文的帮扶之下会对我们的全球文明产生什 么的价值和贡献?怎么样看待中国历史研 究对全球文明建设的推进?"

包弼德: 我们总是在给不是专门学 中国历史的人讲,中国历史的文献,是 两千五百年以来一直有继承性的,是很 广大、很详细的。中国历史一定是世界 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未来也是我们 学界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资源。我们可以 的确这样讲, 但我们应该怎样证明? 我 们在做一些数据库,比如 CBDB 的时候, 也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中国史学领域以 外的人, 能够看到中国史料和数据的丰 富。欧洲史和中国史有一点很有趣的不 同,如果我们看欧洲中叶的历史,他们 地方的资料非常丰富,比中国丰富得多。 例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他们关于书信 的档案, 比全中国中古史的地方书信档 案还要多。中国的文献,有很多是全国 性的,可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以来, 地方志的资料也是很重要的。到17、18 世纪,中国的地方史的材料,还是比欧 洲更丰富。所以从资料来看,中国史和 其他世界史分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不同, 可是从问题意识来讲,又有许多问题可 以做比较性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确不太 好回答,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魏希德: 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到中国史 如何为全球史作出贡献。我觉得这个问 题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中国历史有很 多数据,这是一方面的贡献。20世纪, 中国人文科学家也出了很多参考书,这 些参考书其实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可 以利用这些材料来做一些先进的平台,

这方面其实 CBDB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讲到历史经验的话,我自己的看法是其 实我们应该把中国历史的经验连接到其 他全球中。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我 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数 字人文刚开始成为研究热点的时候,每 个国家都单独地做每个国家的项目,东 亚、欧洲、美国都是这样。这当然有好处,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数据库;但也 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些数据库常常没办 法互用。将来,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把 中国和整个东亚的历史经验、数据、平 台连接到其他文明的材料中,这可以让 我们做新的历史研究。从19世纪开始, 我们所写的历史都是一些国家性的历史, 当我们把全时间、全人类的历史放在一 起,可能会发现,通常这些去国家性的 历史可能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误会, 所以 我希望我们能弥补不足,做这项工作。

薛凤:我稍微补充两点。我认为包 教授和魏教授已经说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的视野也是国际化的。我还是要强 调自己是一个科学历史家, 我觉得如果 应用中国历史的长期的材料,最大的好 外是可以看到长期的认识和发展。这方 面我认为中国的材料还是有特点的。这 和多样性有关,因为各种各样的地方都 有不同的材料,对数字人文的应用方式 也不同。中国有这么多的文献材料,同 又有很多文物方面的材料,对此开展数 字人文研究,既存在挑战,也存在机遇。 我希望中国在这个方向也能继续发展起 来,据我估计,中国史学界在数字人文 研究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 静园学术 189

### 会议总结

最后,何晋老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 总结。何晋老师指出,数字人文未来可能 会对史学研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也对历 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影响。希望这次 的研讨会能够对未来的历史学研究者带来 启发, 也希望未来史学界也能够有科班出 身的数字人文研究人才。同时, 也希望未

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便干使用的数字人 文研究资源整合平台出现。

借此机会, 王军老师向大家公布了北 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数字人文创新作 品展'暨数字人文国际论坛 2020" 即将举 办的消息,并发布了展会征稿启事。

(撰稿: 侯玥然)



# 张大庆: 天花根除的全球史

2020年6月16日晚,由文研院、北 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联合举办的"科 学·文明"系列讲座第七讲在线上平台以 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天花根除的全球 史"。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大庆 主讲,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中系教授 张藜主持。

### 一、世界上第一位天花患者

天花使感染者们遭受到巨大的痛苦: 发烧、严重头痛、肌肉疼痛、身体孔口大 量出血、呕吐,以及身体大部分地方出现 充满脓包的丑陋皮疹。作为一种古老的病 毒,其起源至今尚未明了。

有科学家猜测, 天花病毒曾是一种无 害的痘病毒,可感染家畜(例如发生在牛 身上的牛痘),在人类畜养的过程中与其

频繁接触,从而变异,在人体组织中生长、 复制并使人致病。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公 元前 10000 年左右。

从现有证据来看, 迄今发现最早患有 天花的病人,是于公元前 1157 年去世的古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研究者们发现, 法老的脸部、脖子和肩膀上都留下了极其 类似天花造成的疤痕, 由此推测, 可能早 在公元前 1161 年, 天花就开始袭击埃及。

此后,通过以战争为主的传播方式, 天花逐渐遍布亚欧大陆。随着大航海时代 的到来, 它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美洲 大陆。西班牙侵略者将天花带到美洲,致 使在美洲大陆暴发了长达8年的传染病。 相关研究表明,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的 一个世纪内, 2500 万原住民, 只有600万 活了下来。

1519年,西班牙探险 家赫南 · 科尔特斯带领远征 军和天花病毒在墨西哥海 岸登陆,数周内,原住民阿 兹特克人被天花摧毁。17 世纪初, 普利茅斯殖民地附 近的印第安人遭遇天花,患 者死亡率近90%。

天花在中国流行,最 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 纪——战争中, 由俘虏从 印度经越南带到中国。因

此,在中国古代,天花也称"虏疮"。我 国东晋时期的名医葛洪在《时后备急方》 中对天花的描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且 较为准确的记载: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 须臾周匝, 状如火疮, 皆戴白浆, 随决随生, 不即治, 剧者多死。治得瘥后, 疮斑紫黑, 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以建武中于南 阳击虏所得, 仍呼为虏疮, 诸医参详作治, 用之有效。"

英国医生托马斯・西登汉姆(1624-1689)观察到,富人患天花的死亡率高于 穷人。他由此推论, 当时医疗方式可能弊 大于利,穷人因很难获得治疗反而更少死 亡。美国第一本关于天花的小册子是托马 斯·撒切尔医生(Thomas Thacher)编 写的《新英格兰公众处置天花或麻疹指南》。

但是, 当时, 对天花的处置仍为放血 降温、发汗调整体液平衡等传统疗法,甚 至还有将房间布置为红色的"红色疗法"。



天花医院

实际上,放血、发汗,对发热或许有效, 但并不能控制该病的进程。能否幸存,只 能凭借病人自身的"天然自愈力"。

那么, 防治天花的方法, 是如何被我 们发现和掌握的呢?

### 二、现代免疫学先驱: 人痘接种术

在认识疾病、与之作斗争的漫长历史 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些疾病在人的一 生中只发生一次,康复后通常不会再患。 于是,"接种"这种自然保护的方式开始 被广泛使用——让孩子们多接触温和型的 传染病,以保护他们日后免受更严重的疾 病侵袭。

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出现较早。据《医 宗金鉴》记录, "宋真宗时峨眉山有神 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其法 遂传干世。"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 用于人痘接种的工具和方法。1661年, 顺治因染天花去世。出过痘的康熙十分 重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他在《庭训格言》 中提到:

种痘工具与方法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德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可以说,康熙的支持对人痘接种的推 广发挥了重要影响。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彼得一世派人来京学习满汉文字和人痘接种。"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衙内,在京城肄业。"

这一时期,通过贸易,到17世纪时,欧洲与非洲诸地都接触到了人痘接种。18世纪,通过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英国皇家学会了解到把粉末状的天花痂吹进鼻孔进行接种的人痘接种法。1750年代,许多欧洲王室成员死于天花。在意大利内科医生提摩尼(Emmanuel Timoni)的大力传播下,如给时任官员写信、在学术期刊发文等,人痘接种在欧洲得到推广。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大英博物馆第二任馆长的马修・麦提(Matthew Maty)看到了人痘接种的价值,并预见了天花的根除:一旦所有容易感染天花的成年人要么已经感染了天花死亡,要么永久免疫。经过人痘接种,自然天花和人工天花都将不复存在。

在美国,1721年,波士顿天花感染达到高峰,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说服当地医生博伊尔斯顿(Boylston)给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奴隶进行人痘接种,并在当地推行;1730年,天花在纽约等地流行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文提倡接种人痘,人痘接种在美国的传播加快。

独立战争期间,天花流行病肆虐整个 北美,大陆军遭受了重创。17岁时已经感 染过天花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开始关注天花对军队的影响:一方面,欧 洲人接触这种疾病比美国人早,这相当于 英军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感 染这种致命疾病,一些州拒绝或暂停士兵 招募。为了预防天花感染,1777年,华盛 顿下达命令,让整个大陆军实施人痘接种。 当然,人痘接种术在欧美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有宗教人士认为,人类试图控制疾病是不虔诚的;有些医生认为,人痘接种可能是无效的——即便它清除了血液中的天花颗粒,但留下其他腐烂的颗粒会导致更危险的发烧,而且人痘还可能传播其他更严重的疾病。

既然人痘接种风险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 三、技术升级: 牛痘疫苗

在消灭天花的历史中,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类疾病预防史上,牛痘接种的发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他曾给布里斯托附近的乡村外科医生兼药剂师当学徒,期间,从一位挤奶女工那里听说,得过牛痘就不会感染天花。 1772年,年仅23岁的詹纳带着满腔热血与学到的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伯克利,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

1796年5月14日,积累了丰富行 医经验的詹纳给8岁的菲普斯(James Phipps)接种了牛痘,痘苗取自一位挤奶 女工。菲普斯出现局部反应,几天后就完全 恢复了。为了检验牛痘的保护作用,同年7 月,他为菲普斯接种了取自人类天花疮的物 质,结果是成功的。次年,詹纳给英国皇家 学会写信,描述其实验和观察结果,被拒。 一个乡村医生想要打破权威何其艰难。

1798年,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介绍"在英国西部尤其是格洛斯特郡发现的 一种称为牛痘的疾病之原因和效果研究", 包含利用牛痘脓包材料保护菲普斯免受天花 感染以及 22 个相关病例的成功案例。

他还跑去伦敦寻找接种疫苗的志愿者, 然而3个月一无所获。在快要放弃时,先前 结识的外科医生亨利·克莱恩主动使用了詹 纳提供的疫苗,再次证明接种牛痘疫苗可以 预防天花感染。在几次卓有成效的临床试验 后,牛痘接种在英国得到了迅速推广。

为什么接种牛痘也可以预防天花?

牛痘是牛的一种不常见疾病,通常是温和的,可以通过牛身上的疮传染给与之发生接触的人。牛痘病毒(cowpox virus)属于正痘病毒(orthopox virus)家族,这个家族还包括马痘病毒(horsepox virus)、猴痘病毒(monkeypox virus)和引起天花的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es)。

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非常相似,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DNA)基本相同。当它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能产生中和病毒的抗体。由于这些病毒之间可以产生交叉免疫,感染牛痘所产生的的抗体也就可以对天花病毒产生作用。因此,挤奶女工感染过牛痘后,就不会再患天花。在医学史上,很少有医疗方法能取得类似牛痘接种预防天花这样立竿见影的成效。

1801年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也 开始推行这种疗法。在法国,拿破仑命 令麾下军队全部接种疫苗;美国总统杰 斐逊不仅大力推行疫苗接种,还致信詹 纳,称赞他祛除了人类最大的苦难;有 几个国家甚至强制接种牛痘疫苗。10年 间,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已传播到 世界各地。

### 四、中国人如何战胜天花?

19世纪初, 澳商葡人带来"活牛痘苗", 为澳门的孩童接种牛痘, 这是较早关于中 国生痘疫苗的记录。1805年、英国医生亚 历山大・皮尔逊 (Alexander Pearson) 将牛痘接种术引入中国。传入早期,得到 广东行商(郑崇谦、伍秉鉴等)和传教士 医生(雑魏林、嘉约翰、合信、德贞等) 的大力支持。



《根除天花宣言》

后来,湖南、江南、福建、四川等地 的地方官或请医生将牛痘术带到自己的辖 地,或支持开设牛痘局。一些乡贤直接创 办牛痘局或支持相关工作,一些慈善机构 也参与其中。

1817年,皮尔逊的助手邱熺编写《引 痘略》,运用中医医理来解释牛痘术,使 其被更多中国人接受。之后, 牛痘接种在 中国逐渐制度化: 1919年,中央防疫处制 成牛痘苗: 1928年, 国民政府颁布《种痘 条例》;1929年,卫生部颁布《省市种痘 传习所童程》。

民国时期政府将牛痘接种纳入公共卫 生事业,但因政局动荡,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后,国家规定对满6 个月儿童进行普遍接种,之后每6年复种 一次,直至18岁。

由此, 天花发病人数得以迅速下降。 从 1950 年到 1954 年, 我国天花病例从 4 万多降至仅800余例;至1957年,少数 地区还有个案发生: 60年代初,中国最后 一个天花病人痊愈,天花彻底被中国人征 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等因素,直 到 1979 年底, 这项成绩才获得世界卫生组 织(WHO)认证。

### 五、全世界行动起来

20世纪中期,根除天花作为一个全球 性目标被提上日程。1958年,在第11届 世界卫生大会上, 苏联代表提出全球根除 天花的议案,获得全票通过,WHO 启动 了"根除天花规划"。

然而,由于美苏敌对状态、资金短 缺和相关国家政府官僚化等原因,该规 划并未及时有效地付诸行动。1966年, 美苏达成共识,在第19届世界卫生大会 上通过决议,同意协调各国的根除天花 规划,将根除天花项目列入 WHO 正规 预算。

WHO 启动"根除天花加强规划", 计 划 10 年内在全球根除天花;同时,成立根 除天花工作组,负责协调各国的天花根除计 划以及提供技术与经济支持。各国政府积极 配合,广泛开展疫苗接种并及时通报疫情。

到 1973 年底, 天花仅存于南亚次大陆 和非洲的一角——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1977年10月26日, 天花皮疹出现在一 个索马里人身上, 这是世界最后一个天花 病例。1979年12月9日,瑞士日内瓦, WHO专家组郑重地在承载着《根除天花 宣言》的羊皮纸上签字,并盖上红色蜡印。 宣言用6种语言写道:

"我们,全球扑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委员, 证实扑灭天花已经在全世界实现。"

折磨人类数千年的天花病毒, 通过各 国共同努力,终于被人类征服。

# 六、为什么第一个被人类根除的传 染病是天花?

其一,与疟疾和黄热病不同,天花 是一种只影响人类的疾病,没有动物宿主。 当天花感染未接种疫苗的个体时,疾病迅 速发作,严重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只有在 出疹时才会传染。被感染的人要么死于这 种疾病, 要么痊愈终身免疫。因此, 不存 在可能使传播不可预测的载体。而且,与 麻风病或性传播疾病相比, 天花的污名化 不明显, 很少有病人会隐瞒病情。

其二, 在天花的预防方面, 针对一种 稳定毒株的有效疫苗是可用的, 并且已经 使用了10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 天花疫苗接种技术的 改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保存技术使疫 苗得以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中储存, 而且更 易运输;与喷射注射枪相比,分叉疫苗注 射用针每次使用的疫苗量仅需 0.0025mL, 且消毒后能够重复使用,极大地降低了成 本、提高了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成功根除天花,在干 各国政府、科学家与国际组织等不同行为 体之间的多维互动。这展示出科学标准与 政治价值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塑造, 充分证 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征服传染病的 重要意义。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常常不平衡, 贫穷国家和地区易出现病毒 卷土重来的现象, 并播散到其他地区, 这 是导致艾滋病等疾病广泛蔓延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 传染病远没有到退出历史 舞台的时候。面对突发的传染病, 我们依 然会惊恐:对于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还有 待深入探索。我们不得不接受人类将与传 染病长期共存的严峻局面。

从人类根除天花的历史中,我们看到, 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已为我们应对传染病提 供了丰富的手段。我们相信依靠科学、依 靠聪明才智、依靠团结友爱精神,人类可 以从容地面对各类传染病的挑战,不断提 升健康水平。

(撰稿: 韩明月)





文研回望

# 文研院开启"云端论坛"再现学者对话与交锋

自创立以来,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一直致力于推动跨学科的交流, 鼓励不同学 科的学者以各自的视角加入到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诸多核心议题的讨论之中, 从而激发学 术发展的潜在活力。"文研论坛"是以多视 角、跨学科的深度对话交流为特色的常规活 动,一直深受师牛欢迎。疫情期间,文研院 将过去的线下论坛转移至线上, 开辟"云端

论坛"栏目, 重启思想对话与交锋, 通过视 频的形式将学者之间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呈 现给广大师生。目前已举办十场, 具体内容 参见文研学术·云端论坛。

(本文于2020年5月21日载于北京大学 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 王瑞)



# 文研院携手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第二季音频讲座

文研院携手三联中读共同打造的"北大 文研学堂"精选音频栏目,自2019年底在"三 联中读"官方 app 推出以来, 吸引了众多听 众订阅。近日,第二季"多面的制度"专题 全新上线,内容选自文研院于2018年秋季 学期至2019年春季学期举办的"跨学科视 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

上一季"文明的起源"专题精选十场文 研院优质学术活动, 带领听众一同回溯早期 中国的历史,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寻找东 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路径。陆续推出的 第二季"多面的制度"专题,则汇聚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阎步克、清华大学 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周雪光等九位海内外学者, 在跨学科的视

野下,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 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聚焦"制度"这一人 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集中讨论古今中 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 探寻制度 研究的路径及其学术意义。

在第二季中, 阎步克从制度史的视角, 分析周代可视性的等级标志——酒爵与酒 尊。发达的衔号系统、精密的升降规则、森 然不紊的等级待遇, 必定是行政体制发展到 特定阶段的产物。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爵, 西周仅在孕育之中,它们实际都是春秋以来 才逐渐成形的。然而, 西周已是贵族社会, 大小贵族虽不像后世那样有成熟的品秩勋 爵, 但也形成了一些萌芽性的、原生性的标 识方式。



候旭东以古人心中的"制度",即中 国古代典籍中制度的含义为切入点,论述制 度逐渐成为制度中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变的意 义, 在梳理制度史研究脉络的同时, 关注对 制度实态的研究。

周雪光围绕"为什么非正式制度会盛 行不衰?""如何从非正式制度理解正式 制度和国家治理?"等问题,分析了非正 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背景和逻辑,探讨 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机制,以及对中国国 家治理的意义。

近年来,"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 研究范式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即不再 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 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 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 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于这一研 究背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以宋 朝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例,探讨如何挖掘和 理解制度史的"活动"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同顾 了国家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相关理论,提出 "官场+市场"的理论、重新审视和评价政 府与市场在中国的增长机制中各自所扮演的 角色及其互动模式,进而解释中国增长所带 来的理论困惑。

一条鞭法和图甲制, 在明清国家制度变 革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志伟阐释了明代基层社会经济的变动如何 改变里甲制的构造和运作方式, 进而导致一 条鞭法的产生, 而一条鞭法又是怎样成为这 个社会转型过程的制度基础。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 工具, 也是新制度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沿着这一脉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 授应星着重讨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源头, 述证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若干特点. 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发 牛转型的原因。

经济社会学作为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 中发展起来的学科, 具有独特的、构建自身 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世定基于自身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通 过不同的路径分析, 对经济社会学所独有的 思想方式加以解释。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 究员邢义田从可视性角度出发,以汉代官吏 的印绶和鞶囊为切入点, 重新思考制度及制 度史的研究问题,考察古人如何将政治制度 转化为有形、可视的符号,如何借助这些符 号体现不同场合下的权力与身份秩序。

"北大文研学堂"栏目以音频为主的方式呈现,配以独具特色的"文研海报"元素,回顾文研院往期学术活动内容,还原活动现场。疫情期间,文研院积极利用新媒介,开辟新栏目,透过"特别推送""云端论坛""海

外来信""线上展览"等多种内容与形式的 探索和创新,继续凝聚学者,不断拓宽学术 交流平台,贡献优质学术活动内容。

(本文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載于北京大学 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 刘雨桐)



# 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之"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 线上研讨会举行

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系和北京论坛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线上研讨会于2020年6月6日举行。秉承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宗旨,研讨会以"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为题,邀请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大家,围绕数字人文方法如何推动历史学发展、传统史学的格局将如何改变、研究者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来从事研究、数字人文方法面临的挑战与需要突破的瓶颈等前沿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信息 管理系王军教授担任研讨会召集人,研讨会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何晋教授、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梁晨教授和北京大学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主持。



邓小南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认为数字 人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人文领域理念最为 开放、成就最为显著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 式。它打造了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提供了新 的研究工具,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 式和研究活力。 著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席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在"从轶事到数据:传记数据的网络和空间分布"主题发言中表示,数字人文将促使研究者对历代传记资料在地理信息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有新的发现。包弼德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有长期合作,分别建立了两套适用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网络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会上包弼德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 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发言题目为"新 方法开辟新领域,历史研究中的数字人文"。 薛凤提出,历史学通过数字人文重组和呈现,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史料资源的数据分 析和结构分析,最大程度解析了史料的产生 原因和背景。她提到,把历史数据转到新的 结构或做成新的数据库时,我们也同时会对 该历史事件有新的了解,发掘出新的意义。

比利时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史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发言的题目为"数字历史需要什么?想象力、评测、合作"。她认为人文研究的数字化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开放想象力将成为数字历史发展的新动力。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熙远 研究员介绍了他所在的数位文化中心的规划 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作为一个数字人文研究 者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个是文本 的分析,另一个是图像的分析。陈熙远希望 未来有更多人文学者对历史资料和实物藏品 做数字收集、转译、展示及数据应用,以推 讲数字人文学科的全面发展。

在讨论问答环节,与会嘉宾与观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人文研究语料的普遍数字化,数字方法逐渐渗透到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中,由此形成了"数字人文"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一方面,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基于计算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计算机辅助下研究广度和复杂度的极大扩展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视角和新问题,注入了新活力。"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特质正在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藩篱与组织边界,为多学科的交流与协作提供了平台,进而引发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科重组和组织重构。

该场线上研讨会的直播在哔哩哔哩、百 度和中国网等直播平台上吸引众多海内外观 众点击观看,引发广泛关注。研讨会也受到 新华社、光明日报和中国文化报等多家媒体 的支持。

作为本次线上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创办于2004年的北京论坛始终致力于凝聚全球智慧,融汇世界学识,搭建高端平台。北京论坛(2020)将继续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战,开拓用东方智慧解决世界问题的国际新视野。

北京论坛(2020)将陆续推出"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聚焦人工智能、全球健康、数字人文、生物医学、技术能源、全球治理、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展开深度探讨,促进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于 2020 年 6 月 9 日载于北京大学 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纪事



# 文研纪事

04-09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六篇纪念性文章,并对"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做了简要回顾。

04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会。本次会议 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22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

5.11-6.1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丝路现场"栏目陆续推送 5 篇对和田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地进行考察的文章,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主笔。

13-19

文研院"线上雅集"栏目第一期继续推送"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系列文章《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的第二、三篇。

14 2020-05

受疫情影响,线下学术活动无法开展,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云端论坛"栏目,以视频、文字稿等形式呈现跨学科交流、重启思想对话与交锋。"云端论坛"第

一期的主题是"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王俊淇博士参与讨论。

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孟庆国处长一行到访文研院调研,双方就文研院总体发展、 各项学术工作、邀访学者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议由社会科学部 副部长王周谊主持,文研院院务会成员参加。

文研院举办"西学知识形态在中国"云端论坛视频筹备会,论坛发起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姚达兑副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研究员与院务会成员就论坛主题、形式及开展方案进行讨论。

5.15-7.2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新书推介"栏目陆续推出由各期邀访学者所著的 5 本新书及新书内译者序、章节摘录等具体内容。此外,栏目还推送了由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十余本科学史经典著作,由"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张卜天翻译。

16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七期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 莉主讲,报告题目为"地理对于人文研究的意义"。

5.17-7.5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增设"国家与文明"栏目,梳理近年来学界关于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进展。截至7月5日,该栏目陆续推布12篇资深学者撰写的文章,其中包括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学术委员赵辉、"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秦岭等。

17

文研院组织召开"思想史中的衰亡问题"线上研讨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参加会议。

5.19-7.1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读书的风景"栏目第二至七期陆续介绍围绕《续高僧传》、《仪礼》、《礼经郑氏学》、农业社会学、国家理论、当代中国史等主题的读书会。读书会由线上、线下同时开展,校内外师生共同参加。

文研纪事 205

19 2020-05 文研院推出"质性研究: 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 陆续邀请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名学者发表学术创见。5月20日,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主讲的该系列首场讲座"工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完成录制,本讲邀请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评议。

5.22-6.26

文研院"线上雅集"栏目第二期推送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的系列文章《书斋内外的钱钟书》六篇。张治副教授专门为文研院录制讲述音频,搭配幻灯片呈现报告内容。

23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八期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讲,报告题目为"从大西岛到《出埃及记》——火山与神话"。

25 2020-05 文研院举行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对到校办公做出防疫部署并提出工作要求。

29 2020-05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到访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汇报近期工作安排和计划。

"云端论坛"第二期的主题是"镜中火焰——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孙柏、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魏然参与讨论。

02

文研院举办"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筹备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奇生、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汤元宋与院务会成员 参加讨论。

由文研院、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云端论坛"第三期"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十三位学者围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苗润博新著《〈辽史〉探源》展开讨论。

"云端论坛"第四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在自然与身体之间——中西传统中的自我观念"。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程乐松,复日大学哲学学

院教授孙向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做主题报告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文研院与三联中读合作开展的"北大文研学堂"第二季,围绕"多面的制度"这一主题,以音频为主要形式,线上推出"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内容。

05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九期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讲, 报告题目为"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同步推出文字实录。

06 2020-06 文研院、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论坛联合主办的"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研讨会在线上进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军教授担任召集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睿共同主持,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薛凤(Dagmar Schäfer)、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熙远参与。本次研讨会是"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首场活动,据统计,近万人在线参加。

09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酒爵大小与人之尊卑一再谈早期爵制之物化可视形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

10

文研院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共同举办交叉学科规划系列座谈会筹备会。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副院长昝涛,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存群, 文研院院务会成员参加。

11 2020-06 "云端论坛"第五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素质教育的迷思:跨越概念之争与实践鸿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主持并做主题发言,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教授宋崔,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做主题报告并参与讨论。

12 2020-06 文研院于 2020 年 6 月至 12 月陆续推出"质性研究: 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该系列首场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八期在线上平台以视频形式推出,主题为"工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评议。

北京大学举办"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挑战与科学应对"项目预备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并发言。

14-15

为纪念马克斯·韦伯先生逝世 100 周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韦伯思想是时代的"黑暗之心"》《"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等五篇文章,以表达怀念和敬意。

16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联合举办的"科学·文明"系列讲座第七讲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天花根除的全球史"。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大庆主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张藜主持。

17-18

北京大学交叉学科建设专题座谈会在静园二院及网络会议平台同时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副校长张平文、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方方、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等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主持,

17 2020-06 文研院开设"袖珍经典"栏目,邀请校内外学者围绕古今中外的一部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栏目第一期推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老师苏薇星的音频讲述《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by John Keats》。

19 2020-06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十期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讲,报告题目为"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云端论坛"第六期的主题是"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西学传入与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达兑,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学院博士后李骛哲作主题报告。

20

"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二期"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一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做主题报告,台湾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方震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评议。

26

文研院"线上雅集"栏目第三期推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的文章《历史上的杀虎口》。李孝聪教授专门为本期推送录制音频,搭配幻灯片讲述历史地理学上杀虎口长城的意义,并回顾文研院开展的历次西北史地考察。

27 2020-06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十一期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辉主讲,报告题目为"莱辛如何思考文明冲突问题:《智者纳坦》中的指环寓言再释"。

"云端论坛"第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重审考据之学——清代学术的表与里"。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华喆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璧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董婧宸、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教授张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琦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二期"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二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主持,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做主题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评议。

28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统一部署, 文研院全体教职员工及后勤保障人员参加学校组织的核酸检测。

01

文研院举行"科学·文明"系列讲座视频筹备会,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 虹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 02

文研院举行2020年春季学期视频总结会,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并发言。

"袖珍经典"栏目第二期推送文研院邀访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的文章《再读 < 秋兴八首 > 》。文章中,于溯副教授以幻灯片动图的形式呈现了《秋兴八首》完满结构和作者的复杂心境。

03

文研院举行视频会,讨论文献学主题系列论坛开展形式。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参加。

"云端论坛"第八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方法、源流与传承:再谈中西学脉间的陈寅恪"。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清华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做主题报告。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九期在线上平台推出,主题为"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评议。

04

"袖珍经典"栏目第三期推送"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 副教授李溪的文章《梦中林泉:苏轼题郭熙的 < 秋山平远图 > 》。

"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二期"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三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魏希德,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孟天广做主题报告,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平田茂树,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文研院邀访学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黄宽重评议。

07 <sup>2020-07</sup> "中国古建筑与历史"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

09 <sup>2020-07</sup>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龚六堂、副部长王周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代尧、常务副主编刘曙光到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商讨文研院和北大学报合作事宜。

"云端论坛"第九期在线上平台推出,主题为"危机中的农村与农村中的危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熊春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狄金华出席并参与讨论。

10

"云端论坛"第十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南渡君臣:浙江南宋陵墓新观察"。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晖达做主题报告,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魏峰出席并参与讨论。

10-12

为纪念瞿同祖先生诞辰 110 周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自述文章《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一篇、学术年表一篇及纪念性文章四篇,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13

北京大学召开暑期工作部署视频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参加并传达会议精神和相关工作安排。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代尧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商议文研院学术活动成果发表事宜。

"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 恳谈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与会人员包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副教授韩巍、助理教授苗润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各位就文研院秋季学期历史学与考古学跨学科学术活动的组织筹备事宜进行商议。

16

文研院举行工作委员会视频会议,就核心议题、学者凝聚、学科交叉、成果发布 等问题进行合议,并讨论规划下一阶段工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教授一行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 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叩问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角"系列讲座等 跨学科合作项目的推进方式。

